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

#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 What News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 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

〔美〕比尔·科瓦齐（Bill Kovach）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著
刘海龙 连晓东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 What News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科瓦齐和罗森斯蒂尔关于每条原则的议论均是言简意赅的散文精品，堪称名言警句的洞见俯仰皆是。……这本书应该成为新闻专业工作者、学生和他们所服务的公民的核心读物。

——卡尔·塞申斯·斯特普（Carl Sessions Stepp）

这本书会让记者若有所思，想到自己的职业和职业良心，好看、中肯而深刻。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际新闻界》主编，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秘书）

这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新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有助于我们领悟新闻职业的责任和使命，有助于我们知晓新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当我们能够充满自信地汲取来自世界各方的智慧之际，我们就一定会拥有更强大的贡献于祖国和人民的专业力量。

——高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ISBN 978-7-301-18179-9

9 787301 181799 >

定价：30.00元

#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

〔美〕比尔·科瓦齐（Bill Kovach）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著
刘海龙 连晓东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103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美）科瓦齐（Kovach，B.），（美）罗森斯蒂尔（Rosenstiel，T.）著；刘海龙，连晓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
ISBN 978-7-301-18179-9

Ⅰ.①新…　Ⅱ.①科…②罗…③刘…④连…　Ⅲ.①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研究　Ⅳ.①G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2910 号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by Bill Kovach and Tom Rosenstiel
Copyright © 2001 by Bill Kovach and Tom Rosenstie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o Black Inc., the David Black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Peking Univeris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
著作责任者：〔美〕比尔·科瓦齐　汤姆·罗森斯蒂尔　著　刘海龙　连晓东　译
责 任 编 辑：张盈盈　周丽锦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8179-9/G·3006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54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 译者前言
## 从默会知识到公共知识

2009年我在美国访问期间，与一位曾做过记者的新闻学者谈起手头正在翻译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她会意地一笑说："你说的是那本新闻工作者的'圣经'吧。"类似的反应我在不少人那里见过，可见此书在美国新闻界影响之大。我将部分译文发到"人人网"（当时还叫"校内网"）时，几位同学回复说，这本书已经被作为他们的教材使用。我之前了解到此书曾被港台地区的一些学校列为教学参考书，但没想到它早已经悄然进入内地的新闻学课堂。为了让更多的新闻学子和新闻工作者读到这本近年来少有的新闻研究佳作，我和妻子利用在美国访学期间的闲暇时间，翻译了此书。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有长期的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经历，因此该书贴近现实，生动活泼，2001年一问世便迅速成为畅销书，目前呈现给读者的是2007年出版的修订版。这一版与第一版相比，加入了一条新的原则，并增加了不少新案例。

作者之一比尔·科瓦齐在《纽约时报》工作过18年（1968—1986年），曾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在《亚特兰大宪章报》工作过两年，担任过哈佛大学尼曼基金的负责人、卓越新闻项目的资深顾问和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教师，他还是本书导论中提到的"热心新闻工作者委员会"的创始人。据他介绍，他曾随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来访过中国。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汤姆·罗森斯蒂尔在《洛杉矶时报》和《新闻周刊》等媒体有长达30年的新闻工作经验。1997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创立了"卓越新闻项目"，2007年该项目从哥大分离出来，成为皮尤研究中心的项目。该项目的网站www.journalism.org是新闻研究领域的知名网站。他们二人还

合作出版过一本名为《扭曲的速度》(*Warp Speed: America in The Age of Mixed Media, 1999*)的书。

我通过朋友联系到两位作者,他们非常支持本书的翻译工作,科瓦齐先生不仅就翻译中的一些问题给予了耐心解答,还和罗森斯蒂尔一起为中文版撰写了序言,并热情希望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也能加入到这些问题的讨论之中。

**作为实践智慧的新闻学**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本近年来在美国新闻界颇具影响的著作,有必要先把它放回写作的语境中,然后再来思考它对于中国新闻界的启示。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中美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在中国被奉为显学、从业者必修的新闻理论,在美国几乎找不到踪影。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新闻教育中没有理论成分,而是他们认为新闻工作作为一种实践,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新闻精神已经融入到了采写编评等实务课程之中,不需要单独开设一门理论课来传授。此外,对于崇尚言论自由的美国人来说,写新闻是一个中立的技术活,毋需加上太多条条框框。正因为如此,"journalism"才既有中文里的"新闻学"的意思,又有"新闻工作"的意思。[①] 从广义上来讲,新闻研究也是新闻工作的一部分,在实践与理论之间,新闻学离前者更近,离后者较远。所以学者们也大可不必一听到"新闻无学"便着急上火。这里的"学"指的是学院派尊崇的以发现新知识为取向的智力游戏。这就像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访问中国时曾说过"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一样,他所说的"哲学"特指源于古希腊的理性智慧,并不含有贬低中国人的意思。[②] 同样,这种学术取向的"学"对于新闻工作来说有用,但很间接。新闻工作需要的是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智慧。尽管看上去,理论取向的新闻学术研究和实践取向的新闻学讨论的是同一个对象,但是二者的旨趣和方法却存在着很大差异。

就在美国的新闻研究者内部,这个分歧也十分明显。这在这两类研究的期刊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尽管近年来一些刊物(如 *Journalism*)试图调和这种分歧,但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

① 潘忠党:《新闻与传播之别——解读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6 年第 4 期。

②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9 页。

*view*)和《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的不同还是一望可知的。芭比·泽丽泽(Barbie Zelizer)依据研究主体的不同,把新闻研究分成了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者和新闻学者三个诠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她形象地把这三者之间的分歧做了如下描述:

> 新闻工作者说新闻研究者和教育者无权把他们的脏衣服晾出来给人参观;新闻研究者说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者不够理论化;新闻教育说新闻工作者把头埋在沙子里,新闻研究者把头伸进云里。①

按照这个划分,《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应当属于新闻教育者的话语,对过于现实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可能嫌它太理想化,而对学院派的新闻学者来说,则会嫌它陷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自拔。在中国,新闻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分化还不明显,导致了对"新闻理论"的理解与美国不大相同。

中国的新闻理论也不是从新闻学研究一开始就存在。在早期翻译的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和休曼(Edwin Shuman)的《实用新闻学》(*Practical Journalism*)②,以及徐宝璜写的《新闻学》、邵飘萍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等③中国新闻学的源头中,都沿袭了美国式新闻研究的这种追求实用智慧的精神,基本属于泽丽泽划分的三类诠释共同体中的新闻教育者的传统。

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的出现可追溯到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④,这篇破中有立的文章把唯物主义思想引入新闻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闻学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哲学传统。20世纪50年代通过学习苏联新闻教育模式,这套新闻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从产生的语境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理论是对当时新闻体制的正当化过程(legitimation),其主要目的不是指导实践,而是试图通过唯物主义哲学回答社会主义新闻体制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这个知识

---

① Barbie Zelizer, "Journalism and the Academy", in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Karin Wahl-Jorgensen and Thomas Hanitzsch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9, pp. 29--41.

② Edwin L. Shuman, *Practical Journalism: A Complete Manual of the Best Newspaper Methods*, New York: N. Y.,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3.

③ 见徐宝璜等:《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④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转自《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体系偏重学理，在实践维度上并无独特的贡献，这一缺失直接导致了1978年以后在新闻教育的课堂上“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新闻实践方法和唯物主义新闻理论表面上“和平共处”的特殊局面。

中国新闻理论产生的语境对今天的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影响深远。由于路径依赖和体制原因，哲学（包括非唯物主义的哲学）成为中国新闻理论的主要背景学科，追求学术化、理论化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主流。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少研究者没有意识到学术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区别，缺乏研究规范，一批打着学术研究之名，既无理论建树，又无实践价值的所谓学术成果充斥着新闻理论研究领域。当这种“学术研究”与海外对接时，又意识到自身和美国新闻教育者的研究相比过于理论化，与美国的新闻学术研究相比，又缺乏规范。于是它把前者划入新闻业务和技巧的范畴，把后者划入“传播学”范畴。[①] 这便出现了前面提到的在美国的新闻教育中没有“新闻理论”的现象。

这里对中国新闻理论产生背景的简单回顾，目的并不是否定它，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新闻理论的差异。正如译者在另一篇论述传播学本土化的文章中提出的，我们要正视中国特色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是采取一种鸵鸟似的回避态度或非此即彼的否定态度。[②] 但是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仍然抱着寻找中国式新闻理论的心态来看这本《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肯定会失望而归，因为它大多是一些经验的总结，谈不上多高深。在美国的书店里，如果碰巧没有“新闻”这一分类的话，这本书多半会被放到“语言”或“写作”的书架上。

## 作为手艺的新闻工作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不是一本纯学术著作。正如副标题“新闻工作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所提示的，这是一本针对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公民

---

① 比如近年来译介的北美学术界的研究如《做新闻》、《什么在决定新闻》、《发掘新闻》、《维系民主》等成果都被列入传播学的系列丛书。当然，这个“传播学”也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建构起来的他者。通过对立面的建构，中国的新闻学进一步完成了自己的正当化过程，形成了本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实用/虚文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见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② 刘海龙：《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

的普及性读物。科瓦齐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强调，这本书的主旨是找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个人品质，也就是书中总结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1. 新闻工作首先要对真实负责。
2. 新闻工作首先要忠于公民。
3. 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
4. 新闻工作者必须独立于报道对象
5. 新闻工作者必须成为独立的权力监督者。
6. 新闻媒体必须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
7. 新闻工作者必须让重大事件变得有趣并且与受众息息相关。
8. 新闻工作者应该使新闻全面均衡。
9. 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按良心行事。
10. 公民对新闻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在本书的修订版里，增加了初版没有的第十条原则，对公民也提出了要求。不论这些原则的细节如何变化，其道一以贯之，就是作者们在导言里提出的“新闻工作的目标是向人民提供获得自由和自治所需的信息”。自由是个人权利的核心，自治(self-governing)是民主的精髓。与中国的新闻理论倚重哲学不同，美国的“新闻理论”把政治学作为最重要的背景学科。新闻与民主的关系是本书十大主题背后的复调。

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上述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并不是逻辑思辨的结果，而是通过大量的调查与访谈，对新闻工作者共识的描述。它用研究实然世界的经验方法，完成了对应然原则的建构。换句话说，这些原则不是客观的法则(law)，而是新闻工作者们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rules)。这一点也体现出美国新闻研究注重实践智慧的特征。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不再把新闻工作看成是一个专业(profession)，而是把它看成一门手艺(craft)。[①] 因为和更具有专业性的医生、律师、会计等职业相比，新闻工作中能够被规范化、标准化的部分实在有限。多数新闻工作者是在实践中，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中摸索、试错、领悟而成为熟练匠人的。在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共同体接受

① Barbie Zelizer,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Sage, 2004, p. 34.

的行业规则。因此，作者们认为，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必须在传统内寻找，而不是通过逻辑推导植入。但是或许是出于谨慎，或许是出于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不得为言论立法的敬畏，新闻工作者流传下来的这些原则从未被清晰地阐明过。此书的重要贡献，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全新的见解，而是首次把美国新闻传统中这些默会的知识(tacit knowledge)转换成了用语言表述的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让它们接受来自不同媒体和文化的新闻工作者的实践检验。

"默会的知识"是由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知识除了可以言说的知识(articulated knowledge)外，还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的知识。后者来自长期经验积累，是主观的、个人化的知识。[①] 之前提到的"新闻无学"所包含的另一层含义，正是指新闻工作的这种无法通过语言把握，只能通过师傅带徒弟、依靠每个实践者体会顿悟的特征。波兰尼有一句名言——"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说出的要多"，然而语言的吸引力如此之大，老子明知"道可道，非常道"，仍要花上五千字来解释他所谓的"道"。本书的两位作者也固执地想通过自己的调研，把这些被新闻工作者当作理所当然的直觉变成能够被讨论的公共知识。

本书名为"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正有此喻意，基本元素须臾不可离，但却易被当成理所当然之事而忽略。这个书名写成英语一目了然，但要翻译成准确的中文却令译者颇为踌躇。除了前面讨论过的"journalism"难译之外，信达雅地把"elements"的含义传达出来也不容易。这个概念来自于古希腊和许多文明中都存在的"元素说"，认为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基质构成，比如古希腊的土、水、气、火，中国的"五行"说等。作者用这个比喻来暗示这些原则具有普世性，是新闻活动的基础。但是在中国的新闻理论里，"新闻的元素"或者"新闻的要素"一般指构成新闻事实的5W和1个H，一时难以改变。笔者发现作者在文中有时也使用"principles"来换用"elements"，"基本原则"这个概念倒是不易引起误解。在卓越新闻项目的网站上，这几条规范也被称为"新闻工作的原则"(principles of journalism)。[②] 我给作者科瓦齐发去电子邮件，询问可

① 〔英〕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见 http://www.journalism.org/resources/principles。

否用 principles(基本原则)来翻译书名,也得到了他的肯定。[①]

**美国新闻业的危机**

为什么作者们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做这个总结性的工作呢?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新闻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如果更直白一些,就是随着产业和技术的发展,美国的新闻界出现了价值危机。在令人不知所措的新形势下,新闻工作的标准是与时俱进,还是坚守传统?如果坚守传统,哪些传统是时代的产物,哪些传统是永恒的?

这本《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本书之所以被称为新闻的"新保守主义"的代表,就是因为它在主张适应变化的同时,更强调坚守新闻工作的传统,提倡通过修炼内功,来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挑战。

美国新闻业面临的危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集团化、公司化带来的价值危机和经济危机。非新闻行业的大公司经营新闻媒体带来的新闻质量下降、新闻标准滑坡和对多元观点的压制已经不是新鲜话题,本书也多有涉及。此外,书中提到的一些现象近年有了新变化,2008 年以来美国经济危机导致一些历史悠久的知名报刊停刊或转向网络出版更带来了我们对媒介经营模式的思考。不少媒体的问题并不出在发行量和新闻质量上,而是出在经营上。有的媒体是被投资市场将市价炒得过高,致使媒体拥有者(多来自非信息产业)以虚高的价格购入媒体,欠下银行大笔贷款,一旦金融市场泡沫破裂,资金链出现问题,公司就面临破产危机。还有的媒体是因为盈利模式过于依赖广告,一旦经济情况不好,或者广告商对媒体失去信心,媒体就会面临经营困境。比如 2010 年老牌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尽管仍有 100 万份的发行量,但是由于广告商不愿在此刊物上投放广告,遂陷入危机,最后不得不以 1 美元低价出售。新闻媒体如何保证其经营模式更稳定?是否可以在私有化、商业化模式之外探索其他的经营模式?但是相比这些问题,本书更关注的是如何通过优质的内容和消费者建立起更牢固的关系,认为只有受众的关注和支持才是媒体抵御外界冲击的关键。

第二个危机是客观中立的价值正受到挑战。受市场萎缩的影响,为

---

① 展江教授建议将书名译为《新闻学精义》,这是个很符合中文表达的意译。亦列于此,供读者参考。

吸引眼球，近年来美国一些媒体放弃了客观中立的信条，以言论类谈话节目和福克斯新闻为代表，走上了一条言论化新闻的道路。发表见解本身没有错，但是作者们认为如果在观众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观点剪裁事实，甚至歪曲事实，则违背了新闻的基本准则。这一危机暴露了传统客观性原则固有的缺陷，这一点早就为学界所诟病。[①] 言论化新闻的支持者提出，因为谁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客观的，不如放弃它，比如保守派媒体就指责美国的主流媒体具有"自由主义偏向"，二者是五十步笑百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们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透明性(transparency)。他们认为，既然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偏不倚，索性放弃这种自我标榜，老老实实地把调查和判断过程、立场和预设向受众公开，让他们来评判、选择和监督，以方法和程序的客观来代替结果的客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们完全放弃了传统的客观性概念，而是提醒新闻工作者放弃传统的武断，重新建立一种透明的客观性或受监督的客观性。

第三个危机是新闻的娱乐化。新闻娱乐化是商业逻辑影响新闻价值观的后果之一。如果把新闻仅仅看成是吸引受众注意力的信息产品，新闻与娱乐的区别就会荡然无存。按照传统的看法，这样做会导致新闻的目标由为公众服务转向俘获更多的消费者，新闻的公共性将遭到破坏。但是在严肃新闻的受众日益萎缩以及老龄化的条件下，以乔·斯图尔特(Jon Stewart)的《每日秀》(*Daily Show*)为代表的"伪新闻节目"向这种传统的划分提出了挑战。《每日秀》恶搞调侃严肃的时事和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复兴了美国建国前后讽刺性新闻的风格。尽管它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基调引来不少学者的批评，但是却把大量青少年观众重新吸引到了新闻节目面前。主持人斯图尔特的播报风格虽然夸张，然而他机智的评论却延续了传统新闻工作中的监督精神。本书第7章便列举了他在《交锋》节目中仗义执言、导致该节目被停播的事例。

类似的节目使不少人重新思考新闻与娱乐的关系。比如扎勒(Zaller)把传统的新闻称为全能新闻(Full News)。他把这种新闻比做是巡逻，要为公民提供能够形成意见的所有事物的信息，巨细无遗地关注所

---

① 如 Gaye Tuchman,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7, No. 4 (1972); Dan Schi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The Public band the Rise of Commercial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美〕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周雨、沈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有事情。但是他发现，全能新闻的标准越高，信息越专业，选民获得的信息就越少。由于普通民众注意力有限，这种严肃的高级新闻标准实际上把他们拒于千里之外。出于现实的考虑，扎勒提出了一个新标准——报警新闻(The Burglar Alarm News)，这种新闻平时可以降低标准，采用戏剧性的、娱乐的方式报道日常事件，吸引受众，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便全力以赴关注重大事件。[①] 扎勒的看法引来学界的讨论[②]，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实用主义方案。目前学术界和实践界也有不少人开始转换思路，提出不要简单地排斥娱乐，而要研究如何让娱乐更好地为严肃的新闻服务。这本书正好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新闻的定义：哪些原则可以妥协，哪些原则丝毫不能动摇。

第四个危机是新媒体对新闻工作的影响。新媒体抢夺了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这已经是毋须质疑的现实。本书作者更担心的则是新媒体会动摇新闻工作的基本标准和原则。随着博客、推特等可自由发表信息的互联网应用的出现，许多人认为专业的新闻工作已经不再重要。比如《草根媒体》的作者丹·吉尔摩(Dan Gilmor)就提出，现有的新闻是大公司生产的单向性的新闻(corporate journalism)，Web 2.0 则为创造双向对话的新闻(conversational mode of journalism)提供了条件。前者的经营模式使其无法为公共利益服务，后者则可以承担起这个责任。[③]

本书的“保守主义”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也体现得比较明显。作者们承认不能忽视公民的参与，并在 2007 年的修订版里特地加入了一个新的原则(“公民对新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专业的新闻工作是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无法替代的。网民虽然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内幕信息或者进行监督，但是由于其身份处于流动状态，受众无法快速地判断信息的可信性，一些别有用心的网络推手和“水军”甚至会使受众无所适从。更重要的是，网络的信息良莠不齐，业余作者所生产的文章内容数量庞杂，造成受众获取信息的效率下降，甚至冲击了严肃、优质的内容生产机构。他们在数字时代强调新闻的基本原则，正是要用更严格的标准，将优

---

① John Zaller, “A New Standard of News Quality: Burglar Alarms for the Monitorial Citize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003), pp. 109—130.

② Lance Bennet, “The Burglar Alarm that Just Keeps Ringing: A Reply to Zalle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003), pp. 131—138.

③ Dan Gilmor,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Reilly Media, 2006.

质、可靠的新闻与劣质、不可信的信息区别开，重建专业新闻的权威性。

**裸体和吉他**

社会在大变革时期，往往会产生一股回到传统的思潮。这既是社会有机体本能的保护机制，也为变革时期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重估传统价值的契机。尽管中国和美国的社会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上面介绍的美国新闻界面临的危机与中国新闻界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美国新闻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原则可以为我们思考相似的问题提供重要的参考，尤其是结合案例对新闻实际操作规范的介绍，对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尤其具有启发。

几年前，译者曾结合中国的案例，向非新闻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介绍过本书的部分内容。讲座结束后有听众感慨说，没想到学校的老师对我们的要求这么高。译者纠正说这些不是学校老师的要求，而是公众的要求。其实正如本书的作者们所提出的那样，在新闻界遇到经营危机的时刻，首先要明确的是自己真正服务的对象是谁。在信息纷繁复杂的今天，只有公众意识到媒体的价值，才会和媒体之间建立起长期的信任和契约关系。作者们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裸体和吉他”原理（见第 9 章）。

> 如果你想吸引受众，可以到街角表演脱衣舞，脱到一丝不挂。在短时间内或许你会吸引一群看客。但问题是如何才能让他们持续观看？如何避免观众转移注意力？还有另一种方法。假设你回到同一个街角表演吉他。第一天听的人很少。但是第二天可能会多些。这取决于你的吉他弹奏水平，如果曲目丰富多样、引人入胜，观众很可能会与日俱增。如果你弹得好，就用不着去费劲地保持观众量，总能不断吸引新观众进来，替代那些听厌了的老观众。

本书所提出的大部分原则，正是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形成的维系公众的措施。因此作者们相信，优质的新闻才会最终获得市场，他们使用了大量案例进行论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中国的公众迟早会对新闻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近些年公众对于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制方面的关注增加，公民还自己行动起来，通过调查揭露虚假报道。这些现象发出了一个信号。如果媒体轻视受众，把一些重要的原则看成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媒体一定会为自己的自负买单。

当然，如何做到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还需要中国新闻工作者与研究者

共同探索。排斥全球的经验、闭门造车固然不可取，简单地将西方理论照搬到中国或者仅仅为了验证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而进行模仿更不可取。自信开放的立场应该是把中国看成是全球新闻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借鉴他国经验，再通过中国的实践，为新闻与民主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理论，丰富全球新闻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回到新闻—民主关系的基本问题**

在新闻与民主关系的问题上，本书提出了一个“连锁公众”(interlocking public)的理论，赞成约翰·杜威的民主目的论，反对沃尔特·李普曼的民主工具论。李普曼与杜威之争是美国传媒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建构起来的一段叙事。[①] 李普曼认为新闻无法“正确”反映现实，公众无法形成“正确”民意，民主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凯瑞认为这种看法存在不足。他以杜威的看法反驳李普曼。杜威提出，民主的目标不是有效地管理公众事务，而是让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追求人的自由。换句话说，民主本身即是目的。因此新闻乃至于其他传播形式，其目的是为人们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形成具有共同文化的共同体。[②]

有学者认为这种看法将小城镇的对话式交流过度浪漫化。[③] 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论述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民主的清晰的、具有操作性的定义。英国学者赫尔德认为，“民主”有多种模式，它不是单数，而是复数。[④] 不同的民主模式对于新闻的功能、标准乃至形式都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程序民主可能更强调新闻的监督和揭丑作用，竞争性民主强调新闻对政治候选人的充分报道，参与式民主强调新闻对公共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公民动员，协商民主则强调新闻要成为理性意见交流的平台。[⑤] 尽管

---

① 其实二者在现实中并没有正面争论过这个问题。见 Michael Schudson, “The ‘Lippmann-Dewey Debate’ and the Invention of Walter Lippmann as an Anti-Democrat 1986—199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iton*, 2(2008), pp. 1031--1042。

② 〔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4—66 页。

③ Michael Schudson, “Why Conversation is Not the Soul of Democrac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4 (1997), pp. 197--309.

④ 〔美〕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⑤ Jesper Stromback. In Search of a Standard: four models of democracy and their normative implications for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Vol. 6, No. 3 (2005), pp. 331—345.

不同的民主模式对于新闻的要求有不少部分重叠，但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对新闻的规范性要求还是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不一定在于民族国家之间，就是在同一个文化内，也存在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在深度报道和解释性报道、新新闻、精确新闻、公民新闻等新闻标准的背后都存在着关于新闻—民主关系的争论。

要对上述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既需要大智慧，也需要借鉴其他文化的成果。眼前的这本《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将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的参考。

刘海龙

2010 年 12 月 8 日

# 中文版序言

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世界仍处于一百多年来变化最剧烈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的变迁比中国更加巨大。二十多年来，她一直被公认为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方面的根本变革。经济增长也创造了巨大的信息流，使成长之中的中产阶级能够进一步深入地参与公共事务。中国目前这一代新闻工作者是这个变革过程的重要环节，他们既是观察者，同时也是参与者。

我们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帮助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应对目前的新科技给他们的工作带来的各种挑战。

数字摄影、无线技术、电话、掌上电脑(PDA)和其他便携式电子设备使计算机、相机和音乐播放器的功能每天都在增加，价格也变得更加便宜。随着更多人掌握这些技术，网络新贵们找到了整合这些创新的途径。早在2002年，人们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自己的文字、照片、音频和视频。

除了技术发展以外，美国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数百万人上网浏览新闻，聚集组成全国性的社区，为讨论国家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迅速飙升，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还在继续增强。公民参与政治对话和社会对话，促进了“公民新闻”概念的出现。该运动的早期倡导者很早前就预见到，将来任何人都能制造和发布信息。

传统媒体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来自雅虎和谷歌这样的新闻集成商，它们发布的新闻并不是自己的原创内容，只是转载全世界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虽然大多数博客和个人日记相去不远，但是其中一些博主却成为美国各政治群体的意见领袖。

2004 年，博客在总统初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一年，两位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波因特学院(the Poynter Institute)结识的青年记者制作了一段 10 分钟的视频，想象了 2014 年的媒体发展情况。这段视频预言，未来占统治地位的是谷歌开发的一种叫 EPIC 的衍生产品，它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选择、消费习惯、兴趣、个人背景、社会网络调整产品，生产出属于消费者自己的内容组合”。目前，大多数新闻工作者认为这一幕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

这些新技术带来的变化削弱了 19 世纪以来美国生产新闻的经济组织的实力。它们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创造新的经济模式，为不断增加的新网络受众提供服务。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令人充满希望的信号。2005 年，BBC 在报道 7 月伦敦炸弹袭击事件时，出色地利用了市民的力量，播出业余人士拍摄的视频、目击者的讲述和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就在几周后，当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美国新闻机构证明它们也能提供定期更新的信息，并使用公民制作的内容。在传统媒体之外，公民聚集在专为突发事件设立的网络聊天室里，不断更新消息。他们收集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互相编辑对方的内容，订正错误，增加报道深度。

同样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 2008 年 5 月也使用了当时能够利用的技术，报道了发生在四川的大地震。他们使用各种硬新闻和特稿体裁，连续多天报道了人员伤亡的新闻和震后情况。他们不仅向全世界提供了地震和灾后的信息，而且通过公民的现场目击，就灾后政府的反应提出各种问题。

由于几乎任何人都有能力制造和传播文字、视频和音频，用户对从其他资源获得的内容也产生了个人定制的需求，希望把它们都保存在某个网站上或通过软件进行管理。这些或增或减的变化说明，新闻越来越不像精心准备的演讲，而是更接近于任何人都能自由发言的对话。

技术也不断在媒体和公民之间制造紧张关系。新闻工作者受到了博主们严格的审查监督，许多组织正努力做到既把网络业务整合到新闻编辑部的工作之中，同时又不降低报道和信息核实的标准。

中文版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试图捕捉这些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目前的新闻界不仅要适应新的竞争环境，还必须理解并适应近来越来越被放大的公民的声音。公民不仅是新闻的消费者，也是新闻的制作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的互动特征使新闻实践受到公

众更严格的监督。透明的核实方法成为区别新闻和以一己私利为目的的传播的重要手段。新闻工作与公民之间互动关系的发展，让我们确信，公民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的增加导致出现了一个新的基本原则——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它同时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各项原则，这些原则使得新闻工作的价值更加重要。

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新闻工作者必须更深入和具有创造性地反思自己在做什么、如何去做以及知情的民众有什么重要意义。本书所记录的声音，以及为了对这些声音做出补充而做的研究说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正在回到一百多年前新闻工作者重新定义新世纪的新闻工作时所冥思苦想的问题。

我们希望，《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文版邀请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这一讨论中加入他们富有启发意义的声音和经验。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

2009年4月，华盛顿

# 新版前言

自从2001年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新闻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作为新闻的消费者，受众分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作为新闻生产者，新闻工作者面临的信任危机也有所加剧。然而这些变化使我们更加相信，新闻的基本原则依然重要而且稳定。

为了生存，新闻的形式和风格必须反映文化、政治、趣味和技术的变化。但是就在新闻与时俱进的同时，新闻的生产者必须牢记自己的目标和原则：代表公民生产准确的信息。这些基本功能的原则和目标构成了新闻理论，同时正是本书试图描述的内容。

从表面上看来，过去5年内发生的许多事情阻碍了新闻的复苏。在千年之交，首先是害怕改变，接下来是.com泡沫的破裂导致新闻工作者对网络这一新媒介过于谨慎，这使他们没能及时跟上技术的发展，以至于到2006年初出现了数不清的由公民自己出版和编辑的媒体。

1999年，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叫Pyra Labs的公司建立了Blogger.com，一种只具有初级技术水平的使用者也能够在互联网上创建和发布自己内容的出版系统。这个网站就是后来所说的“网络日志”或“博客”，许多公民抓住这个机会，变成了自己的主编。博客只是大量公民控制信息的因素之一。数码摄影的发展和其他便携式电子产品使笔记本电脑、相机和音乐播放器具有了更多的功能，同时它们的价格也变得更便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掌握这些技术，网络新贵找到了整合这些创新的途径，到2002年，人们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自己的文本、相片、音频和视频。

---

* 科瓦齐教授和罗森斯蒂尔教授2009年4月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了新的前言，替代美国版的前言。虽然两篇前言主旨相近，但考虑到美国版前言内容更为详细，故仍将其译出，供读者参考。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在这些革新层出不穷的时候，2001 年的“9·11”事件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吸引了上百万人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参加社群、讨论国家的前途。[1]对互联网的依赖飙升到新的高度，直到现在仍在上升。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对话的公民促进了公民新闻概念的出现，早期倡导公民新闻的人之前就预见到未来任何人都可以创造和发布信息。

对传统媒体提出更大挑战的是像雅虎和谷歌这样的新闻集合商，它们的新闻服务并不生产原创内容，只是传递全世界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大多数博客与个人日记相差无几，但是其中一些博主则发展成为代表美国不同政治立场的意见领袖。比如 2002 年底，在博主的努力下，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因为在特罗姆·索蒙德（Strom Thurmond）一百周年诞辰聚会上发表了被广为引用的种族主义言论而被迫辞去共和党参议员领袖的职位。[2]传统媒体则对这一事件置若罔闻。

到 2004 年，博客在总统初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它的帮助下，黑马候选人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几乎被提名。同一年，两个在佛罗里达圣彼得堡波因特学院结识的青年记者制作了一个 10 分钟的视频短片，在其中预测了到 2014 年媒体的发展。他们想象的未来世界被谷歌的产品 EPIC 所统治，它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选择、消费习惯、兴趣、个人背景和社会网络调整产品，生产出属于消费者自己的内容组合”。目前大部分新闻工作者认为这一预测完全有可能实现。

与此同时，主流新闻则四面受敌，因一系列丑闻而备受煎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青年记者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为了走捷径，编造和抄袭新闻，这不仅暴露出新闻编辑部的深层问题，同时也引发了员工的起义，最终迫使该报罢免执行主编——这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报纸以前从未遭遇过的尴尬事件。[3]为了获得独家新闻，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竟允许一个名叫杰克·凯利（Jack Kelley）的流氓海外通讯员编造谎言，并把它们刊登在报纸上，尽管基层员工表示过担心，但是上层编辑却一路为其保驾护航。另一些有争议的事件使像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和鲍勃·伍德沃德（Bob Woddward）这样的普利策奖得主的报道动机受到怀疑。还有一些承担重要责任但是知名度不太大的新闻工作者也被揭露出存在严重的过错。比如《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的斯蒂芬·邓非（Stephen Dunphy）就因抄袭而被开除[4]；《萨克拉门托蜜蜂报》（*Sacramento Bec*）的黛安娜·格里格厄温（Diana Griego Erwin）被迫辞职，因为编辑发现她在报道中引用的 43 个人无

法找到[5]；佐治亚州卡特尔斯维尔的《每日论坛新闻》(*Daily Tribune News*)报(发行量8000份)的青年主编克里斯·希瑟尔(Chris Cecil)因为抄袭一位普利策奖得主的辛迪加专栏而被老板开除。[6]我们很难判断究竟是这类违规事件在不断增加，还是对媒体监督的增强导致更多此类事件被揭露——抑或两个原因同时存在。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令人充满希望的信号。2005年，BBC在报道7月伦敦炸弹袭击时，出色地利用了市民的力量，播出业余人士拍摄的视频、目击者的讲述和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就在几周后，当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美国的新闻机构证明，自己也能提供定期更新的信息，并使用公民制作的内容。在传统媒体之外，公民聚集在专为突发事件设立的网络聊天室里，不断地提供最新信息资源，收集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互相编辑对方的内容，订正错误，增加报道深度。

由于几乎任何人都有能力制造和传播文字、视频和音频，导致用户对从其他资源获得的内容产生了个人定制的需求，希望把它们都保存在一个网站上或通过软件进行管理。2006年4月1日，《纽约时报》开发了"我的时报"，这个服务"可以让你用最喜欢的《纽约时报》文章、最喜爱的网站和博客创造出个性化的版面"，他们还同时推出了编辑和记者的博客，在新闻中加入了观点的链接和与相关资源的链接。

这些或增或减的变化说明，新闻越来越不像精心准备的演讲，更接近于任何人都能自由发言的对话。

技术也继续在媒体和公民之间制造紧张关系。新闻工作者受到了博主们严格的审查监督，许多组织试图做到既把网络内容整合到新闻中，同时又保持报道和信息核实的标准。但是这些压力中很大一部分是良性的。抛开那些希望传统新闻行业(令人憎恨的主流媒体)消失的哗众取宠和恶毒攻击不论，新闻业还是应该谨慎对待博客带来的一切。

如果没有基础建设的突飞猛进，互联网上的这些活动根本无法展开。到2006年，美国家庭互联网的普及率超过70%，超过7400万人使用宽带——和2002年相比，几乎增长了4倍。这些宽带用户不论属于什么年龄段，都比其他群体消费更多的新闻。[7]

新修订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试图抓住这些新发展产生的效应。基于本书第一版，我们建立了一个被称为热心新闻工作委员会流动课程(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Journalists Traveling Curriculum)的培训计划，有机会和全国上百家新闻编辑部的新闻工作者讨论，这些讨论中的

真知灼见丰富了新版的内容。此外，我们对本书提到的新闻史的内容进行了完善，此书的读者和使用此书教学的新闻教师让我们注意并订正了一些事实性错误。

读者会发现改变无处不在。许多例子被换成了最新的事件。还有一些事件的最新进展也被加进来，这些新发展与已有的例子相互补充，让我们看到更复杂的故事。

因为现实的变化，我们重新调整了忠诚与商业一章——自 2001 年以来，几个大并购计划失败，同时新闻工作者在公司中的影响力也有所下降，此外，因为会计工作的影响不断积累也造成一些后果。因为围绕新闻公司精神的斗争由来已久，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会发生巨变。

还有一些变化更加明显，并且可以预测。比如，新闻界不仅要适应新的竞争环境，还必须了解并适应新近被放大了的公民的声音。

随着新闻工作者的思考和我们对一些观念的反思不断加深，其他章节也做了更新。就拿新闻工作者追求目标时使用的工具来说，我们与全国数百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者的交谈促使我们对核实那一章作出很大改进，超过了本书其他章节。对客观性的看法也从这些交谈中获益良多。我们意识到，应该进一步把客观性的原始含义描述成方法的统一而不是目标的统一。自从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在新闻工作的词汇中，透明性获得了更多关注，互联网的互动特征把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过程公开，使其接受公众检验，在这个过程中透明性概念还在继续发展。最后，这些讨论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透明公开的核实方法将成为重要工具，解决一直困扰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工作的偏见问题。希望这一版的读者也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其余各章也从我们与新闻工作者的谈话中获益，在这些交谈中我们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当新闻成为供过于求的商品时，自治社群受到某种冲击，此时新闻工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在作为公共论坛的新闻工作一章中，不但此论坛的性质因为“自媒体”(we media)概念的出现而迅速发展，而且我们所说的争论文化和媒体的极端化(polarization)现象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过去故意让争论双方势均力敌、创造交锋效果的模式被新的模式所取代。这种新模式承诺做出解答，或提供肯定答案。它更具有倾向性，在某种程度上使争论文化愈演愈烈。因为丑闻曝光和各种巨变的发生，我们对新闻良心一章也做了

较大改动。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最明显的变化是新版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原则。在本书平装本第一版里，我们附加了一个《公民新闻权利法案》。新闻和公众之间互动关系的不断发展使我们相信，公民角色的问题已经重要到足以成为修订版中的第十个原则——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快要结束，和五年前相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闻媒体的结构需要改变。但是有迹象表明，在对该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差距。比如地方电视新闻就不像电视网新闻那样积极建设未来的网上转播。同样，有些报纸比别的报纸更严肃地对待向网络转移的工作。

读者还会注意到，有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第一个问题是：新闻业的观望时间是否过长，坐视许多机会溜走？比如许多年前没有及时购买刚成立的新媒体公司，结果它们后来成为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第二个问题是：消费者是否关心传统媒体所代表的价值观，以及代表这些价值观的品牌——如 CBS 新闻或《纽约时报》？第三个问题，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新闻工作者是否全面掌握了那些曾支持了好几代新闻工作者并保障他们未来事业的基本原则？

对于公众来说，新闻的采集方式变得更加公开和容易接近。过去许多新闻工作者的第一反应是告诉自己："不要让别人看见香肠是如何生产的。"但是他们却不敢公开表达这个观念，这说明即使在当时这也是个虚伪的看法，当前透明的观念更令这一想法愚不可及。

20 世纪初，人们的困惑和疑问导致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从那以来，新闻工作者还没有如此深入和富有创造性地思考过自己做了什么、如何做以及它们为什么对知情的民主非常重要。本书所记录的声音，以及为了对这些声音做出补充而做的研究说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正在重新思考一百多年前新闻工作者重新定义新世纪的新闻工作时冥思苦想的问题。

我们希望《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修订版能够为这场讨论提供新的看法。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

## 注 释


[1]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The Commons of the Tragedy," October 10, 2001; available at www. pewinternet. org/ppf/r/46/report_display. asp.

[2] Olivia Burkeman, "Bloggers Catch What Washington Post Missed," *The Guardian*, December 21, 2002; available at www. guardian. co. uk/international/story/0, 863964,00. html.

[3] CNN. com, "Top New York Times Editors Quit," March 1, 2004; available at www. cnn. com/2003/US/Northeast/06/05/nytimes. resigns/.

[4] Poynter online, "Encouraging Transparency in Reporting," February 15, 2005; available at www. Poynter. org/column. asp?id=31&aid=78491.

[5] Sacbee. com, "Rick Rodriguez: Griego Erwin Resigns Amid Internal Enquiry into Her Columns," May 12, 2005; available at www. sacbee. com.

[6] Poynter online, "Georgia Newsman Fired After Lifting from Columnist Pitts," June 3, 2005; available at www. Poynter. org/column. asp?id=45&aid=83351.

[7]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Online News," March 22, 2006; available at www. pewinternet. org/ppf/r/178/report_display. asp.

# 目　　录


导论 …… 1

第 1 章　新闻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 8

第 2 章　真实：首要且最令人困惑的原则 …… 31

第 3 章　新闻工作者为谁服务 …… 46

第 4 章　经过核实的新闻 …… 71

第 5 章　保持独立 …… 102

第 6 章　监督权力并为无声者发言 …… 125

第 7 章　作为公共论坛的新闻 …… 145

第 8 章　引人入胜且息息相关 …… 167

第 9 章　全面均衡 …… 187

第 10 章　对良心负责 …… 203

第 11 章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 220

致谢 …… 229

译后记 …… 231

# 导　论

当人类学家对照世上硕果仅存的原始文化时，有一些意外发现。无论在非洲最与世隔绝的部落，还是在太平洋上的遥远岛屿，人们对新闻的定义本质上基本相同。他们交换相似的家长里短，甚至于在收集和传递新闻时，也会选择特征相似的信使。这些人能够飞快地越过前面的山丘，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娓娓动听地向他人重述。历史学家发现，最基本的新闻价值从未因时间的流逝发生过变化。历史学家米切尔·史蒂芬斯(Mitchell Stephens)写道："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中，人类一直在交换着相似的新闻。"[1]

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神秘的相似？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满足了人类最本能的冲动。人们具有某种内在的需求（本能）——去了解直接感知的世界之外究竟发生了什么。[2]了解无法亲眼所见的事会令我们感到安全和自信，觉得世界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有作家把这称为"对知的渴望"。[3]

分享信息始终是朋友或熟人见面后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听说……了吗？"我们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听说了我们知道的事情，或者他们听到的是否和我们听到的一样。分享发现的感觉令人兴奋。当我们和他人建立关系、选择朋友、品评人物时，标准之一就是此人对某个信息的反应是否和我们一致。

当新闻的流动受阻，"黑暗降临"，焦虑增加。[4]世界变得过于寂静。孤独感油然而生。亚利桑纳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在回忆河内的5年半战俘生涯时写道：当时最想念的不是舒适的生活、可口的饭菜、自由，甚至家人和朋友；"我最想念的是信息——未经审查和歪曲的、丰富的信息"。[5]

这就是求知的本能(Awareness Instinct)。

我们需要新闻维持生活、保护自己、联络他人、区分敌友。新闻事业就是为了提供新闻而产生的系统。这就是我们关心新闻和新闻事业品质的原因：它们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思想和文化。曾写过数本宗教史畅销书的作家托马斯·卡希尔(Thomas Cahill)这样表达：你可以从一个文化中流传的故事看出他们的世界观、被隐藏起来的恐惧和欲望。[6]

面对新的传播革命，我们将用什么故事讲述自己的世界观——我们的恐惧、欲望和价值观？

本书的缘起要从1997年6月一个下雨的星期六谈起。那天，25位新闻工作者在哈佛教工俱乐部济济一堂。在长条桌边围坐着国内几家顶尖报纸的编辑、一些在电视和广播里家喻户晓的名人、几位一流的新闻教育工作者，还有一些全国知名的作家。他们之所以坐到一起，原因是大家认为自己的行业出了问题。他们觉得同行的工作与他们心中理想的新闻事业已经相去甚远。他们担心当前的新闻业不仅没有为大多数公众的利益服务，相反，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可能正在损害公众利益。

相应地，公众对新闻工作者的不信任感也与日俱增，甚至还会憎恨他们。情况还在恶化。到1999年，只有21%的美国人认为新闻媒体关心民众，比起1987年的41%大幅下降。[7]只有58%的人对新闻界的监督(看门狗)角色表示尊重，这一数字和1985年的67%相比也下跌许多。不到一半人(只有45%)认为新闻界捍卫了民主。1985年的数字要比这高出近10个百分点。[8]到2005年，某些统计数字有了小幅上升——28%的美国人认为新闻媒体关心民众。[9]

和以往不同，剑桥会议上的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包括全国各地的记者)也开始同意公众的判断。《费城问讯者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的编辑麦克斯韦尔·金(Maxwell King)说："在新闻编辑部里，我们不再谈论新闻事业本身。我们正在忍受商业压力和职业标准互相冲突的煎熬。"另一位编辑也同意他的说法。新闻正变成娱乐和娱乐化的新闻。新闻工作者的奖金越来越与公司的利润率挂钩，而不是工作质量。最后，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做出了后来被很多人认为具有总结意义的发言："问题在于，你们眼中的新闻事业正消失在更大的传播的世界里。你们期望的是在这个更大的世界中复兴新闻事业。"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更加重要和耐人寻味。如果新闻事业——我们获得新闻的系统——被收编并降为一个子类(subsumed)，替代和收编它的

究竟是什么？广告？娱乐？电子商务？宣传？网络新闻集成商？还是上述事物的新混合体？这一收编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不论是对公众还是新闻工作者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至关重要。新闻业向文化提供具有独特价值的东西——公民用来争取自由的独立的、可靠的、准确的、全面的信息。如果要求新闻业提供其他东西，民主必然遭受灭顶之灾，就像在纳粹德国发生过的一样。在某些国家，我们再次看到了同一现象，新闻被操纵用来促进资本主义，却不鼓励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此类似的现象正在美国生根——以纯商业化的形式（比如那些隶属于大公司的新闻单位习惯于推销母公司的产品），巧妙地进行隐形游说或打击竞争对手，或者用软新闻（用新闻来做隐性广告）来增加利润。这不只是新闻事业的损失。真正的问题是，作为公民，我们是否还能获得独立的信息，实现自治（self-governing）？

自 1997 年剑桥会议以来，这些压力与日俱增。在乔治·W. 布什执政期间，总统及其高级助理们只把新闻媒体看成另一个追求自己议题的利益集团。[10]虽然这一姿态部分出于政治需要，而且 2005 年初总统不得不调整了该姿态，转而支持新闻媒体的独立，但是政客们却道出了公众早就想说的话。[11]

这届政府在制作官方媒体内容方面比克林顿或前一届布什政府走得更远。它向地方电视台发布具有误导性的新闻通稿。它付钱给一家公司，让他们把美国军方制作的具有强烈倾向的新闻节目在伊拉克的媒体上播出。它付钱给美国的专栏作家，让他们撰写支持政府教育和婚姻政策的材料。[12]它还企图给泄露政府信息的人治罪，当媒体揭露了未经法律授权窃听国内通信的事件和在海外建立秘密监狱的问题后，政府对媒体进行调查。[13]

科技不会只帮助政府生产和散发材料。当博客在 2004 年具有了和主流媒体一样的（坏）名声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自己的网页上发布信息。这一公民新闻运动有助于消除民众对政府制造官方新闻的恐惧。

1997 年，在剑桥参加会议的新闻工作者身处巨变的风口浪尖，他们决定实施一个项目：让新闻工作者和公众仔细审视新闻工作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要回答两个问题：如果新闻人认为新闻不同于其他传播形式，那么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他们认为新闻业需要变革但是一些核心原则仍需发扬光大，这些原则又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个现在自称为热心新闻工作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Journalists，CCJ）的群体组织了一次关于新闻报道及其职责的调查，这是有史以来新闻工作者针对这个题目展开的持续时间最长、最系统和最全面的研究。我们举办了共计 3 000 人参加的 21 个公众论坛，超过 300 名新闻工作者在论坛上发言。我们和大学的研究团队合作，对 100 多个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问题进行了每人 3 个半小时的采访。我们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准则进行了两次抽样调查。我们还举办了一个关于《第一修正案》和新闻学者的高峰会议。在卓越新闻项目（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PEJ）[①]中，我们对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了近 12 项内容分析。我们研究了那些知名新闻记者的经历，并走遍全国，培训新闻编辑部的工作人员。

本书就是这一调查的成果。我们是述而不作，并不提出观点，只是描述三年来我们在听取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意见、进行经验研究并且阅读美国新闻职业发展史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关于新闻工作的理论和文化。

我们发现，虽然很少有人研究过或清晰地表达过这些理论，但是社会期待新闻工作者实践这一理论，也期待公民了解这些理论。不论是公民还是新闻工作者，由于对它们缺乏清晰的认识，不仅导致新闻工作受到影响，也波及当前的民主社会。除非我们能掌握和重新说明新闻自由的理论，否则新闻工作者只能坐以待毙，看着自己的职业逐渐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文化危机和新闻业危机其实是信仰危机。

于是，我们从研究中提取出了一些新闻工作者公认的、明确的原则——同时，公民也有权要求新闻工作者达到这些标准。尽管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原则时隐时现，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依然清晰可见。它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新闻工作者做出了调整，使其适应新的媒介平台和报道方式的要求，实现新闻工作的基本目标——向人民传递信息。但这些调整只是对新闻工作（而不是基本原则）的调整，就像公众适应新的接受新闻的方式一样。这些基本原则帮助新闻工作者和自治的人民做出自我调整，以适应更加复杂的世界。它们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中最关键的就是：新闻工作的目标是向人民提供获得自由和自

① PEJ 是一个研究新闻媒体和信息传递方式变革的独立研究机构，1997 年创建时从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2006 年 7 月成为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部分。该机构侧重于经验研究。

治所需的信息。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

1. 新闻工作首先要对真实负责。
2. 新闻工作首先要忠于公民。
3. 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
4. 新闻工作者必须独立于报道对象
5. 新闻工作者必须成为独立的权力监督者。
6. 新闻媒体必须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
7. 新闻工作者必须让重大事件变得有趣并且与受众息息相关。
8. 新闻工作者应该使新闻全面均衡。
9. 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按良心行事。
10. 公民对新闻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为什么是这十个原则？一些读者会有遗珠之憾。公正性哪里去了？平衡性呢？在综合考察了调查研究的结果之后，我们发现，一些为人熟悉甚至有用的观念——包括公正性和平衡性——因为过于模糊，无法进入职业基本原则的层次。还有一些人可能认为以上原则缺乏新意。相反，我们发现，新闻基本原则中有不少观念被神话化和误读。比如认为商业和新闻之间存在一道防火墙，新闻工作者应该受到这道防火墙的保护，这种观念就是神话。另外，独立就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必须保持中立，这也是一个神话。还有，客观性概念被随意剪裁，以至于它要纠正的问题现在竟成为它自己最大的问题——客观性概念本身成为了主观概念。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经历新闻接受方式的重大变革。每当发生社会、经济和技术的重大变革时，新闻业就会发生变化。随着电报的出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过一次变革。19世纪80年代，报纸价格的下降和外来移民的涌入也导致了新闻业的变革。20世纪20年代，因为广播的发明、小报的兴起、关注八卦和名人私生活的文化的出现，又发生了一场新的新闻革命。电视的发明和冷战的到来又引起了新的变化。

现在，随着有线电视的出现以及随后到来的互联网，新闻业又面临着变化。这次的冲击将更加富有戏剧性。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闻开始由新闻行业以外的公司生产。这一新型经济组织非常重要。我们正在面临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独立的新闻将被流言和伪

装成新闻的自私的商业精神所取代。如果这种可能真的变成现实，新闻业将不再是独立的机构，无法再自由地监督社会中其他强大的权力和机构。

在新世纪，民主社会所面临的最具深远意义的问题之一就是独立的新闻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答案将取决于两点。第一，新闻工作者能否清晰并确定地说明：什么是独立的新闻。第二，作为公民的其他社会成员是否关心这个问题。

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新闻工作者，迈出阐明这些价值的第一步，并且协助公民督促新闻工作继续坚持那些曾经孕育了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一些人会问，是否有专门的计划来"解决"新闻行业存在的问题？我们打算分两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回答是，希望通过大胆的行动、统一的公式，一蹴而就地解决问题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新闻业也不是在21世纪初的某一天突然陷入目前的困境之中。新闻业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演化过程。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能同时看到改善与恶化两种趋势并存。

2006年，更多的年轻人通过新的新闻报道和传递方式观察世界，分享自己的发现，他们对新闻的公共使命和公共道德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同时，一些自封的实用主义者（在商业公司工作的人员）相信，目前新闻业的经济状况证明，追求优质新闻和为公众利益服务是有见识的现实主义者必须放弃的奇谈怪论和幼稚想法。

为什么不能通过一个由5点计划或10点计划构成的方案解决新闻的社会角色问题？我们的第二个回答是，我们二人加起来超过70年的新闻工作经验和教训让我们明白了如何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问题的答案应该从那些使用新闻基本原则生产新闻的人身上以及在日常工作和思考中严格地实践这些原则的人身上寻找。这个解决方案的原理和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完美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断地重复这些原则，直到它们成为自己的第二天性。正是这些实践孕育了明确的目标、行动的信心和公众的尊重。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把决定新闻工作目标的基本原则和某一代人通过特定媒介实现这些目标的技巧加以区别。只有了解这些首要原则，新闻工作才能在道德上与时俱进，排除干扰，继续为民主的目标服务，为新世纪、新技术、新的信息形式和网络公民服务。

## 注 释

[1] Mitchell Stephens, *A History of News*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6), 27.

[2] Harvey Molotch and Marilyn Lester,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Accidents and Scand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February 1974), 101—12.

[3] Stephens, *History of News*, 12.

[4] Ibid.

[5] John McCain, with Mark Salter, *Faith of My Fath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221.

[6] Thomas Cahill, *The Gift of the Jews: How a Tribe of Desert Nomads Changed the Way Everyone Thinks and Feels* (New York: Nan A. Talese/ Anchor Books, 1998),17.

[7] Committee of Concerned Journalists (CCJ) and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Striking the Balance: Audience Interest, Business Pressures and Journalists' Values," March 1999, 79.

[8] Ibid.

[9]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Public More Critical of Press, But Goodwill Persists," June 26, 2005; available at http://people-press.org.

[10] Ken Auletta, "Fortress Bush," *The New Yorker*, January 19, 2004; available at www. newyorker. com/fact/content/articles/040119fa_fact2.

[11] Associated Press, "Bush to Agencies: Don't Hire Columnists to Promote Agendas," *USA Today*, January 26, 2005; available at www. usatoday. com.

[12] Susan Goldenberg, "Bush Payola Scandal Deepens as Third Columnist Admits Being Paid," *The Guardian*, January 29, 2005; David Folkernflik, "Video News Releases Find News Airtime,"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rch 25, 2005; David S. Cloud, "Quick Rise for Purveyors of Propaganda in Iraq,"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2006; Gail Russell Chaddock, "Bush Administration Blurs Media Boundar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17, 2005; available at www. guardian. co. uk.

[13] Scott Shane, "Criminal Inquiry Opens into Spying Leak,"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2005; Walter Pincus, "Prosecution of Journalists is Possible in NSA Leaks," *Washington Post*, May 22, 2006.

# 第1章

# 新闻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公民或新闻工作者很少提出"新闻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你拥有印刷机或广播执照,就可以从事新闻生产。在美国,新闻工作被化约为简单的同义反复:新闻工作的目的就是新闻工作者所说的那些目的。正如《费城问讯者报》的前编辑麦克斯韦尔·金所言:"我们用自己的工作说明一切。"如果新闻工作者被逼急了,他们会人云亦云地说他们是在为公众利益而工作。[1]

对于越来越具有怀疑精神的公众来说,这个过于简单的回答显然不够。何况随着新的传播科技的发展,任何拥有电脑可以上网的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在"做新闻工作"。更何况这些科技还催生了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在这些组织中新闻工作的规则正被推翻并重新定义,有时甚至被弃之一旁。

一些人建议,或许科技的发展已经彻底颠覆了新闻工作的定义,因此现在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视为新闻工作。但是如果仔细考查,就像波兰人民已经证实的那样,我们会发现新闻工作的目的并不是由科技决定的,也不是由新闻工作者或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来定义的。你们会看到,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目的是由另外一些更基本的东西——新闻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具有的功能——所决定的。

尽管表面看来新闻工作有了不少变化,但事实上自从"新闻"(the press)[①]这一概念在三百多年前第一次出现开始,其目标一直明显保持不

① The press 最初指印刷媒体,包括书籍和报纸;后来逐渐专指报道新闻的报纸和小册子;随着其他媒介的出现,该词扩大到泛指所有新闻媒体和新闻界。

变(当然,这些目标并不总是能很好地实现)。尽管新闻的传播速度、技术及新闻传递手段已经发生变化,并还将以更快的速度变化,但是在新闻的社会功能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关于新闻工作的清晰的理论和哲学。

**新闻工作的首要目标是为公民提供自由和自治所需的信息。**

在听取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意见时,我们发现新闻工作对公民所承担的义务包括几个原则。新闻媒体帮助我们定义自己的社群,协助我们创造共同的语言以及根植于现实的共识。新闻工作还有助于确定社群的目标、英雄和恶棍。NBC 的主播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告诉研究者:"长期以来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我们拥有共同的信息基础,我们的社会就会臻于完美。"[2]新闻媒体具有监督的义务,它使人们戒骄戒躁,替被遗忘者说话。"我希望帮助那些想要表达的人以及无权的人发出声音。"《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前记者陈婉莹(Yuen Ying Chan)说,她曾在香港创立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培训项目。[3]我们这个协会的奠基人之一,已故的詹姆斯·凯瑞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或许归根结底,新闻工作不过是在传递和放大民众中的对话而已。[4]显然,互联网、博客和公民记者的兴起让这一目的显得更为重要。

对新闻工作的这一定义长久以来一直保持不变,并且被证明已经成为不同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很少受到质疑。从历史上看,甚至很难把新闻工作的概念同创造社群和民主的概念截然分开。我们会发现,新闻工作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如此重要,以至于那些想压制自由的社会必须首先压制新闻。有趣的是,它们并不必然会压制资本主义。理想的新闻工作应该全面细致地理解公民的行为,理解我们所说的联锁公众理论(Theory of the Interlocking Public),这部分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

然而,这些新闻事业长期坚持的理论和目标今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美国就是如此。科学技术促成一种新型新闻公司的出现,这一经济组织把新闻工作变成母公司业务的一部分。威胁不再只是来自美国政府的审查制度。在新技术的帮助下,政府更有可能通过破坏媒体的诚信、削弱其影响力的方式达到搞垮媒体的目的。21 世纪,政府有更多手段达到这一目标,建立伪新闻网站、给电视台提供政府制作的视频新闻、给那些愿意为钱效命的"媒体打手"(media personalities)提供补贴以推行某

项政策等等都是制造伪新闻(pseudo-journalism)的方式。随着公民记者的不断增多,政府必定会制造相应的赝品。另一个新的危险使得政府的威胁有增无减,那就是独立的新闻工作会被法团主义(corporatism),即商业传播和联合企业的自我推销所吞噬并最终消亡。《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真谛——自由的新闻业应保持独立——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来自非政府势力的威胁。

有一些人反对说,给新闻工作下定义,这本身就十分危险。他们提出,给新闻工作下定义就是限制它。或许这么做确实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即"国会不得提出限制言论或新闻自由的立法"。他们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记者不应像医生或律师一样持有执照或进行资格认证。他们还担心对新闻工作做出定义只会导致它无法与时俱进,可能会使其在经营上处于劣势。

事实上,拒绝为新闻工作下定义并不是一个一直为人接受的基本原则,它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商业因素的影响。作为惯例,一个世纪以前的出版人曾自豪地把他们提倡的新闻价值观写在头版的社论栏、言论版和公司标识上。他们还经常公开攻击竞争对手的新闻价值观。这都是营销手段。公民根据报纸的风格和处理新闻的方法选择要阅读的出版物。只是在新闻界开始呈现出集团化、同质化和垄断化特征之后,它才变得沉默起来。律师们建议新闻公司不要明确写出自己的原则,以免其在法庭上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因此,避免定义是一个商业策略。它并不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产物。

另一方面,一些人会提出,不仅新闻工作的目标不应该随意改变,它的形式(form)也应该保持不变。他们以自己儿时的新闻为标准来衡量改变,他们所担心的就像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娱乐至死"。他们忽略了另一个事实——每一代人都在创造他们自己的新闻事业。但是我们发现,每一代人的新闻工作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却是相同的。

虽然新闻工作者对于给自己的所作所为下定义感到不太舒服,但是他们还是能对其工作目标达成基本共识。当我们从 1997 年开始搜集和记录新闻人的共同看法时,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下面这个回答:"新闻工作的核心目标是说出真相,这样人民才能得到所需的信息行使统治权。"这

番话来自杰克·富勒(Jack Fuller)①,作家、小说家、律师和论坛出版公司(Tribune Publishing Company)的总裁,《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就在该公司旗下。[5]

甚至那些不愿意被列为新闻工作者的网络工作者,也提出了相似的目标。"纽约在线"的创立者、自称是"车库企业家"的奥马尔·沃索(Omar Wasow)在本协会的一次论坛上告诉我们,他的目标之一是帮助创造这样一种公民,他们是"媒体的消费者、贪婪的信息接收者和打假者,参与内容制造同时谨慎做出反应"。[6]

这些声音是否只代表个别意见?并不尽然。我们和皮尤人民与媒体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合作,调查了新闻工作者心目中新闻最突出的特征。被访的新闻工作者中近三分之二的人在未经提示的情况下提到了民主功能,是其他答案的两倍。[7]我们和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从事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合作者一起对一百多位新闻工作者进行了开放式深度访谈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在报告中写道:"各个层次的新闻工作者都坚定地表现出对一些核心原则的忠诚,默契程度令人吃惊,他们都将自己的工作与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8]

新闻工作者的伦理准则和职业使命宣言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同的证据。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北美最大的印刷媒体新闻管理者协会)的准则提出:新闻工作的目标是"通过向人民提供信息,为大众福祉服务"。斯克列普斯公司(Scripps Company)的报头上写着:"给人民光明,他们会找到自己的道路。"事实上,美国报纸编辑协会记录的每张报纸的使命宣言中都把促进自治作为新闻机构的首要目标。[9]

那些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从更一般的社会义务和道德义务的角度也提出了他们对新闻工作的理解。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2000年6月说:"由于对公众意见具有全面而直接的影响,新闻工作不能仅仅由经济力、商业利润和少数人的利益决定。相反,它应表现出某种神圣的使命感,从业者要认识到,将如此举足轻重的传播权力委托于你,目的是促进所有人的福祉。"[10]

---

① 杰克·富勒关于新闻的论著《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有中文版,陈莉萍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这种民主的使命并不是在现代才出现的观念。几个世纪以来，创造统治权(creating sovereignty)的概念贯穿于每个牵涉新闻的重大宣言或讨论之中。不仅新闻工作者这么认为，那些为民主原则而奋斗的革命者，不论来自美国革命还是其他民主革命，也这么认为。

**求知的本能**

历史学家米切尔·史蒂芬斯研究了历史上新闻在人民生活中的功能，并发现了一个我们在本书开头提到的显著的、亘古不变的现象。他写道："在新闻中，人们关心的基本话题、评价新闻价值的基本标准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在漫长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中，人类交换着相似的新闻，因此人类对新闻的兴趣即使不是天生的，至少也具有某种必然性。"[11]许多不同的学者都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同样的解释。人们是出于本能而渴望新闻——我们称这种本能为求知的本能。他们需要知道山后面发生了什么，知道他们无法亲身经历的事件。对未知事物的了解给了他们安全感；他们可以规划和讨论自己的生活。交换这类信息成为创建社群、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

新闻是我们了解外界世事变化、重大问题及世界大势的传播形式。当然，历史学家也提出，统治者利用新闻把治下的群体合为一体。新闻提供了集体意识和共同目标。它甚至帮助独裁者炮制出共同的威胁，把惊恐的人们结合在一起。

历史学家还揭示出另一个重要趋势。越是民主的社会，新闻和信息就越多。当人类社会第一次走向民主时，出现了某种前新闻事业(pre-journalism)。最早的民主社会——古希腊建立在雅典市场的口头新闻事业之上，在那里"几乎每件与公众相关的重要事务都是公开的"，新闻教育学家约翰·霍恩伯格(John Hohenberg)写道。[12]罗马人发明了《每日纪闻》(acta diurna)①，这种新闻写在纸莎草上，张贴于公共场所，对每日元老院议事情况、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报道。[13]但是随着欧洲社会越来越专制和暴力，到中世纪时这种传播形式逐渐衰落，书写新闻基本消亡。

---

① 《每日纪闻》是公告式的官方公报。公元前59年由当选为罗马执政官的尤利乌斯·恺撒下令创办。至于其具体形态，学术界尚存在争议。

## 新闻事业的诞生

随着中世纪的终结，新闻又以歌曲和故事的形式、以浪迹天涯的游吟诗人所吟唱的新闻歌谣的形式重新出现。

我们目前所说的现代新闻事业始见于17世纪早期，它源于人们的清谈，尤其是在公共场所的交谈。在英格兰，第一张报纸诞生于咖啡馆——信息丰富，甚至在某类信息上几乎做到了细分化。这些报纸非常流行，一些学者抱怨说："那上面只讨论新闻和宗教界的琐事。"

不久以后，新闻事业又在美国的小酒馆或小酒吧（pub or publick house）里出现。这些被称为"publicans"的酒吧老板们主持热火朝天的谈话，内容是关于旅行者们带来的信息。这些旅行者还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在日志本上，保存在酒吧的一角供人阅读。第一张报纸就是从这些咖啡馆里逐渐演化而来的，有生意头脑的印刷商开始收集航运新闻、异域见闻、小道消息以及咖啡馆里的政治言论，并把它们印在纸上。

随着报纸的出现，英国的政治家们开始谈论一个新现象，他们将其称为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18世纪初期，新闻记者或出版商开始形成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理论。1720年，两位伦敦的报人用"卡托"（Cato）的笔名提出一种新观念，称只要是真相就不应被称为诽谤。但是，当时英国普通法的规定却刚好相反：不仅任何对政府的批评是有罪的，而且"越是真相，诽谤的罪行越大"，因为真相的危害更大。[14]

卡托的观点对美洲殖民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的美洲对英国皇室的不满正在与日俱增。一位名叫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也是众多翻印卡托文章的出版商中的一员。当1735年出版商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因批评由英皇任命的纽约州长而受审时，卡托的观念成为辩护词的主要依据。曾格的律师①提出，人民具有"说出和写出真相、揭露和反对独断权力的权利"。富兰克林及另一些出版商支付了曾格的律师费。陪审团判曾格无罪。这一裁决在殖民地的法律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美国的出版自由观念开始以正规的形式出现。

这一理念也深植于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在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约翰·亚当斯

① 曾格的律师是来自费城的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1676—1741）。

(John Adams)起草的《马萨诸塞州宪法》以及大多数新颁布的殖民地的权利宣言中看到这一理念。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对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说："任何政府都应接受审查，在享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地方，没人能免于此。"①[15]但是不论是富兰克林还是麦迪逊，都认为这样的语言不能写进联邦宪法，然而有两位代表，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曼森(George Mason)和来自马萨诸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退出制宪会议，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一道，鼓动公众，要求把制订一份书面的权利法案作为通过宪法的必要条件。因此，新闻出版自由成为美国人民向自己的政府提出的第一项要求。

在后来的两百年间，新闻出版自由的观念已经成为确保自由的坚强支柱，深深地印在美国的法律精神中。最高法院1971年判决《纽约时报》有权公布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的政府机密文件，判词中写道："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美国的国父们给予新闻出版自由特殊的保护，这一保护有助于它完成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的重要使命。新闻应该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16]这一观念在法庭上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确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研究者，时任密歇根大学校长的李·博林杰(Lee Bollinger)在本委员会所举办的一次论坛上告诉我们，该观念十分简单：在众声喧哗中，人民自会分辨真假，因而有能力实现自治。[17]

即使新闻事业曾掌握在20世纪初的黄色新闻专家或20世纪20年代的小报专家手中，建立社群和促进民主仍然居于新闻事业的核心位置。在黄色新闻达到顶峰的时候，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威廉姆·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不仅迎合受众追求煽情的

---

① 原文是：No government ought to be without censors, and where the press is free, no one ever will. If virtuous, it need not fear the fair operation of attack and defense. Nature has given to man no other means of sifting out the truth whether in religion, law or politics. I think it as honorable to the government neither to know nor notice its sycophants or censors, as it would be undignified and criminal to pamper the former and persecute the latter.

(任何政府都应接受审查，在享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地方，没人能免于此。政府毋须害怕公平合理的攻击和辩护。除此之外，上天没有赋予人类任何其他手段去筛选真相，无论是宗教真理、法律真理抑或政治真理都是如此。我认为，得体的政府，不应该把它的赞扬者和审查者放在心上，如果对于前者大加褒扬而对后者横加迫害，不仅有失尊严，同时也是在犯罪。)

趣味，也迎合其爱国主义冲动。普利策用头版引诱读者上钩，但是他用社论版教他们如何做一个美国公民。在选举前夜，他和赫斯特都试图压过对方一头，一个租下麦迪逊广场公园办免费晚会，另一个则在自己报社摩天楼的一侧用灯光显示选举结果。

不论是回首三百年还是三千年，我们都永远无法将新闻和社群，尤其是比较民主的社群截然分开。

**电子时代的自由传媒**

到21世纪初，我们再来讨论新闻与民主的问题还有意义吗？今天的信息传播十分自由，那种认为只存在一种新闻的观念已经过时。就连《宪法第一修正案》自身也可能被视为比较封闭的精英主义时代的产物。

当然，把媒体看成把关人，决定公众应该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这种观念已经无法严格界定新闻的角色。如果《纽约时报》决定不报道某事，在数不清的网站、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和反对党中至少有一个会挺身而出。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证明这一规律。当《新闻周刊》推迟刊登第一篇关于莱温斯基丑闻的报道时，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抢先发布了这一消息。当传统新闻媒体不再关注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赞扬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1948年参选总统时所提出的支持种族隔离的言论时，博客们突然对此事进行了猛烈抨击，最终导致洛特从共和党议员领袖的位置上引咎辞职。①

互联网、博客、“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自媒体”(we media)以及宽带民主化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意味着评判新闻的标准——人们为了自治需要知道什么——已经过时。相反，他们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

科技使公民从消费职业新闻工作者生产的新闻的被动消费者，逐渐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使用不同地方的资源，组合成自己的新闻。当人们在谷歌(Google)上搜索信息时，在近乎无限的信息渠道间跳跃式

---

① 2002年12月5日，在瑟蒙德100岁生日的庆典上，洛特针对1948年瑟蒙德竞选总统一事评论说：“我们当时给他投了票。我们对此很自豪。如果全国其他地方也像我们一样，后来的这些麻烦也就不会发生了。”当年瑟蒙德竞选的一个主要纲领是种族隔离政策。后来洛特也参加过反对民权运动的公开论战。12月20日，洛特被迫辞职。后来有学者归纳，这一辞职是博客的功劳。在事发48小时内，洛特的言论在主流媒体上消失，但博客依然搜索他以前的所为，后来影响到主流媒体。

浏览、阅读或写作博客时，他们正在成为自己的编辑、研究员甚至通讯员。我们所说的新闻只是这些信息大杂烩中的一部分，和其他公民机构一样，它所扮演的居间者和核实者的角色正在被弱化。我们正在见证一类新型的、积极的美国公民的兴起，人们刚刚才开始考虑这种公民身份具有何种义务。21 世纪的新闻工作必须承认这一趋势，并且协助公众用必要的工具武装自己，更好地履行积极公民的义务。

硅谷最具传奇色彩的智库，施乐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①]的前主任约翰·西利·布朗（John Seeley Brown）很早就看到，新闻媒体作为公众论坛，为民主社会的公众服务的观念并没有因为科技而改变，改变的只是新闻工作者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方式。“在新经济和新的传播文化条件下，最有必要的是了解这一切的意义。在一个变得越来越疯狂的世界，我们最渴望的是找到某些不变的东西。”布朗解释说，这就意味着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从多个角度观察事物并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18]。未来学家保罗·萨福（Paul Saffo）把这一任务描述为通过新闻报道进行的调查和判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发现结论”[19]。

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的角色。他或她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这种新型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意义赋予者）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加以整理，使它能被人们迅速有效地理解。

西利·布朗暗示，在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成为记者或评论员的时代，新闻工作者不再是一名教师或演讲者，而是“论坛主持人”（forum leader）或调解人（mediator）。[20]受众也不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消费者（pro-sumers），一个混合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角色。

一些“自媒体”的倡导者相信，没有必要控制信息，因此我们不再需要新闻工作者。既然公民间能更方便地交流，他们就能更接近真实，得到更准确的信息。诚然，他们的交流变得更容易，这一点没有疑问。有上百万人阅读博客——然而数据也显示，阅读人数已经不再增加。此外，我们还

① Xerox PARC 是 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的简称。该中心于 1970 年成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图市（Palo Alto）。个人电脑、激光打印机、鼠标、以太网、图形用户界面、语音压缩技术等现代计算机技术都诞生于此。从 2002 年 1 月 4 日起，该中心独立为公司——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Incorporated。

必须提出一连串问题：公民们是否有时间、动机和能力完成上述任务？如果不能，那些专业新闻工作者是否具有能力和意愿帮助公民们掌握这些工具？

不论怎样，最终的结论是，能否得到更加准确和真实的信息，取决于“自媒体”提出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忠实地完成。启蒙时期产生了个体价值和公共媒体的观念，这个时代的动力是追求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使得公众从中央集权的独裁者或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的独断权力的控制中获得解放和自由。如果核实事实的新闻事业在新的信息时代想要继续延续下去的话，它必须成为一种赋予公民权力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在可信的信息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社群。

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其重要性不亚于电报或电视的发明。电报使天各一方的人们能够在同一时间了解相同的事情；电视则增强了人们亲眼目睹新闻的能力。

今天，人们从被动的消费者变成主动创造自己的新闻和观点的生产者。不仅如此，他们处理新闻的能力并不逊于传递新闻的专业人员。一些人使用网站发布他们自己对事件的描述，还能附上照片、视频或音频。一些人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反馈方式与报道新闻的记者取得联系，修正报道或提供新的事实。一些参与者还对新闻的采集过程进行讨论，立即对新闻媒体进行批评和监督。

如果公民发现新闻中的问题，他们知道给谁发电子邮件，订正报道内容（越来越多的报纸把电子邮件和网站地址印在上面，有的还在电子版里把作者的名字做成有邮件地址的超链接，方便读者与作者、编辑和社长进行联络）。受众还能看到他们提供的新鲜事实成为新闻报道的一部分。和受众的对话已经成为新闻报道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借助高科技的互动，新闻重新向日常交谈回归，就像四百多年前在小酒馆和咖啡馆里产生的原始新闻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的功能并没有因为电子时代的到来而发生根本变化。技术虽然存在差别，但是背后的原则是相同的。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做的是确证事实。

不论是启蒙时代的理想主义者还是硅谷的科学理论家都赋予了新闻工作相似的功能。如何让这些功能得到实践？自由的新闻媒体如何才能真正为自由提供坚强的支持？它真的行吗？

## 新闻工作者的民主理论

新闻工作者通常不会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如果我们问新闻工作者，促使你们制作电视新闻和报纸新闻的民主理论是什么，这会显得有些可笑。我们拥有能够想象得到的最自由的媒体，但是在过去的 30 年里，能够说出本州众议院议员名字的美国人不到 30%。[21]即使在总统大选中，也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参加投票，那些不受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保护的国家的投票率也会比美国高得多。[22]大多数人从地方电视台获得新闻，然而这种媒体几乎不关注政治治理程序。[23]只有 42%的人说自己读过前一天的日报，人们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程度和 50 年前相比没有多大提高。[24]如果再深究的话，媒体向人们提供自治所需信息的理念很可能只是幻想。人们或许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在现实中，我们可能根本不关心自治问题。政府干它的，其余的人多数只是看客。

这个问题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一度成为热点，它缘于报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争论。德国和意大利的民主政府垮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西方此起彼伏。人们对于警察国家利用高新科技和新型宣传技术控制民众意志的恐惧在不断增长。

李普曼当时已经是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他在畅销书《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中提出，民主制度存在根本缺陷。他说，人们大多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了解世界，然后通过“他们头脑中虚构的图像”想象世界。他们主要通过大众媒体来接受这些主观图像。李普曼认为，问题在于，因为媒体无可救药的缺陷，人们头脑中的图像不可避免地被扭曲并且残缺不全。同样糟糕的是，即使公众突然心血来潮想弄清楚真相，由于个人偏见、刻板印象、心神涣散和愚昧无知，他们也根本没有能力理解真相。最终，李普曼认为公民就像戏院里的过客，“在第三幕中间进场，在大幕落下前退场，在他们观赏的时间里，只能够辨认出谁是英雄，谁是坏蛋”[25]。

《公众意见》成为了名著，而且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传播研究的发轫之作。[26]它也深深地震动了美国最具盛名的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约翰·杜威。杜威在李普曼参与创办的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了书评，他称李普曼对人类感知的分析“是用笔写就的对民主制度的最有效的控诉”，他承认李普曼发现了许多媒体和公众的严重缺陷。[27]

但是，杜威后来在自己所著的《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一书中更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批评，提出李普曼对于民主的定义存在根本错误。杜威说，民主的目标不是有效地管理公众事务，而是让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换句话说，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虽然公众仅是政府的“最终仲裁人”，通常只限于为争论制订宽泛的指导原则，然而杜威认为，美国国父们想要的民主生活除了有效治理之外，还包含更多内容。民主的真正目标是追求人的自由。要解决民主中存在的问题，不是要放弃上述目标，而是要尽可能提高媒体的技能和公众的素质。

对于杜威，我们在今天更容易心有戚戚焉。他相信，如果人们可以彼此自由交流，民主自然会从人类互动中成长起来。因此，民主并不是为了有效管理而使用的计谋和策略。

80 年后，这一争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也仍然没有最终答案。随着新闻工作者和公民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人们对新闻工作者产生了新的疑问：他们是否应该继续扮演议程设置者的角色，告诉受众什么是最重要的新闻，什么是头条新闻？虽然该角色正在变化，但是很明确的是它并没有消失。报道新闻的人仍然决定如何分配资源，报道哪些新闻，给予哪些新闻更多篇幅，哪些新闻可以用简短的篇幅处理。他们每天要做出无数个类似的决策。

在上述决策中，新闻从业人员所决定的事情要比表面看上去重大。就在编辑设计一个版面或网页、决定重点报道哪个角度或细节时，他们同时在猜想读者想要或是需要知道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工作的同时，他们也在实践着某种民主理论——政治、公民权利受何种力量支配以及人们怎样做出判断。本书的目标是描绘出当新闻以公民的身份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时，隐藏在它背后经常被忽视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不少评论者提出，今天的新闻工作过于受李普曼观点的主导。[28]研究显示，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把目标受众定位于精英或其他小众人群，忽略了大部分公民。[29]媒体不愿意报道政策和政治理念，要不就用体育竞赛的方式表现它们，还有的把某项政策立场看成是从竞争对手那里争夺权力的精打细算，他们同时在这样的语境中报道政治。[30]记者们承认，在政治选举中直接采访选民这样的报道方式也成为正在消失的艺术。正如詹姆斯·凯瑞所写的那样，我们的新闻工作“以公众的名义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但是另一方面公众除了充当看客外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31]。公民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有时媒体会谈及它，但却离题万里。

毫无疑问，公民媒体的兴起和消费者权力的增加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公众正在努力加入到对话之中。那些拥有自己政治议程的新闻工作者更容易被揭露出来。在核实事实的过程中存在疏漏的新闻工作者更容易被发现。自称了解公民关心什么的新闻工作者很快会发现自己错了。

但是显然，这并没有解决新闻工作者如何才能发现公民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的问题。相反，这意味着媒体需要一个更清晰的有关民主和公民的理论。

当我们研究网络、博客、社区报纸、公共电视等新型新闻工作者和公民的互动关系时，我们发现，今天的公众和传统的争论中提到的公众相比，复杂性和流动性更强。我们认为这一未来的发展对于公民和新闻工作者均很关键。

**联锁公众理论**

戴夫·伯金(Dave Burgin)，曾担任过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地区报纸的编辑，他的排版教学集中体现了这一理念。他告诉学生，首先假设只有不到15%的读者想读本版的任何一篇报道。你的工作就是保证每个版面的报道具有多样性，这样每个受众都会在其中找到一篇想读的报道。[32]

伯金的多样性版面理论中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人都对某些事物感兴趣，甚至是这方面的专家。那种认为人民一无所知，或者另一些人对每件事情都感兴趣的观念只是神话。当我们倾听记者和公民的意见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更现实地描述了人们是如何与新闻互动并且成为公众的。我们把这种理论称为联锁公众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locking Public)。

为了论证的方便，我们不妨假设公众参与事件的层次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参与的公众。这个事件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对事件也有着深入的理解。第二类是感兴趣的公众。他们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们身处其中，受到影响并作出反应。第三类是无关的公众。当其他人谈起这件事时(如果有的话)，他们既不关注也不参与讨论。在不同的事件中，我们分别属于这三类联锁公众群体中的一类。

例如，底特律郊区的汽车厂工人不关心农业政策或外交事件，可能只是偶尔买张报纸或看看电视新闻。但是他会经常参加工人集体与资方的谈判，非常了解公司的官僚系统和工厂的安全情况。他的孩子可能在当

地学校就读，有朋友靠福利救济度日，知道自己钓鱼的河受到污染。在这些和另一些与他有关的事情上，他有不少知识和经验。在一些事情上，他是参与的公众；在另一些事情上，他是感兴趣的公众；当然还有一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十分遥远，他一无所知，也无法参与。

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很难被简单地归入某一类群体。她是祖母，热心于园艺，是个新闻迷，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标准的具有参与精神的“精英”。她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宪法专家，言论经常见诸报端，她对科技充满恐惧，讨厌投资和商业，对它们也一无所知。孩子长大成人后，她对本地学校，甚至本地政府的新闻也失去了兴趣。

我们还可以想象有一个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受过高中教育的家庭主妇，她把丈夫的事业看成是自己的事业。她在孩子的学校里参加义务活动，敏锐地发现当地报纸的教育报道存在错误，她在平时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培养了某种直觉。

当然，上述人物是我们虚构出来的，它们说明现实中的公众有多么复杂。人民的力量正源于其规模庞大，充满多样性。深度参与某个问题的专家在另一个问题上可能就是无知且冷漠的公众中的一员。上述三类公众虽然只是粗略的概括，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说明并不是只有积极的公众才会参与社会讨论。相反，混合型的公众比单一的参与公众更加明智。

如果倾听新闻工作者谈论他们在工作中对受众的想象，你会从中感觉出联锁公众的存在。《纽约时报》的公众编辑(public editor)[①]拜伦·卡拉姆(Byron Calame)在采访自己同事的时候感觉到了这一点。“一些编辑，包括当了一段教育版编辑后刚转任全国版编辑的苏珊娜·达利(Suzanne Daley)，提出他们必须时刻牢记存在着两类读者。‘一类是专家，无论如何都会看到这篇报道，并且会做出严厉的评判……另一类是充

① 也被称为“ombudsman”。美国大报大约50年前开始常设公众编辑职位，一般选择经验丰富、思想独立并敢于说话的新闻工作者担任，甚至有的会招聘竞争媒体的编辑记者担任。他们的功能是代表受众监督并调查本报新闻报道工作和表达中的错误、疏漏和违反新闻伦理的行为。公众编辑通常在报纸的社论版开设定期的专栏。《纽约时报》一直未设这一职位，直到2003年12月，记者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编造假新闻丑闻暴露后(见本书第10章)，才邀请老出版人丹尼尔·欧克伦(Daniel Okrent)但任其第一位公众编辑，他也成为同时期最知名的公众编辑之一。2005年5月，拜伦·卡拉姆接任此位。该报现在的公众编辑是克拉克·霍伊特(Clark Hoyt)。

满好奇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仔细阅读，在我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挑战。他或她或许会阅读这则新闻，但是这则新闻得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能留住他们。因此我认为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对于大学宿舍或家教这样的题目，我们如何才能写得精确而有分量，同时让不感兴趣的人也觉得非常有趣？'"[33]

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的能力要远远强于李普曼的想象，媒体也不必把自己的工作想象为把"真相"传递给被动的受众，并因此感到棘手。新闻媒体的工作（我们将在下一章更详细地讨论）就是给这群复杂且充满活力的公众需要的东西，以便他们从中发现真相。

上述对公众的复杂看法同时也隐含着对现代媒体所扮演的角色的批评。只关注专家和精英（特殊兴趣）的新闻对公众的幻灭感要负一定责任。这样的新闻没有反映多数人生活和体验的真实世界。政治报道专注于战术细节的算计，满足了那些极度关心政治的人，却把只有些许兴趣或缺乏兴趣的公众晾在一边，没有履行好新闻工作者应尽的义务。那种使每个报道都尽可能吸引最大多数受众的新闻——认为所有时间都应该报道 O. J. 辛普森案的新闻——实际上总是忽略了大多数受众。

简而言之，关于联锁公众的更多元的描述说明，公众对传统媒体的需求仍然和过去一样强烈，即媒体应该尽可能地为最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服务。与此同时，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发展也清楚地说明，发现联锁公众复杂多样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困难。许多分析家认为，21 世纪以来两次全国选举中公众之所以表现出保守倾向，原因是过去几十年来大批被边缘化的公民在背后推波助澜。历史学家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大潮使得他们"进一步被社会疏远，渴望'回到'理想化的青春时代——或许现在应该说是他们父母的青春时代"[31]。

众多美国人甚至无法理解是什么导致他们产生了疏离感，这至少部分归咎于媒体在报道这些问题时处理不当，以及他们偏爱用偏激的报道策略和修辞来反映这些问题。在报道包括民权运动、性解放、反越战、移民和全球化等 20 世纪后半叶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时候，媒体经常使用标签或刻板印象，反映那些极端言论。这些刻板印象和标签成为公众辩论时的通用语言，阻止了媒体进一步探寻有多少人支持这些立场，或者这些立场意味着什么。如果新闻工作者是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服务，那么他们的职责就是促进公众相互理解，允许他们做出妥协，以实现治理复杂的联锁公众的目的。

联锁公众理论也暴露了新闻工作中细分受众市场(niche marketing)的概念所存在的问题。由新型信息发布平台所创造的大部分细分受众群很难用市场研究者人为制定的类型加以界定。瞄准 18 至 34 岁女性,或 X 世代,或足球母亲(soccer moms),或橄榄球迷的电视节目很可能把数量更多的真正目标受众排除在外。民众的复杂程度要远高于人为创造的类型或刻板印象。

**新的挑战**

如果说联锁公众理论强调了新闻工作应该促进民主自由的观念,那么在 21 世纪初,这一专业可能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威胁。我们第一次看见以市场为基础的新闻事业的兴盛正和公民责任的观念渐行渐远。

我们不妨听听当代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他的公司赢得新加坡的电视播放权时的评论:

> 新加坡并不自由,但是它非常干净,没有毒品。在不久以前它还因殖民地的剥削而贫困落后,受饥馑、疾病和其他问题的困扰。现在人们住进了有三个房间的公寓,拥有了工作和洁净的街道。物质的刺激创造了商业和自由市场经济。大部分人更关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不是投票权。[35]

媒体的所有者使新闻屈从于商业利益的例子层出不穷。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收购时代公司的当天,时代华纳的主席杰拉尔德·列文(Gerald Levin)兴高采烈地说:"这意味着时代华纳真正向数字化全面转型……这两个公司真是天作之合。"[36]然而事实上,一个公司肩负着新闻事业的使命而另一个没有,或者说当《时代》、CNN、《财富》或其他媒体的记者报道互联网、有线电视和其他许多领域时,难免在忠于谁的问题上产生冲突。收购时代华纳的美国在线首席执行官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为大众仔细计算了美国在线将从新兼并的公司获得的巨大利润。虽然新公司还包括几家全国最具影响的新闻机构,但他只提到了娱乐、电子购物和个人对个人的传播。六年之后,凯斯认为美国在线和时代的合并是一个失败,他在 2005 年底说,"一个公司"的战略从来没有落实过。

凯斯在《华盛顿邮报》的言论版发表文章说:"每个部门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这使得争夺市场的战争无法打响,它无法促进任何创新。"凯斯

提出公司应该分成四个独立的部分：时代华纳有线电视、时代华纳娱乐、时代公司以及美国在线。

同时进行的其他并购也导致了相似的冲突。在收购 ABC[①] 新闻网不久，迪斯尼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说他认为“迪斯尼报道迪斯尼”[37]的做法不妥。换句话说，在一个管理着包括 ABC 新闻在内的联合企业的经理人的心目中，新闻机构不仅失去了独特的身份，而且现在不得不为是否应该报道“迪斯尼奇幻世界”以及如何报道苦苦挣扎，这一奇幻世界是一个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价值 230 亿的大公司，从球队、主题公园一直到有线电视频道和互联网门户网站。[38]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迪斯尼的这桩并购也是一个失败，至少对于 ABC 所拥有的新闻企业来说是这样。就在迪斯尼从大都会传播公司(Capital Cities)手中收购 ABC 前不久，ABC 新闻的总裁鲁恩·阿利奇(Roone Arledge)对下属说，与竞争对手相比，ABC 新闻任何时段的节目——早间新闻、晚间新闻、周日早间新闻，甚至黄金时间的新闻杂志节目——都居于榜首。[39]但是迪斯尼的管理，加上经理人阿利奇困难以控制局面而被迫退休[40]，使得 ABC 几乎所有的新闻节目都开始走下坡路，迪斯尼的管理层 2002 年甚至企图用 CBS 的《大卫·莱特曼秀》(*David Letterman Show*)取代 ABC 的老牌新闻节目《夜线》(*Nightline*)。2005 年底，ABC 终于成功地把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和他的执行制片人汤姆·贝塔格(Tom Bettag)赶出 ABC 新闻网。[②]

有三种力量正导致新闻工作偏离服务公民的职责。第一个是新技术与生俱来的特征。互联网使新闻工作与地理空间分离，因而也使新闻工作与政治或公民意义上的社群相分离。为政治社群服务比较困难，但是如何为电子商务社群以及以利益为基础的社群服务，我们却看得很清

---

① 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ABC)，成立于 1944 年，由 NBC 的蓝色广播网络脱胎而来。1985 年，它出乎意料地被规模小于它的大都会传播公司(Capital Cities Communications，也叫 CapCities)收购，双方整合成大都会/ABC 公司(Capital Cities/ABC)。1996 年，迪斯尼公司收购大都会/ABC 公司，又将其名改为 ABC。

② 《夜线》是 ABC 自 1979 年 11 月开始推出的一档夜间新闻节目，特德·科佩尔从1980 年 3 月起一直任主播并因此闻名全美。自谈话类新闻节目盛行后，《夜线》一直面临被取代的危险。1993 年推出的《大卫·莱特曼秀》是一档高知名度的深夜谈话类新闻节目。2002 年，大卫·莱特曼与 CBS 合约到期，迪斯尼试图用这个节目取代《夜线》，但后来因莱特曼与 CBS 续签而未成功。《夜线》仍保持原状至 2005 年 11 月科佩尔退休。《夜线》目前仍在 ABC 播出，但形式有所改变。

楚。[41]与此同时，技术可以使公民不必通过地理空间的联系而进行直接的互动——这既带来了新的可能，也带来了挑战，我们在这本书的后面部分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主要影响因素是联合企业。批评者们一直以来就对新闻集团的兴起表示强烈不满，这些公司拥有覆盖不同社群的媒体。《纽约客》的媒体批评家 A. J. 利布林(A. J. Liebling)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对此颇有微辞。但我们还是看到拥有不同媒介的跨媒体公司的兴起。芝加哥的论坛报公司(The Tribune Company)现在仍然在同一个城市拥有广播、电视和报纸——20 世纪中期联邦政府曾立法禁止这一行为，但是现在似乎有放松这一管制的趋势。即使这些媒体公开地属于某个集团，但是显然它们仍旧是新闻公司。对它们的批评主要针对其立场中庸或内容同质化。甘乃特(Gannett)集团拥有大约 90 家报纸，但它还是一家报纸公司，其领导人还是新闻人，能在全公司内倡导某种新闻价值，甚至还为所属的报纸创立了一系列新闻伦理原则(Principles of Ethical Conduct)。传统的三大电视新闻网是一个例外，这些公司既生产娱乐节目也生产新闻。然而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电视网新闻部门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基于公众利益的要求。因为它们使用了公共的电波，所以政府规定它们必须以一定的新闻节目交换这一资源。赢利只是最近才产生的要求。

随着新世纪的开始，新闻公司拥有新闻事业这一传统被破坏。新闻成为跨国联合企业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ABC 新闻在迪斯尼的所有利润中只有不到 2%的份额。新闻过去是时代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在美国在线—华纳集团之中只占很小一部分。NBC 新闻只为整个通用电气贡献了不到 2%的利润。[42]

甚至一些新进入新闻行业的公司根本不从事新闻采集工作，而是像谷歌和雅虎新闻这样主要集纳由他人生产的新闻。2002 年上线的谷歌新闻甚至不用人工编辑来进行新闻的选择和编排。全部工作由计算机的算法规则来完成。

新闻部门的管理人员必须为了自己的独立而抗争，但是历史显示，这一转变很可能改变新闻工作的性质。詹姆斯·凯瑞说："回首 20 世纪 30 年代，我们可以看到钢铁和化工产业开始收购欧洲的新闻机构。"这改变了欧洲新闻界对法西斯崛起的看法。军国主义被认为是好事。他认为，今天美国的新闻业"正在被娱乐产业和电子商务收购。今天的娱乐和电子商务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钢铁和化工产业"[43]。

新闻自由来自独立。只有不受政府审查的新闻才能说出真相。在现代的环境下，自由的含义有所扩大，它同时意味着不受其他机构（政党、广告主、商业和其他势力）的控制。控制新闻的联合企业对新闻业的独立性构成了威胁，因为新闻业正在成为大型公司的附属机构，然而这些大型公司本质上是为其他商业目标而存在的。

联合企业以及大多数传播中的合作增效（corporate synergy）背后隐藏着这么一种观念，即新闻只是内容（content），或所有媒体没有差别。这一观念预示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再是代表更广大社群的公共信托。相反，它是在为一个行业争取特殊权利，就像为棒球业争取反托拉斯豁免权一样。在这里，《宪法第一修正案》变成了一种财产权，为商业竞争自由而不是言论自由提供规则。这对于民主社会而言，是一个根本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所说："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不断提出质疑：难道民主也可以被收买吗？"[44]

第三个推动新型市场新闻业的因素是全球化。当各个公司，尤其是传播公司，成为超越国界的公司时，从商业角度看，公民和传统社群成为过时的观念。

全球化改变了这些公司生产的内容。因为火暴的场面毋须翻译也能在海外市场大卖，这导致好莱坞拍摄了更多的动作片。但是按照类似的被简单化了的文化规则来决定新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对全球化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界更喜欢那些既可满足国内需要，也可满足国际需要的模式化的新闻——名人、灾难和悲剧，像 O. J. 辛普森杀妻案、戴安娜王妃之死，或小肯尼迪坠机等事件。

但是"9·11"事件证明，全球化并不产生于真空中。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导致人们开始逐渐关注另一种不同性质的超越了国界的硬新闻，比如马德里和伦敦的火车爆炸、世界范围的对穆罕默德卡通画的抗议、席卷中东的暴力事件等。虽然这些新闻在全球不同的媒体系统中都可以见到，但是这些报道本身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福克斯和 CNN 对这些事件的报道与半岛电视台的相比，很难完全一样。

问题不在于这种新兴的全球媒体系统会失去其民族特征，问题在于公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依赖这些属于全球联合企业的新型新闻企业，监督社会中的权力利益集团？我们是否能依赖少数大型公司的帮助执行监督——尤其是当这种监督对他们所拥有的公司的利益没有什么好处

时？最后，问题归结为一点：21 世纪的新闻工作能否继续坚持为那些产生于三个半世纪前的目标而奋斗？

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要明确这一目标是什么。第二步是深刻理解那些支持新闻工作者代表我们坚持这一目标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 注 释

[1] Maxwell King, at founding meeting of Committee of Concerned Journalists (CCJ), Chicago, June 21, 1997.

[2] Tom Brokaw, interview by William Damon, Howard Gardn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unpublished interviews conducted for the book *Good Work: When Excellence and Ethics Mee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3] Yuen Ying Chan, interview by William Damon, Howard Gardn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ibid.

[4] James Carey,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ed.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 Warren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235.

[5] Jack Fuller, at CCJ Froum, Chicago, Novemberb, 1997.

[6] Omar Wasow, at CCJ Forum, Ann Arbor, MI, February 2, 1998.

[7] CCJ and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Striking the Balance: Audience Interests, Business Pressures and Journalists' Values," March 1999, 79; available at www.journalism.org.

[8] William Damon and Howard Gardner, "Reporting the News in an Age of Accelerating Power and Pressure: The Private Quest to Preserve the Public Trust," academic paper, Novermber 6, 1997, 10.

[9] 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所规定的伦理规则中，所有涉及新闻工作目标的 12 条都把这作为新闻工作的首要使命。在 24 条规则中，有 4 条虽然没有提及新闻工作的目标，但是在文字中包含有这样的意思。

[10] Associated Press, report of Pope John Paul II's declaration of the Vatican's Holy Year Day for Journalists, by Ellen Knickmeyer, June 4, 2000; available at Associated Press Worldstream, via LexisNexis.

[11] Mitchell Stephens, *History of News*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6), 27.

[12] John Hohenberg, *Free Press, Free People: The Best Cau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2.

[13] Stephens, *History of News*, 53—59. 设立官办日报是公元前 60 年尤利乌斯·凯撒在成为罗马执政官之后颁布的第一个正式法案。

[14] Hohenberg, *Free Press*, 38. 执笔者是 John Trenchard and William Gordon.

[15] Thomas Jefferson,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 Septermber 9, 1792. Retrieved from www. about. com.

[16] *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 439 U. S. 713(1971).

[17] Lee Bollinger, at CCJ Forum, Ann Arbor, MI, February 2, 1998.

[18] John Seeley Brown, expressed to author Rosenstiel at a meeting to discuss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curriculum, sponsor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Menlo Park, CA, June 15—16, 2000.

[19] Paul Saffo, expressed to author Rosenstiel, same meeting.

[20] Brown, expressed to author Rosenstiel, same meeting.

[21] CBS News/New York Times poll(October 1994), "Do you happen to know the name of representative in Congress from you district? (If yes, ask:) What is your representative's name?" Data provided by the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2] 这一数据来自 1996 年总统选举。在 1998 年非大选年(off-year)的国会选举中，只有 36%的选民投票。

[23] 大多数人从本地电视节目获得新闻，这一结论来自 Nielsen Media Research 的数据；本地电视节目忽视对政府的报道的判断来自"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Local TV Project," in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anuary 1999, Novermber 1999, Novermber 2000; available at www. jounalism. org。

[24] 民众的报纸阅读率来自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s biennial suvey of media consumption, June 2004。关于公共生活的知识来自于 Michael Delli Carpini and Scott Keeter 的文章"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U. S. Public's Knowledge of Politics," 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Winter 1991, 583—612。

[25] Walter Lippmann, *The Essential Lippmann*, ed. Clinton Rossiter and James Lare(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3), 108.

[26]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22.

[27] John Dewey, review of *Public Opinion* by Walter Lippmann, *The New Republic*, 3 (May 1992), 286.

[28] 有两位作者明确地讨论过这一争论：Carey in *A Critical Reader*; Christopher Lasch in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New York/London: W. W. Norton, 1995)。

[29] Lou Urenick, "Newspaper Arrive at Economic Crossroads," *Nieman Report*,

special issue (Summer 1999), 3—20.

[30] 有不少研究者发现了这些年来政治报道的这一趋势。最近的一些例子包括 Joseph N. Cappella and Kathleen Hall Jamieson in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 Thomas E. Patterson in *Out of Order: How the Decline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News Media Undermine the American Way of Electing Presidents*, and the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i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 Content Study of Early Press Coverage of the 200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ebruary 2, 2000; available at www.journalism.org。

[31]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247.

[32] David Burgin 在 1980 年和 1982 年是本书作者 Rosenstiel 的编辑，当时他们在 Palo Alto 的 *Peninsula Times Tribune* 工作，他教会本书作者关于报纸排版的这一理论。

[33] Bryon Calame, "Turing the Tables: What the Times News Staff Thinks of You,"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2005; available at www.nytimes.com.

[34] Anatol Lieven, "Taking Back America,"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6 (December 2, 2004).

[35] Ralf Dahrendorf, *After 1989: Morals Revolution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i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997), 98.

[36] Seth Sutel, "AOL to buy Times Warner for About $166 Billion," January 10, 2000; available at Associated Press online, via LexisNexis.

[37] Rico Gagliano, "Lockout Blackout," *L. A. Weekly*, December 18, 1998; available at http://home.pacbell.net/one-11/Nabet.html.

[38] Walt Disney Company, 1999 Annual Report. 收入数据来自于 1999 年财报。

[39] 本书合作者 Rosenstiel 参加了 2002 年 1 月的一次电话会议，在那次会议上 Arledge 提出了上述观点。Rosenstiel 当时正在为他的书 *Strange Bedfellows* 做研究。

[40] Peter Jonson, "Pioneering TV Executive Roone Arledge Dies," *USA Today*, December 6, 2002.

[41] 在互联网消费税问题上经过多年争执之后，国会同意三年内禁止向互联网接入服务征税。这一 2004 年通过的协定同时保证，同一个网络购买行为只需要向一个州纳税即可，各州不得重复征税，并且网上购买的商品消费税和在该州购买的其他商品的消费税不得有差异。参众两院都希望这一禁令能够永远执行下去。虽然在线销售被要求纳税，但是许多网站根本不把它加入销售价之中。该体系以及缓慢的立法进展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而这些收入最终会用于修路、消防、学校、政府和类似的用途。

[42] Thomas Friedman, "Corporations on Steroid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2000, A29; available at www. nytimes. com.

[43] ABC 和 NBC 新闻的利润估计来自 Marc Gunth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twork News: How Profitability Has Moved Networks Out of Hard News," *Nieman Reports*, special issue (Summer 1999), 28—29。1998 年,ABC 新闻税前的利润是 5500 万美元,当年迪斯尼的收入为 40 亿美元。1998 年,NBC 新闻的收入为 2 亿美元,当年通用电气的收入为 135 亿美元。

[44] 凯瑞是在 2000 年 6 月 19 日在华盛顿召开的 CCJ 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上述评论的。

# 第2章

# 真实[①]：首要且最令人困惑的原则

约翰·F.肯尼迪遇刺几天以后，继任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召见了国防部长。约翰逊想知道一万英里外的一个叫越南的小国究竟发生了什么。约翰逊不相信他在副总统任上曾听到的汇报。他想得到自己的信息。为此，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飞往西贡，花了三天时间与所有将军交谈，并游历了各战区。

在回国前，麦克纳马拉在新山一机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报告说自己极受鼓舞，战况进展成绩斐然。南越武装力量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共的死伤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第二天，当他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他召开了第二个新闻发布会，内容与前一个大致相同。接着，他乘直升机来到白宫草坪亲自向约翰逊报告情况，然而世人对这位部长与总统的会面情况以及他向约翰逊报告的内容却一无所知。

八年之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份由政府撰写的机密报告，内容是政府领导人对越南情况真正的了解及看法。在这批后来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浩瀚文件中，就有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的真实内容。他认为，越南的状况惨不忍睹，越共的增援数量超过其伤亡人数，需要更多美国士兵参战而不是相反。总而言之，实际内容与他在两次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完全相反。《华盛顿邮报》前执行主编本杰明·布莱德利(Benjamin C. Bradlee)在20年后提出了一个问题：

---

① "Truth"一词有真实、真相和真理三种不同的翻译。这三种中文解释在不同的语境中略有区别。在本书中，涉及哲学讨论时译成"真理"，作为抽象原则时译作"真实"，而在新闻操作层面使用这个概念时译作"真相"。

“如果真相在 1963 年就公布，而不是等到 1971 年才大白于天下，将会发生什么？”[1]

**真相**与**谎言**、**准确**与**错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这些词，认为它们传递着某种有意义的东西。麦克纳马拉在新闻发布会上**撒了谎**。五角大楼文件揭示出他**真实**的想法和向约翰逊汇报的**真实**内容。这个故事甚至还涉及真与假的不同层面。新闻界准确地报道了麦克纳马拉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内容，但是却没有获得麦氏知道的真相。

在过去三百年间，为了发挥提供新闻的功能，即为了让人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而提供间接的知识，新闻职业逐渐确立了一套松散的原则和价值观。在这些原则之中，最重要的就是：

**新闻工作首先要对真实负责。**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既绝对一致，也存在困惑：每个人都同意新闻工作者必须说出真相，但是人们对于“真相”的含义却不甚了解。

皮尤人民与新闻调查中心和热心新闻记者委员会在调查新闻记者心目中最重要的价值时，100％的被访者都回答“得到正确的事实”（getting the facts right）。[2]

我们在和高校合作者进行的深度访谈中发现，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的新闻工作者都主动将“发现真相”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3]在论坛上，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的新闻工作者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另类周报《韦斯特沃德》（*Westword*）的编辑帕蒂·卡尔霍恩（Patty Calhoun）说：“我们认为你无法保持客观，因为你在工作中总是具有某种倾向，但是你肯定能追求准确、公平和真实，并且这种追求将一直持续下去。”[4]

希望得到真实信息，这是人的基本欲求。因为新闻是人们了解和思考自己身外世界的主要依据，所以有用和可靠成为最受重视的素质。明天会下雨吗？前方是否交通拥堵？我支持的球队获胜了吗？总统说了什么？真实会带来安全感，因为安全感来自知晓。真实是新闻的本质。

对真实的基本需求如此强烈，有证据显示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①是《新约·约翰福音书》的

① 直译为“世界产生之初就存在语言”。据《旧约·创世纪》记载，上帝是通过语言创造世界的。

开头。最早的新闻工作者是前文字社会的信使，他们要能准确可靠地记住一切，这不免有些强人所难。不过这些信使传递的新闻常常生死攸关。部落的首领掌握准确的讯息后才能知道山后的那个部落是否会进攻。

有趣的是专制的社会有意轻视对真实和准确进行咬文嚼字般的定义，就像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不过两者的原因有所不同。比如中世纪的僧侣提出，真理是有等级的。最高级的是关于宇宙命运的讯息，例如是否存在天堂。其次是道德真理(moral truth)，它教导我们如何生活。接下来是寓言真理(allegorical truth)，它来自故事中蕴含的道德教诲。最后，在最底层的是最不重要的真理——表面真理(literal truth)，它通常被理论家认为是毫无意义且无关紧要的真理。一部14世纪的手稿用今天我们经常从后现代主义学者或好莱坞制片人那里听到的相似逻辑解释道："历史真实还是小说真实，这个区别并不重要，因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其重要性。"[5]

现代的政治操作也信奉相似的观念，经常宣扬在公共生活中"感觉就是真实"的论调。1968年围绕着理查德·尼克松所进行的操作就利用这种理念，为其选举增加了砝码。[6]

今天，类似的管理信息的手段无疑变得更加高明。缔造公民新闻的高科技同样也能增强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塑造其公众形象的能力。乔治·布什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顾问曾接受过《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记者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的采访，不妨看看他是如何谈论政府控制新世界的信息的："(新闻工作者)属于我们所说的以真实为基础的群体……但那已经不再是今天世界的运行方式了……我们采取行动时，我们会制造我们自己的真实。当你研究这种真实时……我们会再次行动，制造另一个全新的真实，当然你还可以继续研究。"[7]

这没有什么新鲜的。和今天的政治运作一样，中世纪思想家们的目标不是启蒙而是控制。他们不愿表面事实妨碍了政治的或宗教的正统性。对于现实的准确理解威胁了这种控制——就如同今天一样，因为这种理解是反抗压迫和操纵的武器。

当现代媒体伴着民主理论的诞生逐渐萌芽时，对真实和准确的承诺迅速成为早期新闻业市场营销的有力手段之一。被认为是英格兰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提出要依赖"最好和最确凿的情报"。法国第一张报纸虽然由政府所有，但是其编辑在创刊号上承诺："在一件事上我不会向任何

人屈服——那就是我对真实的追求。”类似的关于准确性的承诺在美国、德国、西班牙及其他地区的早期报纸上随处可见。[8]

美国早期的殖民地新闻是议论和事实的奇怪混合体。尽管航运和货运的信息非常准确，但是政治上的刻薄攻击就不尽然，很显然其中的观点或言论的分量要大于严格的信息。即便是那个时代以揭露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及托马斯·杰斐逊性丑闻而臭名昭著的丑闻贩卖大亨詹姆斯·卡伦德(James Callender)也不会无中生有地向壁虚构，历史学家发现，他传播的是混合着传闻的事实。[9]

随着19世纪的新闻业从政治控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它开始吸引第一批大众读者，为了达到目的，它既依靠煽情的犯罪新闻、丑闻、恐怖事件和名人崇拜，同时也面向普通大众，用浅显的语言写作新闻。新闻不再纠结于政党之间的相互攻讦，这一转变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创刊的《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到19世纪末，新闻业在大众化和煽情化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约瑟夫·普利策和“黄色新闻”的时代。即使是这些黄色新闻大亨也向读者保证他们可以相信自己读到的一切，虽然这一承诺不总是能兑现。赫斯特的《纽约纪事报》(*New York Journal*)尽管刺激性远超过创造性，却声明它是该市最真实的报纸。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按照其座右铭“准确、准确、准确”行事，并且比人们通常称赞的还要值得依赖。[10]

为了向读者保证他们可以相信读到的一切，1913年普利策在《纽约世界报》建立了准确和公平部(Bureau of Accuracy and Fair Play)。1984年，卡桑德拉·泰特(Cassandra Tate)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发表文章，描述了《纽约世界报》的第一个调查员在研究报纸发布的沉船报道时发现的一个规律：每个报道都会描述一只幸存的猫咪。当这位调查员向记者问起这个奇怪的巧合时，他得到了下面的回答：

> 有一艘沉船上刚好有只猫咪，船员回去把它救了出来。我在自己的报道中专门写到了这只猫。其他报纸的记者因为没提到这只猫，在竞争中略逊一筹，结果被城市版的编辑责骂。第二次再有船沉没时，虽然没有猫，但是其他负责沉船报道的记者不愿意冒险，便擅自加上了一只猫。我写的新闻中没有提及这只猫，被别家报纸抢了风头，受到我们编辑的责骂。因此，只要有船沉没，我们总会加上对

猫的描写。[11]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修饰都是为了增加真实感才加上的。

到了20世纪初，新闻工作者开始意识到现实主义(realism)和现实性(reality)——或准确性和真实性——并不能简单画等号。沃尔特·李普曼在1920年发表的《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the News")一文中将**真相**(truth)与**新闻**(news)作为同义词互换使用。但是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意见》中，他却写道："新闻和真相并不是一回事……新闻的功能只不过是使某个事件更加突出"，或使人们知晓而已。"而真相的功能则是说明隐藏的事实，让它们彼此联系，形成一幅现实的图像，以便人们以它为参照采取行动。"[12]到1938年，新闻教科书已经开始质疑新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真实。[13]

在后来的50年里，经过长达几十年的争论，有时是由政治意识形态引起的，有时是由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引起的，目前的现状是，一些人认为任何人都无法在有意义的语境中阐明事实，做出真实的报道。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弥漫整个知识界，从艺术、文学、法律、物理到历史无一幸免。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西蒙·沙马(Simon Schama)表示，"终极的、可观察的、经验的、可检验的真理"已经消亡。[14]

看起来真实对我们来说过于复杂，以至于可遇而不可求。或许它根本就不曾存在，因为我们都是具有主观性的个体。这些论点很有意思，甚至从哲学层面看，或许也能成立。但是这会置新闻事业于何地？在今天，难道**真实**这个词充其量只能在日常对话中使用，禁不起仔细推敲？

显然，存在不同层面的真实。记者兼新闻批评家理查德·哈伍德(Richard Harwood)在一次委员会的论坛上说："《纽约时报》的记者告诉我们几天前纽约巨人队以20比8输掉了橄榄球赛。那是真相的一小部分。但是关于巨人队为什么会输掉比赛的报道，却有上百种来自不同视角的写法，每种写法都会受到刻板印象和个人偏好的影响。"[15]

新闻工作者对真实的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学术界的研究和哲学论证是人们回答这个问题时常用的方式，结果却越说越乱。导致该现象的一个原因是这些讨论通常没有从现实世界出发。关于"真实"是否存在的哲学讨论多数沦为名学之争。

导致该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新闻工作者自身从未对真实性意味着什

么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看法。新闻工作的特征是行动和实践，不是哲思和内省。新闻工作者关于这一问题的严肃思考并没有留下丰富的文献，仅有的少数文献也没有多少人看过。新闻工作的理论研究留给了学术界，许多新闻工作者素有轻视新闻教育的传统，他们认为学习新闻的唯一方式是工作中的言传身教。即使令人尊敬的电视记者泰德·科佩尔也曾说过："上新闻学院纯粹是浪费时间。"[16]

在解释他们如何做到真实时，新闻工作者通常会迅速从采访、演讲，或者更糟糕的是，从商业口号中抽取几句话来回答，他们经常依赖一些粗糙的隐喻来加以说明。传媒是社会的"镜子"，广播与电视新闻总监委员会前主任戴维·巴利特(David Barlett)如是说。汤姆·布罗考认为，新闻"是当天激情的反映"。CNN的一位制片人认为新闻就是"一天中最有新闻价值"的一切信息。[17]这些解释使新闻工作者似乎只是事件的被动记录者而不是选择者或编辑者。[18]好像他们认为真实就像发面一样，自己会膨胀。新闻工作者不但没有为自己发现真实的技巧和方法进行辩护，反而否认这些技巧和方法的存在。

不论是秘而不宣还是无力阐释，新闻工作者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缺乏清晰的说明不禁让公民心存疑惑：新闻界究竟是在自欺欺人还是隐瞒了什么秘密？这也是导致新闻客观性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客观性这个概念变得极易被误解、被抨击，以至于相关讨论大多会离题千里。我们将在第4章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根本上讲，并不是新闻工作者应该保持客观，而是他或她的方法应该保持客观。然而，部分由于当今的新闻工作者无法清晰地说明自己所做的一切，导致目前对客观性的理解变得混乱不堪。

虽然公众充满疑惑，但是毫无疑问，新闻工作者却坚信自己的职责是追求真实，而不是追求言论自由或商业自由。我们必须如此，因为这是社会对我们的要求。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新闻真实"不只是准确(accuracy)。它是一个去伪存真(sorting-out)的过程，它是报道与公众、被报道者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新闻的首要原则——超功利地追求真实——最终将新闻与其他形式的传播区别开来。

## ◉ 新闻真实

理解这一去伪存真的过程，首先要注意的是新闻工作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公民和团体必须依赖对事件的准确而可靠的叙述，这一点毫无疑义。他们发展起各种程序和规则来达到所谓的“实用的真实”(functional truth)。依据事实，警察搜查逮捕疑犯，法官做出判决，陪审团裁定被告是否有罪。在事实的基础上，人们规制产业、课税和立法。我们也依据这些真实向下一代传授规则、历史学、物理学和生物学。所有这些真实——甚至科学规律——均处于不断修正之中，但是我们同时又在遵循着它们，因为我们离不开它们，也因为它们确实起作用。

这就是新闻所追求的真实——一种操作性的或实用的真实。这种真实不是绝对的或哲学意义上的真实。它不是化学方程式那样的真实。新闻工作能够而且必须追求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使用的真实。《纽约时报》的第一副主编(managing editor)比尔·凯勒(Bill Keller)在委员会的一次论坛上说：“我们期待陪审团做出公平的裁决，老师传授诚实的知识，历史学家写出不偏不倚的历史，科学家进行不带偏见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为什么我们要降低新闻工作者的目标呢？不论真正的客观性是否可能实现——我不认为这应是我们现在这次会议的真正议题……我们努力报道，力求尽可能多地向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帮助他们进行决策。这就是我们的终极理想。”[19]

这是否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只须坚持准确性，把名字和日期写对就万事大吉？这就足够了吗？随着当下多数新闻的解释性不断增强，新闻工作者在论坛、抽样调查和访问中的回答都对上述判断说不。一则仅仅建立在准确基础上的新闻并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需求。

首先，仅仅做到准确无误，这本身就可能造成某种歪曲。早在1947年，由一群学者组成的哈钦斯委员会(Hutchins Commission)花了数年时间完成了一篇报告，概括了新闻工作的责任。在这篇报告中，他们对发表那些“事实正确但本质虚假”的内容所导致的危险提出警告。[20]早在那个年代，这个特别小组就以一些对少数群体的报道为例，说明由于没有提供社会背景或者无理由地强调种族或民族，强化了读者错误的刻板印象。“仅仅真实地报道事实(report the fact truthfully)已经不够，目前更有必要的是报道事实中的真实(report the truth about the fact)。”

单纯的准确也不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新闻工作者杰克·富勒在《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一书中解释说，根据哲学家的说法，存在两种评判真实的标准：一种是符合论的（correspondence），另一种是融贯论的（coherence）。[①] 对于新闻工作而言，这些标准大致可以理解为获得未被扭曲的事实，并且说明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富勒认为，融贯论应该成为新闻真实的最终检验标准。“不论极端的怀疑论者提出什么观点，人们仍然热情地信仰意义。他们需要整幅图画，而不只是一部分……他们对于像‘麦克洛克林小组’（McLaughlin Group）[②]式的各执一端的公共辩论感到厌烦。”[21]

常识使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现在警察部门正陷于一桩腐败丑闻中，那么今天的新闻仅仅简单地报道了市长在花园俱乐部的午宴上表扬了警察，这似乎是不够的，甚至是愚蠢的；很显然，市长的评论只是一种政治修辞，是为了回应最近对他的一些攻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准确性就无关紧要。相反，准确性是语境、解释、辩论和所有公共传播的基础。如果这一前提就出现错误，会导致其他所有信息都存在缺陷。新型的新闻媒体、谈话节目、博客和解释性报道带来的一个风险就是它们把核实事实抛在脑后。采用错误数据或纯粹属于偏见的辩论提供不了任何信息。它只会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社会迷失方向。

因此，把新闻真实理解为一个过程显得更有帮助，也更现实，它是一个以理解为目标的持续的旅程——以第一篇报道为起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丰富。例如，第一则报道可能是一个新的事件或趋势，如对一个会议或一场车祸这样简单的事件进行描述，说明车祸的时间、地点、伤亡损失、交通工具类型、制动状况、特殊的天气或路况，这些事实都有记录可查。一旦确定了这些事实，新闻记者会尽可能对事件的意义进行公正和

---

① 符合论起源于哲学家洛克，他认为，真实是我们的观念与事物的实相之间的契合。现代的逻辑实证主义也持这种看法。经验论派多持符合论，即主张真理在于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心中观念与外部事物相对应。而以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为首的理性论派则持融贯论的真理观，即主张真理就在于主观内部的逻辑一致性、无矛盾性、严密性和无可怀疑，也就是说真理是一个相容的、一致的、不包含矛盾的体系。

② 自1982年1月开播至今的“麦克洛克林小组”是一档电视政治时评节目，由制片人麦克洛克林作主持，邀请四或五位嘉宾（其中三位通常是固定的），以圆桌讨论的形式针对近期发生的政治话题进行辩论。它通常以各执一词的舌战而告终，这也成为该节目的特色。批评意见则认为该节目过于追求争辩效果而损害了新闻的严肃性。

可靠的叙述，至少是暂时符合逻辑的，以备进一步调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把这说成是新闻记者为提供“可知的最佳版本的真实”而努力[22]。尤金·迈耶(Eugene Meyer)于1933年为《华盛顿邮报》所起草的报道原则把它描述为说出“可以确定的最接近真实的真实(the truth as nearly as the truth may be ascertained)”[23]。

在最初的报道中，单个记者或许无法超越表面准确的层面。但是在第一篇报道的基础上还会出现第二篇报道，消息源会对第一篇报道中错误的和疏漏的事实进行补充，然后还会有第三篇报道，以此类推。每一个新的层次都会加入不同的背景材料。对于重要而复杂的报道，还会有社论跟进，同时在谈话节目、言论版进行深入报道和讨论，博客和其他互联网站的意见也会加入进来，也包括读者给编辑的来信和广播节目的热线电话，整个公共的和私人的讨论都会成为追寻真相的一部分。这种实践的真实处于变化之中，它既像我们学习知识的过程，也像岩洞里的钟乳石，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成长。

现实中的例子举不胜举。以阿布纳·路易玛(Abner Louima)的案子为例，这位海地移民1997年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夜总会外被以妨碍治安为由逮捕。一开始这个报道看上去就像是一则警察记录的简报。但是三天后，纽约《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专栏作家麦克·麦克阿拉里(Mike McAlary)在一家医院里发现了路易玛并采访了他。路易玛揭发说警察对他施暴，并且用厕所里橡胶吸碗的手柄鸡奸了他。同一天，警察局把两名涉及该案逮捕工作的警察调离岗位。两天后，在第二次采访中，路易玛声称逮捕他的警察告诉他：“这是朱利亚尼(指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的时代，不是丁金斯(指前黑人市长戴维·丁金斯(David Dinkins))的时代。”更多的警察被停职，不久市民在布鲁克林举行抗议活动。没几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深度报道，暗示纽约市犯罪率下降的另一面是警察野蛮执法的系统性增长。纽约市政府重点整治了警察对嫌犯的执法问题。一年后，路易玛收回了他关于“朱利亚尼时代”的证言，但是没有否定他被残暴对待。几个月后，曼哈顿研究所出版的《城市期刊》(*City Journal*)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虽然警察系统中偶然出现的暴力执法现象引起了高度关注，但是纽约警察局在这一问题上有着较好的记录。[24]

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真实是一个复杂的，甚至有时相互矛盾的现象，但是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的话，新闻能够做到真实。新闻试图

从一个令人迷惑的世界里找到真实，它首先从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误导性信息（disinformation）[①]或自吹自擂的信息中剥离出有用的信息，接着观察社群的反应，然后再完成去伪存真的过程。寻找真相成为一场对话。

这一定义有利于兼顾日常语言中**真实、虚假**的含义和哲学争论中被我们解构的词语的意义。相对于镜子和映射这样一些粗糙的比喻而言，这个定义更接近新闻工作者对于自己工作的直觉。

我们把真实理解成一个目标——虽然有时难以把握——并仍然信奉它，这就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观点，他在阐述科学时曾说科学的目标不是发现真理，而是让我们少犯错误。这就是生活——我们经常努力奋斗，但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目标。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在谈到如何写历史时曾说，“虽然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历史记录是碎片式的和不完整的……历史学家永远不会在诠释上达成一致”，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存在可观察的和可被经验证实的客观真实的过去”。这不仅仅是因为信仰而盲信。在现实生活中，当某人的信息来源权威、调查彻底、方法透明，人们就会认为他或她已经接近真相。正如伍德所说：“历史学家可能永远不能完整地看到并呈现出最终的真实，但他们中有些人写的历史总会比其他人的更接近真实、更完整、更客观、更诚实，当我们看到这些作品时，我们一定会看得出来，事实上我们已经做到了。”[25]

那些在新闻机构或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也说过同样的话：使新闻接近最完全版本的真实具有重要意义。在事件刚刚发生一小时之内，事实准确最难做到，准确性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公众根据新闻提供的信息语境，形成对事件的态度，这一态度有时可能还很顽固。这个事件是否对我构成威胁？对我有好处吗？我应该关心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是否会仔细阅读接下来的最新进展，以及我所关心的这些

---

① 误导性信息（disinformation）的字面意思是“错误的、不完整的信息”。这类信息的真实发布者的身份不为人所知，通过第三方传送、提供或证实。这个概念最早来自1955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新成立的一个局的名称——“dezinformatsia”，该局也被称为A局，即“积极行动”（Active Measures）局的代称。该部门主要从事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和颠覆策反活动，目的是给敌对国造成危机。误导信息不仅包括错误的信息，还包括用来削弱敌方的新闻报道。这些新闻报道常常通过外国特工或被收买的外国记者首先在其国家发布植入性报道（planted stories），这些报道通常半真半假，表面信源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中立性，容易迷惑受众。后来，这个词在一般语境下泛指隐蔽的宣传。

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核实。有过长期记者工作经历，后来担任卡特政府国务院公众事务助理国务卿的霍丁·卡特（Hodding Carter）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这是一个政府可以对公众心灵进行大规模控制的时代："只要三天内没有受到挑战和质疑，政府就能通过设定某一事件的语境，最终控制公众对该事件的感知。"[26]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刚结束之时，政府没有及时行动或反应造成的后果，证明了卡特的观点。因为政府无法设定语境，恐慌的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报道决定了这一新闻事件的性质。政府花了数周时间才使新闻报道重新回到控制之中。

近年以来，一些新闻工作者建议用另一些原则代替真实。两个最普遍的替代原则是公平和平衡。但是细察之下会发现这两者均有不足。公平过于抽象，最终比真实更加主观。对谁公平呢？如何检验是否公平？尽管达到真实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至少还可以加以检验。

平衡也过于主观。如果意见双方的重要程度事实上并不完全相等，确保对各方公平的平衡可能会造成对真实不公平。全球变暖是一个事实还是虚构？绝大多数科学家很多年来一直认为存在全球变暖现象，但是新闻却继续报道旷日持久的科学争论，给双方同样的篇幅。而且在许多事件中，可能有两个以上的立场，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如果平衡导致了错误的平衡，那么平衡就成为了歪曲。

在我们所写的《扭曲的速度》（*Warp Speed*）一书中，我们谈到尽管大多数新闻工作者表示继续忠于真实，但是各种力量却削弱了新闻工作者对真实的追求。这里不必要再赘述那本书里的内容，只需要说明一点：在源源不断地大量生产新闻的新兴媒体文化中，新闻变得碎片化；信息源反过来控制了记者；新闻工作标准的改变使媒体把关人不再起作用；廉价的、极端的观点充斥于报道之中；更多的媒体只把注意力放在发现"大新闻"上，这些新闻只能暂时地吸引碎片化的大众。总之，这些被我们称为混合媒体文化的新特征正在取代从当天的诸事件中寻找真实可靠报道的经典功能。在这种持续变化的新闻文化中，新闻工作者只顾着一股脑儿地把最新信息发布出去或放到网上，几乎不会花时间去核对事实。通常他们只是传递信息，创造出被我们称为断言式新闻（journalism of assertion）的新形式，并且已经推翻了传统的确证式新闻（journalism of verification）。自从 2001 年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以来，我们又在广播谈话节目、有线电视新闻和其他一些节目中看到了第三种媒体模式——肯定

式新闻(journalism of affirmation),它不追求充满怀疑精神地确证事实,而是肯定和迎合受众已有的理念。互联网上的一些网站只是收集信息,通常是使用几何算法程序来进行这一工作,这导致了第四种模式——聚合式新闻(journalism of aggregation)的出现。这种模式不负责区分流言、事实和猜想。去伪存真的工作完全依靠使用者来完成。

尽管出现了上述潮流,新闻工作者还是坚信讲述真相的重要性。在我们对核心价值观的抽样调查中,80%的全国性媒体的新闻工作者、70%以上的地方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回答他们"会对一个事件做出真实和准确的报道"。新媒体或网络新闻工作者也持上述看法,70%的人认为真实和准确的报道是可能的。[27]

70%的全国和地方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自信他们能够找到一种专业的方法"公正无私地报道事件"。与此相近,几乎有60%的新媒体工作者也这样认为。但是持怀疑论的人也不少:在所有媒体中,大约四分之一对这一目标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表示怀疑——其中地方新闻工作者中有27%、新媒体工作者中约有31%同意该观点。[28]

可能正因为存在上述怀疑,难怪所谓严肃新闻界对新型媒体文化的一贯反应就是为这些新闻加入更多的新闻背景和解释。该观念认为这会帮助受众从超载的信息中发现真相,让新闻更有意义。但是我们认为这一针对新媒体的反应并不成熟。首先,希望人们从大量未经过滤的信息中去伪存真不具操作性。毫无疑问,以互联网为联系途径的21世纪的消费者拥有的新闻来源超过了任何一位生活在20世纪的消费者,但是人们消费新闻的时间仍然有限。事实上,虽然可获得的新闻数量不断增长,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人们是否会增加他们花在新闻上的时间。[29]

在新媒体和发布新闻的渠道不断增加的今天,追求真实的本能和在以往任何时代一样必要。霍利奥克山学院(Mt. Holyoke College)的荣誉退休历史学教授彼得·维里克(Peter Viereck)甚至认为追求真实的本能在今天显得更加必要。维里克说:"尽管我们屡战屡败,但是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努力发现真相、尽量如实报道真相更英勇无畏。虽然我们从未完全如实地描述现实(reality),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定义现实。现实是那种纵然你不相信,却不会离你而去的东西。"[30]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投入到寻找真实方面的力量在很多方面要比过去更多,因为今天可获得的信息太多了。可以将其称为信息时代的

获知悖论(paradox of learning)。当信息供过于求,即输入的信息过多时,获得知识不是变得更简单,而是更困难。一个人必须处理更多信息才能把事情弄明白。我们得到的知识可能更深更好,但是它也可能会更加专业化。

不仅如此,当媒体成为背景噪音时,我们的注意力被削弱了。摆脱嘈杂的喧闹声变得更加困难。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当真相才穿上裤子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了",如果他的话正确,那么更先进的科技只是提高了信息传输的速度,不仅给真实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同样也给错误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31]

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兴的党派新闻、肯定式新闻会更受某些受众欢迎。因为它使得一切变得更加简单。它能够在令人困惑的世界里发现秩序,不需要太多筛选和提升。它令人感到舒适。这一现状增强了挑战性,我们更加需要那些把事实放在首位的新闻。它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增加解释只会增加报道中的杂音,并转而追求新闻中的软真实(softer levels of truth),而这个层次的真实应该是在事实确立之后,在去伪存真、寻找意义的过程中才应该涉及的真实。在还未真正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就匆忙地进入解释阶段是错误的。

新闻界不应匆忙加入背景和解释,而应集中精力进行综合和确证;把流言、影射、琐事、宣传排除在外,专注于报道中真实和重要的内容;向受众交代确定的消息来源,核实信息,强调应该注意的重要部分,过滤那些无足轻重的内容。人们需要信源告诉他们什么是真实的和重要的,而不是投入更多时间从大量信息中自己寻找需要的东西。他们需要信息来判断"这些信息中我能够相信什么"。因此,在这个新时代,媒体的作用是回答这个问题:"哪里有好内容?"核实和综合应该成为新型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责;正如前一章提到的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约翰·西利·布朗所说,新闻工作者扮演着"意义解释者"的角色。简而言之,在新世纪因为失实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对真实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为了做到真实,新闻工作者必须清楚他们首先要忠于谁。这是下一章要讨论的原则。

## 注 释


[1] Benjamin C. Bradlee, *Nieman Reports*, special issue(Winter 1990).

[2] CCJ and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Striking the Balance: Audience Interests, Business Pressures and Journalists' Values," March 1999, 79; available at www. journalism. org and http: //people-press. org.

[3] Interviews by William Damon, Howard Gardn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with a number of journalists; unpublished interviews for the book *Good Work: When Excellence and Ethics Meet*(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4] Patty Calhoun, at CCJ Forum, Chicago, November 6, 1997.

[5] Peter Levine, *Living Without Philosophy: On Narrative, Rhetoric, and Moral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169.

[6] 上述形象优先于现实的观念在以下这本书中得到了戏剧性的描述: Joe McGinniss, *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 (New York: Trident Press, 1969)。

[7] Ron Suskind, "Without a Doub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7, 2004; available at www. nytimes. com.

[8] John Hohenberg, *Free Press, Free People: The Best Cau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17.

[9] Joseph Ellis, *American Sphinx: 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303.

[10] Edwin Emery, *The Press in America*, 2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2), 374.

[11] Cassandra Tate, "What Do Ombudsmen Do,"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June 1984), 37.

[12] Ibid.

[13] David T. Z. Mindich, *Just the Facts: How "Objectivity" Came to Define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5. Mindich 说第一本质疑客观性的教科书是 Curtis MacDougall 的 *Interpretative Reporting*, 8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14] Gordon Wood, "Novel Histor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27, 1991, 16.

[15] Richard Harwood, at CCJ Forum, New York City, December 4, 1997.

16] Everette E. Dennis, "Whatever Happened to Marse Rober's Dream?: The Dilemma of American Journalism Education," *Gannett Center Journal* (Spring 1998).

[17] Mindich, *Just the Facts*, 6—7. 这里的三个例子均来自该书，但是它们代表了我们这些年来从许多记者那里听来的观点。

[18] Mindich 在 *Just the Facts*, 141，也提到了这一点。

[19] Bill Keller, at CCJ Forum, New York City, December 4, 1997.

[20] Robert D. Leigh, ed., *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7), 23.

[21] Jack Fuller, *News Values: Ideas for an Information Ag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94.

[22] Carl Bernstein 在演讲、采访和与作者的交谈中曾数次提到这一观点。

[23] Eugene Meyer, "The Post's Principles," *Washington Post Deskbook on Style*, 2nd edit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9), 7.

[24] Heather MacDonald, "America's Best Urban Police Force," *City Journal* (Summer 2000).

[25] Wood, "Novel History," 16.

[26] Hodding Carter, interview by author Kovach, April 1998.

[27] CCJ and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Striking the Balance," 53.

[28] Ibid., 54.

[29] John Robinson and Geoffrey Godbey, *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 2d ed.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3. 在《公众意见》中，李普曼使用了从 1900 到 1920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人们看报的平均时间基本稳定在 15 分钟左右。到 1965 年，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 John Robinson 发现人们看报的时间仍然在 15 分钟左右。但是当他 10 年之后再对比类似的数据时，他发现虽然电视新闻的播出时间有所增加，却没有导致人们花在新闻上的总时间增加，相反，"看报时间中减少的时间与每天观看本地电视新闻节目增加的时间相等"。过去 100 年间美国人的闲暇时间一直在增加，如果我们把这也作为一个因素进行考虑的话，上面这些数字所显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30] Tom Reiss, "The First Conservative: How Peter Viereck Inspired—and Lost—a Movement," *The New Yorker*, October 23, 2005, 42.

[31] 这段引文的不同版本被许多政治家、作家和新闻记者所引用。人们一般把马克·吐温的话引用为："当真相刚穿上鞋子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了。"

# 第3章

# 新闻工作者为谁服务

每到岁末，全国新闻界的高层主管们会焦急地等候新的职业评估：他们干得怎么样？可以领到多少钱？一般来说，他们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将取决于此。然而，这个评估不再仅仅依据新闻的质量。新闻质量通常只占到评估指标的一半甚至更少。今天，新闻管理层的奖金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公司赚了多少钱。[1]

这一现象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许多商业机构为了增强管理者的责任意识，都设置了激励奖金。但是将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和新闻质量以外的因素挂钩，这是一个新现象，只在近二十年才出现。从表面上看，这一做法无可厚非。新闻也是生意，管理者有控制预算、降低成本和吸引顾客的商业责任。

然而公司激励计划标志着新闻编辑部的思维方式出现了巨变。这一现象导致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将出现新的定义，这也是新闻职业正在发生的质变的一部分。

到20世纪末，美国新闻界的主要领导者中间不仅发生了普通的人事变动，事实上他们蜕化成了商人。其中一半的人说他们将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经营上，而不是新闻上。[2]

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对这一现象保持警惕。同样，新闻工作者也应该意识到，他们的岗位正在受到侵蚀。但是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削弱了公民和新闻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并且与我们对现代媒体的定义相矛盾。评估重心的转移导致新闻组织内部出现了导向混乱和士气低迷的问题，限制了新闻工作者无所畏惧、不偏不倚地提供新闻的能力。这正是公民对新闻失去信心的关键原因之一，同时也使新闻媒体管理者们在公司

内很难自由地为公众利益说话。

到此为止，新闻工作者必须追求真实的观念应该比较清楚了，但是这还不够。究竟什么条件才能保证他们能发现真相，并且以公民能够相信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真相？答案是忠诚，这也是新闻工作的第二个基本原则。

没人会质疑新闻机构应该对其赞助者负责。成功的新闻机构必须为社区机构、本地组织、母公司、股东、广告主和许多其他利益相关方着想，并为它们服务。但是到了19世纪，经过不断地艰苦摸索和修正，报纸出版人逐渐意识到新闻工作者（通常也包括媒体的所有者）必须确定高于其他对象的优先效忠对象。这一承诺构成了新闻工作的第二个基本原则。

**新闻工作首先要忠于公民。**

效忠公民这一原则不仅是新闻职业自身的需要。它是与公众签订的契约，它向受众表明：影评会实话实说，餐厅评论不会受到广告主的影响，新闻报道不会受到报道者自身利益的影响或偏向报道者的亲友。新闻工作者挖掘和报道真相时不应受到阻碍，即使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也在所不惜——此观念是做到准确的前提条件，也是具有说服力的前提条件。这是公民信任新闻组织的基础，也是新闻公司和员工所拥有的特殊资产。

因此，新闻工作者与其他公司的员工不同。他们对社会承担特殊义务，可能会超越雇主的眼前利益。当然，该义务也是雇主获得商业成功的源泉。

忠于公民就意味着我们说的新闻独立（journalistic independence）。我们会发现，新闻独立这个短语经常被当作其他概念的同义词，包括中立、无私和超然（disengagement，disinterestedness and detachment）。但是这些概念让人混淆，反映出新闻从业人员自己对此的模糊理解。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新闻工作者还把这些混乱的观念传递给公众，结果可想而知，公民变得多疑甚至愤怒。

然而，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为公民服务，这个观念仍然根植于新闻生产者的心底深处。在我们的采访中，“你为谁工作？”这个问题引起了被访问的新闻工作者特别强烈的反应。1999年皮尤人民与新闻调查中心和热心记者委员会进行了针对价值观的抽样调查[3]，80%以上的被访者认

为“首先对读者/听众/观众负责”是“新闻工作的核心原则”。在发展心理学家实施的另一个开放性深度访谈中，70%以上的新闻工作者同样也把“受众”作为效忠的首要对象，远高于雇主、自己、其职业，甚至家庭。[4]曾在洛杉矶、辛辛那提和其他地区担任过新闻播报员的尼克·克鲁尼（Nick Clooney）说：“我一直在为那些打开电视的人工作，一直如此。每当我和主管经理或编委会成员讨论问题时，一直坚守一条底线：我不为你工作。你给我发工资，我非常高兴。但事实上我不为你工作，如果说到忠诚，我只忠于那些打开电视的人……当我明确表明上述立场时，从未受到过质疑。”[5]

新闻工作者应有超越雇主的效忠对象，这一意识根植于新闻工作者心中。当最优秀的新闻编辑部戏剧性地公然揭竿而起反抗上级时，这种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其他行业无法想象的。2003 年，《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的剽窃和虚假报道丑闻曝光后，该报的记者和编辑认为新闻编辑部最有权力的两个人——主编和执行主编（executive editor and managing editor）——纵容了这类事件的发生，并在事后企图逃避责任而违背了效忠公众的使命。编辑部的公愤迫使社长开除了这两名主编。[6] 2005 年，《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涉入一桩泄密事件的调查①，社长对这个饱受争议的事件的处理也招致了相似的结果。《纽约时报》记者唐·小范纳特（Don Van Natta Jr.）、亚当·利普泰克（Adam Liptak）、克利福德·J. 利维（Clifford J. Levy）毫不畏缩，向公众披露了自己报纸的问题。[7]专栏作家莫林·多德（Maureen Dowd）在言论版公开警告她的老板，威胁说如果允许米勒回到她的岗位，公众就不应再相信这份报纸。最后，米勒主动辞职。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记者亨利·温斯坦（Henry Weinstein）发现该报与新建的体育场签订了秘密协定：如果该报的周日刊全部报道该体育场的揭幕，斯特普尔斯中心（Staples Center）将以在该报投放广告作为交换。得知此事后，温斯坦和其他人发起了类似的起义。

---

① 2003 年，《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前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的妻子担负了 CIA 的秘密任务。从 2003 年到 2005 年，相关记者一直被要求与调查此案的大陪审团合作，供出当时向他们提供此信息的政府官员。朱迪斯·米勒因为拒绝提供信息源，以藐视法庭罪被判服刑 85 天至 2005 年 9 月 29 日。不过米勒的努力最终告失败，泄密官员仍被查明，米勒本人也在服刑后的一次庭审中提供了当时与线人接触的笔记。《纽约时报》因报道不利而公开道歉，米勒因此前作伪证等行为受公众责难。2005 年 11 月 9 日，米勒宣布从《纽约时报》“退休”。

巴尔的摩一家姊妹报纸的编辑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后来调到《洛杉矶时报》接管新闻编辑部,他描述说:"员工与愤怒的管理层在餐厅正面冲突,几乎动手。"这一偶然事件导致该报的管理问题受到全面调查,并最终促成了该报被卖给论坛公司。

照新闻行业以外的人看来,这类公开的冲突似乎标志着新闻业的价值危机。毫无疑问,这类违反纪律的反抗行为确实很严重。但是仔细研究这些案例,我们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新闻编辑部激烈、大胆、公开的抗议,说明忠于公众的原则对该职业的工作者具有多么深远的影响。

上述新闻观念来之不易。虽然忠于公众的努力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出现,但是直到19世纪后半叶,大多数居于领先地位的报纸才渐渐用采编独立取代政治意识形态。1896年,来自田纳西州的出版人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收购了挣扎在生存边缘的《纽约时报》,提出了最著名的思想和经济独立的宣言。奥克斯坚信,许多纽约人已经厌倦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和约瑟夫·普利策制造的恶俗的煽情新闻,他们希望看到更有品味的、更精确的新闻。在担任社长的第一天,奥克斯以报纸所有者的身份发表了一篇题目朴实无华的《商业通告》("Business Announcement"),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重要的精神遗产。他写道,自己"最诚挚的目标是不偏不倚地报道新闻,不畏强权,不徇人情,超越党派,利益无涉"。

其他出版人也提出了相似的独立宣言,但是正如阿历克斯·琼斯和苏珊·蒂夫特(Alex Jones and Susan Tifft)所指出的,奥克斯"真诚地相信他自己的话"[8]。美国其他报纸争相全文刊载这篇宣言。当《纽约时报》继而成为纽约乃至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后,其他人竞相追随奥克斯的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的主要思想认为:把受众看得高于政治利益和短期经济利益,才是最佳的长期经营策略。尤金·迈耶1933年购入《华盛顿邮报》后,起草了一系列内部原则,其中有这么一条:"为了追求真实,报纸应该做好牺牲物质财富的准备,只要这一牺牲对于公众利益来说是必要的。"[9]

就在媒体所有者高调宣布要在市场经营中保持编辑独立的同时,新闻工作者也抓住这个契机,加强专业性。像威尔·欧文(Will Irwin)这样的第一代媒体批评家开始出现。欧文之前是《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的记者兼编辑,他1911年在《科利尔》(*Collier's*)发表了由15部分组成的令人振奋的系列文章,记录了媒体滥用权力的大量细节。欧

文借用当时刚刚出现的新科技——电灯，把新闻工作为公众服务这一新角色称为“漆黑深巷里的电灯光”[10]。在老板们的宣言和批评家的谴责声中，报纸的编辑们也励精图治，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专业团体。《底特律自由新闻》(*Detroit Free Press*)的专栏作家马尔科姆·宾盖(Malcolm Bingay)追忆了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的创建过程，该协会是美国报纸编辑部管理层最主要的行业协会。1912年夏季的某天晚上，一群报纸编辑在冰川国家公园(Glacier National Park)①正式对外开放前游览了该公园，他们在洛基山下聚集一堂：

> 大伙围坐在篝火旁，卡斯帕·约斯特(Casper Yost，《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St. Louis Globe-Democrat*)社论版编辑)，提到最近有个想法萦绕在脑海中。他梦想着建立由美国报纸编辑组成的伦理组织……被同时代的人称为“毒药和老妇”②的小卡斯帕，也许最应该被记住的是创造了现代的媒体责任概念，但在今天关于媒体自由的激烈争论中，它是经常被遗忘的概念。[11]

该组织的伦理规范把编辑独立放到了首位，它规定：“独立：除了忠于公众利益外，不得受任何义务约束，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有违大众福祉促进私人利益，不论何种原因，均与诚实的新闻事业不相容……在社论里明知背离真实而偏向某个党派，会损害美国新闻事业的崇高精神；如果新闻专栏这么做，也彻底破坏了本职业的基本原则。”

没有哪家成功的组织或善于商业经营的组织像《华尔街日报》那样始终不渝地坚持把服务受众的原则放在首位。20世纪80年代，该报的一位专栏作家福斯特·怀南斯(Foster Winans)被发现卷入内幕交易，这迫使该报认识到必须重新公开审查并改写自己的行为准则。“该准则的核心前提是，道·琼斯注重质量和追求出版独立、正直高尚的作品的名声是我们企业的灵魂。”正如它适用于其他新闻机构一样，此准则不单纯是新闻事业的前提，也是商业经营的前提。“如果我们的顾客认为我们的分析

---

① 美国蒙大拿州的冰川国家公园，建立于1910年。

② Arsenic and Old Lace，百老汇舞台名剧，1941年被弗兰克·卡普拉拍成电影。该剧描述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公寓里，住着两个表面看起来十分和善慈祥的老太太，不料她们竟用自己酿制的毒酒杀害了来访的一些孤独老头。用这个名称来称呼约斯特，可能是指他表面和善，但用新闻揭露社会问题时毫不留情的特点。

不能代表最佳的独立判断，觉得它们只代表我们的偏好或信源、广告主、信息提供者的偏好的话，道·琼斯不可能生意兴隆。”[12]

20 世纪 60 年代，报业垄断加剧，除了危急时刻（比如刚才提到的《华尔街日报》）外，很难听到这样的宣言。但是竞争远比报纸激烈的电视新闻在营销活动中继续以服务公众自居。例如在整个 90 年代，虽然公众对媒体的怀疑程度越来越大，但是“站在您一边”和“为您服务”仍是地方电视新闻最流行的口号。电视台进行的内部调查和卓越新闻项目的焦点小组访谈都认为，它们依然是最有效的口号。[13]

## ◉ 从独立到孤立

就像众多职业观念一样，在某些地方，编辑独立逐渐僵化而变成编辑孤立（isolation）。新闻工作者从政治和商业压力那里赢得了来之不易的独立，但是在敬重和保卫独立性的过程中，有时他们走向了为了独立而独立的极端。为了和外部势力保持距离，结果却有可能脱离群众。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新闻专业化的后果之一。随着新闻工作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媒体向集团化发展，媒体公司开始将旗下的报纸和电视台视为培训机构（farm systems）①，在小规模市场培训新闻工作者，日后将他们派往更大的市场。据调查显示，到 1997 年，三分之二的报纸新闻工作者报道的社区并不是自己真正生长的社区。[14]和居住在这里的人比起来，大多数人感到与社群“缺乏联系”，这一数字比 8 年前有了显著增加。[15]对被报道社区而言，新闻记者正成为过客，一个“新贝都因人②”阶层。

导致孤立的第二个因素是新闻的基调的改变。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以及随后出现 24 小时有线电视后，新闻明显变得更加主观和臆断。[16]新闻报道不再仅做客观叙述，而把重点放在转述公众人物的评论上。比如一项著名的研究发现，选举期间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中候选人的同期声从 1968 年的平均 43 秒降到了 1988 年的 9 秒。[17]与此同时，记者现场总结报道中的出镜时间比过去更长，评判性的语言也更多。[18]许

---

① 体育用语，又称 farm team，feeder team 或 nursery club，指培训年轻运动员的队或俱乐部。如果一个运动员的表现达到一定水准，就可以向上发展。

② 贝都因人，阿拉伯、叙利亚、努比亚或撒哈拉沙漠的游牧部落中的阿拉伯人。

多研究发现，报纸新闻渐渐不太关注候选人说了些什么，相反更关心他们言论中隐含的策略及动机。[19]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头版的研究发现，“常规新闻”(straight news)减少，而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增加。这些分析性报道经常不标明或界定为主观分析。[20]媒体中出现了一些专门用来描述愚弄公众的短语，像“民意操纵专家”(spin doctors)①和“摆拍时机”(photo op)②。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术语描述新闻工作者令人厌恶的行为，比如“众兽竞食”(feeding frenzy)③和“导演式新闻”(gotcha journalism)④。

在某些人手中，更注重诠释的风格只是报道者按照自己的印象创造公众人物的工具。2000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年，政治专栏作家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讥讽了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Al Gore)，说戈尔过度夸大自己的农村背景。他写的《农民阿尔》(“Farmer Al”)调侃说戈尔年轻时在华盛顿酒店里度过的时间远远多于田纳西乡下，当时戈尔的父亲在美国参议院任职。

> 阿尔一路奔跑，穿过宽阔的公寓(戈尔农场在费尔法克斯酒店顶层占地6间房，阿尔为此自豪不已；在华盛顿，敢吹嘘在自己家的屋顶公寓能看到日出日落美景的人不多)……他边吃边跑，只在雨伞架旁稍作逗留，一把抓起他心爱的双头斧。[21]

凯利这篇彻头彻尾的游戏之作因为揭露了戈尔的虚伪，为他赢得了赞扬。但是问题在于12年前，当他还没有成为以尖刻著称的华盛顿专栏作家以前，在《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做新闻记者时，他却把

---

① Spin指的是公共关系专家利用媒体，将信息粉饰成有利于自己的样子，改变公众意见。通常使用隐瞒、虚假和操纵的手法，可以等同于传统的“宣传”，是一种为了某种利益而发布的有倾向性的信息。1984年10月21日，《纽约时报》在社论中指出里根的选举顾问在记者身旁聚集，企图影响传媒，首次使用Spin Doctor一词，意指专门通过分析和编造新闻，以图操控新闻。

② 为photo opportunity的缩写，本来指照相的最佳时机，但是后来特指名人或政客所设置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专供摄影记者拍照的场景，是精心策划出来给记者报道的，比如政要会见前的握手、文件签字仪式等。

③ 本义是指生物界丰富的食物导致食肉动物聚集在一起大肆捕食。用于媒体报道指的是在一段时间里，媒体竞相报道某个吸引受众的事件，这个概念用于媒体主要来自Larry Sabato所写的一本名为*Feeding Frenzy*的书。

④ 也译作“搞定你新闻”，指的是新闻记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报道意图，有意操纵报道对象配合报道。这种情况多数出现在电视新闻中，记者为了得到理想的镜头，导演被采访者的行为或访谈内容，甚至在后期的编辑中做特殊处理。

同样的事实作为逼真的细节而不是虚伪加以报道：

> 父亲不顾母亲反对，坚持让我待在农村。远在农场的生活与众不同。“夏天我必须在天亮前就起床，帮家里喂鸡，”戈尔说，“然后我得清扫猪圈……接下来我要在农场工作一天，在晚餐前还得再喂一次鸡。”据周围人说，戈尔先生打小就非同寻常地认真和勤劳。[22]

一些新闻工作者甚至担心，太多同行已经越过了怀疑论的界线走向愤世嫉俗，进而宣扬一种新闻虚无主义（极端怀疑论），即一种不相信一切的哲学。时任《圣琼斯水星新闻》（*San Jose Mercury News*）政治编辑的菲尔·特鲁恩斯坦（Phil Trounstein）对此现象深有感触，他给热心记者委员会写了一篇文章。“在某个特定圈子里，最令新闻记者或评论员无法忍受的不是被指责为不准确或不公平，而是被指责为轻信。”[23]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约瑟夫·N. 卡佩拉和凯瑟琳·霍尔（Joseph N. Cappella and Kathleen Hall）在《愤世的螺旋：新闻媒体与公众利益》（*The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一书中提出，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新闻界过多地关注政府官员的动机而不是他们的行动。他们认为，随着注意力从公共生活中的“什么”转向“为什么”，新闻工作者将公共生活“内在化了”，把它变成了政客的心理及自我的问题，而忽略了公共政治的实际结果，后者才对公民产生真正的影响。这种愤世嫉俗、怀疑一切的关注方式使新闻工作者和公民的关系更加疏远。

最后，就在新闻孤立主义日益蔓延的同时，众多报纸以及后来出现的电视台为了增加经营利润，竞相追逐最具影响力或最能带来利益的受众而不是全体受众。对于电视而言，就是专为年龄在 18 岁至 49 岁的妇女策划新闻节目，因为这部分人大多决定家庭购买什么。对于报纸而言，这意味着把发行范围局限在更具影响力的居民区，以降低生产成本和发行成本。理论上讲，确定新闻目标受众意味着新闻公司可以做到小投入大产出——受众数量少但是广告额高。这同时意味着报纸或电视台可以在报道中忽略社区中的部分群体，以节省费用。换句话说，孤立成为商业计划。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明尼阿波利斯之星论坛报》（*Minneapolis Star Tribune*）在三年内降低了 4% 的发行量之后，社长乔尔·克莱默（Joel Kramer）告诉《纽约时报》：“我们的经营模式更健康，我们的发行量虽然变小，但从读者那里获得的收益增加。”[24]可能没有其他的例子比得上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Bloomingdale）执行官的故事更能说明这一思路，他

告诉鲁珀特·默多克，他的商店之所以不在后者的《纽约邮报》上投广告，是因为“你的读者从我商店偷东西”。虽然这个故事可能是演绎的，但是它却成为报纸产业内的都市传奇（urban legend）[①]，因为它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这个行业最流行的运作模式。

## ◉ 对超然原则的否定

虽然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新闻独立。最初的起因是把特定人群作为目标受众的商业策略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新闻行业具有很强的垄断性，不必为广告发愁，因此不增加发行量也能赚钱。但到了1989年左右，美国零售业和传播技术转型的后果逐渐显现。小零售店和大型百货商店过去一直是报纸的经济支柱，现在逐渐陷入破产、兼并和债务的风雨飘摇之中。取代它们的折扣零售商不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既然所有东西每天都打折，就不必专门登报通知顾客。根据桑福德·C. 伯恩斯坦（Sanford C. Bernstein）的计算，1980年到1991年的11年间，大城市日报的广告版面空间就下降了8个百分点。[25]仅1991年一年，报纸刊登的零售业广告就下降了4.9个百分点，创造了年降幅的历史最高记录。类似的情况也在电视业出现，观众渐渐流失到伪新闻节目、有线电视的旧片重播节目中，当然还有互联网。

由于经营新闻越来越困难，管理者便开始调整其经营策略。对于报纸而言，主要意味着削减成本，而不是增加对新闻业务的投入以增加吸引力。1992至1997年间，小型报纸（smaller newspapers）的新闻报道预算削减了11%，大报削减了14%。省下来的钱一大部分被投到了营销上。[26]

在削减成本的同时，商务管理人员希望编辑承担更多的说明义务（accountability）。他们开始要求新闻工作人员证明，新闻报道有利于商业经营。市场营销人员开始使用市场调查和各类高新科技——比如以分钟为单位的电视收视率调查、焦点小组访谈，甚至是可以跟踪眼球观看报

① 都市传奇是指通过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流传下来的一些与现代生活有关的离奇故事。一般来说，它会有固定的内容模式，并会反复出现，比如说下水道的鳄鱼、消失的搭便车者、艾滋针等。作为流言和现代民间传说的一种，这些故事虽然荒诞不经，但具有民俗学意义。

纸版面轨迹的红外线眼镜。他们的希望是，如果新闻工作者多使用高科技，就可以为发行量的增加作更多贡献，也不至于如此不受公众喜爱。

市场人员和新闻从业者之间逐渐出现鸿沟——更糟糕的是类似的鸿沟也在报道者和新闻管理者之间出现。新闻工作者把商业经营看成是对新闻独立性的威胁，他们害怕“**说明义务**”会成为广告主左右新闻的借口。市场人员则开始怀疑，新闻部门之所以在改革问题上毫不退让，不切实际的新闻超然(detachment)原则很可能就是他们顽固不化的根源。新闻行业内的文化冲突逐渐激化。

“许多记者认为编辑已经越过了防火墙。”纽豪斯报业集团(Newhouse Newspapers)华盛顿分局主任德布拉·豪厄尔(Deborah Howell)在1998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解释道。

与此同时，公司内部坚持忠于公众利益的新闻工作者会被贴上幼稚、守旧和难以相处的标签。约翰·卡罗尔说：“如果你向公司提出‘公众服务’，人们会把你看成理想主义者或不切实际的人，没人会听你的。”卡罗尔曾经在2000年到2005年执掌《洛杉矶时报》期间创下了5年内获得13个普利策奖的纪录，他后来与芝加哥论坛报集团的老板发生激烈争执后辞职。

当然，在现实中，这两派并不经常像描述中那样水火不容。双方真正的斗争并不在价值观上，而是在应该如何改变，即改革的性质问题上。支持改革的人认为自己是在为行业的生存而战。反对者则认为自己是在为捍卫作为新闻事业成功基石的职业伦理而战。

尽管如此，这一分裂还是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第一个是革新者受到谴责。《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的麦克·范彻(Mike Fancher)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建议，为了保护自己，编辑应该掌握更多经营方面的知识，他遭到了鄙夷。后来被称为“公众”或“公民”新闻(“public”or “civic”journalism)的运动在利用新科技重建与社群的联系方面同样包含着不少值得借鉴的思路，比如找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然后要求政治候选人对这些问题进行说明。当然不可避免的是，不是所有实验都会成功。比如有时会出现过于迷信民意测验，让统计数字左右新闻报道的反例；还有些时候公民新闻的招牌被当作营销手段。许多全国性精英报纸的工作人员以这些弊端为由，抵制变革。

分裂的第二个后果是，某些商业做法被引入新闻部门后，与新闻事业和公民的最佳利益背道而驰。为了增强新闻部门的责任感，最基本的一

个做法是引入所谓目标管理法(Management by Objective, MBO)的激励机制。这个概念最初由管理学大师彼德·F. 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原理十分简单:通过设定目标和完成目标的奖励,公司就能建立统一的系统,协调和监督管理人员的行为。

目前,大多数电视和印刷媒体在新闻管理中使用目标管理体系。[27]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管理体系中有相当部分无意之中扭曲和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和社群的需求。1998年,美国报纸现状项目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71%的编辑说自己所在的公司采用了类似的目标管理体系。在这些人中,有一半的人说其收入的20%到50%取决于这个项目的完成情况。大多数编辑提到一半以上的奖金与报纸的经营表现挂钩。

这些做法有错吗?毕竟,如果新闻卖不出去,还能算好新闻吗?

问题出在把新闻工作者的收入与组织的经营表现联系在一起,这等于改变了新闻工作者效忠的对象。媒体公司明确表示,新闻工作者应该主要对母公司和股东效忠,而把读者、听众或观众放在第二位。如果广告主明确提出,要是不刊登某篇报道或把某个记者开除、调离,就向媒体投入更多广告费,此时该如何选择?广告主什么时候会主动要求媒体报道行业腐败或协商定价(price-fixing)[①]?如果编辑的主要目标是本季度的经营任务,怎么能勇敢而中立地报道新闻?目标管理体系与职业操守挂钩,导致新闻工作者在效忠于谁的问题上出现二心。

波特兰《俄勒冈人》(*Oregonian*)报的编辑桑德拉·罗(Sandra Rowe)在这个问题上有独到的论述。她说,向新闻工作者传授商业经营方面的知识,本身没有错。但问题在于,新闻记者信仰哪个教派?他们是深谙经营之道的新闻工作者,还是了解新闻的商务人士?这个区分对于为谁服务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公司文化的基础是信仰为公民服务,那么能否提高赢利能力?抑或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基础,甚至不惜以公民需求为代价的公司文化才能提高赢利能力?

新闻工作者如果在忠诚对象的问题上产生困惑,会造成严重后果。田纳西州福克斯的附属电视新闻台向投放广告的企业做出书面承诺,将会为其提供正面报道,该事件被通讯社揭露出来。事实上,这种行为十分常见,远远超过许多新闻工作者的想象,只不过没有作为新闻被揭露而

① 指商业竞争者协议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相同的产品或服务,以便尽可能维持所有竞争者的利润空间。一般来说协商定价是非法的,它破坏市场自由竞争,而且会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

已。“通过眨眼或点头做出的承诺随处可见……特别是在经营比较困难的小型市场里。更为常见的是，有个潜规则规定无论做什么报道，第一个采访对象应该是电视台的赞助商。”一位前福克斯的管理层人士说。（为了保护他，使他能够继续在商业电视台工作，这里不便透露其身份。）

许多资深的新闻工作者都承认，这种行为的逻辑颇为典型。“我们总归要采访个什么人。他也可以是我们节目的赞助者。”另一个技巧是把主要赞助商的商业促销活动（如汽车促销）当成正在进行的公共事件加以报道，有时由新闻记者出马，更常见的是天气预报员或体育播报员代班。

## ◉ 公民而非顾客

商业说明义务进入新闻编辑部的同时，商业用语也趁机而入。在某些公司，这意味着用市场营销术语指导新闻生产，读者和观众变成了“顾客”，理解受众的过程被他们看成“市场营销”，新闻变成了“顾客服务”。“最好的编辑一定是个营销专家”，奈特—里德集团（Knight Ridder）的《圣琼斯水星新闻》前执行主编、后来任该集团新媒体运营总裁的鲍勃·英格尔（Bob Ingle）说：“这正是我作为总编极力想做到的——让所有员工倾听受众的意见。我希望他们这样评价我：‘他是个出色的商人。’”[28]

很少有人会真的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成为商人，但是用词的准确却十分重要。“顾客”这个词太具有局限性，也欠准确。根据《美国英语传统辞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的解释，顾客是“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人”。大部分新闻不是待价而沽的服务。新闻是免费的，大多数互联网的新闻站点、许多全国性周报、广播新闻和电视新闻都是这样。不仅如此，都市报纸和杂志实际上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新闻工作者不是向顾客出售内容，而是和受众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价值观、判断能力、权威性、勇气、专业性以及对社群的忠诚之上。新闻服务创造了媒体与公众的牢固联系，然后新闻机构再把这种联系租赁给广告主。

新闻的受众是顾客，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也会造成混乱。实际的关系远胜于此，这种关系也和新闻媒体与该行业的真正商业顾客——广告主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

简而言之，新闻业的商业关系与传统顾客营销中的关系不同，在某

些方面更加复杂。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三角关系。受众不是购买商品和服务的顾客，真正的顾客是广告主。但是顾客或广告主必须服从三角关系的第三方——公民的指挥。即使是像亨利·卢斯（Henry Luce）那样的媒体商业巨头也能理解这种三角关系。1938 年他对身边的高层人员说："如果我们不得不接受金钱资助的话，广告主可能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人。"但是卢斯称自己的目标是绝不牺牲"新闻灵魂的任何一小部分"[29]。卢斯夸口说："在美国，每个广告主都会意识到，时代集团会顽固地保持独立。"

## ◉ 防火墙

如果新闻工作者首先忠于公民，那在新闻公司工作的其他人应该忠于谁？比如说广告推销人员、发行部人员、卡车运输司机、印刷工人和媒体所有者，公民应该对他们提出什么要求？他们和新闻部的关系是什么？

作为传统，20 世纪的新闻工作者经常提到新闻公司的新闻和商业部门之间存在一堵防火墙。时代公司的编辑常常称赞卢斯提出的一个观念：公司内的教堂（新闻部门）与国家（商业部门）要相互独立。毁誉参半的《芝加哥论坛报》发行人罗伯特·麦考密克（Robert McCormick）在 20 世纪早期曾在俯视芝加哥河的富丽堂皇的论坛报大厦内安装了两部独立的电梯。他甚至不愿意广告销售人员和记者同乘一部电梯。

不幸的是，新闻工作者被隔离在某堵高墙后面为受众服务，其他人自由地为利润服务，这种观念是具有误导性的比喻。首先，它鼓励了我们刚才描述过的孤立主义。其次，如果新闻机构中这两个部分的目标出现冲突的话，最后做出牺牲的一般是新闻部门。

《洛杉矶时报》和斯特普尔斯体育场的丑闻揭示出防火墙的比喻在现实中多么无力。报纸打算和运动场的所有者共同分肥，以对方购买广告作为交换条件。体育场的老板给广告代理写了一封语气强硬的信函，坚持要购买该报广告。发表的关系稿直接分配给各个版面，都是正面报道。新闻部的人对这一安排并不知情。换句话说，这堵防火墙毫发无伤。但当该协议被揭露出来后，记者和读者都出离愤怒。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200 多封信件、电子邮件、传真和电话留言涌到读者代表纳达·扎克契诺（Narda Zacchino）的办公桌上。《华盛顿邮报》记者沙伦·韦克斯曼（Sharon Waxman）在采访扎克契诺时，看到桌上

放着许多电话留言记录，每个留言的主要观点都用黄色记号笔标出。扎克契诺告诉韦克斯曼："大多数读者认为这件事动摇了他们对报纸的忠诚和信任。人们对许多事情提出质疑。他们质疑广告主是否影响了所有报道。他们质疑我们是否正直。真正让我担心的是那些质疑我们的报道是否诚实的问题：'这个或那个公司是否和你们也有协议？'"

最后，报道媒体问题的记者戴维·肖（David Shaw）发现，时代公司的管理工作中利用读者资源为广告主谋利的现象有增加的趋势，而这一切新闻编辑部都毫无察觉。此类现象均出现在前谷物公司执行官马克·威尔斯（Mark Willes）接管该报的母公司——时代镜报公司（Times Mirror）[①]之后，这位管理者没有新闻工作的背景，对新闻事业的经营也知之甚少。换句话说，传说中的防火墙根本保护不了任何人。市场部门正在出卖新闻部门，他们拥有足够的权力，神不知鬼不觉地限制新闻部门的行动。

新闻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20 世纪 70 年代二者的冲突曾一度紧张。因为石油危机，像《亚特兰大宪章报》（*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②]或《得梅因纪录报》（*Des Moines Register*）这样的州级主要报纸均因为运输费用的增加，大幅度削减在本州的发行量。

另一段紧张时期开始于 1989 年，当时新闻行业正面临广告衰退，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报纸发行量整体下降的现象，这次下降不是总人口中发行比例的下降，而是绝对发行量下降。[30]像大型百货商场和连锁杂货店这样的广告大户出现大规模购并；随着竞争对手的消失，广告也减少了。与此同时，像沃尔玛这样的零售业的新竞争对手根本不在报纸上做广告。

到 90 年代早期，大部分报纸公司都成为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为了解决面临的这些问题，报纸行业试图让华尔街相信，他们正在严格控制成本，剥离无效资产。新闻部的预算被削减，但是当整个行业经营状况渡过难关、恢复正常之后，这些被砍掉的部分并没有完全恢复。这一规律在下一个报纸不景气时期——2001 年又再次上演，在重新回到良好时期之后，被裁掉的 2 000 个职位并没有恢复。[31]

就在市场部门为了弥补利润的减少拼命节流的同时，一系列学术研

---

① 时代镜报公司拥有《洛杉矶时报》，2000 年时代镜报公司被论坛报公司收购。

② 《亚特兰大宪章报》是美国东南部最大的英文报纸，属于考克斯报业集团（Cox Enterprises）。

究发现，新闻部门的投入和新闻质量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这些研究提出，支持新闻采集会提高新闻质量，反过来会提高发行量，有助于保持新闻工作的道德底线。虽然董事会经常为此产生争论，但董事中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多年来，对于新闻工作者及公众来说，这一讨论微弱得就像背景噪音一样丝毫不能引起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如北卡罗莱纳大学的菲尔·迈耶(Phil Meyer)提出，这个行业过于短视，为了保持高边际利润，陷入到不断削减产品的死亡螺旋之中，这无异于自寻死路。这种削减只会使更多读者离去，选择其他新闻媒介，最终导致进一步削减产品。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策略导致整个行业在持续削减中走向灭亡。

2005 年，随着读者转向互联网，经济问题似乎雪上加霜。[32]发行量加速下降，行业失业率再次严重——这一次的原因不是经济周期，完全由行业基础的沉疴导致。[33]那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都采取了渐进的、长期的措施，包括少削减成本，向新闻部门增加投资。但是对没有未雨绸缪的公司来说，时机稍纵即逝。奈特一里德集团一向是最热衷于削减成本的公司之一，可是投资人仍然不满意，要求出售该公司。买下该公司的麦克克拉奇公司(McClatchy Company)则是一个实行长期战略、以投资为导向的竞争对手。

五年前，本书第一版出版时，人们对在公司时代保持新闻价值观依然持乐观态度。2000 年，时任《环球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彼得·C. 小戈德马克(Peter C. Goldmark Jr.)在阿斯彭学院(Aspen Institute)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建议，媒体公司需要采取行动，“在巨型公司帝国内部强化新闻型企业的价值观……每个首席执行官都明白，自己对股东承担受托责任。说到新闻事业，我更信任这样的公司领袖，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在拥有新闻组织的同时，还承担着另一项同样神圣的受托责任——公众的信任”[34]。

戈德马克提出了四条建议：让首席执行官每年和评估该公司新闻健康情况的机构见面；在管理层中指派一名成员，担负保护新闻机构独立性的特殊责任；每年对公司在新闻上的独立性和活力状况进行评估或审查；与相似的公司联合，资助成立独立的委员会，跟踪、促进、考核和捍卫新闻独立。

到 2006 年，有确凿证据显示，更多的阵地在这场战争中沦陷。事实上，虽然不是全部，但在许多历史悠久的媒体公司中，公司上层的理想主义者和财务会计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尘埃落定。理想主义者一败涂

地。2005 年，全美纸质媒体共计 2000 多名新闻工作者失业，对于那些为了追求公众利益而不断抗争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不啻为致命一击。

三大电视网的一位总裁去年在会议上对手下的高层人员说："道德铁砧终于搬走了。"这意味着制片人可以不再理会传统的新闻观念。堪称美国最有名的编辑，《洛杉矶时报》的约翰·卡罗尔黯然离职，但是他花了数周时间规劝继任者不要效法自己。称得上 ABC 在职记者中最著名记者的泰德·科佩尔离职去了有线电视台，临行前他宣称，不论是有线电视新闻还是电视网新闻，都不是他想追求的禁得起时间检验的工作。

以公众利益为服务对象的新闻为什么会失势？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自奈特—里德集团的发言人波尔克·拉丰四世（Polk Laffoon Ⅳ）："我希望优质的新闻和报纸销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35]从此，公司里代表公众利益进行斗争的主要是新闻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新闻部主管则充当员工与董事会之间的调解者。而在许多新媒体公司中，现在还不清楚是否存在着代表公众利益的声音。

传统媒体也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在那里工作的新闻工作者感到十分幸运。这些组织没有防火墙，但是市场部门把新闻部门的价值观作为运营的指导思想。这些公司认为，代表公众利益的独立的新闻才是公司销售的产品和价值。利润处于第二位，但这个必然的副产品对公司长期健康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必不可少。

2002 年，英国的卫报有限公司（Guardian Newspapers Limited）为了发展与公众的新型关系，在增强透明度上做了重大努力，创造了名为"活出我们的价值"（Living Our Values）的年度审查制度。这个独立推出的审查活动的目的是向读者表明商业新闻机构和公民之间的特殊关系。该审查报告每年向公众发布，详细地记录了公司在社会和伦理行为方面的表现，是否实践了出版"自由、进步、国际化的报纸"的承诺，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在员工关系、商业伙伴关系、社区关系以及和世界其他地区关系上的表现是否合格。《卫报》的审查没有将公司分成相互独立的两部分，表现了市场和新闻部门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问题上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麦克克拉奇是未受 2005 年裁员风潮影响的美国报纸公司，它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相信，优质的新闻才是企业的基石。在 2005 年的一次对股东的演讲中，加里·普鲁伊特（Gary Pruitt）强调了他的服务宗旨，认为该宗旨既使公司旗下十几份报纸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在经营上也保持成功。普鲁伊特还补充说："我们专注于新闻质量，不断改进工作，这无疑

促进了发行。”正因为此，二十年来麦克克拉奇报系的发行量一直稳步增长。

2003 年，《美国新闻评论》(*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刊登了一篇对该公司的介绍，其中提到了普鲁伊特对优质新闻的 100 字定义：“优质报纸完整、全面地提供本地、国内和国际的新闻及特稿，使人们能够充分知情，全面地参与公民生活和过上更幸福的日子——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参与市议会以及联合国的行动。报纸是每个本地市场上硕果仅存的大众媒体，因此它们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向读者提供信息，还在于创造社群内部的凝聚力。任何其他的媒介或机构，包括政府在内，都无法扮演这一角色，因为其他所有媒体的受众都出现了细分化和碎片化的现象。”[36]

虽然面临裁员和股价下降，纽约时报公司一直保持对优质新闻的承诺，这在该公司的旗舰报纸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事实上有分析表示过担忧，认为时报公司过于专注报纸，不追求多元化经营，投资其他产业。该公司的主席，兼任《纽约时报》发行人的阿瑟·小舒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 Jr.)2005 年告诉《纽约客》的肯·奥列塔(Ken Auletta)：“我们是一家把所有精力用于生产新闻的公司。这是我们最核心的力量，同时也是严防死守的阵地。我们不会涉足教育或餐饮业务。但你会看到我们对新闻产业进行投资。”[37]

如果传说中的防火墙无法保证新闻工作者首先忠于公民，那什么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那些还没有被道德底线的压力压垮的公司在定义新闻和商业的关系时，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把它们归纳为下列五个关键特征。

**1. 所有者或公司把为公民服务作为首要责任**

新闻部门不应该与组织的其他部分隔离开，只有两部分人都忠于新闻的专业价值——而不是一派专注于市场，另一派专注于服务公众——新闻事业才会运行得最好。历史经验说明，只有公司的所有者坚信新闻的核心价值观时，才会出现这种局面。

甚至所谓防火墙措施的拥护者实际上也是这一联合哲学的实践者，他们也主张新闻主导一切。历史学家汤姆·伦纳德(Tom Leonard)的研究发现，与传说不同的是，没有证据证明亨利·卢斯真的说起过教会与国家相分离的话题。相反，卢斯认为整个公司需要保持“顽固的独立”。

《洛杉矶时报》的前任出版人、CNN 总裁汤姆·约翰逊(Tom Johnson)在回首自己的事业时,得出了与前一代的卢斯,或更早一代的奥克斯同样的结论:

> 媒体的所有者,或者是上市公司董事会选出的首席执行官最终决定着新闻部门发表或播出的新闻的质量。主要是他们在选拔、雇用、辞退或擢升编辑、出版人、总编、新闻总监和副总,即管理新闻编辑部的新闻工作者……所有者决定着新闻部门的预算,新闻和广告的时长和版面。他们选拔的人员的质量以及制定的新闻政策决定新闻的质量标准。所有者决定媒体的利润回报率。所有者支付给新闻工作者的报酬丰厚程度也将决定新闻的质量。[38]

约翰逊回忆说,前《洛杉矶时报》出版人,已故的奥蒂斯·钱德勒(Otis Chandler)一再表明,他坚决主张编辑独立。钱德勒为手下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了"隔热板",尽管钱德勒的母亲不断要求把《时报》的音乐评论员开除,尽管董事会成员也有其他抱怨,甚至颇多抱怨,但他的家庭、董事会和其他特定利益集团还是无法干扰他的工作。

在所有者独立经营的时代,这一立场比较容易坚守,但是除了少数特例外,这一所有制模式已经不复存在。如果独立是新闻公司最关键的财富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关键内涵的话,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在约翰逊所说的由董事会任命首席执行官的公司文化中,如何保持新闻独立。

在历史上曾经保护过新闻事业的家族企业的仁慈家长已经不复存在,新的公司文化完全取消了这一机制。当公司将新闻事业作为投资时,它同时认为应该对除股东外更广泛的社会承担责任。关键在于所有者渐渐意识到对公民的责任,并采取措施保护它。同样重要的是,公众也理解到这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除了要求新闻工作者承认其民主利益外,也要求管理新闻工作者的公司领导人承认它。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点,与公司自身利益无涉的新闻将消失。

### 2. 聘用把公民放在首位的商业管理者

一方面,所有者最终决定着一个机构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成功的商人也认为应该招聘认同这一目标的管理者,尽管销售广告、提高发行量与写新闻的思路完全不同。A. H. 贝洛(A. H. Belo)公司经营报纸和电视业务,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德查德(Robert

Dechard)认为，应该自上而下地贯彻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这取决于恰当用人，所用的人应该既有良好的新闻判断能力和新闻工作经验，同时又对潜在的冲突十分敏感。我更偏爱具有大局观的人。"[39]

《纽约时报》的模式与此类似。比如广告部在遇上总统新闻发布会或重要讲话等事件，需要更多版面报道新闻时，通常会回绝刊登广告的要求。广告部清楚，报纸的读者希望看到对这类事件的全面描述，从长远看，这种关系将有助于该报的商业运营。

### 3. 提出并传播明确的标准

即使所有者认同新闻的使命，许多新闻公司还是感到需要有一个能贯彻到普通员工的明确的标准，同时创造一种氛围，至少能使某些级别的市场人员和新闻人员相互对话，确保相互理解并尊重对方的职责。

"必须规定明确易懂的原则，白纸黑字写下来。"时任奈特—里德集团旗下《夏洛特观察家》(*Charlotte Observer*)报编辑的珍妮·巴克纳(Jennie Buckner)说。该报1999年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向来自各个部门的员工介绍应该用什么指导原则处理广告与新闻的冲突。《夏洛特观察家》的编辑们出席广告部的会议，解释新闻决策过程，并且，用巴克纳的话来说，表现出"我们无意干涉，只想开诚布公地说明想法"的姿态。[40]

《巴尔的摩太阳报》也召开过类似的会议，明确广告和新闻的关系，并保证所有员工理解这一关系。当时的副主编威廉·马里莫(William Marimow)说："我们讨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与新闻相关的决策上，新闻部必须拥有最终决定权。"[41]

当然，会议和规则只代表十分有限的第一步。在面对危机带来的压力时，这些措施应该成为行之有效的实际政策，同时在日常工作中应做到让每个人心中有数。那些贴在墙上却不付诸实施的标准只是些空洞无物的管理学套话而已。

### 4. 新闻工作者对新闻拥有最终发言权

除了制定严格的书面规范的公司以外，还有不少新闻组织提出，最应该明确的原则是新闻编辑部对新闻拥有最终发言权。这也是许多顶尖新闻机构奉行的原则。《华盛顿邮报》的执行总编小伦纳德·唐尼(Leonard Downie Jr.)坚持认为，社论式广告产品(advertorial products)，即那些标

记为广告副刊(advertising supplements)[①]的版面“也由我负责，当我们认为内容有问题时，可以一票否决。我们同时进行审查，确保其得到合理的编排”。

**5. 向公众传播明确的标准**

最后一个关键环节是让受众清楚，甚至比过去更加清楚新闻机构是如何运行的。1999 年任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主席的爱德华·西顿(Edward Seaton)是肯萨斯州《曼哈顿水星报》(*Manhattan Mercury*)的编辑，在该协会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出，报纸重建信誉及可信度的最好方法是“说明你自己……作为编辑，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必须阐明我们的价值观。制订了标准后，我们就有了可以向公众和员工解释的东西，有了每个人都能听到并且理解的东西。必须竭尽全力，精益求精。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为公众服务，而不是强调道德底线或高科技”[42]。

一些电视台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弗洛斯特·卡尔(Forrest Carr)担任图森(Tucson)KGUN-TV 台的新闻总监时，制定并反复播放“观众权利法案”(Viewers Bill of Rights)，该法案清楚地列出了图森的公民应该如何要求电视台及员工。

其中列出的七项权利包括公众知情权(电视台“在采访中要提有难度的问题并进行调查”)，公众要求新闻采集活动遵守伦理准则的权利(电视台将遵守新闻工作者职业委员会制订的伦理规则)，公众要求新闻报道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权利(电视台将努力寻找或发现解决方法，而不是只关注问题本身)。这个权利单还包括要求保护隐私的权利，给出的解释是“新闻工作的职责和公众的知情权要求新闻必须报道那些不愿被报道的人和组织。我们既不会无视这些要求也不会麻木不仁，我们在权衡新闻的重要性时也会考虑隐私问题。我们绝不会像狗仔队一样尾随或跟踪受害者”。

最后，这些权利中还包括“要求电视台向受众说明的权利”，并说明观众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通过电视台的观众代表、调查观众的投诉，或通过电视播出观众的反馈。

“观众权利法案”的用语可能会让人觉得了无新意。但是在图森电视

---

① 美国的广告副刊由广告部门编辑，而不是新闻部门编辑。与中国的付费广告版类似，上面也会刊登一些报道性文章以满足广告客户的需要。

台播出介绍观众权利法案的节目期间，卓越新闻项目对图森地区进行的焦点小组访谈发现，这项措施密切了电视台与观众的关系。当焦点小组访谈的主持人问公民，他们希望如何提高地方电视台新闻的质量时，观众都直接提到了 KGUN 正在做的事情。一个男性观众说："这可能还是需要电视台有一些准则，类似所谓报道伦理的东西。做出具体规定……（然后）以得体的方式执行。电视台要做的可能是找一组群众进去，就像这个访谈一样，询问我们对正在进行的报道的看法。"结果发现，这正是 KGUN 所做的。

一些批评者称 KGUN 的计划刻意迎合受众，但是该电视台在图森地区的观众占有率持续稳步攀升。新闻总监卡尔还提出，该项目有另一个收获：使该组织的工作人员明确了组织的价值观。卡尔说，之前没有任何措施像这次这样有助于改善新闻编辑部的文化。显然，KGUN 的承诺不是空头支票，也不是夸大其词，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该台还让公民实实在在地了解了这些承诺。当然，这也是实施该计划充满困难的原因。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新闻机构却南辕北辙，往相反的方向使劲。在《洛杉矶时报》，面对 2005 年的困境，论坛公司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砍掉了报纸与公众交流的预算，从 1 270 万美元减少为 30 万美元。编辑约翰·卡罗尔认为，报纸所做的应该正好相反。卡罗尔说："相互竞争的机构在市场宣传中谩骂、攻击新闻的价值观，竞相贬低主流媒体的观念，其中包括像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福克斯新闻频道总裁）这类党同伐异的人。"卡罗尔认为报纸以及所有主流媒体应对此有所回应，应该增加投入，以推广那些令传统新闻事业具有重要性和独特性的价值观。"他质疑道："仅一年内报纸的推广预算从 1 270 万美元缩减到 30 万美元，难道这就是正确的回应？"卡罗尔说，在他看来，论坛报公司所做的一切都说明他们正在退却，确实是自己该离开的时候了。[43]

不论新闻机构采取什么措施，为谁服务是最关键的，也是常被忽略或误读的问题。正是因为媒体正变得不受欢迎，这一问题才如此重要。在思考为什么公众对新闻的信任程度会下降的时候，人们经常忽视了一点：从根本上说，信任危机与动机息息相关。作为公民，我们并不期待新闻工作者完美无瑕——甚至新闻中每个单词的拼写都正确无误。问题不出在这些表面现象上，而在更为根本的地方。

新闻工作者愿意把自己看成人民的代言人，为了公众利益报道社会的最新问题。然而公众却越来越不信任他们。人民看到的是煽情主义和

以权谋私，感到新闻工作者是为了金钱或个人名誉而从事这项工作，甚至更糟的是，没准认为他们是因为可以从他人的不快乐中获得变态的快感而乐此不疲。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①为了写书而采访政要，但是他在采访后写的报道中对很多内容却有所保留，这一做法被披露出来后，读者对其忠诚问题表示了质疑。他究竟是一个为自己工作的作家，还是为公众服务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一些读者认为，伍德沃德没有权利替他们决定什么事情应该立即公开，什么事情一两年之后才能在书里公之于众。一位读者在《邮报》网站的"问与答"栏目中问执行总编小伦纳德·唐尼："难道伍德沃德一直都以他的感觉为根据，决定我们需要知道的信息吗？"[44]

为了重新把人们和新闻联系在一起，再通过新闻把人们与更大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新闻工作必须重新效忠公民，恢复这一在新闻行业的协助下被错误地颠覆了的传统。当然，即使这样也还不够。真实和忠于公民只是使新闻事业得以运行的最初的两个步骤。下一步同样十分重要：新闻工作者获得真相的方法以及如何向公民解释这一方法。

## 注 释

[1] Geneva Overholser, "Editor Inc.,"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December 1998), 58.

[2] Ibid., 57. 一项针对美国报纸现状的项目调查了77名资深报纸编辑，发现14%的人说自己把超过一半的时间花在经营事务上，另外35%的人花在经营事务上的时间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

[3] CCJ and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Striking the Balance: Audience Interests, Business Pressures and Journalists' Values," March 1999, 79; available at www.journalism.org.

[4] 这一研究结果是由我们的学术合作者发现的，见 William Damon, Howard Gardn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unpublished interviews for the book *Good Work: When Excellence and Ethics Mee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① 鲍勃·伍德沃德(1943— )，《华盛顿邮报》著名记者，水门事件的两名报道者之一。现任《华盛顿邮报》编辑，出版了多本政治畅销书。

[5] Nick Clooney, interview by William Damon, Howard Gardn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ibid.

[6] CNN. com, "Top New York Times Editors Quit," March 1, 2004; available at www. cnn. com/2003/US/Northeast/06/05/nytimes. resigns.

[7] Don Van Natta Jr., Adam Liptak, and Clifford J. Levy, "The Miller Case: A Notebook, a Cause, a Jail Cell and a Dea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2005.

[8] Alex Jones and Susan Tifft, *The Trust: The Private and Powerful Family Behind The New York Times* (Boston, New York, London: Little, Brown, 1999), 43.

[9] *Washington Post DeskBook on Style*, 2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9).

[10] Tom Goldstein, "Wanted: More Outspoken View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2001).

[11] Paul Alfred Pratte, *Gods Within the Machine: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1923—1993* (Westport, CT: Praeger, 1995), 2.

[12] "Dow Jones Code of Conduct," New York: Dow Jones, 2000; see ethics codes at www. journalism. org.

[13]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Local TV Project," focus groups, January 26, 1999, in Atlanta and January 28, 1999, in Tucson.

[14] American Society of Newpaper Editors, "The Newspaper Journalists of the '90s," a study, 1997; available at www. asne. org.

[15] Ibid. 1988 年,41%的人说他们比其他人的参与程度更低。1996 年,这一数字增加到 55%。

[16] Tom Rosenstiel, "The Beat Goes On: Clinton's First Year With the Media," Twentieth-Century Fund essay, 30. 到 1993 年为止,对《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头版的一项为期两个月的研究发现,只有一半多一点的新闻可以归入事实性新闻(straight news),而大约 40%的新闻是对新闻事件、趋势的分析或解释。

[17] Daniel Hallin, "Sound Bite News: Television Coverage of Elections, 1968—1988,"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 (Spring 1992), 6.

[18] Ibid, 11.

[19] Joseph N. Cappella and Kathleen Hall Jamieson,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1.

[20] Rosenstiel, "The Beat Goes On," 30.

[21] Michael Kelly, "Farmer Al," *Washington Post*, March 24, 1999; available at www. washingtopost. com.

[22] Michael Kelly, "Gore: 'His Wife, His Public Life, It's All Been Too Perfect," *Baltimore Sun*, December 13, 1987; available at www. baltimoresun. com.

[23] Philip J. Trounstein, at CCJ Forum, Washington, DC, March 27, 1998.

[24] Lou Urenick, "Newspaper Arrive at Economic Crossroads," *Nieman Report*, special issue (Summer 1999), 3—20.

[25] Ibid., 6.

[26] Ibid., 5. 根据国内出版协会(Inland Press Association)的数据,这些百分比计算的时间段是截至1992年的5年和截至1997年的5年。小型报纸的定义为发行量在5万份左右的报纸。大型报纸的定义是发行量大约为50万份的报纸。报纸的薪酬支出分别下降了8%和15%。生产成本分别削减了21%和12%。报纸行业没有把资金投入到生产中,而是投资到市场营销和市场技术方面,增加了销售人员和广告代理。

[27] 根据对电视新闻主管人员的访谈,我们认为同样的做法在广播电视领域也很普遍。

[28] Overholser, "Editor Inc.," 54.

[29] Thomas Leonard, "The Wall: A Long History," *Columbia Journal Review* (January 2000), 28.

[30] Figures are reflected in the *Editor and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Yearbook*.

[31] 2001年裁员的数据来自卓越新闻项目,"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05," March 2005; available at www. journalism. org.

[32]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Online News: For Many Home Broadband User, the Internet Is a Primary News Source," March 22, 2006; available at www. pewinternet. org.

[33] Jay DeFoore, "More Than 2,000 Newspaper Jobs Lost in 2005," *Editor & Publisher*, November 17, 2005; available at www. editorandpublisher. com.

[34] Peter Goldmark, "Setting the Testbed for Journalistic Values," Fourth Annual Aspen Institute Conference on Journalism and Society, August 23, 2000; available at www. aspeninstitute. org.

[35] Joseph N. DiStefano, "Former Knight Ridder Journalists Plan to Nominate Board Candidates," *Philadelphia Inquirer*, Novermber 18, 2005; available at www. philly. com.

[36] "Pruitt's Code," sidebar to Susan Paterno's story, "Is McClatchy Different?"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August/September 2003); available at www. ajr. org.

[37] Ken Auletta, "The Inheritance,"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19, 2005, 76.
[38] Tom Johnson, "Excellence in the News: Who Really Decides," speech delivered at Paul White Award Dinner, October 2, 1999; Walter Cronkite Award acceptance speech, Novermber 12, 1999.
[39] Joe Strupp, "Where There's a Wall There's a Way," *Editor & Publisher*, December 11, 1999, 23.
[40] Ibid., 22.
[41] Ibid.
[42] Edward Seaton, 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大会的讲话, 1999 年 4 月 13—16 日; 可通过 ASNE 网站上的会议记录访问, 见 www. asne. org。
[43] Interview with John Carroll by the authors, October 11, 2005.
[44] "Post Executive Editor Discusses Woodward,"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8, 2005; available at www. washingtonpost. com.

# 第4章

# 经过核实的新闻

当这位希腊驻外记者坐下动笔时，他希望说服受众自己是可信的。他希望人们知道，自己书写的战争既不是官方记录，也不是草率完成的急就章。他努力做到更独立、更可信，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藏诸名山，传诸后世。在自己的报道中，他十分注意人的记忆力、看问题的角度和政治对历史记录的影响。他会对书写的事实进行复核。

为了说明上述一切，他决定在开头首先阐明自己的报道方法。下面这段话是公元前5世纪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介绍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的叙述方式时，写下的关于发现真相的方法论的献辞：

> 关于事件事实的报道……我定下了一条原则：决不轻易写下我听到的第一个故事，甚至也不接受自己的一般印象的引导；我描述的事件，有的是我亲历的，如果是从目击者那里听来的，我一定尽可能详尽地进行检查。即便如此，真相还是不容易发现：不同的目击者对同一事件，也有不同的说法，或者因为偏袒某一方，或者因为记忆不完全。[1]

为什么两千多年过去了，这段文字看上去还是如此具有现代感？因为它道出了纪实作品的核心任务：如何才能从流言、传闻、错误的记忆、受到操纵的议题中筛选出尽可能准确的信息，并且依据新的信息和新的观点修正报道内容？如何才能克服自己在感知和经验方面的局限，做出更多人认为值得依赖的描述？抛开因新闻工作产生的所有争论，抛开不同媒体和不同时代导致的各种差异不说，上面这些问题才是那些试图采

集、理解并传递新闻的人每天面对的真正问题。

新闻工作者不会遵守标准的准则，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一套通常是相当个性化的方法检验和提供信息——他或她个人用于自我约束的核实行为。实际上，像寻找多个目击证人、尽可能多地透露信源身份、询问多方意见等都是通过核实进行自我约束的工具。这些方法可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特殊性。如《洛杉矶时报》的作家里克·迈耶(Rick Meyer)一般会把获得的事实和采访内容做成很多摘录卡片排放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然后再把它们重新组合在一起。还有的方法可能相对制度化，比如《纽约客》设立了事实核查部门。不论这些习惯和方法叫什么名字，采用何种媒介，都强调了新闻工作的第三项原则：

**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

最终，作为约束手段的核实将新闻工作和娱乐、宣传、小说、艺术区分开来。娱乐——及其近亲"娱信"(infotainment)——专注于如何尽量使人快乐轻松。宣传通过选择或制造事实，实现其真正目标：说服和操纵。小说通过虚构情节，表达作者对于所谓真实的个人化的印象。

唯独新闻关注的是对发生的事情做出正确的描述。

不论是电视网新闻还是互联网上写博客的公民记者，他们都具有这一特征，而且这也是判断所有自称新闻工作的活动是否货真价实的首要标准。

但是新闻工作者却通常无法将本行业最根深蒂固的信仰与新闻工作者角色这一更大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他们知道怎样核实一则报道，但是却不能清晰地阐明核实行为对社会的贡献。但无论如何，核实事实是新闻工作的中心。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在1920年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社群缺乏揭穿谎言的信息，他们就没有自由。"[2]

这也正是新闻工作者对好莱坞电影制作者偶然涉及的取自真实生活的作品感到生气的原因。1999年，当《60分钟》的记者麦克·沃拉斯(Mike Wallace)看到电影《惊爆内幕》(*The Insider*)时非常愤怒，屏幕上的自己所说的台词是虚构的，事件的顺序也做了调整，暗示他向烟草行业屈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遗产"。"谁听我提过**遗产**这个词？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我很生气。"[3]这部电影的导演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反驳说虽然为了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对情节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按照某些对

真实的一般定义，影片还是“基本准确”的，因为沃拉斯确实做出过让步。至于台词是否是虚构的或者沃拉斯内心的动机是否有所不同，这些都无伤大雅。在这个意义上，功利变成了更高的价值，事实的真实从属于必要的虚构。

争论的双方操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曼说的是沃拉斯以事实为挡箭牌，企图分散人们关注其所作所为的真正意义。沃拉斯则暗示，讨论事情的意义离不开对细节的准确描述。在这件事情上，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但是新闻的核实过程必须兼顾这两种看法。

从新闻成为商品，可以从几乎无限量的新闻机构中随时、不断地获取的那一刻起，新闻核实过程——以公众利益为目标的可信新闻的源动力——就面临着新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迅速发布新闻的诱惑，反正总有事后更正的机会。第二个仅仅是因为其他媒体已经捷足先登所导致的发布冲动，它早已经“存在于”各个新媒体平台上了。

“9·11”事件之后，一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制造了一种新的现实，使得上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一新的现实与“自媒体”文化的流行观念发生了冲突。该文化认为，由于公民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交流，所以他们离真正的真相和更加准确的信息更近了。

公民们的交流变得更容易，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新闻核实最终是否能坚持下去取决于新闻工作者对这一目标的忠实程度，只有他们才能生产出与其他更有权力的中介机构制造的说服性或操纵性信息相抗衡的信息。

## ◉ 被误解的客观性

或许因为用核实进行约束过于个人化，并且缺乏正式的定义，它也成为新闻中最令人混淆的概念——客观性的一部分。这一概念最初的意义现在已经彻底被误解并且基本上被抛弃。

当批评家们，包括许多新闻业内的批评家，抛弃了客观性观念的时候，他们通常采用的理由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客观。《草根媒体》(*We the Media*)[①]的作者丹·吉尔摩(Dan Gillmor)2005 年在他那篇广为人知的题

① 美国宪法的第一句话就是“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这本书的名称典出于此。《草根媒体》的中文版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10 年出版。

为《客观性的终结》("The End of Objectivity")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是普通人，我们都有偏见，受到自己文化背景的影响，处于各种冲突之中，我们会把这些冲突带入工作之中。"[4]吉尔摩赞成新闻工作者抛弃**客观性**这个词，用"全面、准确、公平和透明"(thoroughness, accuracy,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取代它。

他只不过是近八十年来怀疑客观性观念的人中最新的一个而已。这一论点的主要主张充满混淆。当客观性观念最早被引入新闻工作时，它并没有暗示新闻工作者不受偏见的影响，而是恰好相反。

这个词在新闻行业中第一次出现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闻工作者充满偏见，通常是无意识的偏见。号召新闻工作者接受客观性观念是为了敦促他们建立一整套检验信息的方法——将所有证据公布于众——以保证个人的及文化的偏见不会损害其报道的准确性。

19世纪的新闻工作者谈论的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客观性。[5]这种观念认为，只要记者发掘事实并把它们按一定的顺序组合在一起，真相就会自然浮现。现实主义产生于新闻与政党分离并追求准确性的时代。它产生的时代也正是新闻工作者所说的倒金字塔结构诞生的时代，当时的新闻工作者把事实按照重要程度依次递减的方式加以排列，认为这样做有助于读者理解发生的事情。

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一些新闻工作者开始对这种天真的现实主义表示忧虑。部分原因是记者和编辑逐渐注意到宣传的兴起和新闻代理人(press agent)①的出现。就在弗洛伊德提出他的潜意识理论、毕加索等画家实验立体主义的时候，新闻工作者也更加意识到人的主观性。1919年，沃尔特·李普曼和《纽约世界报》副主编查尔斯·默兹(Charles Mertz)写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严厉地批评了《纽约时报》的文化偏见如何导致其歪曲了俄国革命。[6]他们写道："总的来说，关于俄国的新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新闻工作者看到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东西。"李普曼等人开始寻找能够使新闻工作者"在观察、理解和再现新闻时保持清醒，不受非理性的、未经检验的、未被承认的臆断影响"的方法。[7]

---

① 这是公共关系的雏形，一些熟悉新闻业的人或从事过新闻工作的人开始将帮助客户发布新闻当成一种新的职业。

李普曼宣称，过去的新闻实践一直是“缺乏专业训练的偶然目击”。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初衷，或某些人所谓的“诚实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把希望寄托在坚定的新闻工作者个人——或李普曼所说的“本行业所特有的愤世嫉俗者”——身上也是不够的。当时的一些新趋势，像报道署名或邀请专栏作家写稿，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8]

李普曼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新闻工作者具备更多的“科学精神……在我们这个丰富多样的世界里，只有一种东西有可能定于一尊，那就是方法的统一，而非目标的统一，即通过标准实验加以统一”。李普曼的意思是新闻工作应该追求“共同的方法以及得到普遍承认的事实”。李普曼认为，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改变对新入行记者的“商学院的教育方式，因为其目的仅仅是在既有结构中追求更高的收入”。相反，这个行业应该把学习获得证据和验证核实作为其基石。[9]

虽然当时是一个对科学充满信心的时代，然而李普曼却对科学不抱太多幻想。“尽管新闻无法用数学来表达，但这没有关系。事实上，正是因为新闻十分复杂，难以把握，优秀的报道才需要在先进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完成。”[10]换句话说，客观性的最初含义是新闻工作者无法做到客观，但是在方法上可以做到客观。所以关键在于规范和约束生产方式，而不是目标。

但是今天看起来，这番话却充满讽刺。当代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理解，基本上和李普曼所要讨论的真正问题南辕北辙。多数人认为新闻客观性是目标而不是方法。许多公民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对新闻工作者所使用的方法一无所知。但是，离开了统一的方法，目标的客观性也不一定能实现，这一观点今天仍然适用。事实上，它和吉尔摩所提出的另一种替代客观性的方法非常接近。

不仅如此，客观性的原始含义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当代媒介。第一点就是许多新闻机构所采用的不偏不倚的语气——那种我们熟悉的、貌似中立的新闻写作风格——并不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充其量，它只是新闻机构进行自我标榜惯用的有效手段，说明它们正努力用客观方法进行生产。第二点启示是这种缺乏用核实加以约束的中立的语气，只是掩盖其空洞实质的装饰而已。那些通过选择信源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再用中立的语气让自己看上去不偏不倚的新闻工作者，实际上是在欺骗。这损害了整个行业的诚信，令其缺乏原则、不诚实和偏颇。在新闻的标准受到怀疑的时代，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原始的客观性观念应该反复强调。在最初的客观性概念里，中立并不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中立只是一种语气或工具，其目的是说服受众相信传播的内容是准确的或公平的。

有趣的是，不论是左翼商业媒体还是右翼商业媒体，尽管它们的新闻带有观点，却经常拒绝承认这一点；相反，它们宣称自己是公平的。福克斯新闻在自我宣传中标榜“公平和平衡”。右翼的安·库尔特（Ann Coulter）提出要揭露左翼的“谎言”。而左翼的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则称自己的书为“真理”。他们都是赫斯特和普利策以及19世纪黄色新闻的应声虫。赫斯特和普利策当时宣称自己刊登的煽情报道比竞争对手更准确。新闻从业人员，即使是评论写作者也很少称自己是优秀的辩论家，但是却会标榜自己写的东西比别人更准确。

原始的客观性观念将客观性理解为一种方法，它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它可以整合美国不同类型的新闻媒体，让它们在更一般的新闻原则之下和谐共存。其中既可以包括脱胎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派媒体的另类媒体（alternative press），也可以包括持不同政治观点的新闻杂志。如果准确性、专业的方法、用核实加以约束、采取统一的方法核实事实等都能成为所有新闻工作的出发点，那么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就可以和谐共存。（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新闻独立概念的意义时详细讨论这一点。）

正如李普曼早在八十多年前提出的那样，统一方法而不是目标，是适合多元文化的统一评价标准。这一方法是采集信息的方法，与表达风格无关。虽然李普曼的观点非常深刻和超前，但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呼吁新闻工作要专业化。比李普曼年长一代的普利策，伟大的大众新闻创新者，创建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他建立新闻学院的理由虽然没有表达得像李普曼这样明确，但也大致相同。美国报业公会（the Newspaper Guild）[①]成立的主要目的也是推进新闻的职业化。

然而，长期以来，原始而深刻的客观性观念却被人们解释得混乱不堪，以致逐渐消失。很多作家在作品中用这一概念暗示新闻工作者曾经是客观的，比如曾写过一本颇有影响的研究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学著作的利奥·罗斯滕（Leo Rosten）。但是可想而知，他发现这个观念无法实现。许多法学专家也持这种观点，他们宣称客观性不可能实现。大量新闻工作者从未真正理解李普曼的观点。[11]不久，新闻工作者开始将**客观性**视

① 美国报业工会是成立于1933年的新闻从业者劳工联合会。

为幻像并将其丢在一边。他们依旧基本处于“偶然的目击”状态。

在另类媒体工作的人常常敌视所谓主流新闻工作者对客观性的信仰，因为实际上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只是双方对中立语气的看法不同，而不是他们搜集和核实信息的方式存在差异。报纸记者发现他们可以轻松地转到《纽约客》这样的杂志工作，在杂志社他们可以使用和另类媒体相似的语气写新闻，甚至可以比电视新闻更主观。

与此同时，记者们进一步完善李普曼所提出的观念，但通常只限于个人行为，以报道技巧或报道惯例的形式出现，却没有成为新闻工作的基本目标。关于客观报道方法的观念散落在各处，在记者之中以非正式的方式口耳相传。比如，斯坦福大学发展心理学家威廉·达蒙（William Damon）发现了新闻工作者用来核实报道的不同“策略”。达蒙询问访问对象他们从何处得知这些概念。绝大多数的回答是“通过试错”、“我自己发现的”，或“从朋友处”。很少有人说是从新闻学院或自己的编辑那里学到的。[12]许多有用的书里曾经写到过这个话题。比如自称调查记者和编辑（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的组织曾试图建立一套使用公开记录、阅读文件和利用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方法。

然而总的来说，这些非正式的策略从未被整合到一起，成为李普曼等人想象中的广为人接受的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规则。既没有建立像法律专业那样的取证标准规则，也没有建立像科学实验那样的普遍同意的观察方法。传统的核实方法也未能与时俱进地适应新的新闻形式。虽然新闻行业发展出了各种确定事实的技术和惯例，但是却没有提出过一套检验新闻解释的可靠性的方法体系。

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晚期，公众已经越来越不相信新闻工作者或其他任何人能够在叙述中做到真实，或者存在一种客观的核实方法。这一状况不仅威胁到新闻的理念，而且威胁到公民社会是否有可能面对和解决自身的问题。公共领域成为一个只有极端观点在互相争吵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寻求妥协、同意和解决方案的领域。

如果新闻工作者想要将那些已经指导其工作了250年的价值观坚持下去，甚至想让从第一个编年史学家修昔底德以来就产生的那种本能发扬光大的话，首先必须知道获得正确事实的规则和方法，然后想方设法让公众知道这一方法。

## ◉ 断言的新闻还是核实的新闻

如果再得不到明确命名并被清晰地表达，新闻工作多年来发展起来的有关核实的方法将在很多方面被现代媒体文化削弱。技术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新闻记者吉内瓦·奥弗霍尔泽(Geneva Overholser)在一次热心新闻工作者协会的论坛上对我们说："互联网和 Nexis(再加上过去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共享及传播视频的服务)使得新闻工作者不必亲自进行调查，就可以轻松地查到新闻报道和引语。"事实变成了商品，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重新加工并用作其他用途。在 24 小时新闻循环播放的时代，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在已有的新闻基础上增加内容，他们通常加入一些解释而不是尝试独立发现并核实新闻事实。奥弗霍尔泽说："一旦一则新闻出笼，似乎与之相关的所有新闻都是真实的。报道被一家媒体所决定——被一家报纸或电视台的叙述所决定……部分原因是新闻机构已经被联合在一起，部分原因是电子媒体的报道方式，我们都在一个槽里进食。"[13]

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的例子只是说明技术如何削弱了复核(double-checking)过程的一个事例。戈尔参加 2000 年总统竞选期间，媒体开始关注他可能存在夸大过去政绩的倾向。一篇报道称戈尔有"匹诺曹问题"，另一篇称他为"说谎者"，还有的称他有"妄想症"。[14]其中一个关键的证据是戈尔宣称自己发现了纽约北部乐伍卡农(Love Canal)的有毒废弃物掩埋场。可是问题在于，戈尔从未说过这些话。他曾经对新罕布什尔州的高中生说，他第一次听到关于有害废弃物问题是从一个选民那里，后者告诉他，田纳西州一个叫通尼(Toone)的小镇被污染了，戈尔提出要召开听证会调查此事。他对学生说："我开始寻找全国其他类似的地方。我发现纽约北部一个叫乐伍卡农的小地方。于是，我召开了关于这个问题和田纳西通尼情况的第一个听证会——你们可能没听说过这次听证会，但它却导致了所有相关调查的启动(But that was the one that started it all.)。"[15]

然而，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却把戈尔说的话错误引用为："我正是第一个启动调查这个问题的人(I was the one that started it all.)。"在发布的新闻中，共和党又将这句引语改成"我是第一个启动调查这个问题的人(I was the one who started it all.)"。《纽约时报》和《邮报》刊登了同样错误的引语。不久，新闻界就开始了对此事的讨论，依据的都是 Nexis 数

据库里这两份报纸的错误报道。美联社正确地引用了戈尔的原话，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直到那所高中的学生们对媒体的错误报道提出抗议时，这个问题才得到了彻底澄清。

就在新闻工作者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加工来自各个新闻来源的不断增长的信息数据流时，他们也会面临变得更加被动的风险，更像是接受者而不是采集者。为了对抗这一风险，进一步理解客观性的原始意义将有助于使新闻更脚踏实地。并不是只有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北卡罗莱纳大学新闻学教授菲尔·迈耶说："新闻和科学的智慧根源是相同的，都源自17世纪以及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同样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其理念是从多样的观点之中我们更有可能发现真相——"而这一思维方式也产生了科学的方法……我认为新闻与科学之间的联系应该恢复到尽可能完善的程度……我认为我们应该强调方法的客观性。正是科学的方法——而我们的人性、主观冲动……指导着我们应该用客观的手段调查什么。"[16]

这样看来，公平和平衡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它们不是最高原则，只是技术——或工具——以帮助新闻工作者寻找方向以及核实其叙述。它们从来都不应该成为追求的对象或新闻工作的目标。它们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核实，对事件做出更可信的描述。

比如说，平衡就可能导致歪曲。举例而言，如果压倒多数的科学家相信全球变暖是一个科学事实，或者相信某些治疗方式明显是最安全的，但是记者制造的印象却是科学家们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派，这对市民和真相来说，就是一种武断。不幸的是，通常新闻平衡都被错误地理解为类似数学上的平等，就好像一则好的报道中，双方的引语数量一定要相等。正如新闻工作者知道的那样，一则新闻中经常包含两个以上的立场。然而，有时平等地处理它们并不一定真实地反映了现实。

同样，如果把公平本身作为目标，那么它同样会被误解。公平应该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对事实公平，对公民理解事实做到公平。它不应被理解为："我对我的信源公平吗？不应该让他们不开心。"它也不意味着新闻工作者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的新闻看上去公平吗？"这些都是主观判断，会减少新闻工作者进行核实的需求。换句话说，公平只是一个目标，而不是方法，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主观判断。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澄清这些普遍存在的误解、加强用核实加以约束是提高新闻质量和公众讨论的质量的最重要的措施。最后，上述约束

和界线会将新闻与其他领域区分开来，并且为其继续存在创造良好的经济理由。更加自觉的核实约束对以主观臆断为特征的新新闻过度扩张是一副解毒剂，它会为公民信任新闻提供一个更好的理由。

如果新闻工作者有志于强调并纠正（如果有必要的话）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的“新闻已经受到了偏见的侵蚀”的看法，那么更深入、统一、透明的新闻核实方法不啻于是唯一的、最重要的解决措施。下面我们将更详细地解释这一点。

遵循客观**方法**——而不是目标——的新闻究竟是什么样的？对那些受到合理约束的报道，公民们究竟应该期待些什么？在倾听和研究来自新闻工作者、公民和其他关心新闻的人的所思所想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发现，作为约束的方式核实的基础由以下一些观念构成。它们是科学报道的理性规则：

1. 不得随意添加不存在的东西。
2. 不得欺骗受众。
3. 尽可能地使你的方法和动机透明公开。
4. 依赖你自己的报道。
5. 谦虚谨慎。

下面让我们依次解释这些规则。

和以断言为特征的新新闻相似，以纪实为名的虚构内容的兴起也是一个重要现象。在不同的领域，这些内容的叫法有所不同。在电视媒体，制片人称其为纪录剧（docudrama）。而在出版界，一些作者——比如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则假借回忆录这种体裁把虚构性内容当真实传记销售。2006 年，弗雷被揭发他的回忆录《百万碎片》（*A Million Little Pieces*）里许多内容子虚乌有。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说谎。

奇怪的是，有些新闻工作者却认为纪实性叙事——使用文学风格表达非虚构的内容——需要与虚构创作联姻。虽然使用叙事风格的许多一流纪实作者并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该问题却愈演愈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联姻并没有必要。纪实性叙事并不一定要借助虚构方能成功。在波士顿大学主持纪实叙事项目的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则，无论是硬新闻的写作者还是追求文学风格的

新闻写作者都可以遵守——比如，当写作内心独白的时候："切勿将某种思想归诸于信源，除非该信源确实说过他们有过同样的想法。"在时代公司任职的报纸专栏作家史蒂夫·洛佩兹(Steve Lopez)总结说，虽然具体的规则和表达方式会随报道风格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却不容更改：不要使用任何没有得到核实的信息。《纽约客》的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以长于叙事著称，他对于叙事中关键因素的总结可能最为透彻："纪实作家和读者交流的是生活在真实地点的真实的人。所以只有当那些人说话，你才能说那些人说了些什么。作者不能决定他们说什么……不要杜撰对话。也不要虚构不存在的人物……你不能钻到他们(人物)的脑子里替他们思考。你无法采访死者。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则，就是在利用和损害其他纪实作者的可信性。"[17]

约翰·赫西(John Hersey)因在《广岛》(*Hiroshima*)一书中描写了二战中第一次使用原子弹所产生的后果而获普利策奖。1980 年，为了使新闻工作者避免擅自越过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分界线，他提出了一条规则。在《刻在执照上的铭文》("The Legend on the License")中，他提出了一条非常严格的标准：永远不要虚构。新闻工作的绝对信条是："这里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编造的"(nothing here is made up)。[18]

但是，今天我们却认为赫西所说的"永远不要虚构"的标准需要修改。在《善恶花园的午夜》(*Midnight in the Garden of Good and Evil*)里，约翰·贝伦特(John Berendt)使用了合成角色，即为了追求戏剧效果，把几个事件浓缩成一个。罗纳德·里根的传记作者埃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认为，如果他自己(传记作者)也能成为书中的一个角色的话，可以使这位前总统的一生更加生动。但是，重构对白、使用合成的角色、压缩事件以及变换人物生活的时代，这些都是虚构。

我们和位于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市波因特学院(Poynter Institute)[①]的资深学者罗伊·彼得·克拉克(Roy Peter Clark)一道，为有志于探索事实与虚构分界线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一组经过修改的最新观念。

## ◉ 不得添加内容

不得添加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个要求比"永远不要虚构"或"永远不

① 波因特学院是美国著名的新闻教育学院，为新闻记者和教授新闻的老师提供培训。

要编造事实”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同时包括重新排列事件的时间和地点或把不同的人物和事件合成在一起。如果在录制电视新闻的时候响起了警报，为了达到戏剧性效果，把它从一个场景移到另一个场景，警报声就被加到了第二个地点的声音中。这样一来，原来的事实就变成了虚构。

人们在添加内容或进行修饰时，通常不愿意别人知道——这就暗示着这些行为本身是无法被接受的。这也正是赫西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他像其他人一样对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①]的做法表示怀疑。当纪实作家进行了虚构并承认这一点时，批评家和读者一般会做出消极的反应。传记作家埃德蒙·莫里斯在写完《荷兰人》(*Dutch*)之后才发现这一点。在他写的这本罗纳德·里根的传记中，他把自己塑造成里根早年生活的一个目击者，实际上那个时候作者还没有出生。莫里斯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突出里根自己是如何创造虚幻现实的。但是这一幻想与现实相交织的写法对说明事实帮助不大，反而削弱了这本书的可信性。“我为什么要读那个东西?”《华盛顿邮报》前主编本·布莱德利在2005 年秋季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Oswego)分校召开的一个讨论会上大喊道。[19]

## ◉ 不得欺骗

绝不要误导受众。轻视并愚弄大众是一种撒谎，它嘲弄的是新闻忠于真实的观念。这一规则与上一项规则密切相连。如果你删除了警报的声音却没有告诉观众，就是在欺骗他们。如果意识到你的所作所为可能令受众无法接受，那么它显然就是不合适的。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检查方法。如果观众知道你为了增强戏剧性而把新闻中的这个声音移到另一处，他们会有什么感受？他们很可能会觉得这一改动十分低劣。

不得欺骗意味着不论使用何种叙事技巧或讲故事的手段，只要和一般意义上的目击报告有所不同，受众都有权知道。我们在对新闻工作者的调查中发现，人们在引用语问题上有普遍共识。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认为，除了改正语法错误外，如果引号中的用词被替换或为了追求清晰而被删除，应该给受众一些信号——比如使用省略号或括号。[20]

如果新闻工作者重构(reconstruct)了他没有目击的引语或事件，不

① 汤姆·沃尔夫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新新闻运动的发起者，作为畅销小说作家和记者，他主张将文学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

得欺骗原则也意味着受众有权知道这些引语是被重构的，以及这些二手的引语是如何得到核实的。作者在书籍或报道的开头或结尾加上一则暧昧的说明，告诉受众只有“一些采访内容涉及重构”，这是远远不够的。哪段采访？如何重构的？这些暧昧的披露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披露。它们只是逃避的借口。

我们认为这两个观念——不得添加内容和不得欺骗——是新闻工作者区分事实和虚构界线的路标。但是作为公民，我们如何判断哪个记者可信呢？下面是一些方法。

## ◉ 透明公开

如果新闻工作者是真相的追求者，他们也必须对受众真诚——因为他们是真相的报道者。这项责任要求新闻工作者尽可能如实、公开地告诉受众，他们知道什么以及不知道什么。如果你首先都做不到对受众真诚，又如何能够自称追求和传递真相呢？

在实践中，诚实地告诉人们你知道什么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可能披露你的信源和知晓方法。你是如何知道一切的？谁是你的信源？他们是否拥有一手知识？他们可能有什么偏见？他们是否说过自相矛盾的话？还有哪些信息我们不知道？

这就是透明公开。我们认为，这一观念是进一步实现用核实进行约束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从准确到真实的过程中，如果新闻工作者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那么这些局限多数都会通过他们的诚实流露出来，包括他们知道什么、为什么他们相信这些知识、他们为获得这些知识付出了什么努力。

透明还有第二个重要的优点：它显示了新闻工作者对受众的尊重。它使得受众可以评判信息是否可信、获得过程是否可靠、提供信息的新闻工作者有何动机和偏见。这使得透明性成为对抗信源造成的错误和欺骗的最佳保护伞。如果新闻工作者所掌握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来自一个可能具有倾向性的信源，说出信源本身有助于向受众揭示出信息中可能隐藏的倾向——而且也可能阻止信源的欺骗。

透明公开还有助于新闻工作者养成为公众服务的动机，这也是可信性的关键。新闻工作者愿意公开其所作所为，是在表明新闻工作者对真相非常在意。谎言或错误缘自不懂装懂，或自以为是。

透明的精神如何才能起作用？它自上而下运行，首先意味着会议、发言、编辑专栏都要公开，尤其是出现争议时。《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伦纳德·唐尼在专栏文章中解释了他们在表明自己关于总统大选的立场当天，新闻版和社论版要分开出版的原因。他说，其中有不少内容比较个性化，可能需要特殊处理。如果一则新闻里说“专家们说”，那么记者究竟采访了多少专家？透明原则这个朴素的观念中最有价值的一点，恐怕是它天生与互联网的新型开放式架构不谋而合。双向交流让新闻的消费者在甄别信息可信性的过程中有机会提出他们心中最重要的问题：“你是如何知道的?”向新闻的提供者提出这个问题能够促使他们对信源提供的判断、结论、标签和事实做出清晰的表述。

对信源做出清晰详细的说明是新闻工作者实现透明公开的最有效手段，它也成为新闻工作者与最终消费者之间建立更具开放性的关系的基础。2002 年，《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恩里克的旅程》(“Enrique's Journey”)获得了普利策奖，这部由六篇系列报道组成的报道描述了一个洪都拉斯少年赴美国寻找母亲的经历。在发表这些报道时，《洛杉矶时报》通过脚注的方式，详细地回答了引语、事实、场景和其他信息的来源问题。超过七千字的脚注使这篇报道不仅摆脱了过于武断的可能，而且向读者提供了详细的信源信息。

自从本书第一版 2001 年面世以来，透明性概念已经越来越被新闻界重视。互联网站及一些新闻工作者用来讨论、批评和传播小道消息的渠道——比如波因特学院网站上罗梅内斯科(Romenesko)的博客[①]——帮助推动各类机构更坦诚地解释其工作。像《莫德斯托蜜蜂报》(*Modesto Bee*)或《奥斯丁美国政治家报》(*Austin American Statesman*)等报纸开设了博客，编辑能够通过这些渠道解释编辑部的决策，比如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做这则新闻、他们如何决定上什么新闻，以及他们是如何决定头版新闻的。

报纸还利用互联网补充其纸质版的不足，加入更多的数据、原始文件、调查方法、采访对象及报道者的音频和视频。即便如此，新闻透明化的实践才刚刚起步。

---

① 吉姆·罗梅内斯科，生于 1953 年，曾任报纸记者、编辑，后来任网络记者。1999 年，他被波因特学院聘用，并在该学院网站开设博客。该博客提供日常新闻、评论和媒体内的一些信息，访问量较大。

比如说，报纸要做到更加透明，其中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对匿名信源作出解释说明。但是我们看到的事例在这方面常常做得还不够，有时甚至根本就对此置之不理。2005 年 11 月《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非处方药的报道在引用一个自己开药的人时试图做到透明。但是该报在介绍她时只是简单地称其为凯瑟琳(Katherine K)："'我手里有一些药，并且在朋友需要的时候分给他们。我知道我这么做有问题。'凯瑟琳说。凯瑟琳住在曼哈顿，和许多在本文中接受采访的人一样，因为担心自己的行为可能会让雇主、执法机构或者至少父亲找她麻烦而不希望自己的姓(last name)出现在报纸上。"[21]

凯瑟琳要匿名的原因十分明显。报社为什么答应选择匿名却关系到读者。难道报社害怕她父母会找她麻烦？

接下来再看奈特—里德报团报道 2006 年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的例子。在演讲中，乔治·W. 布什总统保证到 2025 年为止，美国对中东石油的进口将减少 75%以上。演讲后的第二天，布什内阁的成员告诉记者，不要把"中东"两个字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奈特—里德报道说："在被问到既然并不是专指中东地区，为什么总统要使用'中东'这两个字时，一位布什政府的官员说，布什是为了把这个问题变得夸张一些，以使'每个听演讲的美国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意思'。这位官员只愿意在不透露姓名的状态下说这些话，因为他害怕这些评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22]

同样，我们也理解为什么这位布什政府的官员希望保持对自己有利的匿名状态，但是我们没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奈特—里德的新闻工作者同意为其提供保护。

最重要的是，透明的精神首先体现为在每件事情上，新闻工作者都要问一个问题："为了对这条信息做出评估，我的受众需要知道些什么？"这包括在可操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说明新闻机构是如何得到这条信息的。

透明性的第二个要素涉及另一个问题："我们对处理信息的方式是否需要做出解释，包括是否需要说明新闻取舍过程中有争议的决定？"在一个对新闻工作充满怀疑的时代，对可能导致误会的决策做出更多说明十分重要。动机与决策的问题是重新思考新闻客观性的关键。

透明精神的第三个要素所涉及的问题与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所做的正好相反。新闻工作者必须承认，报道中还存在一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作为传统，新闻工作者一般被教导不要提出新闻无法回答的问题。要使新闻看上去毫无破绽，甚至要表现得无所不知。永远不要显得还有些事

情不知道，要回避报道中的缺陷与漏洞。但是在21世纪，当新闻工作者无法完全控制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晓时，当他们不再是把关人时，这种观点就变得不太明智——如果它曾经明智的话。

关于透明性的这些观念可以解决大量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理查德·朱厄尔(Richard Jewell)的案例。《亚特兰大宪章报》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警察部门暂时认为朱厄尔可能是1996年奥运会爆炸事件[①]的作案者。这条新闻来自执法部门，提供消息的信源希望不要透露自己的姓名，他提到此前因为发现雷管炸弹并报告警察而被誉为英雄的朱厄尔，在调查过程中成为了嫌疑对象。这条新闻还说，朱厄尔符合警方对“孤身炸弹人”的描述。

令事件变得更复杂的是，该报纸还必须面对它自己定下的规则：不得使用匿名消息源。那么《宪章报》是如何报道这则新闻的呢？它使用了被新闻界称为“上帝之声”(Voice of God)的策略，即记者不说明消息源，只是把它当作(他们自己理解的)事实进行报道。

这条新闻中也没提及警察局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搞清楚，其中包括他们并没有任何物证说明朱厄尔与该罪案有联系。警方也没有将朱厄尔当作嫌疑人进行审讯。警方还没有推算出合理的时间表，说明朱厄尔可以在打电话报警后，在规定的时间出现在他发现炸弹背包的地方。

该报坚持说整个报道没有任何问题。它只是报道了警方的看法。然而，如果该新闻机构注意到案件还有许多疑点，警方尚且无法确定对朱厄尔的怀疑，那么这则新闻可能就不会那么具有爆炸性，但会更全面，也会更准确。同时，这也可以避免长达数年的诉讼[②]。[23]

透明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完全相同，都要解释你如何知道，以及为什么相信你知道的事情，这样才能让受众也接受你所相信的一切。在科学研究中，实验的可靠性或客观性取决于实验结果能否被其他人复

---

① 1996年7月27日午夜，社会极端分子埃里克·鲁道夫在位于亚特兰大奥运会主新闻中心旁的奥林匹克公园内设置装有雷管炸弹的背包。身为保安的理查德·朱厄尔发现了这一背包并向在场的佐治亚州侦查部门发出警告。9分钟后，案犯本人也打通“911”向警方提出警告。在警方清场过程中，炸弹爆炸，1人被炸死，1人死于心脏病，另有110余人受伤。2003年，案犯埃里克·鲁道夫被FBI逮捕。

② 被正式宣布无罪后，朱厄尔正式提请诉讼，以诽谤罪起诉以NBC新闻和《亚特兰大宪章报》为首的相关媒体，要求媒体正式道歉。这场官司持续了近十年。2007年，朱厄尔因疾病去世。

制。在新闻报道中，只有说明我们如何知道，才可以接近让我们的报道能被他人复制（如果他们想这么做的话）的观念。这就是科学或新闻中方法的客观性的含义。

就在沃尔特·李普曼刚开始怀疑新闻工作者是否具有去伪存真的能力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 当一份报纸六次刊登列宁去世的消息，而其唯一的信源只是一个一再被证明不可靠的关于列宁已去世的报告时，没有任何辩解、开脱或借口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在这个例子里，真正的新闻不是“列宁去世”，而是“赫尔辛福斯（Helsingfors）说列宁已经去世”。报纸所应承担的责任不是一再重复列宁去世的消息，而是采用了不可靠的信源。如果说编辑们对错误负有责任的话，最大的责任就是他们对信源可靠性的判断。[24]

不幸的是，太多的新闻工作者对其方法、动机或信源没有做出任何说明。通常，电视网的新闻节目只会简单地说“信源说”，这么做是为了节约宝贵的播出时间，但是这些信源大部分都很难让人信任。举例来说，2003年三大主要商业电视网的晚间新闻节目中，有43%的新闻含有匿名信源；2004年，匿名信源的比例上升到53%。[25]同样，这也是国会山大部分办公室一直沿用的规则，官员说的话只能以匿名的方式被引用。

像这样对公众保密是一个错误。当公民对新闻工作者和政府当局越来越不信任时，这种不利于公众的行为只会让新闻工作遭到更多质疑。

## ◉ 不得误导信源：透明原则的推论

透明精神同时也对处理新闻工作者与信源的关系问题有所启发。显然，在尽量向受众讲真话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也不应该对信源说谎或误导信源。

不幸的是，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原则的新闻工作者常常忽视了这一点。误导信源、欺瞒报道目的，甚至欺骗信源，这都是某些新闻工作者以寻找真相为名义，经常使用的技巧。虽然乍看上去，真诚的作风似乎给报道者套上了一副枷锁，但是在许多时候并不是这样。不少记者逐渐发现，诚实可以使他们具有更大影响。《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政治记者吉尔·朱克曼（Jill Zuckman）告诉我们：“我发现对信源说实话通常

效果更好，告诉他们我要做什么以及我进行到哪一步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杰伊·马修斯(Jay Mathews)已经养成了给信源看新闻初稿的习惯。他认为这会提高其报道的准确性和精细程度。[26]

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也应该要求其信源诚实可信。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认为，如果享受匿名特权的信源误导了记者，就应该公开信源的身份。保持匿名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诚实。

还有一类特殊的情况，即新闻工作者误导信源，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化装采访(masquerading)。这时新闻工作者为了获得新闻，假扮成另一个身份误导信源。“隐身”(undercover)采访技巧并不是新发明。在20世纪初，内莉·布莱(Nellie Bly)这样的揭黑记者(muckraker)就曾使用过这种技巧。在她的众多事迹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化装成精神失常者被关进精神病院，揭露这些机构对精神病患者的虐待。今天的电视节目也经常借助化装和微型隐形摄像机暴露不良行为。

不得欺骗原则和对受众、信源透明的原则对化装采访有何启示？当然，这些观念并不完全否定新闻工作者使用化装采访。相反，它们暗示在能否使用这些技巧的问题上，新闻工作者可以参考在判断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①]是否合理时使用的类似标准进行判断。公民也应该使用这种标准来评价新闻工作者的做法是否合理。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步骤来进行检验：

1. 要获得的信息对公众的利益必须非常重要，以至于它使欺骗具有合理性。
2. 除非新闻工作者没有其他方法获得新闻，否则不能使用化装采访。
3. 无论何时，只要新闻工作者通过误导信源的方式获得信息，就必须让受众知晓这一点，并且解释这么做的原因，包括为什么在报道这则新闻时欺骗具有合理性，以及为什么这是获得事实的唯一方式。

通过上述方法，公民可以自行判断新闻工作者的欺骗是否合理。同

① 公民不服从是人们反抗法律、行政不合理的方法之一，是指主动拒绝遵守政府的某些法律、要求或命令，而不诉诸于暴力。美国作家亨利·梭罗开创了这一传统。可参见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样，新闻工作者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向其首要的效忠对象——公民显示其清白。

我们对于建立更加透明的新闻观念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因为从长远来看，它将有助于公民更加热心新闻及公共事务。这样的公众才能够轻松发现规范的新闻和粗心的或为私利服务的伪新闻之间的差异。这样做，新闻工作者才能使新兴的市场力量也成为促进提高新闻质量的动力之一。透明意味着在新闻报道中植入一种新的意识，说明新闻是如何获得的以及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表达。

在报道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丑闻的过程中，《纽约时报》在向读者解释为什么将一位名叫朱厄妮塔·布罗德里克(Juanita Broaddrick)的妇女的指控推迟发布并且放在16版时，就是按照透明原则来处理的。布罗德里克宣称克林顿总统大约21年前在阿肯色州强迫她与其发生性关系，但是她当时并没有提出指控，甚至在莱温斯基丑闻之前从未提过此事。而且，她也没有将此事诉诸法律程序。

《纽约时报》的记者费利西蒂·巴林杰(Felicity Barringer)和戴维·费尔斯通(David Firestone)采访了自己报纸的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把后者的解释也写入新闻。在报道中凯勒提出下述原因：布罗德里克指控的是非曲直最终“很可能无法搞清楚……从法律上看，它似乎无法向前发展……参议院也不可能再次弹劾他……而且‘坦白地说，我们都对丑闻有些厌倦了’”。一些公民可能不同意他的说法，但是至少他们现在得到了一些说明，了解了报社为何要这样处理新闻，而不是得到“新闻是客观现实而不是人类判断的产物”这样的错误感觉。[27]

这里有两个重点需要说明。第一，记者认为，让读者了解新闻背后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以及支持这些决策的标准是什么，这十分重要。第二，《纽约时报》编辑部内部的氛围使记者可以心安理得地质疑主编的决定，并在报道中有意识地引用他的评论。

## ◉ 原创性

除了要求新闻报道更加透明之外，公民和新闻工作者在判断新闻报道的价值时，还可以寻找另一些标准。记者迈克尔·奥雷斯克斯(Michael Oreskes)在任《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主任时为了规范寻求真相的行为，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但却有影响的观念：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报道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及法律丑闻的整个过程中，新闻机构经常发现自己处于无所适从的尴尬位置，因为其他新闻机构不时披露爆炸性新闻，但是他们自己却无法证实这些新闻。更为复杂的是，这些爆炸性新闻通常来自匿名消息源，这意味着和简单引用他人的言论不同，新闻机构需要对这些匿名新闻的真实性担负更大责任。根据这样的信源，三家不同的新闻机构均报道说有第三者目击到了总统与莱温斯基的亲密行为——而这些新闻后来均被证明不准确。知道其他媒体会报道这些内幕，或者像流行语所说的，新闻“就在那儿”(out there)，此时新闻机构是否就可以报道这些内幕？

奥雷斯克斯的结论是应该坚决说不。“那些做正确报道的记者一定是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人，他们兢兢业业，遵守审查信源的基本原则，从多个信源获得信息。那些被‘就在那儿’的信息干扰、引用这可怕的短语为新闻工作者的罪恶辩护的人，那些只关心完成自己的日常专线报道，而不是尽可能好和尽可能快地完成工作的人，他们最终会把报道搞砸。”[28]

原创性深深地根植于新闻事业。新闻界的一些老格言，如“有疑勿报”(when in doubt leave it out)，涉及的就是类似的问题。“核对”(matching)新闻的传统也植根于同样的理念。这种理念要求新闻工作者不是简单地发表其他新闻媒体的独家新闻，而是首先派出自己的记者与信源联系并确认这一消息。这样做，部分也是为了避免把功劳归诸其他新闻机构。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效果——不得重复报道无法独立确证的新闻。

原创性的概念与透明性的观念相一致。报道中存在不同层次的知识，新闻工作者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向受众说明。新闻首先关注的是事件的外部特征：一辆卸货车闯了红灯并撞上一辆公共汽车；总统说过这些话；多少人去世了；文件上说了什么。你离中心越近，越容易确证这些信息。在上述例子中，新闻的来源非常确凿。

当报道进一步转向内心世界，试图报道信仰、动机时，新闻中猜想的成分必然增多。卡车司机闯红灯时心里在想什么？总统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奥萨马·本·拉登仇恨美国？

新闻工作者感觉到这些内容也应该让受众知晓，但是这个层次的证据又不太确凿。可能存在多种解释和不同层次的知识。这些不太确凿的证据也应该向受众明确说明。如果编辑部认定，对某专家进行采访是说明动机和回答“为什么”的最佳途径，那么必须向公众说明为什么选择这

位专家，并介绍他的专长或他与这个话题的关系。新闻编辑部不应躲在专家的后面，推卸追求接近真相的责任。

为什么我们建议这么做？因为新闻工作者在他（或她）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的问题上对受众越诚实，他们就越可信。对人民真诚，不要装作无所不知，提出你无法证实的内容。承认自己有所不知会让你更加权威，而不是相反。

## ◉ 谦虚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观念，新闻工作者必须对自己的能力保持谦虚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们不仅必须对所见所闻保持怀疑，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对自己了解真相的能力表示怀疑。杰克·富勒建议，新闻工作者对于自己知道的一切和知道这一切的方法，应该持一种“谦虚的判断”。[29]避免错误报道的关键是对个人知识的局限和感知能力的局限表现出训练有素的诚实。

我们举办多样性论坛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正好有助于说明这一点。这件事是由《纽约时报》的宗教作家劳丽·古德斯坦（Laurie Goodstein）告诉我们的，它是关于五旬节教派（Pentecostal）的信徒在美国国会前的台阶上进行奋兴（revival）祷告的报道。这次宗教聚会的主题包括信仰治疗、号召学校组织祷告、诅咒允许堕胎和同性恋的国家——一个相当典型的福音会奋兴集会。一家报纸的记者报道这个事件时也提到了上述内容，但是里面加了这样一句话：“其情绪不时地变得对台阶后雄伟的白色建筑中的立法人员充满敌意。”接下来，记者引用了一家基督教电台播音员站在台阶上说的话：“让我们祈祷上帝会 slay 国会的每一个人。”[30]

这个记者认为播音员所说的 slay 意思是“杀害”（kill）。但是古德斯坦解释道：“任何一个五旬节派的成员都知道，请求上帝 slay 某人，其含义是对灵魂进行杀戮，通过圣灵进行杀戮，祈祷他们会转而爱上帝、爱基督。”

问题在于这个记者不了解这层含义，在新闻部也没有五旬节教派的成员可以咨询，或许他急于发布这样一个“不雅”的新闻，以至于事后也没有找其他人再次复核一下这个播音员是否真的在鼓动人们谋杀整个国会。古德斯坦说：“它导致该报做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更正。”它同样也为保持谦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谦虚还意味着你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哪怕下一个采访对象会改变新闻的整个内容，甚至使你相信这里根本没有任何新闻，你仍然能够接受现实。

这五个观念加在一起，构成了以核实进行约束的核心哲学。它们同时有助于在新闻工作者和公民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这对于双方都有益。通过使用透明、新闻叙事等工具，新闻工作者可以吸引公民接受在其他情况下有可能被忽略的重要的信息，这么做并不会牺牲事实的完整性。与此同时，通过更加公开自己的工作，也促进新闻从业人员在获取、组织和表达新闻中考虑得更加周全。

## ◉ 偏见

用核实加以约束，尤其是透明的观念，是新闻工作者解决偏见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我们这里所说的偏见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偏见。我们所说的偏见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偏见，涵盖新闻工作者的所有判断、决策和信仰。偏见包括各种偏好，不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它也可以包括倾向于追求真相或事实，或让无声者说话，同时也可以指个人社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倾向。有批评说我们都受到个人生活史和所在文化偏见的影响，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如果这么看的话，我们根本无法做到在传播中不带任何偏见，即使那些极具说服力的新闻报道的作者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如果用这种更宽泛的，坦率地讲也是更现实的方式理解偏见，那么偏见就不是能够或应该消除的东西。相反，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是在报道某则新闻时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偏见的存在，并判断什么时候它们是恰当的和有用的，什么时候它们又是不恰当的。新闻工作者需要成为自己的偏见或新闻机构的偏见的管理者。

有句老话说得好，只有存在偏见的眼睛才能看见偏见——或者说，有偏见的新闻其实仅仅是你不同意的新闻。然而，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它成为一个所有人得以为自己开脱的借口。既然你不能令所有人满意，为什么还要为它操心呢？所以问题就自动解决了。然而，用这样的方式来消除这个问题并没有化解受众的不满，也不能改进报道。

偏见管理涉及几个与核实有关的问题。首要的任务是更系统和更自

觉地正确获得事实，可以使用下面将要提及的几个技巧。进行核实，而不是盲目地相信自己的良好动机，是新闻工作者避免先入为主的最有效的方式。

第二个应对偏见的方法是尽量做到透明公开。这意味着传受关系将由居高临下地传达，转变为平等地分享。新闻工作者告诉我们，解释自己的决定常常迫使他们判断，有时甚至重新思考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还告诉我们，更加透明公开能够有效地打消他们担心受众误解其动机的顾虑。

## ◉ 核实的技巧

显然，上述观念并不足以构成报道的“科学方法”——它还有待新闻工作者个人加以完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能明白这个观念。但是为了说明，我们还是愿意提供一些来自全国各地新闻工作者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下面这几个技巧虽不能应付所有问题，但是任何新闻工作者都可以从中提炼出适合自己的最理想的收集和表现新闻的方式。

## ◉ 带着怀疑编辑

桑德拉·罗(Sandra Rowe)是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主编，她在该报采用了一个被她和执行主编彼得·巴提亚(Peter Bhatia)称为“起诉式编辑”(prosecutorial editing)的管理系统。不过，这个名字起得并不好。雷德·麦克勒盖奇(Reid MacCluggage)，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报纸《今天》(*The Day*)的前主编兼社长，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词——“怀疑式编辑”(skeptical editing)。[31]不论用哪个词，对于新闻工作者和公民来说，理解这个概念都十分重要。

这个方法就是对新闻报道进行裁定，逐字逐句地对其中的判断和事实进行编辑。我们是如何知道的？为什么读者应该相信？这句话背后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如果新闻说某件事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这是谁说的？某个信源还是某位市民？

在《俄勒冈人》报任副主编的阿曼达·贝内特(Amanda Bennett)说，她是从《华尔街日报》那里学到这个观念的，其作用“与其说是挖出数量有限的事实性错误，不如说是挖出判断和叙述中产生的无意识的错误——

发现那些因为'众所周知'而被写进去的东西"[32]。

如果一篇报道说目前大部分美国人都有个人电脑，编辑就会进行核实。如果新闻说"根据消息来源得知"，编辑就会问："这个消息源是谁？是否还有其他知道这个信息的人？"如果只有一个信源，新闻就应该说明这一点。如果一则新闻说候选人史密斯在税收提案中突然改变立场，和其一贯的政治立场矛盾，编辑就会问"出现了哪些问题？"以及"谁会这么认为？"，如果答案只是记者和他的朋友，那么新闻中要么说明这一点，要么删掉这一段。

罗主编说，不管是否可行，在进行这种编辑时，编辑和记者应该坐到一起，记者提供原始材料。罗说："在我们编辑部，越是这样做，我们就越远离真正的恐惧。"[33]贝内特最早在自己编辑部的一群记者和编辑中传授这种做法。她说："人们此前并不知道可以问这些问题。"这么做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使人们觉得可以提问，并且成为一种自觉"。除非能够得到绝对核实，否则与其往新闻里加东西，不如删东西。[34]

贝内特和罗相信，该技巧使编辑和记者更加仔细全面。《俄勒冈人》所实行的怀疑式编辑的目的是创造一种质疑新闻而不是质疑记者人品的氛围。这成为新闻编辑部公开的对话环境的一部分，这种对话既可以自下而上，也可以自上而下。

## ◉ 使用准确性清单

一些报纸使用准确性清单，以提醒员工意识到核实的重要性。我们收集到的清单中有些只列出了一些概念性的问题，比如下面这些：

- 报道的导语是否得到了充分支持？
- 能帮助受众理解新闻的背景材料是否完整？
- 新闻中的所有利害相关者是否都得到确认，是否联系过各方代表并且给予其发言机会？
- 新闻是否偏向某一方或做了难以觉察的价值判断？有些人是否会格外地喜欢这篇报道？
- 是否在新闻中对每条信息的出处进行了标注和查询，以保证其正确无误？
- 这些事实是否足以支持新闻的前提假设？有争议的事实是否得

到了多个信源的支持？

- 是否对引语进行过复核，以确保其准确并且不会断章取义？

还有一些问题则更加具体：

- 是否复核过网址、电话号码和罕见的姓名？
- 在报道中第一次引用人名时是否列出了姓名的全称？
- 是否检查过年龄、住址、职务，以保证它们正确无误？如果是这样，是否在文章旁边注明“所有资料都已经准备就绪”以表明它们都已经被订正过了？
- 报道中的时间是否包括星期和日期？

一些编辑认为类似这样的清单太机械，如果处理得不好，它们也会打击记者的自信心，压制新闻叙事中的创造性。但是处理得当，这些问题可以帮助记者和编辑共同努力，将报道变得更准确可信。

## ◉ 不要贸然做假设

戴维·普罗泰斯（David Protess），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的教授，运用死囚犯的例子让学生们意识到核实推测性事实的重要性。教训之一就是：不要依赖官方或新闻报道。尽可能接近原始信源。全面彻底，不要遗漏。确证所有假设。

普罗泰斯每年都会收到数千封来自死囚犯的邮件，他们宣称自己是被冤枉的。每年他都会从中选择一些布置给学生去检查。普罗泰斯经常使用 1999 年安东尼·波特（Anthony Porter）的例子，向那些有抱负的记者介绍怀疑一切的重要价值。

“要说明我使用的方法，最佳的方法或许是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举的一个例子，”普罗泰斯在一次采访的最后说，“我在黑板上画了一组同心圆。最外面的圈代表第二手文献，像新闻报道……接下来的一圈代表原始文献，像证言及陈述之类的审讯文件。再里面一圈是现实的人——证人。我们对证人进行访问，检查他们说的是否与文献里的内容一致。我们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可能来自文献阅读。最里面的一圈是我所说的靶子——警察、律师、其他嫌疑人以及罪犯……你会惊讶地发现，原始文件里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那里面有许多东西，特别是警察放过的最初的犯罪嫌

疑人。”

在波特一案的内圈，普罗泰斯及其学生发现了一个被警察迅速放过的嫌疑人阿尔斯托里·西蒙(Alstory Simon)。他们使用普罗泰斯发明的系统方法，对文件和信源进行了交叉检查，发现西蒙的一个外甥在凶案发生当天晚上无意中听到西蒙对谋杀的忏悔。西蒙最终被判定有罪，而本来被判死刑的波特则幸免于难。1999 年 3 月 19 日，安东尼·波特成为伊利诺伊斯第五位因为普罗泰斯及其学生的努力而获释的误判死刑犯。普罗泰斯的工作出色地说明了有条理的新闻核实的威力。

## ◉ 汤姆·弗伦奇的红铅笔

如果说普罗泰斯的方法的特点是全面，那么汤姆·弗伦奇(Tom French)的方法则出奇的简单。弗伦奇擅长给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时报》(*St. Petersburg Times*)撰写长篇的故事性纪实深度报道。他的特稿获得了 1998 年普利策奖。他也写有时效性的硬新闻。

弗伦奇有一套核实自己新闻中的所有事实的检验方法。在交稿之前，他拿着稿件的打印件，用红铅笔逐行审查，在每个事实与判断前面标上记号，以确定他已经对这些内容的正确性进行过复核。

## ◉ 谨慎使用匿名信源

作为公民，我们所知的大多数信息来自他人。代表我们对世界进行监测的新闻工作者，也经常在报道中依靠他人提供的细节。新闻工作者为了保证自己受到受众信赖，最早使用的技巧之一就是披露信息的来源。“在麋鹿组织(Elks Lodge)[①]年度报告会的某次演讲中，琼斯先生说……”等等。由于依赖他人得到信息，所以新闻工作者必须始终保持怀疑态度。他们很早就接受了这样的提醒：“如果你的母亲说她爱你，先核实一下再接受。”有了信源的详细背景信息，受众自己就能决定这些信息是否值得相信。

近些年来，随着新闻供应渠道的增加，信源控制媒体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过去，为信源保密是新闻工作者用来劝诱不愿开口的内部告密者

① 麋鹿组织是美国的慈善组织，主要帮助残疾儿童和老弱群体，分支遍布全美，影响很大。

放心提供信息的手段，而现在它所隐藏的重要信息则完全不同——它成为深谙媒体游戏规则的信源强加给记者的交换条件，否则他们就根本不开口。

让我们看一则独特的内幕调查丑闻，它涉及乔治·W. 布什政府内部的信源。这一丑闻涉及一位名叫瓦莱丽·普莱姆（Valerie Plame）的中央情报局秘探，其身份被泄露给媒体。2005 年，此案成为一场关于媒体是否有权保护秘密信源的著名争端。《纽约时报》的记者朱迪斯·米勒因拒绝说出新闻信源，在监狱里度过了 85 天。尽管最终她还是改变了主意，出庭作了证，然而她所保护的信源——一名名叫“脚踏车”刘易斯·利比（I. Lewis“Scooter” Libby）的男子——并不是真正泄露政府机密的内部告密者。利比是副总统的高级助手，他受上级的指使向媒体泄露，说政府不同意普莱姆的丈夫（前美国大使）在《纽约时报》上所发表的文章的观点。后来发现，米勒不仅答应要为利比的身份保密，而且还遵照之前的约定，主动误导读者，把利比描述为“前国会工作人员”，而不是“政府高级官员”。因此，米勒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是发表了一篇关于大使的报道。[35] 正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阿尔·卡门（Al Kamen）后来描述的那样，在华盛顿特区，政治圈里几乎每个人都曾在国会工作过，所以“前国会工作人员”这个称呼和“某人”没什么区别。[36]

随着新闻工作者在重大公共信息上对匿名信源的依赖不断增加，他们也开始尝试建立一些规则，以保证自己和受众相信新闻工作者和报道中的匿名信源没有特殊关系。乔·莱利维尔德（Joe Lelyveld）在《纽约时报》任执行主编的时候，要求记者和编辑在使用匿名消息源之前问自己两个问题：

1. 匿名信源拥有多少该事件的一手信息？
2. 如果确实存在误导我们的动机，那么该信源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是为了锦上添花，还是为了隐瞒那些可能改变我们对信息印象的重要事实？

只有在对上述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之后，他们才会使用这些信源。此外，他们还尽最大可能与读者分享一些暗示性信息，如信源是处在一个令其知晓此事的位置（比如“一位看过文件的信源”），或信源可能有哪些特殊利益（如“一位独立检查办公室的内部工作人员”）。这种追求更加透明的报道的努力是受众决定是否相信报道的重要依据，更为重要的

是，它还表明了新闻机构在提供这些新闻时所采取的标准。

德博拉·豪厄尔，纽豪斯报团驻华盛顿主编提出了另外两条规则，对莱利维尔德的规则做了进一步补充。

1. 切勿使用匿名信源表达他人的观点。
2. 切勿在报道的第一个引语中使用匿名信源。

《丹佛邮报》(*Denver Post*)前主编格伦·古佐(Glenn Guzzo)则要求记者和编辑在提出使用匿名信源的申请前回答另一组问题。

1. 该信息对这则新闻非常关键吗？
2. 该信息是事实而不是观点或判断吗？(他不允许以匿名方式发表判断性陈述。)
3. 该信源的位置是否保证其真的知晓此事——他是目击者吗？
4. 是否存在其他说明可信性的指标(多个信源、分别得到独立证实、对信源的经验)？
5. 为了帮助受众决定对该信源的信任程度，你将如何介绍该信源？

即使在你决定使用匿名信源提供的信息之后，这三个版本的问题或检测也可以为如何写作新闻提供实用性指导。

问题不在于新闻工作者应该更相信上述哪一种标准，或者公民应该证明哪一种更好。我们希望任何从事实践工作的新闻工作者都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创造出自己的标准。

更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新闻工作者对于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使用匿名信源有意识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并且把自己的理由和受众分享。民意调查发现，虽然公众并不喜欢匿名信源，但是他们也认为使用匿名信源或许有其价值。[37]

究竟应该如何表达呢？下面是一个例子："据一位接触到本案细节的律师说……《邮报》决定对这位律师的身份保密，因为对公众来说这一信息十分重要，而且我们认为，说出他的身份将使他在法律上处于险境。"

## ◉ 真相的多重来源

最后，在真相的追求之旅中，新闻产生过程中的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社长和媒体所有者必须愿意毫无畏惧、毫无偏袒、始终如一地发布

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新闻。

编辑们必须保护表达自由免遭威胁——抵抗政府、公司、起诉者、律师，以及其他新闻制造者们通过以假乱真、粉饰太平来误导或操纵媒体。

记者们必须矢志不渝并努力克服自己的偏见，进行自我约束。在一次委员会的论坛上，来自芝加哥的资深电视播音员卡罗尔·马文(Carol Marvin)用下面这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当你和家人坐在一起共度感恩节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典型的家庭内部争论——可能是政治问题，也可能是种族、信仰或性方面的问题——但要记住的是，你在这场家庭争论中所看到的，是从你所在桌子的那一方所看到的。它会扭曲你的观点，因为在这时你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提出观点……而新闻工作者则是那些远离桌子、试图综览全局的人。"[38]

而且，如果把新闻工作看成一场对话，参与对话的人不仅是提供新闻的人，还包括公民。公民们也应在其中扮演角色。当然，他们必须专心致志。他们必须果断自信。如果有问题或困难，他们应向新闻机构提出：你们是如何知道的？你们为什么要写这些？你们所遵循的新闻原则是什么？这些都是合理的问题，公民们应该得到答复。

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把真相作为首先要效忠的原则，还必须把公民作为最高的效忠对象，这样他们才能自由地追求真相。新闻工作者应该使用透明的并且系统的核实方法，吸引公民参与到寻找真相的过程之中。下一步则是厘清他们与被报道者关系的问题。

## 注 释


[1]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bks. 1 and 2, trans. C. F. Smith (Cambridge: Harvard Unviersity Press, 1991), 35—39.

[2] Walter Lippmann, *Liberty and the News* (New Brunswick, NJ,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5), 58.

[3] Claudia Puig, "Getting Inside the Truth, Filmmakers Accused of Fiddling with Facts Cite Dramatic Accuracy," *USA Today*, November 3, 1999; available at www. usatoday. com.

[4] Dan Gillmor, "The End of Objectivity," *Bayosphere*, January 20, 2005.

[5] Michael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6. 舒德森的书在分析从19世纪幼稚的经验主义向最初的更高级的客观性观念转

变的问题上，非常有用。

[6] Walter Lippmann and Charles Merz, "A Test of the News," *The New Republic* (August 4, 1920), published in *Killing the Messenger: 100 Years of Media Criticism*, edtied by Tom Goldste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91.

[7] Walter Lippmann,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6 (June 1931), 170. 李普曼的后一篇文章写于 1931 年，距他研究俄国革命已经有 12 年，这一事实说明这个问题如何一直困扰着他。

[8] Lippmann, *Liberty and the News*, 74.

[9] Ibid., 60.

[10] Ibid., 74.

[11]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155—56.

[12] William Damon, to Committee of Concerned Journalists steering committee, February 12, 1999, private meeting.

[13] Geneva Overholser, at CCJ Forum, Minneapolis, MN, October 22, 1998.

[14] Robert Parry, "He's No Pinocchio," *Washington Monthly*, April 2000; available from www. washingtonmonthly. com.

[15] Ibid.

[16] Phil Meyer, at CCJ Forum, St. Petersburg, FL, February 26, 1998.

[17] Norman Sims, ed., *The Liberty Journalist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4.), 15.

[18] Tom Goldstein, ed., *Killing the Messeng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247.

[19] 本书作者之一 Rosenstiel 与 Bradlee 是同一个讨论小组的成员。The panel was "Why Don't We Trust the News Media? How Can the News Media Recover Public Trust?" Oswego, NY, October 27, 2005.

[20] CCJ and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Striking the Balance: Audience Interests, Business Pressures and Journalists' Values," March 1999; Amy Mitchell and Tom Rosenstiel, "Don't Touch That Quot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anuary 2000), 34—36; available at www. journalism. org.

[21] Amy Harmon, "Young, Assured, and Playing Pharmacist to Friends," *New York Times*, Novermber 16, 2005; available at www. nytimes. com.

[22] Kevin G. Hall, "Administration Backs off Bush's Vow to Reduce Mideast Oil Imports," Knight Ridder Newspapers, February 1 2006; available at www. commondreams. org/headlines06/0202-05. htm.

[23] 这一信息来自 Ron Ostrow's "Case Study: Richard Jewell and the Olympic Bombing," available on www. journalism. org, the website of the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24]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226.

[25]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05," March 2005; available at www. journalism. org.

[26] Jay Mathews, interview by Dante Chinni, September 12, 2000.

[27] Felicity Barringer and David Firestone, "On Torturous Route, Sextual Assault Accusation against Clinton Resurface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1999; available at www. nytimes. com.

[28] Michael Oreskes, at CCJ Forum,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 1998.

[29] Jack Fuller, *News Value: Ideas from an Information Age* (Chicago and London: Unvi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350.

[30] Laurie Goodstein, at CCJ Forum, Detroit, MI, February 2, 1998.

[31] MacCluggage 在向本地版编辑讲话时提出："要带着更加怀疑的态度去编辑。如果不从一开始就表示怀疑，没有经过适当审查的新闻就会偷偷溜进头版。" Associated Press, "APME President Urges Editors to Challenge Stories for Accuracy," October 15, 1998.

[32] Amanda Bennett,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April 13, 2000.

[33] Sandra Rowe,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April 13, 2000.

[34] Bennett,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April 13, 2000.

[35] Don Van Natta Jr., Adam Liptak, and Clifford J. Levy, "The Miller Case: A Notebook, a Cause, a Jail Cell and a Dea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2005; available at www. nytimes. com.

[36] Al Kamen, "In the Loop: Ambiguously Anonymou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9, 2005, A19; available at www. washingtonpost. com.

[37]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People and the Press, "Public More Critical of Press, But Goodwill Persists," June 26, 2005; available at http: //poeple-press. org.

[38] Carol Marin, at CCJ Forum, Chicago, IL, November 6, 1997.

# 第5章

# 保持独立

1971年，因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突然与联邦政府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冲突。几个月后，尼克松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在一个筹款晚宴上正好坐在《时报》社长，“重拳”阿瑟·苏兹贝格（Arthur“Punch” Sulzberger）[①]的旁边。在席间交谈中，萨菲尔提到打算辞掉政府的工作。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自从尼克松1968年竞选开始，苏兹贝格就面临压力，他要找个保守的声音平衡《时报》言论版。压力来自斯科蒂·赖斯顿（Scotty Reston），他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记者，也是该报驻华盛顿记者、前分局主任以及执行主编，他担心的是政界对报纸的看法，同时担心《时报》董事会成员有意见。董事认为，报纸的声音只有更加平衡才能保证策划中的全国版将来能取得成功。在当时，该报的言论版被自由派把持，包括汤姆·威克（Tom Wicker）、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弗洛拉·刘易斯（Flora Lewis），以及稍温和一些的赖斯顿本人。苏兹贝格得偿所愿，最终得出结论：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保守派声音加入。

萨菲尔是不二之选。他是纽约人，在该市具有良好的人脉。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者，散文清晰晓畅，有时也很尖锐，一些批评新闻界的文章为人传诵。苏兹贝格所尊敬的《华盛顿邮报》社长凯瑟琳·格拉汉姆（Katharine Graham）也曾经试图邀请萨菲尔加盟，但是因为薪酬问题无法达成协议，最终没有成功，这一事件令该想法更具吸引力。

最终，萨菲尔与《纽约时报》达成协议。然而，如果说萨菲尔的加入缓

① 即 Arthur Ochs Sulzberger（1926— ），1963至1992年任《纽约时报》社长（出版人）。

解了保守派给苏兹贝格的压力的话，那么它同时也点燃了老读者的激烈批评，就连《纽约时报》新闻部的很多人也有不同意见，他们对总统的演讲撰稿人摇身一变而为新闻工作者感到惊诧。

对一个党派的前政治活动家来说，达到什么标准才可以自称为新闻工作者？开一个专栏就足够吗？显然，要赢得《时报》新闻工作者的认可，还需要更多证明。萨菲尔 1973 年最终来到《时报》时，正值水门丑闻完全被揭露三周之前，多年后他回忆说，当时“华盛顿分局的同事完全排斥我，把我看成尼克松阵营冥顽不化的宣传家。唯一勉强愿意和我吃午餐的记者是马丁·托尔钦(Martin Tolchin)，他是我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的同学”[1]。

但是两件互不相关的事改变了萨菲尔的处境。第一件是个人事件。“在分局一年一度的野餐会上，某记者的 3 岁小孩掉进水池并溺水；作为唯一站在旁边的成人，我连衣服也没脱就跳进池里把他救了起来。大部分人开始改变对我的看法，觉得‘他也许不是坏得一无是处’。”第二件是一则新闻事件。《时报》记者约翰·克鲁森(John Crewdson)报道了一则爆炸新闻，提到 16 名记者和 1 名尼克松的助手被秘密安装了窃听装置。这个助手就是萨菲尔。“这是对新闻自由前所未有的侵犯，后来该行为被判违法；因为我也被窃听监视，我就成了尼克松所谓的‘他们中的一员’，当我在《时报》的专栏里攻击尼克松的秘密录音带时，《时代》杂志把这称为‘萨菲尔怒火冲天’(Safire Afire)，这帮我树立了独立形象。就像经历了洗礼，我不再被当作贱民而受排斥。”

32 年后，萨菲尔从《时报》退休，带着一个普利策奖，他不仅获得了新闻界的尊敬，还有上百万读者的尊敬。是什么使他得到了承认？肯定既不是中立或冷淡的语气，也不是公平无私的姿态。萨菲尔始终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会无情地批评对手，让对方身败名裂，某些时候还会有过激的言论。那么究竟是什么把萨菲尔和党徒、政治活动家或宣传家区别开来？

对新世纪的新闻和信息的传递而言，这是个关键问题。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近年来内容生产的民主化和大众化以及公众需求的增加，迫使媒体不断扩大发展，以满足更多样和更积极的公众。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与其他信息的区别是什么？

真实及对公民忠诚是新闻的特征之一。起到监督作用和为公众讨论提供论坛也是新闻的特征。但是新闻评论工作的特征呢？中立是否是新

闻的原则之一？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专栏作家和社论作者就会被排除出这个职业。比如普利策奖获奖记者，《华尔街日报》的保罗·吉戈特(Paul Gigot)和《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成为专栏作家之后就应该放弃记者的称号。那我们又该如何定位《华盛顿邮报》的戴维·布罗德(David Broder)，或《洛杉矶时报》的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新闻工作者，既写专栏也做新闻报道。此外还有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或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作为电视新闻主持人，他们有时也发表评论。

每年普利策奖评定委员会都给评论颁奖，并把该奖项放在"新闻"类。不少人会提出，美国的另类报纸，新闻领域非常活跃的一支力量，它们比由大公司掌握的自诩提供中立新闻的报纸更接近美国新闻的历史传统。

有必要重申并澄清，不偏不倚或中立并不是新闻的核心原则。正如在前一章讨论核实时解释过的，不偏不倚并不意味着客观。但是，如果中立不是新闻的基础，那新闻和其他信息(如宣传)的区别又在何处？宣传家也公开出版。政治活动家也公开出版。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的谈话节目的政治立场偏左。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谈话节目偏右。数十位不同政治阵营的支持者发表党派倾向明显的博客。他们是新闻工作者吗？是否只要参与公开出版或广播，就可被称为新闻工作者？

萨菲尔离开《时报》后，我们请他总结究竟什么影响了他的想法，促使他从一个政界人物转变成新闻工作者？中心问题与忠诚对象有关。

> 究竟应该忠于谁？老友、同事、政治意识形态或党派、为之效力的新闻媒体、冰冷的事实——还是真相？
>
> 实际结果可能是这些对象的不同组合。你不会为了精彩的新闻而毁掉与之长期合作的信源。你不会因为意识形态而拒绝好新闻。[你决不会无动于衷地看着文字编辑把精彩的"故事"(story)变成干巴巴的"论文"(article)而不作任何抗争。]你不会守着一系列确凿的事实，却得出缺乏根据的或者误导性的结论。如果有人野蛮攻击和你政见一致的人，你会不屑于与他为伍。你不会断章取义地引用一段话，追求细节的准确却误解了中心意思。

换句话说，和其他新闻工作者相同，萨菲尔同样忠于准确和事实，坚决站在确凿的事实和真实的结论一边，告别过去的党派身份。他属于自

己，虽然依旧保守，但现在为读者工作。

萨菲尔也认为，自己的从政经历对第二个职业——新闻工作起到正面作用，而不是背离了后者的要求。但是他同样明确意识到，这个转变只能进行一次。他说："如果每隔几年就在政客和新闻工作者之间轮换，会令读者或观众感到迷惑，也会让积习难返的跳槽者本人面临麻烦。"换句话说，新闻工作远不仅是在电视台或言论版占据一个位置那么简单。但是萨菲尔还是坚信，政治经历是对记者的良好训练。

> 由于过去身在其中，了解如何回避问题或含糊其辞，所以跳出来后，这些经历有助于新闻工作者识破此类对言辞的操纵。当置身其中时，你与某些你认为可信的人建立了终生的关系（同时你也会记住哪些人不是那么值得信任）。而当你走到街对面时，这些友谊可以指引你找到秘密信源。从知情者或退休的知情者那里获得信息的艺术，是新闻工作学不到的。没有什么能比共同的工作经历更能打动秘密信源。你知道从他那里你能得到什么，对方也清楚你会为保护他做什么努力。

萨菲尔甚至认为，新闻评论员比其他新闻工作者享有的自由更多，至少，他们可以有一说一，不必受记者身份的限制而权衡再三。他们担负的义务甚至更多。萨菲尔说："我认为自己参与开拓了一个叫做'有立场的报道'（opinionated reporting）的新领域。它不是通过暗中做手脚、捕风捉影使新闻偏向某个观点；它是通过挖掘新鲜事实，表明（或者至少使人们关注）自己是正大光明地表明政治立场的言论专栏。"

还有一件陈年旧事令《时报》的新同事心存芥蒂，但是在这件事上，萨菲尔曾有意不多做澄清。"还是那件有关'否定一切的扯淡富人'（nattering nabobs of negativism）的事。"萨菲尔回忆道。他指的是自己曾经参与写作了一篇演讲稿，它后来成为重要政治人物公开指责美国媒体的最著名的演讲之一。"这个短语是我 1970 年为副总统萨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在圣迭哥的演讲创造的，这篇指责失败主义者的演讲只是泛泛而论，没有专门针对媒体；但是因为阿格纽之前还发表了一段由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写的演讲，恰好被电视直播，那段演讲痛斥了媒体的'即刻分析'（instant analysis）和其他原罪，人们把我创造的这个押韵的短语（阿格纽大方地把它归到我的名下）和阿格纽对媒体的讽刺挖苦联系在了一起。（我从未试图向人们解释这一事情的原委，因为媒体批评家这个

称号并不会损害我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这段引言也很说明问题。萨菲尔更关心的不是在新同事心目中的形象,他真正关心的是受众的反应。

确凿的事实、属实的结论、不要让意识形态干扰新闻、坦诚地表明立场、诚实,这些都是萨菲尔的用词。简而言之,他之所以长期以来得到承认,是因为和《时报》的同事一样,读者们从他的专栏中发现了能让他们冰释前嫌的东西。他们发现这是一个独立的人,把读者放在首位,对某些理念忠诚,而不是对某个党派忠诚。换句话说,他们发现这个人的人格正是他们所喜欢的那种,是那种会跳进水池救落水儿童的人,是只服从自己以至于会遭到白宫前同事窃听的人。

这些素质构成了新闻工作的第四个关键原则:

**新闻工作者必须独立于报道对象。**

这条原则甚至也适用于言论、批评和评论。新闻工作者必须随时关注的不是中立性,而是独立的精神和思维方式。

像萨菲尔这样的社论和言论新闻工作者并不中立。和其他新闻工作者所追求的一样,他们的可信性也来自相似的追求:准确、核实、更大的公众利益以及使公众知情。"你是否必须同时呈现双方的观点以做到不偏不倚?"萨菲尔答道,"当然不是。不要害怕把那些在人群中实施恐怖袭击、有意杀害平民的人称作'恐怖分子'(terrorist)。这种杀手不应被称为'好战分子'(militant)或'行动主义者'(activist),因为后两者只适合用来称呼政治示威者或狂热分子。也不要把他们称作'持枪歹徒'(gunman),这个词不仅模糊而且有性别歧视。如果过分追求公平,有可能最后就像布利茨(Brits)所说的那样,变得束手束脚(kak-handed—clumsy)"。

萨菲尔还认为,冒牌的公平损害了读者利益。"公平游戏并不意味着在空间和时间上完全相等。当争议中的一方有了新闻——公布了调查结果或主办了活动——记者不一定非要找到反对者并给予同等关注。评论上做到平衡,可以;但是在文章字数或节目时间上追求'平衡',不行。"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第四条原则更多源自实践而不是理论。在理论上,我们既能报道一个事件,也可以成为该事件的参与者,但是在现实中,身陷其中将使新闻工作必须执行的其他任务变得模糊不清。它会使新闻工作者无法从其他角度看问题,更会使新闻工作者难以赢得信源和其他阵营斗士们的信任,同时也难以(如果有可能的话)说服受众相信你把他

们的利益放在了你为之效力的工作群体之上。换句话说，你也可以充当被报道者的秘密顾问或演讲撰稿人，或者从对方那里领取报酬。但是如果认为这不会对报道造成影响的话，就过于自以为是了，甚至可能是过于天真或自欺欺人。因此，正如萨菲尔所承认的那样，因为担心读者或观众产生怀疑，所以要努力做到对他们公平。

## ◉ 思想独立

我们与全国不同领域的新闻工作者讨论，研究他们的动机和职业目标，我们逐渐发现，萨菲尔所说的关键而微妙的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比如在意识形态光谱的另一端，当时供职于《纽约时报》的自由派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曾说，和保守派的差异不仅来自对真实的忠诚，而且来自这种忠诚导致的信仰。“那些后来成为言论专栏作家的新闻工作者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是仍把事实放在首位。英国《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伟大的主编 C. P. 斯科特(C. P. Scott)说：‘评论可以自由，但事实是神圣的。’我们总是由特殊到一般；先发现事实，然后从中得出结论。”刘易斯继续说，媒体“煽动者如安·库尔特或约翰·麦克劳克林(John McLaughlin)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们只关心意见，大声疾呼，党同伐异。事实，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偶尔才需要的东西。他们听从红桃王后[①]的建议：‘先判刑——再定罪。’”[2]

独立精神甚至也影响到像艺术批评或书评那样非意识形态型言论的写作。曾任《纽约时报》舞评家的约翰·马丁(John Martin)说，每当他进行判断和阐述观点时，他都认为自己保持着一种新闻工作者特有的独立。“我认为首要的职责是说明发生了什么，其次才是表达我的观点或解释，如果用尽可能简洁的方式表达的话，就是把具体表演放到整个场景中。我认为这个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新闻报道。”[3]

我们希望上述讨论可以澄清另一个经常让人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近年来变得时髦起来，那就是谁是新闻工作者，谁不是新闻工作者。我们认为这是个错误的问题。应该问的不是某个人是否可以被称为新闻工作者，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是否在从事新闻工作，在工作中是否坚持真实

---

① 红桃王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人物，率领一群扑克牌士兵，容易动怒，动辄宣判砍别人的头。

性原则，是否忠于大多数公民和社群，是否传递信息而不是操纵受众？正是这些观念把新闻和其他传播形式区别开。以比较流行的博客为例，从上述关系看来，博客仅仅是一个平台。写博客既可能是新闻工作，也可能是政治行动。博客既可能成为谎言的交换市场，也可能成为深刻的学术讨论。问题不在于博客里是否出现某个信息。问题在于工作的性质。不要找错了关注对象。

我们得到的重要启示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意义在于，它们属于每个人。但是传播和新闻并不是可以互换的两个概念。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工作者，但并不一定**是**新闻工作者。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是否有记者证或受众。菲尔·多纳休（Phil Donahue）在我们的一个论坛上说，那个走进切尔诺贝利的酒吧说“那东西爆炸了”的人，在那一刻就是记者。如果他不是传播流言，而是在报道目击的事件或者报道调查的结果，就是在从事新闻工作。萨菲尔说：“新闻事业有许多不同的空间，既有容纳客观报道和深思熟虑的解释性报道的空间，也有容纳具有严重党派倾向性的过激社论和攻击性电视评论的空间，还有属于企业期刊编纂者和网络信息传播者的房间。此外不要忘了给那些明确自称为新闻报道言论作者的人（reportorial opnionmonger）留间宽敞的壁橱。”

能理性地分辨言论性新闻工作者和党派宣传家之间的区别是一回事，能遵从这一区别而不越界则是另一回事。知易行难。人情、环境及奉承都会引诱言论作者越界。

玛吉·加拉格尔（Maggie Gallagher）的例子十分具有启发性。在1997年我们组织的一个论坛上，当时任环球新闻辛迪加（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和《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专栏作家的加拉格尔是我们遇到的在言论记者和活动家加宣传家这两种身份之间游刃有余且最善言辞的思想者之一。加拉格尔当时说：“我用三个标准随时提醒自己保持新闻工作者（持有某种观点的新闻工作者）的底线。第一个是始终追求真相……我从不向读者提及我认为不真实的事情。”[4]

她提出的第二个标准是：“一个人既可以成为党人、言论新闻工作者，同时依然可以公平对待那些持相反意见的人。这与对受众的责任感有关。”因此必须“对读者开诚布公，向受众说明你的观点和倾向……这是新闻工作者与宣传家的不同之处。我不想操纵受众。我希望向他们揭示或描述我所看到的世界”。

加拉格尔说，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和政治集团保持距离：

> 我认为，做诚实的新闻工作者和忠于某个原则或事业，这两者可以兼得。但是做诚实的新闻工作者和同时忠于某人、某政党或小集团，是不可兼顾的。为什么我这样认为？这与我的基本信仰有关，我认为新闻和个人对真实的认知密切相关。一个人可以相信某些事情、观念、措施对美国有利并且公开表明这些观点。但是人民才是你的受众，忠于政党、个人或小集团则意味着你不会把向人民说出真相作为首要考虑。这会导致在忠诚问题上存在根本冲突。

在本书第一版里，我们被加拉格尔说的这些区别深深打动，并把它安排在了本章开头加以强调。然而，2005 年，有人揭露加拉格尔违背了自己提出的原则。

《华盛顿邮报》的媒体批评家霍华德·库尔兹（Howard Kurtz）揭露，加拉格尔曾经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签订了一项 21 500 美元的合约，答应为该部写东西。库尔兹写道，加拉格尔的工作是宣传布什总统的婚姻措施（marriage initiative）是强化家庭关系的措施。她的这项合约跨越 2002 年的 10 个月，包括为该部一位官员起草一篇杂志文章，写作说明小册子以及情况简介。这篇报道还揭露，布什政府教育部付给保守派评论员阿姆斯特朗·威廉斯（Armstrong Williams）超过 24 万美元，让他宣传布什的“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No Child Left Behind）计划。这一曝光导致威廉斯失去了在报纸的专栏。

加拉格尔说，她认为自己的情况与威廉斯不同。她写道：“我是一个婚姻专家。我从事与婚姻问题相关的写作、编辑、调查和教育，以此为生。如果一个学者或专家因为替政府工作而获得报酬，当他或她写论文、散文或报纸评论时涉及和工作中完全一样或类似的题目时，是否要向人们说明自己为政府工作这一事实呢？如果这也是道德标准的话，请恕我无知，这是个全新的标准。”[5]

事实上，这并不是新标准。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新闻工作，它都是传统标准：如果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必须告诉读者，如果这一说明会令人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就不要接受这项工作。加拉格尔没有说明这一点，事实上暗示着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这会损害她的独立性，而独立性对自称新闻工作者的人来说十分关键。她的角色冲突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恰好说明要达到这一标准是多么困难。

## ◉ 独立性的演化

古希腊的哲人们已经知道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他们提出，有组织的社群需要进行某些政治活动。正是在严峻的政治事件的磨炼中诞生了第一批期刊，邀请广大公众参与到将会影响其生活的政治决策之中。

正如在第 3 章忠于公民那一部分中提出的那样，过去 300 年的新闻事业史经历了由忠于政党转向忠于公众利益的变化过程。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凯瑞写道："从新闻的角度看，20 世纪可以被定义为民主对抗宣传的世纪，'客观的'和'独立的'媒体在这一抗争中责无旁贷，出力不小。"[6]

本质上，媒体由忠于政党转向新的契约关系——新闻里不再隐藏秘密的议题。过去，社论和政治言论基本上混杂在一起，有时甚至和头版新闻混杂在一起；现在，它们在版面和归类上都有明确的区分。从这些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简单决定中，逐渐产生了目前新闻伦理的大部分标准，尤其是有关记者政治立场的原则。

整个 20 世纪，随着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化以及城市报纸竞争对手减少，幸存下来的媒体必须照顾更广大的受众，电视新闻机构也面临着相似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上述伦理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在 21 世纪，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独立的观念是否会受到削弱。在本世纪开始的时候，新闻独立的观念受到侵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技术的出现及随之而来的新型竞争，使得全国性的小众市场得以发展，并且在经济方面具有了较强的吸引力。这些趋势导致大众市场式微，但是在过去，正是大众市场在经济方面的潜力才促成了独立新闻事业的出现。

## ◉ 行动独立

新闻独立的规则经过历史的发展，不断完善和强化，以至于今天通常规定记者和编辑不得参加像公共政治集会这样的政治活动。例如 1989 年，《纽约时报》的高等法院记者琳达·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就因为参加了支持堕胎的"自由选择"游行而受到批评。她称自己是匿名参加行动的，并且没有使自己被大众关注。事后她说："我只是另一个穿蓝牛

仔裤和夹克衫的女性而已。”但是《时报》认为她参与游行损害了她在新闻报道中的形象，对她提出了正式批评。[7]

格林豪斯事件正好发生在新闻界因被指责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而对这一指责十分敏感的时期。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政治论争的特征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部分原因是活跃的保守派智库网络把一些新观念注入了公共辩论。从副总统萨皮罗·阿格纽将华盛顿的新闻工作者称为“否定一切的扯淡富人”以来，共和党议员指责媒体具有偏见的声音越来越大。

到 1991 年，报纸在新闻工作者参加党派政治活动方面制定了严格规则。华盛顿州塔科马的《新闻论坛晨报》(*Morning News Tribune*)记者桑迪·纳尔逊(Sandy Nelson)，因为协助组织该市反对性取向歧视的全民投票，被调离教育新闻报道岗位，转到了文字编辑部门。爱荷华州费尔菲尔德的《每日明细报》(*Daily Ledger*)发现两个编辑建立反对堕胎组织后，开除了他们。爱达荷州刘易斯顿的《论坛晨报》(*Morning Tribune*)和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汉普郡每日新闻报》(*Daily Hampshire Gazette*)都阻止工作人员参加支持或反对海湾战争的示威游行。[8]10 年之后，人们仍会对新闻工作者参加政治行动皱眉头。2004 年，《旧金山记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两位女记者在市政厅结婚后，被调离了报道同性恋婚姻的工作岗位。

博客之类的新兴出版平台的出现，使得关于新闻工作者私人领域言行标准的讨论变得更加激烈。2004 年 4 月，雷切尔·莫斯泰勒(Rachel Mosteller)因为写博客而被《达勒姆先驱太阳报》(*Durham Herald-Sun*)开除，她在名为“讽刺记者”的博客里，提及了自己在新闻编辑部的经历。2006 年 1 月，《多佛邮报周刊》(*Dover Post*)的记者因为在博客里贬低那些争取被报纸报道的人而被开除。

## ◉ 重估独立性

即使独立规则在过去十年间变得越来越严格，仍然不断有人挑战(或违反)它们。

2003 年 3 月伊拉克战争开始，保守派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在专栏中反对美国必须等到盟友同意后方可入侵中东的意见。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说明等待批准是愚蠢的，威尔大段引用了英国上议院

议员兼报纸所有者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的演讲。布莱克在演讲中说,美国之所以拥有最成功的外交政策,是因为其目标不受任何威胁,如果面临威胁,它就清除威胁。

但是威尔在专栏里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多年以来,他一直受雇于布莱克,担任后者的报业公司——霍林格国际(Hollinger International)的国际顾问。《纽约时报》说,威尔每次出席该公司的会议,就可以得到2.5万美元;威尔说自己也记不清出席了多少次会议。威尔所在的报业辛迪加——华盛顿邮报作家群(The Washington Post Writers Group)也不知道这一冲突。当《时报》问他是否应该告诉读者从布莱克那里拿钱这一事实时,威尔回答说:"我的工作是我自己的事,明白吗?"[9]

康拉德·布莱克事件并不是威尔第一次违规。1980年,威尔曾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的坚定支持者,他担任里根的演讲教练,为里根和吉米·卡特总统的竞选辩论做准备。威尔在辩论结束后,就以ABC评论员的身份到电台做节目,为里根的表现欢呼,称赞里根在压力之下"表现一流"。

类似的秘密政治家顾问不可胜数。比如沃尔特·李普曼曾为不同的总统写过演讲稿,其中包括林登·约翰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则也有所改变,李普曼的秘密顾问经历后来被发现,他的名誉也受到了影响。

威尔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专栏作家继续说他对此毫不在乎。当他培训里根的新闻最终浮出水面的时候,威尔却称批评者是吹毛求疵。他说:"新闻事业中(和其他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公共服务领域一样)如今充斥着一些'手拿道德温度计'的人,迫不及待地测量他人的体温,就像那些缺乏明确道德标准的人一样,杞人忧天,混淆视听。"[10]

威尔提出论点和意识形态无关。相反,他另有所指(来自不同意识形态的人都可能赞成他):新闻道德或伦理是主观的,缺乏正当性。

但是威尔的论点里存在一个问题,正是这个问题能够说明为什么独立性的概念根植于实践比根植于理论更重要。威尔一直对辅导里根一事守口如瓶。他不愿意告诉读者,在他的协助下里根总统所进行的表演,正是他后来热情洋溢地进行评论的对象。

威尔所做的事情虽然并不新鲜,但是它会继续损害新闻工作者在政治活动中的可信性。2000年总统选举中,《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经常作为评论员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对候选人的立场、策略和机会进行评价。在整个选举期

间，他始终把自己塑造成中立者。但实际上，他是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非正式顾问和支持者。和威尔一样，他也试图掩盖自己的真正身份。

类似地，2005 年布什政府为了第二届总统宣誓仪式的演讲稿，咨询了许多新闻工作者，其中就包括克里斯托尔和辛迪加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这两位新闻工作者都证实，自己在宣誓演讲前见过相关政府官员，但是他们说这只是非正式讨论，内容只涉及政府政策，不是为演讲作准备。对向政府提供意见的行为他们没有歉意，并告诉《华盛顿邮报》，这是评论员的正当行为。[11] 克里斯托尔和克劳萨默在演讲结束后，都赞扬了总统的演讲。

在他们的辩护中，还有另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当他们把自己看做内部人士时，觉察不出这里有什么问题，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看到了真相。作为一般规则，任何类型的政客（我们可以打赌）都不会对新闻工作者可能对演讲所做的实际修改真正感兴趣，因为已经有太多作者参与其中，政客真正感兴趣的是让新闻工作者认为自己的修辞和智力充满魔力，以至于他们能够担任顾问。换句话说，这些商量与其说是真的想让他们对演讲做出贡献，还不如说是试图引诱新闻工作者，以保证得到对自己有利的报道。

除此之外，新闻工作中精神和思想独立的观念还面临着其他有力的挑战，值得我们一一进行检查。

第一个担忧是害怕新闻独立已经走上歧路，发展为自我禁锢和封闭，与整个社会隔绝。正如后来加入克林顿政府的前《旧金山记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记者埃利奥特·迪林格（Elliot Diringer）向我们的研究合作者所说的那样："这个观念意味着应该做到超然事外……如果你是新闻工作者，就应该从公共事务中退出。我发现这很麻烦。我不明白为什么做热心的公民一定要与做记者相对立。"[12]

有两个大的思潮与这种认为新闻编辑部变得远离和疏远公众的论调同声相应。第一个是公民新闻运动，正如我们在讨论忠于公众一章中提到的，该运动主张新闻不仅要指出问题，而且要检验各种可能的答案。但是该运动的倡导者却没有发现，如果这一主张得到了认真实施，就等于抛弃了新闻的独立原则。批评者则提出，因为认同于某一结果，这会让新闻工作者看起来更像是鼓吹者（advocates）。我们要谨慎对待这种角色分裂。

另一个回应主要利用了公众对新闻的不满情绪，提倡抛弃独立原则，站在对立双方的一方进行报道，以此吸引受众。党人摇身一变而为“媒体人”，成为谈话节目主持人、评论员、广播电视的嘉宾。通常他们以独立专家自居——他们的身份是前联邦检察官、法学专家或其他中立的专业人士——事实上，他们是政党的代言人。他们最好被称为“媒体活动家”(media activist)。我们在第 7 章讨论新闻的公共论坛功能时会谈到，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专家，只是装腔作势，通常，他们并不重视其言论的准确性。这些党人与其说是在表达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不满，不如说是在利用这种情绪。伯克利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浦·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调查了 250 多个以专家或评论员为职业的人。这项长达 20 年的研究的目的是评估这些专家的各种预言是否得以实现。结果显示，这些专家是些失败的预言家。如果当初他们平等地考虑过各种可能结果的话，情况可能会稍好一点。[13]

说明该现象的最好例证可能来自右翼势力，保守主义媒体大鳄鲁珀特·默多克创造了福克斯新闻(Fox News)，整个新闻网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言论及政治意识形态。私下里，福克斯内部的新闻工作者认为，他们通过播出保守主义节目来创造平衡。当然，这种看法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

但是，在公开场合，福克斯提出的观点却更微妙，可能也不够坦诚。福克斯新闻的总裁罗杰·艾尔斯之前是政治运营专家和广告制作人，他的顾客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布什。在他的指导之下，福克斯小心翼翼地给节目加上了独立的伪装。例如福克斯新闻第一个市场宣传计划的口号就是“我们报道，你来决定”(We report, you decide)，后来这个口号又被“公正和平衡”(Fair and Balanced)代替。这与赫斯特、普利策的手法如出一辙，不是宣传自己是什么，而是把公司想要的形象灌输给公众，希望公众把它看成准确、公平的化身，而不只是一个可能提供可信信息的来源。它希望每个受众觉得福克斯很公道。如果你喜欢我们，不是因为你赞同我们的观点，而是因为我们更准确、更全面。

同样，这一思潮偏离了美国新闻界传统的市场诉求。该诉求产生于 19 世纪中期，并在 20 世纪不断发展。它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之上，因为独立是新闻可信性的根本。它采用中立的口吻，不偏袒任何一方，并声明代表公众，用怀疑的眼光监督任何权力的行使。

但是新兴的美国政党媒体则只是一味强化受众的成见，而不监督权

力。我们最好把它称为肯定新闻(Journalism of Affirmation)。它与美洲殖民地时代以及19世纪早期的传统政党媒体有所不同,传统的党报受党派控制,其目的是宣传政治议程,说服甚至教育受众。但是新兴的肯定新闻只是作为公司战略而存在:政治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已。

同样重要的是区别言论新闻工作和党人的新闻报道。言论新闻的代表是威廉·萨菲尔和为《标准周刊》以及《国家周刊》(*The Nation*)工作的安东尼·刘易斯,党人新闻的代表则是福克斯的新闻节目。党人的信息传播还包括博客,其中大部分和早期新闻工作者很像,言说的对象是和作者想法一致的人,目标是让犹豫不决者皈依该党派。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公开自己的意图,同时遵守其他新闻工作者的所有原则。后者看上去是在传播中立的信息,但是却使用看似平衡的语言和形式干着另一个勾当——某种宣传工作。

这一区别有着十分重要的暗示。言论新闻工作者在公开意图的同时,也公开了对一系列理性原则的忠诚,这些原则高于小团体或党派。乔治·威尔称自己是美国托利党人,威廉·萨菲尔则称自己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安东尼·刘易斯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维克多·纳瓦斯基(Victor Navasky)称自己是进步主义者。当权力机构或个人背离了这些理念,言论新闻工作者常常立刻批评那些过去的志同道合者。而肯定新闻虽然宣称公平、平衡和中立,却缺乏这种机敏和坦率。

这两种人还有另一个差别。言论新闻工作者,不论是保守的专栏作者还是自由主义的专栏作者,基本上都不报道新闻,只是解释新闻。他们的新闻来自别处。当言论新闻工作者涉足新闻报道时,不会声称这么做已经越界,自己主要关注的应该是评论和解释。

肯定新闻在新闻报道问题上的看法十分冒险。福克斯的成功,以及以人民为幌子的能说会道之徒如拉什·林博的成功,对新闻界影响不小。他们向政治代理人或名人大开方便之门,有时甚至对二者同时开放。1997年CBS新闻尝验性地邀请前纽约议员苏珊·莫利纳里(Susan Molinari)主持一个早间新闻节目。ABC则聘用前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乔治·斯蒂芬诺普罗斯(George Stephanopoulos)为评论员,报道和总统有关的政治新闻。他在该节目中对以前在白宫工作时的服务对象——副总统戈尔进行过报道。后来,斯蒂芬诺普罗斯成为周日早间新闻谈话节目的主持人。

这些主持人露骨的偏见并没有违反准确的观念，因为这种罗生门[①]式的偏见（不存在什么准确性或真相）不容易避免，所以已经成为借口。对某些人来说，“有观点才有信息”的观念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这种新闻不需要任何职业约束或技巧，甚至不需要理想主义。这种观念过于绝对，就像对纯粹市场经济的信仰，接近于这种观念：任何感情只要足够强烈就是合理的。

新闻工作者身份的模糊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改变了人们对报道双方的人际关系的态度。比如《纽约时报》即使知道托德·珀德姆（Todd Purdum）与前白宫新闻秘书迪伊·迪伊·迈尔斯（Dee Dee Myers）有亲密关系（后来他们俩结婚了），仍然允许他去报道克林顿政府。如果在几年前，《时报》根本不会容许发生这样的事情，而现在这种做法甚至没有引起任何议论。一代人以前，人们发现《时报》记者劳拉·福尔曼（Laura Foreman）与一位她正在报道的腐败政客相恋。她被《时报》雇用后，这段恋情才曝光。《时报》的执行总编阿贝·罗森塔尔（Abe Rosenthal）说了一句名言：“只要你不报道马戏团，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和大象睡在一起。”相比之下，迈尔斯和珀德姆的关系如此公开，以至于以白宫为题材的电视剧《白宫群英》（*The West Wing*）竟把此事作为充满吸引力且明显可以接受的次要情节加以再现。既然如此，为什么 CNN 的首席驻外记者克里斯蒂安妮·阿曼普尔（Christiane Amanpour）在报道 90 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时就不能和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詹姆斯·鲁宾（James Rubin）订婚（后来结婚）呢？

和福尔曼的案例不同，在当代媒体文化里，因为向社会公开了他们的关系，迈尔斯和珀德姆，或者阿曼普尔和鲁宾的情形就比较容易被社会接受。但是这样就可以了吗？从道理上讲，任何人都能报道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甚至亲密关系的对象吗？这种行为怎样才能和首先忠于公民的职业责任保持一致？

信息披露固然十分重要。作为公民，我们有资格知道该记者是否与他或她正在报道的某个问题或某个人物有密切关系。但是在听取了新闻工作者和担心此事的公民的意见之后，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仅做到个人

---

① 《罗生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 1950 年拍摄的著名影片，该片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中》。影片中不同的角色对同一杀人事件做出了不同版本的叙述，最后无法断定真相究竟是什么。后来罗生门成为形容多重（不确定）真相的代名词。

信息披露还不够。就像萨菲尔、刘易斯和其他言论作者理解的那样，为了清楚地看问题并做出独立判断，个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至关重要。

当然，由于目前妇女进入职场和上班族夫妻的增加，类似的冲突会更加普遍。考虑到妇女进入职场的价值，人们对于社会角色重合的宽容度有所增加，不愿立即指责这类现象，导致该问题愈加严重。但是，原则并不会因为挑战的增多而改变。

解决方案似乎也并不像被困扰的当事人想象的那么复杂。珀德姆可以换到另一个报道专线，鲁宾或阿曼普尔也可以调换岗位。事实上，在一个质疑新闻工作者专业性的公民不断增多的时代，强调对独立性原则的支持，等于向多疑的公众明确表明新闻机构将严肃对待自己的责任，愿意以自己的不便、难堪、偶尔的牺牲和不快乐为代价，努力遵守这些原则。

## ◉ 独立于阶层和经济地位

独立的问题不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事实上，意识形态的问题可能比其他领域的问题更容易处理。正如第 4 章谈到核实问题时提到，在解决倾向性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明确的报道方法。但是，为了充分理解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有必要看看其他类型的冲突和互相依赖问题。

随着新闻工作者职业训练的增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且在某些时候收入也有所增长，产生了另一个与独立相关的问题。在一次热心新闻工作者论坛上，当时为《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写专栏的胡安·冈萨雷斯(Juan Gonzalez)对我们说："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人民感到在新闻、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横亘着一道阶层鸿沟。这条鸿沟说明存在着一个针对大多数美国人的阶层偏见，不论对方是保守派、中庸派还是自由派，都难逃这一偏见：如果他们是劳动阶层并且生活贫困，就被认为对社会无足轻重。我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偏见。"[14]

前《华盛顿邮报》的内部调查员(ombudsman)[①]、已故的理查德·哈伍德(Richard Harwood)在同一论坛上对此看法表示赞同："作为认知精英中的一分子，新闻工作者从同伴那里学到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偏见。他们的工作是为了适应和满足这一新兴上层阶层的品味与需求。我必须

① 有的报纸也称公共编辑，见第 1 章译注。

说，有大量证据说明主流媒体把自己的未来押在了这一阶层身上，因为主流媒体也在向社会上层流动……抛弃或失去了低收入的劳动人民。”[15]

汤姆·明纳里(Tom Minnery)过去是新闻工作者，后来成为以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为基地的福音会组织——关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的副会长。他在另一个论坛上对我们说，阶级偏见促进了新闻商业化。他提出：“报道的方向……偏离了美国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美国，1%的人口占有日常交易股票的35%。如果看电视晚间新闻或报纸，你会认为我们都坐在家里关注CNBC频道屏幕下方的滚动实时股票行情。”他还说，如果看电视网的早间节目，“会看到大量有关电脑展(Comdex show)[①]上的最新小电器的可爱的细节的报道，而实际上全美只有12.5%的家庭拥有带调制解调器的计算机。商业推销和新闻报道现在已经紧密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甚至再也看不清它们之间的界线在哪里”[16]。

许多新闻公司都把精英人群作为战略目标受众，该策略强化了潜在的阶层隔绝。该现象曾经，也将继续对所有新闻工作构成威胁。人们越来越将新闻媒体看成是陌生疏远的已有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而不是代表公众的社会公器。

然而，消除阶层隔绝并不意味着否定独立概念。解决之道在于把更多来自不同阶层、文化背景和利益群体的人吸收进新闻部，同与世隔绝的孤岛状态作斗争。具有不同视角的人合作完成的新闻远胜于各自为营生产的新闻。

或许正如一些新闻工作者建议的那样，应该建立一个系统，招募具有不同生活经验的人进入新闻界。“如果我们打算改变新闻工作人员的构成状况，就应该建立某种项目，吸收在其他领域有工作经验的人员……(并且)给他们提供机会，帮助实现阶层的多样性。”冈萨雷斯说。[17]

## ◉ 独立于种族、民族、宗教和性别

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新闻有必要进一步反映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像美国新闻编辑协会等行业群体为报纸树立了全行

① COMDEX，Computer Dealer's Exhibition的缩写，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脑展之一。第一届COMDEX于1979年举行。

业的多样性目标。各新闻机构修改了风格手册，彻底清除了带有种族主义的语言。然而直到今天，报界仍然未能实现该目标。我们将在个人良知的原则部分讨论，如果把多样性的意义仅仅狭隘地理解为民族、性别或其他量化指标，这个概念仍然存在问题。这些指标是实现多样性的必要手段，但不是多样性的目标。

然而在多样性问题之中还有一个议题值得我们先搞清楚。它就是民族和性别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身份或专业性画上等号。我们是否赞同只有非洲裔美国人才能胜任报道非洲裔美国人，或只有亚裔美国人才能胜任报道亚裔美国人，诸如此类？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难道不应该能报道任何事情吗？

非裔商业管理人员彼得·贝尔(Peter Bell)说："多样性的争论，核心问题是表征(或再现)问题，其前提假设是，只有同种族或同性别的人才有相似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们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感同身受。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忽略或者弱化了阶层、教育程度、地域、家庭背景、个人心理、宗教信仰等因素对个人观念和信仰的影响。……种族和性别等可观察的特征……常作为一类人的代表，但我却要说，对于人类思想而言，这些代表过于原始粗糙……在任何特定问题上，黑人应该是什么立场？当然，答案是根本不存在这么一种立场。"[18]

许多新闻工作者，甚至包括属于少数群体的新闻工作者，都提出了相似的疑问。多次得奖的电视和广播通讯记者约翰·霍肯伯里(John Hockenberry)是个身体不便的残疾人，他说："简单说吧……你觉得保证新闻编辑部里有一个亚裔、一个黑人和一个坐轮椅的，就有资格自吹实现了多样性，这其实和根据人口统计学分布来决定报道内容没什么区别。你可以根据人口统计学指标来制定赢利目标，但是绝不可能让它决定报道内容……雇用什么人当记者并不是多样性的衡量指标，了解受众才是，你必须真诚地对所有受众感兴趣，不论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不论他们属于哪个经济阶层。"[19]

这些批评触及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背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工作？如果编辑仅仅根据民族或皮肤颜色来决定谁来报道什么新闻，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或民族的刻板印象吗？这种做法暗示着存在一种所谓的单一的黑人视角或单一的亚洲人视角。

在严格的新闻编辑部人员构成比例和新的"政治正确"教条之间，还存在一大块富饶的地区可以开发。已经有充分证据说明，缺乏多样性的

新闻编辑部无法圆满完成其工作。他们会错过新闻。他们的报道存在漏洞。《芝加哥论坛报》的克拉伦斯·佩吉(Clarence Page)回忆道："北伊利诺伊的编辑恳求去掉(关于少数民族的报道)，他说在自己居住的城里确实没有多少少数民族人口，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他所在的城市有17%的人是南美人——17%……威斯康星农村的编辑告诉我，他所在地区真的没有少数民族，但是沿着报社前的大路往北就是一个很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20]

传统上对新闻的狭隘定义就是很好的证据，足以说明个人的视角会导致偏见。媒体公司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聘请了梅纳德研究所(Maynard Institute)这样的组织，通过工作坊的形式，帮助媒体进一步了解所有受众关注的问题，并帮助新闻机构扩大信息来源。

如果接受了种族问题十分重要这样的观念，我们又如何调和它与保持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呢？毕竟无法完全避免个人观点的影响。

在讨论党派独立那部分曾暗示，新闻工作者可以做到既不完全排斥个人经验的影响，同时又不否定独立的观念。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对新闻核心原则的忠诚，这种忠诚建立在对公众真诚和告知公众的基础上。就像处理政治意识形态一样，问题不在于是否保持中立，而在于是否故意为之。保持党派独立的要求不应阻止新闻工作者将不同文化和个人经历带入新闻工作。不论在新闻工作者一词前面加上什么样的形容词——佛教徒的、非裔美国人的、残障的、同性恋的、拉丁裔的、犹太人的、中上层新教白人的(WASP)，甚至自由的或保守的——它们都是些描述而不是限制。他们首先是新闻工作者，同时又是佛教徒、非裔美国人、保守主义者——而不是首先是佛教徒，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当涉及相关报道时，种族、民族、宗教信仰、阶层和意识形态背景给他们更多信息，而不是支配其工作。

记者霍肯伯里怀疑身体残疾给自己带来了不利影响，他的经历证明了我们提到的观点。霍肯伯里曾经避免报道"关于残障人士的新闻"，但是后来他逐渐领悟到他能够为这些新闻做出什么贡献。"我刚到《日线》(*Dateline*)的时候，制片人来到我面前说，我们想做个新闻，用偷拍机，是关于残障人士的工作与求职的……虽然我个人并不想被划作残障记者，但我对他说的是，就我所遭遇过的被歧视的经历来看，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定论的。我遇到过那些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的人，或许

他们做出了某种决定，但我永远无法真正弄明白……这些决定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

“这个青年（制片人）是个叫乔·芮（Joe Rhee）的韩裔美国人，他对我说：‘约翰，歧视并不发生在你在场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你离开之后。这就是为什么要偷拍的原因。’”[21]最后完成的新闻显示，在每次暗访中，招人的公司都拒绝了截瘫的应聘者而雇用了另一个没有残疾的应聘者。“我们新闻编辑部一起合作、集思广益，做出了这则很有影响的新闻。”霍肯伯里说。

霍肯伯里的经历说明，新闻部的目标不仅仅是创造数字上的多样性——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残障记者独立报道，这则新闻就可能不会完成。新闻编辑部多样性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种氛围：人人都坚守新闻独立的思想，同时又集中集体智慧、群策群力。把不同的经验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出比任何个人独立完成的新闻更丰富的新闻。最终，这些新闻又会使公众对于世界的看法变得多样和全面。

新闻工作者要忠于社会。其模式不是超然世外，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新闻工作者的角色以特殊的参与为基础——投入到告知公众之中，但却不是作为活动家直接参与到行动之中。这可被称为“参与的独立”（engaged independence）。

《坦帕论坛报》（*Tampa Tribune*）执行总编吉尔·西伦（Gil Thelen）对该角色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他对把新闻工作者与社群重新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新闻理念十分着迷，与此同时，为保护新闻工作者的独立，他也和出版人进行斗争。因为对新闻与商业利益不能彼此分离感到不满，最终他离开了奈特—里德集团旗下的报纸。

西伦把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描述为“负责任的观察者”。西伦解释说，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新闻工作者不能离开社群。新闻工作者与公民的需求“互相依赖”。如果我们镇上有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且本地机构已经对此进行了调查，“作为观察者，我们有责任对调查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长期跟踪报道”。随意地关注一下这个事件或因为它看似没有新闻价值而忽略它，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西伦提出，新闻工作者应该致力于帮助解决问题，解决方法就是扮演好负责任的记者的角色。

西伦的想法与其他一些新闻工作者的说法不谋而合，他们提出新闻媒体应该创造一种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理解方式，或者扮演黏合剂的角色，定义社群并把社群凝聚在一起。这也是许多新闻工作者对“参与的独

立”这一角色的恰当解释。

佛罗里达的《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Sarasota Herald-Tribune*)甚至制订了颇具创造性的“读者代表”(Reader Advocate)的计划,试图保证记者在保持独立的同时不至于变得与世隔绝。该机构的每个新闻工作者都要作为读者代表工作一周,接听读者电话,把意见传达给适当的记者或编辑,并且记录每个投诉或建议电话的内容。

虽然该报花了三年时间才让所有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岗位上轮换一遍,但是当时的总编詹妮特·韦弗(Janet Weaver)相信这是值得的。她的下属说,仅仅是倾听公民对报纸的反响就会更加意识到自己与社区民众的关系。韦弗说:“当一些人的名单被呈报上来时,我有些担心。我知道他们平时怎么对待我,所以很想知道他们会如何对待公众。”他们在办公桌的另一边安排了一个人观察读者代表,而且会给每个月当班的四个记者一些资料,以供参考。

其他新闻工作者也用自己的方法检验自己能否保持思想独立。《费城问讯者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前首席政治记者保罗·泰勒(Paul Taylor)使用前后对比法。如果泰勒被分配报道需要进行大量采访的新闻,一般会在采访前拟一则导语。在报道快结束的时候,泰勒会对比自己先后写下的两则导语。如果它们很相似,他就能知道自己在报道过程中没得到什么新东西,可能是自己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也可能是他只是在重复自己的先入之见。

当然,再严格的措施都无法防止个人的或思想的影响介入,无法保证新闻工作者始终独立于政治团体、政治或其他因素。最终,只有良好的判断,加上恪守首先忠于公民的原则,才能使新闻工作者独立于党派。拥有自己的观点不仅是允许的、自然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任何优秀的记者在报道新闻时都应该保持天生的怀疑和不信任。但是新闻工作者必须聪明和诚实,当他将所持观点用于新闻报道中时,能认清这一观点确实是基于确凿的材料而不是个人信仰。信任某个人或信任某群体,与新闻报道的质量没有关系。新闻工作是以报道、学习、理解和教育为基础的行业。如果给探索过程设置障碍,最终会导致对公众不忠。

当我们思考下一个新闻原则——监督者(看门狗)角色时,独立的重要性将变得更加明显。

## 注 释

[1] William Safire, in a note to author Kovach, April, 18, 2006. 下文中萨菲尔的引语都来自同一记录。

[2] Anthony Lewis, in a note to the authors, October 10, 1999.

[3] John Martin, in William L. Rivers, *Writing Opinion: Review* (Ames, I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8.

[4] Maggie Gallagher, at CCJ Forum, New York City, December 4, 1997.

[5] Maggie Gallagher provided this defense in one of her columns titled "A Question of Disclosure," January 25, 2005; available at www. uexpress. com.

[6] James Carey,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ed.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 Warren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233.

[7] Carol Emert, "Abortion Rights Dilemma: Why I Didn't March—A Reporter's Struggle with Job and Conscienc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1992; available at www. washingtonpost. com.

[8] Cassandra Tate, "Outside Activities: When Does a Journalist's Personal Opinion Become a Public Issu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rch/April 1991), 13—15.

[9] Jacques Steinberg and Geraldine Fabrikant, "Friendship and Business Blur in the World of a Media Baro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2, 2003; available at www. nytimes. com.

[10] Mary McGrory, "Casualty: George Will Finds Being a 'Stablemate to Statesmen' Can Cost," *Washington Post*, July 12, 1983.

[11] Howard Kurtz, "Journalists Say Their White House Advice Crossed No Lin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9, 2005; available at www. washingtonpost. com.

[12] Elliot Diringer, interview by William Damon, Howard Gardn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13] Louis Menand, "Everybody's an Expert,"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5, 2005, 98—101.

[14] Juan Gonzalez, at CCJ Forum, New York City, December 4, 1997.

[15] Richard Harwood, at CCJ Forum, New York City, December 4, 1997.

[16] Tom Minnery, at CCJ Forum, Ann Arbor, MI, February 2, 1998.

[17] Gonzalez, at CCJ Forum, New York City, December 4,1997.
[18] Peter Bell, at CCJ Forum, Ann Arbor, MI, February 2, 1998.
[19] John Hockenberry, at CCJ Forum, Ann Arbor, MI, February 2, 1998.
[20] Clarence Page, at CCJ Forum, Ann Arbor, MI, February 2, 1998.
[21] Hockenberry, at CCJ Forum, Ann Arbor, MI, February 2, 1998.

# 第6章

# 监督权力并为无声者发言

1964年，新闻界最令人梦寐以求的奖项——普利策奖把一个新设的奖项颁给了《费城公报》(*Philadelphia Bulletin*)。该奖是为了奖励该报揭露了费城警察参与了多起诈骗活动——一种非法的彩票游戏。该报道预示着新一波调查警察腐败的潮流将在美国各城市兴起。该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印刷媒体正式承认，美国新闻业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普利策奖的这一新奖项叫作“调查性报道”。来自全国的报纸管理人员在评选这项由哥伦比亚大学资助的奖金时，去掉了一个他们认为不再需要专门褒奖的奖项“本地报道”(Local Reporting)，而代之以这个新的奖项。他们开始强调新闻工作者作为政治活动家、改革者和揭露者的新角色。

通过建立这个奖项，新闻界正式承认了那些年来在新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努力之下不断出现的新的报道方式。来自波特兰的华莱士·特纳(Wallace Turner)和威廉·兰伯特(William Lambert)，以及芝加哥的乔治·布利斯(George Bliss)等记者复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基本消失的追查及揭露腐败的报道传统。在战争期间，像斯克里普斯·霍华德(Scripps Howard)通讯社的特稿记者厄尼·派尔(Ernie Pyle)这类善于写故事的记者引领报道潮流，他们作品里坚强的英国人民、淳朴而英勇的美国士兵激起了盟军的英雄主义精神。但是1964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8年后，当《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伍德和卡尔·伯恩斯坦配合其他机构揭露尼克松政府水门丑闻时，调查性报道突然名声大振，充满了吸引力，并改善了该行业的形象。

整个新闻界面目一新，尤其是华盛顿的新闻工作者。时任《纽约时报》执行总编的罗森塔尔(A. M. Rosenthal)对于《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

件报道中独领风骚感到忧心忡忡，他命令重组华盛顿分局，建立了正式的调查记者团队。只要罗森塔尔在位一天，华盛顿分局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就会像局长的位置一样稳固。CBS 新闻开设了自己的调查性新闻节目《60 分》，该节目后来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电视网新闻节目。地方台的电视新闻也不甘落后，不久也纷纷组建自己的调查新闻队伍或“调查小组”(I-Teams)。

一些守旧者开始报怨。他们不满地说，调查性报道只是一个廉价的概念，并不代表优秀的新闻报道。其实所有报道最终都是调查。那种认为调查性报道的质量一定高于其他报道方式的看法确实有些过于简单，然而这种评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一定道理。普利策奖委员会在 1964 年正式认可的这种方式其实是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传统报道方式。

调查性报道起源于最早的定期出版物，起源于自由报刊和《第一修正案》最初的理念，也起源于新闻职业发展历程中新闻工作者的动机。这些根基十分深厚，它们构成了一个基本原则：

**新闻工作者必须成为独立的权力监督者。**

这个原则的意思经常被误解为“让好受的人难受”，甚至一些新闻工作者也会犯这个错误。不仅如此，因为当代新闻界过度使用监督（看门狗①）原则，且使用伪监督原则迎合受众而不是服务公众，监督原则本身正面临威胁。可能更为严重的是，监督原则正在受到新的公司集团化的威胁，这一趋势破坏了新闻媒体执行监督角色时所必需的独立性。

17 世纪早期，印刷的定期出版物最先在欧洲出现时，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调查者。英国内战期间，英格兰的新闻自由还是微弱的星星之火，当时的定期出版物就立即承诺，会调查正在发生的一切，并告诉读者。1643 年开始出版的《议会探报》(*Parliament Scout*)“意味着新闻业的某种创新——必须努力寻找和发现新闻”[1]。翌年出版的一份名为《密探》(*The Spie*)的出版物向读者许诺，它计划“揭露王国大游戏中的寻常弊案，为此将进行秘密调查”。

这些致力于研究工作的早期努力成为新闻媒体获得宪法自由权利的

① 原文为“watchdog”，字面意思是“看门狗”，这是西方对新闻媒体角色通行的称呼，没有贬低的意思，但考虑到中国文化的语境，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书一般将其译为“监督”或“监督者”。

原因之一。《议会探报》和《密探》这样的期刊首次使政府事务变得更为透明。他们对媒体角色寄予的远大抱负就是后来人尽皆知的第四等级，他们公开宣传政府的事务必须向所有人公开，而不是只通知少数特权阶层。在新闻媒体出现以前，了解政府内部工作的人主要限于特权阶层，他们要么与国家有事务往来，要么直接涉足政府的管理。普通公众关于统治者的信息大部分来自非正式的街谈巷议或政府的官方讯息。但是和只提供统治者愿意发布内容的公告和街头公告员不同，这些新的定期出版物有志于告诉人们政府实际上做了些什么。虽然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经常发生的一样，政府常常取缔这些早期印刷商，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新闻和其他针对公众的传播形式存在差别，并把调查性报道作为最早用来区别这两种传播形式的原则之一。用詹姆士·麦迪逊的话来说，正是监督者的角色使得新闻成为“自由的精神堡垒”，就像在曾格案里所表现的那样，真实成为新闻媒体最后的防线。

这些早期的努力常常遇到各种障碍。英国政府禁止在议会辩论期间做笔记。记者必须用脑子记下所听到的，然后立即跑出去回忆或转述这些事件以赶上报纸的印刷。这些早期的新闻工作者被蔑称为“包打听”(newsmongers)，研究早期议会媒体的历史学家经常认为这类媒体并不诚实且以权谋私。然而，尽管做法还比较原始和粗糙，但他们所表现出的这种追求信息透明的本能和所扮演的监督者的角色，已经被证明是不朽的，并终究会取得胜利。[2]

在后来的岁月里，当受到保护的媒体和政府机构之间产生激烈冲突时，最高法院屡次借助监督者角色的理念，重申媒体在美国社会的中心作用。从尼尔诉明尼苏达(Near vs. Minnesota)案开始，美国最高法院禁止政府妨碍任何出版活动，除非其内容“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并且即刻的威胁”。最高法院通过了一系列判决，在法律空间中为新闻媒体建立了一个安全地带，使它受到保护，可以毫不畏惧地满足公众对涉及公共福祉的重要信息的知情权。[3]纪念美国革命 200 周年时，最高法院大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继续强调新闻媒体的监督责任，他写道：“只有媒体受到保护，才能揭露政府的秘密，让人民知情。只有自由而不受限制的新闻媒体才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的欺瞒行为。”[4]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在各州和联邦立法机构的支持下，《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也就是所谓的“阳光普照法”，为公众提供了接触很多政府文件和活动的机会，新闻媒体也能更方便地获得政府信息。从 21 世

纪开始——尤其是乔治·W. 布什当政期间——政府史无前例地采用各种措施，阻止公众接触政府信息，甚至对新闻媒体发布信息治罪。问题在于司法系统将会对此做何反应。

监督原则的内涵不仅局限于监督政府及社会权力机构。这个观念最初产生时就是如此。就像《密探》为了揭露"王国大游戏中的弊案"而进行的"秘密调查"一样，19 世纪的新闻记者亨利·梅休（Henry Mayhew）走出报社，记录那些生活在同一王国中的籍籍无名者的困苦。梅休漫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街头，在伦敦的《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上报道普通人的生活。[5]在他的报道中可以感受到卖菜姑娘和扫烟囱者的面容、声音和愿望。他把这些人物人性中光辉的一面呈现给那些平日对他们熟视无睹的大众。

这些早期的新闻工作者既寻找不为人注意的声音，也搜索尚未被揭露的弊案，他们把检视社会中被忽视的角落作为自己的责任，并坚定地将该责任作为新闻的核心原则。他们记录的世界在信息匮乏的社会中吸引了大多数人的关注，并立即引来了民众热情的支持。

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仍然将监督者的角色视为工作的中心。接近九成的新闻工作者相信新闻媒体"使政治领导人不敢为所欲为"，新闻工作者在回答是什么把自己的职业和其他类型的传播区别开时，把监督者的角色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告知大众。[6]

由于新闻工作者对监督原则深信不疑，所以这个原则也经常被误解。在世纪之交，芝加哥的新闻记者和幽默作家芬利·彼得·邓恩（Finley Peter Dunne）把监督的意思翻译成"让难受的人好受；让好受的人难受"（comfort the afflicted and afflict the comfortable）。[7]虽然邓恩是半开玩笑，但这句话却深得人心。2000 年，《圣保罗先锋报》（*St. Paul Pioneer Press*）因揭露明尼苏达大学篮球队作弊丑闻赢得普利策奖时，该报的体育编辑在演讲中就引用了这句他老板最喜欢的名言。[8]

但是不幸的是，认为新闻媒体存在的意义就是让难受的人好受、让好受的人难受这种观念曲解了监督的真正含义，赋予了它古典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的色彩。监督的概念要比字面意义上的**难受**或**好受**深刻且微妙得多。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对这个概念更合适的解释是代表大多数人监视少数掌握权力的人，防止暴政的出现。

监督角色的目标不断延伸，已经超出了仅仅使权力的管理和执行保持公开透明、使权力的行使结果被知晓和理解的定义。这也就暗示新闻媒体

不仅应该关注权力机构的无效工作，同时还要关注它们的有效工作。如果新闻媒体不能像说明权力的失败运作一样说明权力的有效运作，又何谈监督权力？无休止的批评会失去意义，公众也会失去判断善恶的标准。

就像巴赫赋格曲中的主题一样，调查性报道在新闻史上也时显时隐，但是却从未消失。它决定了美国历史上一些最具纪念意义和最重要的时代：

- 美洲殖民地时期的报纸把目标确立为人民的论坛，在报纸上他们嘲弄遥远的政府，因为后者干涉了美洲充满活力的发展。詹姆士·富兰克林(James Franklin)创办的《新英格兰报》(*New England Courant*)把自己定位为同时监督政府机构和宗教机构的“看门狗”，同时殖民地也有自己的《密探》——以赛亚·托马斯(Isaiah Thomas)创办的《马萨诸塞密探》(*Massachusetts Spy*)专门揭露那些与敌人进行非法交易的人。
- 革命报刊最终被建国报刊所取代，新政府的组成和特点成为报道的主要对象。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各自创办了报纸，告知和鼓励公众就新生国家的立国基本原则展开辩论。这时党派报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就是监督对立党派，有时这一调查和揭露过程变得十分恶毒，以至于缺乏建树的政府一度企图通过立法手段抑制这种行为。[9]
- 20世纪初，被冠以“扒粪者”(或“揭黑者”，muckrakers)绰号的新一代新闻工作者针对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改革，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对权力腐败进行了仔细调查，内容从童工问题、城市政治机构一直到铁路和石油拖拉斯，这些报道导致美国政界出现了进步主义运动。

随着调查性新闻的成熟，逐渐涌现出几种不同形式的调查性新闻。目前确定的主要有三种：传统的调查性报道、解释性调查报道以及对于调查的报道。每种都值得深入讨论。

## ◉ 传统的调查性报道

传统的调查性报道(original investigative reporting)是指记者自己发现并以材料证明那些之前不为公众所知的活动。这种调查性报道经常导

致官方对所揭露的对象或活动进行公开调查，这是新闻媒体推动公共机构代表公众利益的经典事例。这种报道使用的技术和警察办案中使用的相似，比如最基础的走访、查阅公共记录、使用线人，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还会化装采访和暗中监视。

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或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作品都属于传统的调查性报道。前者的《城市之耻》(*Shame of the Cities*)系列报道在1904年发表后，导致地方政府进行了全面改革；后者则在1962年所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中揭露了杀虫剂带来的后果，并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

马库斯·斯特恩和杰瑞·卡默(Marcus Stern and Jerry Kammer)的报道也可以归入这一类，他们于2005年和2006年为《圣迭哥团结论坛报》(*San Diego Union-Tribune*)所写的调查不仅获得了普利策奖，还导致议员"公爵"兰迪·坎宁安(Randy Cunningham)的引咎辞职，最终致使法院对其腐败指控做出了刑事判决。[10]采用自称为"生活方式审计"的独特系统，斯特恩开始对某些议员的旅行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通过深入挖掘国防工业承包商的竞选捐款，斯特恩发现了其他可疑的财产来往。他找卡默协助调查，两人顺藤摸瓜，最终揭开了被圣迭哥美国司法部官员称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最胆大包天的贿赂阴谋"。

在现代的传统调查性报道中，计算机分析经常取代记者的个人观察。《亚特兰大宪章报》1989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系列报道——比尔·戴德曼(Bill Dedman)所写的《金钱本色》(The Color of Money)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它揭露了亚特兰大信贷机构的种族歧视问题，并导致全国范围信贷政策的重大改革。一本有关调查性报道的著作这样评价这个系列报道："证明亚特兰大抵押贷款过程中存在种族偏见的最无可争议的证据，来自使用计算机分析借出方提交给管理机构的文件得出的结果。"[11]如果使用得当，计算机会增加调查性新闻报道的深度，因为报道可以超越传统的采访和叙事套路，从不可想象的海量文献中发现证据。

## ◉ 解释性调查报道

第二种调查性报道是解释性报道(interpretative investigative reporting)，这种报道一般不仅要使用与传统调查性报道相同的技巧，还要做进一步的解释分析。这两种报道方式最本质的区别是：传统的调查性报道是发

现之前没有被人发现的信息，目的是向公众说明可能影响他们生活的事件或环境；解释性报道不仅要寻找事实，把信息加以整合，并在新的、更全面的语境中进行解读，加深公众的理解，同时还要对某一观念仔细地思考和分析。和经典的揭露性报道相比，它通常涉及更复杂的问题或一系列事实。它不仅提供新信息，同时提供新视角。

1971 年《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就是一个比较早的例子。这些文件最初是美国政府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后果的一项秘密研究。记者尼尔·希恩(Neil Sheehan)历经千辛万苦获得了一份复本。接下来，一组精通外交政策和越南战争问题的《纽约时报》的记者和编辑对文件内容进行了解释和重新组织，使它们变成一篇令人震惊的文本，证明政府欺骗了公众。如果没有综合和解释过程，对大部分公众而言，五角大楼文件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纽约时报》在 2005 年发表的关于社会阶层的十篇系列报道是更近一些的例子。一组记者使用现成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揭示出“阶层(被定义为收入、教育程度、财富和职业的综合体)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这与过去我们具有的社会充满无限机会的印象完全相反”[12]。

目前，一些报道正在进一步推动解释性调查报道向前发展。先在《费城问讯者报》工作，后来到《时代》杂志工作的唐纳德·巴利特(Donald Barlett)和詹姆斯·斯蒂尔(James Steele)以敢于探索复杂问题而著称，他们报道的题目有《美国：错在哪里?》(“America: What Went Wrong”)，以及《美国：谁偷走了你的梦想?》(“America: Who Stole the Dream?”)。这两个报道都深入地探讨了美国经济政治系统如何忽视了低收入公民。这两个报道都是数年的调查、繁重的经济数据分析和上百个访谈的结晶。两个系列报道的前提都是这个国家抛弃了穷人。

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解释性，因此一些新闻工作者谴责它们是辩论而不是新闻——因为作者抛弃了参与其中的独立观察者的角色，成为了活动家。《新闻周刊》的鲍勃·萨缪尔森(Bob Samuelson)把《美国：谁偷走了你的梦想?》称为“垃圾新闻”，因为它“没有对经济政策的长处与不足做出全面而平衡的描述”[13]。

如果把平衡定义为给意见双方同等篇幅的话，批评家是对的，这些作品确实没有做到平衡。这两位记者试图揭示经济趋势中被其他人忽视和没有记录的方面，以前的记者只记录了美国经济对富裕阶层的影响，这个居于经济阶层顶端的群体是经济繁荣中的活跃分子。即使是对这一工作

持赞赏态度的人也认为，第一个系列报道《错在哪里》比第二个系列的证据更为充分。对于大众来说，第一个系列报道让他们看到了之前未听说过的内幕，证据之一就是人们在《费城问讯者报》的大厅排队等候加印，在第一周内报社就接到了9万多个电话。当时任《费城问讯者报》执行总编的阿琳·摩根(Arlene Morgan)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人们对第二个系列报道的批评意见更多，《费城问讯者报》的编辑马克斯韦尔·金(Maxwell King)把社论版变成了各方观点交锋的公共论坛。虽然第一个系列报道在文献证据的质量上比第二个系列报道强，但是最终两个系列报道都成功激起了公众对重大主题的讨论。当然，对他们的批评意见也说明记者在进行这个层次的解释中充分展示不同观点、兼容并包是多么重要。[14]

## ◉ 对于调查的报道

第三种调查性报道是对调查的报道(reporting on investigations)。它最近才出现，并逐渐变得寻常起来。它对官方正在进行中的调查所发现的信息或泄露的信息进行报道，有时也对其他人(通常是政府的代理机构)准备开展的调查进行报道。这种报道是华盛顿新闻工作者的家常便饭，因为在那里政府经常通过媒体向政府工作人员传递信息。当然对于调查的报道也不仅限于华盛顿，只要存在政府调查的地方就存在对于调查的报道。在这类工作中政府调查人员积极配合媒体的原因有很多：为了影响预算资金的分配，为了影响潜在的目击者，或者影响公众意见。大部分关于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婚外情报道实际就是对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办公室所进行的调查的报道，白宫工作人员和那些为在大陪审团出庭作证者辩护的律师也会泄露一些相反的信息，从旁推波助澜。另一个例子是关于1996年理查德·朱厄尔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安放炸弹的报道，这一消息来自警察部门和FBI中的匿名信源，但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相比之下，关于水门事件的大部分报道，尤其是早期起关键作用的几个月中的报道则是传统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不是从调查者那里获得推论，而是直接和知道事情原委的主要信源交谈。

对调查的报道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部分原因是政府调查数量的增加；部分原因是水门事件之后，联邦和各州政府通过了新的伦理法案，建立了特别部门监督政府行为。这种报道形式扩散的另一个原

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工作者都依赖匿名信源，以至于新闻工作者和持怀疑态度的公众对记者个人进行的调查不太信任。

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是美国政府搜集电子情报的主要部门。在一篇关于该机构的报道中，《纽约客》的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引用了匿名情报官员的话，指责 NSA 的工作质量越来越差，无法应付老练的恐怖团体和流氓国家制造的威胁。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的密码专家怀特菲尔德·迪菲(Whitfield Diffie)立即抓住了赫什所使用的匿名信源的漏洞："令我担心的是，你所说的内容正是该机构想让我们相信的内容——他们过去很强大，但是现在他们无法完全解读报纸内容，互联网对他们来说也太复杂了，信息流量太大，他们无法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这也是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说'的话。NSA 想让诉求对象知道自己有麻烦，这对他们自己有好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麻烦，但是我们有理由用怀疑的眼光审视这些紧张不安的内部告秘者所说的一切。"[15]

正如迪菲指出的那样，这种报道的风险在于，它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记者是否严格要求自己和是否具有怀疑精神决定的。记者帮助采访对象站在一个强大的讲坛上，后者可以公布某个指控或提出某种暗示而不必承担公共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调查的报道本身有问题，而是其中经常充满无法预测的风险。从事这类报道的记者通常只能探听到调查的部分内容，无法掌握全部信息。

当《纽约时报》公布从国会秘密报告中发现的核间谍案时，吸取了前车之鉴。《时报》只选取了报告中带有警告性的文字，其中说中国从华裔美国科学家李文和那里得到了制造弹头的数据，所以在核技术方面正在追上美国。[①] 《时报》并没有提李文和的名字，但是却援引权威部门的判

---

① 李文和(1939— )，出生于中国台湾的华裔美国科学家，1974 年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Los Alamos 国家实验室工作。1999 年 12 月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指控李文和窃取美国核武器的机密情报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后来联邦调查员无法证明这些指控。在调查员收回这些最初的指控之后，政府进行了一轮新的独立调查，最终只能以不正当处理内部资料的罪名控告李文和。2000 年，李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诉讼协议：他对一项罪名认罪，政府收回其他 58 项指控并将其释放。李文和随后对美国联邦政府和五家媒体(《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美国广播公司和美联社)提出民事诉讼，指控它们在没有任何正式审判结果之前向公众泄露其姓名。2006 年 6 月，美国联邦政府和五家媒体组织与李文和达成庭外和解，宣布他们会一起向李文和支付 160 万美元。联邦大法官 James A. Parker 就政府的不当行为向李文和道歉。

断，把这个事件列为近年来最大的丑闻。这则新闻导致调查人员立即对李文和提出指控，并判决他在监狱服刑一年。在对他的59项指控中，他只对其中一项认罪：非法收集和保留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宣判他入狱的法官当庭发表了内容深刻的道歉。《时报》也在报纸上发表了篇幅很长的更正信息，对于自己想当然地接受了报告中的太多内容，同时没有给出对李文和有利的怀疑表示歉意。[16]

新闻工作者被调查信源利用的可能性很高。新闻媒体不但很难成为权力机构的监督者，反而很容易沦为它们的工具。对调查的报道需要投入大量辛苦的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闻媒体经常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反而认为自己可以更无拘无束地报道质疑和指控，因为他们只是在引用官方信源而不是自己进行调查。

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治学院的本杰明·布莱德利教授[①]汤姆·帕特森(Tom Patterson)通过研究发现，评价标准的变化导致这类新型调查性报道的兴起。在一次热心新闻工作者委员会的论坛上他告诉我们："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谨慎的、深入的调查性报道正在被另一种断言式报道所取代，这种报道浮在新闻的表面，主要是信源的意见，记者没有尽到充分挖掘事实的本分。这个趋势在80年代有所加剧，到了90年代更加严重，两种不同的报道势均力敌的状况发生了变化。不提及姓名或使用匿名信源的占多数，当然，这一趋势在报道莱温斯基新闻的时候达到全盛时期。"[17]

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兼作家吉姆·赖森(Jim Risen)认为，大多数调查性报道都会同时使用这三种形式。比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调查时，会定期与政治调查官员核对调查结果。当然，记者的报道是基于自己调查的原创性报道，还是解释性的报道，或者是对其他人调查的报道，这三者之间是存在区别的。每种报道类型都有独特的责任和风险。可是新闻工作者常常没有充分注意或仔细分析这些差异。

## ◉ 监督者角色遭到削弱

过去的两个多世纪以来，监督者的角色经历了起起伏伏，目前它正处

① 西方大学有以本行业知名人士或赞助者姓名命名教授职位的传统。本杰明·布莱德利(Benjamin Bradlee)曾任《华盛顿邮报》的总编。

在被逐渐稀释和削弱的时刻。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举成名后，接下来是《60分》大获成功，该节目的记者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莫利·塞弗(Morley Safer)、哈里·里森纳(Harry Reasoner)和埃德·布莱德利(Ed Bradley)成为了明星。人们打开电视是为了看麦克、莫利、哈里和埃德这周又会抓住谁。调查性记者，尤其是电视的调查性记者，既是公众利益的实现者，也是商业收视率的保证。在后来近30年时间里，新闻和信息机构的增加也伴随着调查性报道的滚滚大潮。随着美国大多数的地方新闻台纷纷建立“调查小组”，开办每晚都在黄金时段进行揭露报道的电视新闻杂志节目，我们建立了专门用来揭露的固定的新闻栏目。

这些栏目多数都打着监督报道的旗号，但是实际上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节目并没有监督权力精英，防范权力的滥用。相反，它们更关心的是人身安全或钱包。这些黄金时段新闻杂志的热门话题主要有：不诚实的汽车修理工、不称职的游泳池救生员、性奴隶交易团伙、房屋保洁骗局以及危险的未成年司机。

例如，1997年的一项对黄金时段新闻杂志的研究发现，这一类调查性报道忽略了大多数与媒体监督角色有关的典型问题。这些节目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节目关注了教育、经济、外交、军事、国家安全、政治、社会福利等涉及公共财政支出的领域。相反，超过半数的报道话题集中于生活方式、行为、消费、健康或名人娱乐等领域。[18]当时担任ABC《20/20》执行制片人的维克托·诺伊费尔德(Victor Neufeld)对委员会说：“我们的职责不是传播新闻。我们的职责是制作好看的节目。”[19]

安全问题常常是批判性监督报道比较集中关注的重要目标。但是过多的新型“调查性”报道带着小报记者的视角在日常琐事上小题大做。地方电视新闻经常出动调查小组报道像“危险之门”这样的话题——内容是开门和关门的危险；或者“洗衣机内幕”——内容是消费者放进洗衣机的衣服有多脏和有多少细菌会沾到其他衣物上。让我们想象一下，洛杉矶电视台曾专门租了一栋房子，在里面到处布下偷拍机，用了两个月时间只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花7.95美元不可能真正把家里的所有地毯清洗干净。还有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常受欢迎的系列报道，内容是有一种文胸里的金属丝可能会戳到使用者。

虽然这些报道看上去像传统的调查性报道，但事实上多数不是。首先，这类报道就像电视记者莉斯·利米(Liz Leamy)所说的那样，只是“兑了水”的调查性报道。这些报道都是由电视新闻顾问们策划的，他们为电视台

提供脚本、镜头、待采访的专家，甚至制作好的采访素材，这些节目专门用在特殊时期，以提高电视台的收视率。一些电视新闻制片人把这种揭露性报道称为“特技表演”(stunting)，意思是它们只是用一些花招满足观众对调查工作的好奇，而不是真正想报道新闻。第二个问题是这些节目揭露的都是人们已经了解的常识，贬低了调查性新闻的地位。新闻媒体成了大喊“狼来了”的小男孩。它们浪费和失去了自己引起公众注意的号召能力，因为它们报道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琐事。这些举动把监督变成了一种娱乐。

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不容低估。电视是传播新闻的主要媒介，电视台黄金时段新闻杂志和调查小组已经成功地取代了纪录片或其他长篇调查性报道。结果导致一些新闻工作者开始质疑调查性新闻的这个发展趋势。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另类新闻媒体《韦斯特沃德》(*Westword*)的编辑帕蒂·卡尔霍恩(Patty Calhoun)很担心它们对公众的影响，因为公众无法区分流言和事实。她评论道：“电台谈话节目……随便传播流言，并且直到现在还认为自己在做新型的调查性报道。不幸的是，听众和电台的主持人一样，不知道其实这根本不是调查性报道。”[20]

虽然很难把原因都归结为报道内容的琐碎化，但是它确实逐渐动摇了公众对监督性报道的支持。公众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某些调查性记者使用的标准和技巧上。数年以来，安德鲁·科胡特(Andrew Kohut)为皮尤人民与新闻媒体调查中心所做的调查发现，公众对媒体监督角色的支持保持稳定，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媒体的总体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但是到 90 年代末期，连这一状况也发生了改变。到 1997 年，科胡特发现公众反对使用某些报道技巧，比如记者隐藏自己的身份、向告密者买信息、使用偷拍机或隐形话筒。[21]

过去 20 年以来，公众也更加质疑媒体对军方的批评。认为这些报道会削弱国防力量的公众的比例由 1985 年的 28%上升到 2005 年的 47%。但是公众对监督角色的看法发生了微妙变化。随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做法不断受到质疑，支持新闻监督政治领导人的公众开始增加。2005 年，60%的美国人认为新闻机构阻止了政治领导人做出格的事，比 2003 年的 54%有所增长。[22]

## ◉ 作为诉讼的调查性报道

虽然所有报道都涉及调查，但是我们所理解的调查性新闻加入了道

德维度。它吸引公众对被揭露出来的事情做出判断，同时暗示新闻机构认为这件事十分重要——值得专门花力气来报道。从这个意义上讲，调查性报道除了让人们关注某个话题外，通常还是对某个不良行为的起诉。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小心谨慎，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采取行动，因为不少题材既可以写成揭露性调查（exposés），也可以写成普通新闻报道（news story）。克林顿的母亲（她是护士）曾卷入一桩导致死亡的医疗事故案，但是州政府的法医却没有对她进行彻底调查，招致人们的质疑。《洛杉矶时报》把这则新闻写成了揭露性调查。该新闻暗示克林顿作为州长“几年来一直拒绝解聘该州的法医，此人遭人议论的行为包括帮助过克林顿的母亲……逃避关于病人死亡的调查”。但是该报道的问题是内容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涉及专业技术的内容比较多，让人很难得出最终结论。比如，克林顿在竞选连任州长时落选，因此这桩涉及他母亲的事故发生时，克林顿并不在任上。许多《时报》的记者，包括参与报道的记者，在这篇报道是否公平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反对者认为它应该被写成特稿而不是揭露性报道。如果当时报纸用另一种方式处理这则新闻，就可以简单地避免所有争议。《时报》没有理解到揭露性报道的效果相当于起诉书，它所提到的案子一定不能模棱两可；如果不能达到这一标准，就应该用其他形式报道。

这一事件让我们注意到了调查性报道模式带来的重要问题，即新闻媒体在报道时采取了一种默认的立场——有坏事正在发生。这也正是调查性新闻被称为鼓动性报道（advocacy reporting）或记者莱斯·惠滕（Les Whitten）所说的“带着愤怒的报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职业协会将调查性记者和编辑（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简称为 ire（愤怒）的原因。调查性新闻工作者的揭露会导致报道对象名誉扫地或改变公共事件的走向，所以他们肩负的责任更重大，不仅要核实事实，而且要向受众交代信息来源。

鲍勃·伍德沃德说，为了完成监督的责任，他尽量保持开放的心态。“开始报道某条新闻时，你本想调查本市卫生部门如何管理防疫工作，但是……却发现实际上应该报道的是本市所有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建立工作计划表，尽量与每个人交谈并多次采访同一个人”。

普利策奖得主洛蕾塔·托凡尼（Loretta Tofani）主要通过与可能提供信息的信源面对面交谈，并在他们身上投入大量时间来获得好新闻。当

她在《华盛顿时报》工作时，曾写过一篇关于马里兰监狱普遍存在强奸事件的报道，被揭露的罪行正好发生在执法人员的眼皮底下——警察和法官都知道存在这种犯罪行为。为了调查该现象，她有好几个月下班后坚持上门走访，为的是让最不愿接受采访的目击者开口。通过这样做，她才写出了一系列报道，揭露马里兰州乔治王子拘留中心普遍存在的强奸行为。最终，托凡尼写出了编辑认为不可能完成的报道：一份由引语、人名组成的犯罪记录，采访录音包括对犯罪者、被害人以及对此负有责任并且应该阻止这些罪行发生的官员的采访。

正如托凡尼所说，当这些文章发表时，所有需要呈交的文件都“盛在银盘中端给政府……盘子里面什么都有，包括医疗记录、受害者的姓名、强奸犯的姓名”[23]。这些信息的公开迫使政府对导致强奸发生的系统进行改革。最终，政府判决了所有强奸犯。

另一位调查性新闻记者，当时在加利福尼亚《橘镇记录者》(*Orange County Register*)工作的苏珊·凯莱赫(Susan Kelleher)说，在谈到调查的话题之前，她会和信源充分讨论。通过这种方式，信源知道她是个诚实的人以及他们将要做什么，会遇到什么情况。她说：“任何人作为信源参与报道之前，我会告诉他们我如何工作，我会告诉他们要把采访录下来，我会告诉他们我将来会找其他人打听他们的情况，即使我发现他们十分和善，还是会调查他们……我对他们说：‘一旦你决定和我交谈，你就得配合上面这些要求。你不能控制一切，但是你可以控制参与的程度。一旦你说的话被记录下来，即使你不希望我知道某些内容，录音还是会告诉我，因为它们已经被记录在案。’”[24]

对信源的坦诚以待让凯莱赫能发现不寻常的新闻。其中一则新闻揭露了不孕不育诊所的违法行为，一些医生悄悄地非法从病人体内摘取多余的卵细胞，并转卖给其他病人。就像托凡尼对监狱强奸的采访过程一样，凯莱赫的报道过程一丝不苟，以医疗记录和有关人员的录音作为报道的根据。和托凡尼的作品一样，这个报道也赢得了普利策奖。

普利策奖得主、《洛杉矶时报》商业调查记者迈克尔·希尔奇克(Michael Hiltzik)曾说，如果自己的事业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技巧的话，那就是“获得资料”。其他的都不是那么重要，包括秘密线人、机密会议以及“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调查记者使用的所有花招。你的全部目标是记录所有信息。与信源打交道的关键是让他们给你一个将来有据可查的东西”。希尔奇克和他的搭档查克·菲利普斯(Chuck Philips)一起因为揭露

格莱美奖的丑闻而获得普利策奖。格莱美奖的收入本来应该用于慈善事业，但是该奖获得的巨额收入却几乎没有多少用于慈善。格莱美奖的组织者威胁记者说要对他们采取法律行动和其他措施。“他们没法动我们一根汗毛，因为所有事实都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当一切有案可稽，任何‘冗长无谓的辩解’和威胁都只不过是无稽之谈。你心里会十分踏实。”[25]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技术革命及其带来的经济组织方式的革命既创造了新的机会，也对新闻媒体的独立监督角色构成威胁。数字传播让信息移动变得更容易、更迅速，但是也造就了国际传播大公司，它们对国家概念提出了挑战。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像通用电子、沃尔特·迪斯尼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等新兴的国际集团将新闻隶属于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公司内部的相互依赖无处不在（像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新闻工作者的任何独立宣言都会立即显得不切实际。《时代》杂志的记者既要报道美国在线，又要报道网络、电子商务、娱乐、有线电视和电信，他们的工作困难重重。经过一段时间，当新环境下培养出来的管理者坐上领导者的位置后，经验告诉他们，花自己的钱去监督自己的母公司十分不划算。

启蒙时期以来形成的自由媒体理论认为，只有独立的声音才能监督社会中具有影响力和掌握权力的机构。现在，这一观念正受到质疑。里夫卡·罗森韦恩（Rifka Rosenwein）在《布里尔目录》（*Brill's Content*）杂志上就媒体并购案撰文，他指出：“媒体企业的兼并会带来其他并购案中所没有的特殊问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和反托拉斯法认为，在一个领域（比如零部件）如果存在5个或6个主导公司，就可以保证价格和生产的充分竞争。但是将生产和分配新闻和思想的权力集中在5个或6个牵涉多种利益的集团那里，就会带来各种其他问题。毕竟关于零部件的经济理论并不能用来解释言论表达的问题，对于后者而言，多样性更有优势，而且优势还不小。”[26]

历史向我们承诺，开放社会中的市场经济具有自下而上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人们对美国新闻业独立性的丧失忧心忡忡，有迹象表明，市场对此已经作出反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以监督媒体为己任的非营利性出版物，在内容、深度和批判性上有了明显改善，其中包括《尼曼报告》（*Nieman Reports*）、《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和《美国新闻评论》（*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1998年，新闻实业家史蒂夫·布里尔（Steve Brill）发现，监督媒体（包括新闻界）的出

版物具有潜在的市场，可以赢利。[27]

虽然布里尔的企业在商业经营上的探索失败了，但是它预告了一种新的公民调查者角色的诞生。随着个人博客的迅速发展，许多人专门监督媒体，包括媒体上刊登的调查性报道。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针对媒体所揭露的内容，互联网上会即刻形成利益社群对其提出尖锐的问题。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事件是，一位自称“巴克赫德”(Buckhead)(此网名来自他所居住的亚特兰大社区的名称)的博客质疑 2004 年 CBS《60 分》周三版播出的有关越南战争期间乔治·W. 布什在得克萨斯国民警卫队服役的报道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巴克赫德的质疑认为，丹·拉瑟在报道中支持其判断的资料的真实性存在问题。虽然他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证据证明自己的质疑，但是在几个小时之内，阅读他博客的观众就成倍增长，人们的质疑和提出的零星证据不久就迫使 CBS 对报道进行调查。最后，拉瑟公开称这则报道是“一个错误”并道歉。CBS 的 4 位工作人员被解职，包括报道布什新闻的一位资深制片人。[28]不久，拉瑟自己也辞去《CBS 晚间新闻报道》的主播职位，后来，CBS 新闻部主任安德鲁·海沃德(Andrew Heyward)也被替换掉了。[29]

比这些新兴的媒体监督更重要的，可能是新的传播技术创造了一个新的机会，允许任何人都能参与监督，甚至与现有的新闻媒体展开竞争。虽然很少有博客在向着这个方向——通过新闻报道或新闻调查进行公民新闻报道——发展，但是一些专业新闻工作者正在迎接挑战，在新闻机构或组织外进行报道。

华盛顿的公共诚信中心(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是这种可能性的代表之一，该中心是 34 岁的查尔斯·刘易斯(Charles Lewis)于 1990 年建立的，此前他是 CBS《60 分》的制片人。因为电视台要求生产“更具娱乐性”的新闻报道却不追求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新闻，刘易斯无法忍受压力，辞掉了工作，创立了一个“毋须担心昨夜的尼尔森收视率数据或最新的订户数量”[30]的新的新闻机构。在慈善组织的资助下，刘易斯建立了一个由志同道合的新闻工作者参加的工作坊，对计算机领域和互联网上的权力进行监督。到 1999 年为止，该中心有 40 份报告被传统新闻机构引用或传播——后者已经不再派专人做类似的工作。

虽然刘易斯建立的这个中心因其开创性已经成为最著名的独立新闻机构，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组织：调查性新闻基金会(The Fund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c.)，为“缺乏主流新闻机构保护和支持

的"自由撰稿的记者提供补助;[31]艾丽西亚·帕特森基金会(the Alicia Patterson Foundation)则为在传统新闻机构工作的记者和编辑提供财政补助;[32]索罗斯基金会的开放社会研究所(the Soros Foundation's Open Society Institute)最近新设立了一个类似的奖金,资助对犯罪和法律问题的报道;新闻工作者戴维·伯纳姆(David Burnham)利用非营利性基金会和高校的资助,开发了一个软件,供使用计算机调查政府记录的记者使用;2000 年总统初选期间,长期为《华盛顿邮报》做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莫顿·明茨(Morton Mintz)一直为 TomPaine. com 网站报道竞选中被忽略的问题,这家网站是非营利性网站,专门分析主流媒体忽略的问题。

虽然这些新的努力很有意思,但是和主流新闻相比,它们还比较脆弱,仍处于襁褓之中。私人慈善机构的支持虽然来得快,但消失得也快。它们吸引受众的能力还取决于是否能够吸引以赢利为导向的主流媒体发布他们的研究。

独立的新闻中心说明新技术能够改变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方式。至少这对传统的新闻组织方式构成了潜在的挑战,它暗示着如果传统媒体抛弃了严肃的监督角色,其他人也可以取而代之。即使是只身在数据库和聊天室进行调查的黑客如今也有能力影响甚至主导新闻流,就像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①那样。

除了对新技术进行乌托邦式的畅想外,还有一些更实际的经济问题有待回答。这些新媒体中是否有哪个能把大量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们可能想表达的内容上?如果能,该新媒体是否会被收购并纳入到创立者企图逃避的大企业麾下?至少在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怀疑。电视网的新闻部是我们了解新型经济组织的新闻报道最明显的范例。它们是第一批被并入大型非新闻公司的主要新闻机构。虽然它们已经在遭受新技术导致的受众的结构性流失带来的折磨,却仍在偏离严肃的监督角色,转向把新闻(甚至调查性新闻)当作娱乐节目制作的新模式。这一模式是目前唯一可以看到的跨国新闻集团效应的证据,它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调查性新闻是否还能继续保持过去半

① 马特·德拉吉(1966— ),最著名也是最早的"网络记者"之一,他创办于 1995 年的网站"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以报道小道消息和流言著称。克林顿性丑闻事件最早就是由德拉吉在网上发布的,该事件使得德拉吉报告被许多人所知。德拉吉现象对传统新闻的采集发布方式构成了挑战。

个世纪以来的那种水准。

监督者和其他角色不同。除了其他新闻的特征外，它还要有特殊的技巧、特殊的气质和特殊的渴求。它需要实实在在地投入大量资源，渴望报道严肃的问题，除了忠于新闻的最终消费者外，要与任何利益保持独立。虽然人们对监督的角色表面上表示支持、赞誉有加，但是和本书提到的其他原则一样，该原则目前也面临着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挑战。但是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新闻作为公众论坛的角色正在扩张，出现了断言式新闻的新趋势，这使得我们更渴望充满活力同时又严肃认真的监督性新闻。在新世纪，新闻媒体不仅要监督政府，而且要把监督扩大到非营利组织、企业以及由新技术创造的公众讨论空间里去。

这一发展也为新闻的报道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个博客质疑全国性新闻媒体的例子所表明的一样，参与的、积极的公民开始主动监督新闻媒体，这使新闻的监督向着新的方向发展。让新闻的基本原则适应公民博客等技术发展，不仅可以为监督性报道提供新鲜有力的新工具，也会促使新闻工作者进一步认识到对新型新闻报道的需求，这种报道的基础是媒体与公众的合作。

## 注　释

[1] John C. Sommerville, *The News Revolution in Engl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Daily In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5.

[2] Mitchell Stephens, *A History of News*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6), 226—27.

[3] *Near v. Minnesota*, 283 US 679(1931).

[4] *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 403 US 713(1971).

[5] 关于 Henry Mayhew 工作的详细情况，见 Anne Humphreys, *Travels into Poor Man's Country: The Work of Henry Mayhew*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7)。

[6] CCJ and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Striking the Balance: Audience Interests, Business Pressures and Journalists' Values," March 1999, 79; available at www.journalism.org.

[7] Finley Peter Dunne, in *Bartlett's Familiar Quotations*. 这句话实际上是邓恩在其小说中通过虚构的人物杜利先生(Mr. Dooley)之口说出来的。这句话的完

整版鲜明地体现了邓恩惯用的讽刺口吻，全句是："报纸替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它管理警察和银行，指挥民兵，控制立法机构，它替年轻人洗礼，帮傻瓜成家，让难受的人好受也让好受的人难受，它安葬死者，然后把他们烤熟。"

[8]《圣保罗先锋报的体育编辑》Emilio Garcia-Ruiz 引用该报的执行主编 Walker Lundy 2000 年 4 月 10 日在普雷马克新闻奖年度颁奖礼上的讲话。

[9] 1798 年签署的《对某些犯罪进行惩罚的法案》(the Act for the Punishment of Certain Crimes)，人们一般称之为"煽动法案"，它规定"写作、印刷、表达或出版……不真实的、造谣中伤的以及恶意的内容或反对美国政府、美国总统的内容"都是非法的。此法律主要是为党派之争服务的措施，目标是让 1800 年选举中反对联邦党的人不能说话——由于此法律的逻辑存在问题，1801 年遂被废除。在此法律生效期间，共有 25 人因此被捕，12 人受到审判，11 人被定罪。

[10] 开启这项"联合论坛/科普利新闻服务"(*Union-Tribune*/Copley News Service)调查的第一篇报道是《坎宁安抗辩：与国防企业主无非法交易》(Cunningham Defends Deal with Defense Firm's Owner)，该报道刊登于 2005 年 6 月 12 日，由马库斯·斯特恩撰写。

[11] James S. Ettema and Theodore L. Glasser, *Custodians of Conscienc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Public Virt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36, 42.

[12] *New York Times*, "Class Matters—Social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June 2005.

[13] Robert Samuelson, "Confederacy of Dunces," *Newsweek*, September 23, 1996. 杰克·富勒在 *News Values: Ideas for an Information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一书中也提出了本质上与此一致的观点以反对"America: What Went Wrong"一文。

[14] Arlene Morgan,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March 2000.

[15] Seymour Hersh, "The Intelligence Gap,"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6, 1999, 76.

[16] Kirsten Lundberg, "The Anatomy of an Investigation: The Difficult Case(s) of Wen Ho Lee"(1641.0),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2001.

[17] Thomas Patterson, at CCJ Forum, Washington, DC, March 27, 1998.

[18]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Changing Definitions of News: A Look at the Mainstream Press over 20 Years," March 6, 1998, 3; available at www.journalism.org.

[19] Marc Gunth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twork News: How Profitability Has Moved Networks Out of Hard News," *Nieman Reports*, special issue (Summer 1997), 27.

[20] Patty Calhoun, at CCJ Forum, Chicago, November 6, 1997.

[21]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Press 'Unfair, Inaccurate and Pushy': Fewer Favor Media Scrutiny of Political Leaders," March 21, 1997; available at http: //people-press. org.

[22]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Public More Critical of Press, But Goodwill Persists," June 26, 2005.

[23] "Watchdog Conference: Reporters Wrestle with How to Use Sources," *Nieman Reports* (Fall 1999),7.

[24] 同[8]。

[25] Michael Hiltzik,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May 2000.

[26] Rifka Rosenwein, "Why Media Mergers Matter," Brill's Content, December 1999-January 2000,93.

[27] 本书作者 Bill Kovach 从 1990 年到 2000 年 6 月 30 日曾任《尼曼报告》的出版人,从他上任到 2000 年 8 月,他也是《布里尔目录》的独立巡查员。

[28] CBC. ca, "Rather Boasts about 'Total, Absolute' Control over Cable News Show," July 12, 2006; available at www. cbc. ca/story/arts/national/2006/07/12/rather-hdnet-news. html.

[29] Poynter online, "McManus Replaces Heyward as CBS News President," October 26, 2005; available at www. Poynter. org/column. asp? id=45&aid=91148.

[30]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brochure, Washington, DC, 1999.

[31] 这些记者的调查范围包括腐败、渎职、社会疾病和媒介批评。近年来,受该基金资助的记者对以下主题进行了报道:虐待囚犯、美国报纸报道中的种族歧视、国家情报机关在美国媒体中扮演的角色、对印第安人福利制度进行立法的后果、美国公司对墨西哥森林进行的环境破坏(系列广播节目)、新泽西州某社区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异常的癌症患病率、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调查克林顿性丑闻案的独立检察官——译者)是否利用记者的力量增加了调查权利。

[32] 该项目保证受支持的记者所在的新闻机构也享有权利同时刊登该报道。它已经支持的报道涉及:新移民法、美国青少年集团暴力问题、公司精简和解除管制时代的全球就业问题、管理型医疗保健机制、文盲问题、儿童收养和针对贫民的政策、司法腐败。

# 第7章

# 作为公共论坛的新闻

星期二晚上，刚从欧洲回来的科迪·希勒(Cody Shearer)坐下来看电视。这位华盛顿的自由新闻工作者在不同的电视频道中来回搜索，最后停在了CNBC，看了几分钟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主持的谈话节目《硬球》(*Hardball*)。

马修斯的嘉宾是凯瑟琳·威利(Kathleen Willey)，后者声称克林顿总统曾在白宫猥亵了她。马修斯想谈的是：有没有人企图威胁威利，要她不要声张此事。但是不久希勒就发现，这个采访的真正话题既不是总统也不是威利的指控——而是希勒自己。

克里斯·马修斯：那件事过去5年之后，在里士满的那个黎明，有个男人走过来和你说话，这个人是谁？我想再问你一遍，因为我认为你知道他是谁。

凯瑟琳·威利：我知道。我确实知道。

马修斯：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他是谁？这是这件事的重要环节，为什么你愿意参加今晚的电视直播节目但是却不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那我再换一种更谨慎的提法。有没有什么线索曾导致你对这个人是谁产生过某种猜测？是谁让你产生这种猜测？是什么使你产生这种猜测？

威利：他们曾给我看过一张照片，然后——

马修斯：照片上的人是谁？

威利：我不能告诉你。我不是不愿表态——

马修斯：我能认出照片中这个人是谁吗？

威利：能。

马修斯：他是总统家族的一员或总统的朋友吗？他和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有关系吗？是希勒家的人吗？

威利：他们要求我不能泄——

马修斯：你被要求不能承认此事吗？

威利：是的，是——

马修斯：OK。

希勒感觉胃里一阵恶心，他知道马修斯的目的是什么。近来华盛顿流言四起，说希勒正是在威利跑步时和她见面并威胁她撤销对总统指控的那个人。这则流言完全是无中生有。它不是事实。这个所谓的威胁事件发生的时候，希勒正在加利福尼亚，但是没人愿意劳神去核实这部分内容。现在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马修斯把这则错误的流言公之于世，而且它听上去像真的一样。

马修斯：让我们再回到跑步那段，这是整个故事中最精彩和最令人恐怖的部分。你在出门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当时你睡不着，你脖子疼——这个走到你面前的人你之前没见到过——你之前从未见过他。

威利：是的。

马修斯：那么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把这个故事接着讲完。

威利：嗯，他提到我小孩的名字。他问他们还好吧，在——在这个时候，我问他他是谁，想干什么。他只是盯着我的眼睛，然后说："你还没收到消息，是不是？"我转过身并——并逃跑了。我就那么一直在跑，大概跑了 100 码。我被吓坏了，转过头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马修斯：是谁给你看嫌疑人照片的？

威利：杰基·贾德(Jackie Judd)。

马修斯：来自 ABC？

威利：是的。

马修斯：你做出肯定回答了吗？

威利：是的。

马修斯：那么这个人是科迪·希勒吗？

威利：我不能告诉你。

马修斯：OK。但是你确定了照片上的人就是他——那我们再说说

其他事，结束这段缺乏实质内容的访谈。[1]

这段节目刚结束几分钟，第一个电话就打进希勒家里。一个匿名的低沉的声音威胁希勒的生命安全。希勒并没有被吓着，他猜想这一定是某个受《硬球》刺激的怪人。然而不久第二个电话打进来了。然后第三个。希勒开始有些担心。

第二天，保守的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就传播了这则流言："她说肯·斯塔尔(Ken Starr)要求不要说出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在她为保拉·琼斯案出庭作证的两天前威胁过她……现在我们知道他是谁了：他是科迪·希勒，希望的'希'，勒索的'勒'。"[2]

林博的影响更大。当天希勒家电话不断，差不多有近百个，要么进行死亡威胁，要么威胁说要对他进行人身伤害。虽然此事明显系子虚乌有，但是在当天晚上的《硬球》节目中，马修斯重播了威利访谈的片段，并播出了一个短片，内容是他为《新闻周刊》的迈克尔·伊西科夫(Michael Isikoff)、《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迈克尔·巴龙(Michael Barone)以及全美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主席帕特里夏·爱尔兰(Patricia Ireland)提供"独家新闻"。

希勒离开了华盛顿，试图忘记这件事。他认为华盛顿是个注意力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城市，几天之后便不会有人再提起此事。但是他错了。星期日早晨希勒回到华盛顿，当他洗澡的时候，一个在他家过夜的客人冲进了浴室，说有个持枪的男子站在院子里扬言要进来杀了希勒。希勒起初认为这是个玩笑，直到出门后看到这个人才意识到这是真的。这名男子拿枪指着希勒的另一个朋友，要求希勒出来见他。

突然，这个持枪的人又莫名其妙地跑回汽车，溜之大吉。希勒和朋友抄下此人的车牌并通知了警察。一个小时之后，警察带来了这件离奇案件更离奇的高潮。这个疯狂的持枪者名叫汉克·布坎南(Hank Buchanan)，是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的兄弟，后者过去是谈话节目主持人，是共和党员并且是改革党(Reform Party)的总统候选人。汉克·布坎南之前有过心理疾病的病史。

希勒被克里斯·马修斯吓坏了。希勒说："如果我犯了那样的错误，会坐下来写封信解释说是因为播出时间紧迫并表示歉意。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甚至连制片人也没有向我道歉……最令人惊讶的是马修斯什么事也没有。第二天晚上他又回到了直播室。"[3]

节目播出几天后，希勒和马修斯在火车上见过一面，但是这发生在布坎南事件之前。根据希勒的描述，他们激烈地争论，他认为马修斯根本没有歉意。收到希勒律师的信件之后，马修斯在节目上道歉，宣读了希勒律师的声明：希勒“和威利女士所描述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马修斯在他的节目中说：“我现在很遗憾，在提及他[希勒]的名字之前，向他说明——没有向他说明情况。”

这完全不像更正。更为重要的是，这则新闻就不真实。克里斯·马修斯和科迪·希勒的这个例子提醒我们要了解新闻的另一个基本原则。从诞生地希腊的市场到美洲殖民地酒吧，新闻事业一直以来就是公共交流的论坛。哈钦斯委员会(Hutchins Commission)1947 年把该使命定义为本专业最重要的义务，仅次于说出真相。该委员会写道：“伟大的大众传播机构应该将自己视为公众讨论的公共载体。”[4]

新闻媒体的第 6 个基本原则或义务就是：

**新闻媒体必须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①。**

新科技使得这个论坛更充满活力，也使新闻报道的话语垄断有所减弱。但是希勒事件说明，由于这个论坛的反应速度不断加快，它在歪曲事实、误导大众、妨碍自由媒体的其他功能上的能力也有所增强。只有随着公民新闻、博客甚至新闻和谈话的融合，这种能力才能不断增强。

第 2 章讨论真实时，我们研究了围绕第一份定期出版物自然形成的论坛以及该论坛与公众意见的关系。新闻制造论坛的能力随处可见，它体现在新闻记者的不同工作之中。从新闻工作者写出第一篇报道，提醒公众注意社区中某个事件或情况时，就已经逐渐出现了汇集各方意见的论坛：新闻报道会包含对这个事件潜在影响的分析，背景链接会提供类比和对照，同时配发的社论则会对这些信息做出评价，专栏作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个人评论。

新闻工作者每天使用的这些报道形式都可以警告公众，促进他们做出判断，起到制造论坛(广场)的作用。人类具有好奇的本性，这意味着只要新闻报道某个正在策划的事件的细节、揭露恶行、总结正在出现的趋

① Forum 在古罗马时代也指(用于审判的)公共广场，现在指论坛，即公众参与讨论的场所。文中根据具体情况翻译作“论坛”或“广场”。

势，人们就想知道个究竟。随着公众对这些披露的信息做出反应，到处都是公众的声音——电台的热线节目、电视谈话节目、言论版上的个人观点、博客、聊天室、民意测验以及其他地方都会听到公众的意见。当权者听到这些声音后，就会想方设法了解和该问题相关的公众意见。通过上述过程，现代社会每天都在创造着古代的公共广场，正是在这些世界各地的广场上诞生了原始的民主。

通过促成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人所说的民主的基石——妥协、妥协再妥协，新闻媒体的论坛功能使得建立民主成为可能，即便是在更大、更多元的国家也能建立民主。

对于今天的社会团体和政党来说，上述看法仍然没有过时。每年有数百万美元专门用来改变公众意见，经常通过半真半假的信息或完全虚假的谎言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新闻媒体在刊载公共讨论时，扮演诚实的信息中介角色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媒体发展的新时代，揭穿受商业操纵的观点、游说和政治宣传中的信息操纵和谎言更是新闻提供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报纸的社论、言论专栏、谈话节目、言论杂志的论说、博客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媒介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是他们的使命。但是如果这些作者认为自己是新闻工作者的话，就必须恪守不得歪曲事实的规则——要和这个职业的其他人士一样遵守相同的真实和忠诚的标准。

因此，新闻必须为公共评论和妥协提供论坛。但是在新时代，公共讨论必须建立在和其他新闻工作相同的原则之上，必须以真实、事实和核实（truthfulness，facts and verification）为前提，这些原则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强。公共论坛无视事实，就无法提供有用的信息。陷入偏见和猜测的争论只会演变成激烈的意气之争。

同样重要的是，论坛要为社群的所有成员服务，而不能只属于有钱人或在人口统计学上具有吸引力的群体。

最后，媒体的公共论坛功能还有一个基本原则：论点过于极端的讨论不仅对公众无益，相反还会把大多数公民排除在外。虽然新闻媒体必须反映多元的社会，给各种不同的意见发表的机会，但是也不能忘掉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主最终还是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公共论坛必须包括广泛的同意，普遍的同意才是公众安身立命和找到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地方。

某些人可能会认为对媒体加以组织管理的观点过时了，他们认为这种带有明显精英主义色彩的观念是几家新闻媒体控制公众信息时代的思

想残余。传统的做法是马修斯让威利发言，然后再让希勒回应威利。在拥有新的传播科技的新世纪里，这种做法是否存在不足呢？现在我们可以让新闻工作者改变上述做法，让讨论在真正的公共广场上展开，而不是在由 NBC 或 CBS 新闻指定的那个虚假的广场上展开。上述看法正是技术和新闻之争在哲学观念上存在分歧的明显表现。

确实，我们有了潜在的更开放的讨论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不得不认为，技术能使新闻生产者不必须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大量的由机器促成的辩论会使人类的错误降到最少并提高所有人的判断能力。我们可以依赖事实与观点的自由市场，而不是新闻工作者，实现去伪存真。

博客的出现使得这一哲学变得更加纯粹。门户网站认为（至少在新世纪的前十年里这么看），如果博客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还附上链接指明评论或引用的对象，那么误传事实或有意歪曲事实等棘手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问题就出在这里：究竟是什么标准使得马修斯或其他人可以不再承担核实的责任或为广大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更多频道、交互性媒体还是无限链接？虽然从纯技术的角度看，这种看法似乎站得住脚，但是在现实的传播和政治文化的自由市场里，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创建的公共广场是一个无视事实、公正和责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偏袒取代核实；公正问题变成了谁拥有最大权力、能量或最多修辞技巧的问题。

例如大部分电视和广播新闻——尤其是有线新闻和早间新闻——在进行公共讨论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抛弃了核实的责任。原因是目前这些平台把直播采访作为采集新闻的主要方法。直播采访的形式等于把权力完全交给了被采访者，新闻制造者也愉快地承认了这一点。嘉宾控制谈话的内容，他们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随意地东拉西扯阻挠讨论、误导甚至说谎。而新闻主持人，不管怀有什么意图和目的，都只具备非常有限的检验或订正的能力，最多只能发现少数非常明显的欺骗性内容。节目设计上的缺陷导致事实很容易被嘉宾在节目中想说的话所取代，但是电子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民意操纵（spin）让事实贬值的过程中，电视新闻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不幸的是，现实中技术的进步导致的是数字化暴政，而不是自由。我们不但没有得到自由，反而被技术所控制。新闻工作变成了仅仅保证技术正常运行。这就像《2001 太空漫游》中计算机 HAL 9000 带来

的梦魇一样。①

支持公民互相监督生产内容现象的最有力的证据是维基百科(Wikipedia)——用户自己编辑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基于一种被称为维基(wiki)的技术,它可以使多个用户创建和修改同一篇文章;维基可以保存文章的生成历史,包括每个人的编辑修改。维基百科的哲学是:某个用户引起的事实性错误可以被另一个用户发现并改正。然而维基百科不是新闻,虽然确实存在以维基技术为基础的新闻网站。

2005 年 5 月,纳什维尔(Nashville)的一名男子在维基百科上传了一篇关于退休新闻工作者老约翰·L. 森格赛勒(John L. Seigenthaler Sr.)的传记文章。这篇匿名的文章中包括几个杜撰的陈述,其中提到森格赛勒曾经被认为参与了针对约翰·F. 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刺杀活动,还提到他曾在苏联生活了 13 年。

事实上,该简历中只有一句话属实——森格赛勒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做过罗伯特·肯尼迪的行政助手。虽然这段内容失实,但是一直没人发现,直到 9 月森格赛勒听说这件事之后,才要求将它删除。

森格赛勒在《今日美国》撰文,讲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件事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阵营中都激起了激烈的讨论,内容涉及维基百科的规则和优点,同时也扩展到网络社区的事实观念和准确性观念。有些人建议将诽谤法延伸到互联网,而另一些人则批评森格赛勒不是直接修改自己的简历(维基百科允许任何人做修改),而是要求将它删除。

当然,这个事件并不意味着传统引证信源和信息的做法就理所当然地更加可靠。2005 年 12 月,《自然》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称,维基百科在准确性方面"已经接近"《大英百科全书》。这项研究从这两种百科全书中分别抽取了 42 个词条进行分析,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发现了 123 个错误,在维基百科中发现了 162 个。《大英百科全书》公布了一篇很长的驳论,称《自然》杂志的研究因为抽样方法存在问题,因此是错误的、不准确的,并且误导了受众。《自然》杂志回应说它认为"对比是公正的",并且拒绝收回已经发表的内容。[5]

当然我们还应该对维基百科和其他媒体做进一步研究。但是到

---

① 这是美国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1965 年导演的一部科幻片,其中一部分讲述在人类向木星进发的太空船上,具有超常智能的总控电脑 HAL 不听指挥,反抗人类,最后将太空船毁灭的故事。

2006 年，仍然没有证据支持技术专家的断言，即不论怎样，互联网的开放式结构超过了少数专业人士核实事实和信息的能力。

互联网为更多人提供了发言的机会，这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参与是件好事。但是新闻工作者和公民也要注意，不论何时，新的表达形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时，会带来风险。随着这一新兴的更有活力的公共论坛变得举足轻重时，被它取代的专业的核实工作也在削弱。因此，就在我们理所当然地庆祝公众交谈与媒体对话进一步融合的时候，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失去什么。我们不能认为核实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当事实被贬值成商品，当大量金钱和精力被投入观点和意见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更加关注是否得到了正确的事实。

公共对话是美国新闻事业的核心，事实上它们的出现甚至早于美国新闻业。正如我们提到过的，在印刷报刊出现以前，“新闻”就是在小酒馆里一边喝着浓啤酒一边相互交换的东西。新闻叙述并不仅限于静态的印刷文字，它们不是抽象的，而是日常谈话的一部分。虽然谈话也涉及信息交换，主要流通的还是观念和意见。

印刷媒体诞生后，这一传统并未消失，它们由早期报纸上刊登的论说所承载。诺厄·韦伯斯特（Noah Webster，他编写的字典里第一次给**社论**一词下了定义）在《美洲密涅瓦》（*American Minerva*[①]）的创刊号（1973 年 12 月 9 日）上发表的《对公众的演讲》（“ADDRESS to the PUBLIC”）中，描述了这一功能：“报纸不仅是运载我们称之为新闻的东西的工具；还是社会交流的公器，广大共和党公民通过它能持续不断地就公众关心的话题彼此进行交流和辩论。”[6]

在接下来的时代里，新闻一直实践着让媒体成为开放的公共论坛这个理念。当报纸（新闻纸）最终传递真正的“新闻”时，社论版就成为了社区进行讨论的地方，主要方式是刊登读者信件，不久又有了社论的对页（言论版），通常上面刊登读者所写的内容。出版人还通过一些更基本的方法使论坛观念保持活力。1840 年，《休斯敦星报》（*Houston Star*）率先改造了报社的大厅，让它不仅是进入编辑部的通道，还是开放的公共沙龙。他们不仅鼓励居民到这里来，而且提供“好喝的饮料、有趣的报纸和令人愉悦的雪茄”。在许多城市，把报社的大厅当成公共阅览室和沙龙的

① 密涅瓦（Minerva）是罗马神话中主管手工艺的女神，常被等同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象征智慧。

传统延续了一百多年。报纸不仅是社区的一部分，而且实实在在地成为了社区公众聚集和交谈的场所。[7]

《波士顿环球报》因为报道该地的校车危机①而获得 1975 年的普利策优秀公共服务奖。然而当汤姆·温希普(Tom Winship)对这些报道进行总结评估时，他认为该报在发挥论坛功能上做得不好。作为该报当时的执行总编，温希普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不应该禁止专栏作家在该计划实施的两周内讨论这个具有争议的事件。他回忆说，如果允许他们发言，《环球报》的专栏作家本来有机会对校车计划的实施细节提出建设性意见。他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积极地对校车计划的细节提出更多问题？我认为我们过于关注街头的抗议示威和报纸上反对派的攻击……我一直为审查并禁止刊登专栏专家的稿件而内疚。"[8]

让人感到难办的是我们今天赋予媒体公共论坛概念特殊的含义。20 世纪 90 年代，在媒体的影响下，形成了语言学家和作家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所说的"争论文化"(argument culture)。这种文化是由 CNN 的《交锋》(*Crossfire*)、商业电视台的《麦克劳克林小组》(The McLaughlin Group)和广播谈话节目引领的，但是却反映了某些更本质的东西和当前的政治文化。到 1998 年，模仿有线电视台 CNN《交锋》风格的节目已经相当普遍，下面的讨论中列举到的节目都有这样的特征。

下面这段对话中的拉里·克雷曼(Larry Klayman)，是司法观察组织(Judicial Watch)的主席和总顾问，司法观察是一个以挑战民主党官员为目标的保守派法律组织。克雷曼提出，克林顿总统应该再次被弹劾，因为他没有把白宫丢失的与具有争议的"文件门"事件有关的电子邮件呈交司法部，另一个原因是他派出了联络人与凯瑟琳·威利进行交涉。[9]克雷曼作为嘉宾参加了《交锋》节目，共同主持这期节目的是自由派民主党员比尔·普雷斯(Bill Press)和保守主义者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

克雷曼：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判总统有罪，而且我认为，比尔，让我说完……启动另一个弹劾程序的时候到了。

普雷斯：首先，我认为我们有提出上诉的机会。其次，我想指出你们的人……[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

① 校车危机也称校车事件，是美国废除种族歧视运动中的著名事件。1974 年，美国联邦法院要求波士顿地区实行黑白同校，接送不同学区学童上下学的校车首当其冲成为该政策施行后种族冲突易发的场所。

1975 年判定，隐私法案不适用。

克雷曼：他没有这么判决。他没有。他没有。

普雷斯：事实上，这就是当时他的看法，而且共和党和民主党从此都这么看。

克雷曼：比尔，白宫今晚让你提出的论点太次了。

普雷斯：不，不。

克雷曼：他们没告诉你白宫有一份内部备忘录，承认——克林顿的白宫——隐私法案是适用的。这一点毫无争议。

普雷斯：绝对、绝对存在争议！

克雷曼：法律条文里明明白白地写着它适用于总统的执行机构。

普雷斯：让我们转到信件本身。我得到了一大摞信件。它们都是个人信件，许多页的复印件……是凯瑟琳·威利手写的信件……

克雷曼：你是怎么得到这些信的，比尔？

普雷斯：这他妈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克雷曼：为什么？

普雷斯："亲爱的总统先生——"

诺瓦克：你会收到法庭传票的，普雷斯。

普雷斯："——1996 年 11 月 13 日。亲爱的——"

诺瓦克：我已经看到你不多久就会接到传票。

普雷斯：我能读下去吗，鲍勃，你能不打岔吗？

到 2000 年，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一天 24 小时内电视一共播出 178 小时的新闻和公共事件节目，其中 40% 是谈话节目。[10] 当时可能达到了争论文化的高峰，克林顿被弹劾事件是最顶点。但是这一增长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

争论文化背后的一个主要动力并不单纯是因为受众想看，而是因为谈话节目的制作成本十分低廉。和建立一套用来报道新闻的基础设施以及转播新闻所需要的成本相比，谈话节目的制作成本只是前者的一小部分。因此，在我们之前所说的由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网站、聊天室、博客、互联网论坛以及其他主宰传播系统的新型混合媒体文化（Mixed Media Culture）中产生了以评论取代核实（甚至有时越俎代庖地报道事实）的强烈愿望。传播革命更多地发生在新闻传输环节而不是新闻采集环节。到 2006 年，在所有有线新闻中，我们只知道有一个谈话节目做出过一些努

力，在节目中检查事实和发布更正。这个节目就是《抱歉打扰》(*Pardon the Interruption*)——ESPN 的一档体育谈话节目。

其二，正如我们在之前写的《扭曲的速度》(*Warp Speed*)一书中所首次提出的那样，争论文化倾向于贬低专业知识。为了竭力恢复正在萎缩的电视观众规模，或通过网络吸引新的受众，争论文化把重点放在了求新求异上。不妨听一听 2000 年福克斯新闻黄金时段的执行制片人比尔·夏因(Bill Shine)谈论他聘用希瑟·诺尔特(Heather Nauert)的理由，诺尔特目前是 ABC 的记者，她是新媒体文化中当红的年轻且缺乏资质的伪专家评论员中的一个。夏因告诉《华盛顿邮报》："我第一眼见到希瑟，就认为她正好具有我们需要的外在条件，她能把年轻观众吸引回来。"[11] 此外，年轻专家"散发出更多活力。年纪大一点的男性和女性一般靠在椅背上，比较放松。做辩论节目，需要那种活力和激情"。

虽然当时只有 29 岁的诺尔特没有任何从政、电视或纸媒新闻方面的经验，也从没为共和党工作过，福克斯却总是错误地把她称为"共和党顾问"或"共和党战略专家"。"我猜想，他们需要这个标签。"诺尔特解释说。不幸的是，这个新专家阶层除了想继续出镜以外，没有任何专业责任感或专业知识。因此，这些新的斗士们只能竭尽全力为电视制片人提供节目所需要的活力、态度和极端言论。媒体不仅没有对民意操纵——换言之就是夸大和影射——进行揭露和解释，反而表示热烈欢迎。通过制造"专家"，媒体并没有反映现实的公共讨论；而是在为自己制造可供电视播出的虚假讨论。

这类大型媒体新论坛的第三个特征是它并不一定会扩大公共讨论的范围。最引人注目的媒体论坛(有线电视谈话节目、广播节目和主要的互联网站)只关注范围极其狭窄的某些重大新闻。因为没有做新闻报道的基础设施，谈话内容只能集中在这些受众可以随时关注或放弃的旷日持久的简单新闻上。媒体的菜单可以提供肥皂剧里看到的所有内容，让普通人一夜成名，或者把最新的可怕事件与反恐战争联系起来。

这样做的后果十分明显。国家面临的许多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从这些大型公共广场上消失了。这些问题不得不交给一系列小型媒体去讨论。几家电视网不愿意转播像政治集会这样重要的公共生活事件，把它们交给有线电视去转播，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结果导致大众媒体无法再帮助公众关注那些应该共同关注的问题。美国文化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国家有能力号召全社会应对重大挑战，就像在面对法西斯主义或大萧

条时所做的那样。现在，这个特征正在消失。

最后是这种讨论本身的特征。媒体对谈话节目的爱好逐渐变成了对极端的爱好。在商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讨论”本身常常与新闻启蒙大众的使命没有任何关系。相反，由于这些讨论都建立在人人都喜欢看打架的理论之上，似乎任何问题都无法真正解决。在这里，没有人认为妥协是正当的选择。作家迈克尔·克赖顿（Michael Crichton）早在 1993 年在向 CNN 的节目致敬时就将此现象称为“交锋综合征”（the Crossfire Syndrome）。具有讽刺性的是，虽然这些节目吸引了一小批热情的追随者，但是长此以往，吼叫比赛疏远了更多在讨论中无法听到自己意见的公众。

克赖顿对这种争论文化的话语进行了解构：“你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吗？……你认为自己的中东之旅是浪费时间吗？……问题的结构决定着回答。”更重要的是，“这类问题假设，只存在简单化的非黑即白的现实，但是实际上没有人会真正这样描述现实”[12]。

“最近以来，我们都被看成持极端观点的人。要么赞成堕胎，要么反对堕胎。要么支持自由贸易，要么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要么支持私营部门，要么支持大政府。要么是女性主义者，要么是沙文主义者。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很少有人会持极端观点。相反，存在着一系列中间观点。”

争论文化具有报道水准下降、贬低专家、强调狭隘的爆炸新闻、强调过于简单化的极端观点等特征，它的问题在于剥夺了人们参加公共讨论的权利。公共讨论不仅应该得到媒体的支持，而且也是媒体自身生存的需要。把政治变成吼叫大赛只能使人民远离媒体。

“民主建立在多数派与少数派妥协的基础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罗伯特·伯达尔（Robert Berdahl）1998 年对一群记者说。[13]“然而，如果把每件事都上升到道德义务层面”，把它们简化为现存的刻板印象或者“想方设法让它们显得耸人听闻，便无法达成妥协”。而这些正是媒体的典型作为。

“我从不认为媒体和报纸是社会中愤世嫉俗风气的唯一源头，”伯达尔补充道，“但是一股愤世嫉俗的潮流正向我们涌来，这对市民社会体制极具破坏性……这种腐蚀性的愤世嫉俗之风导致缺乏同情和漠不关心。它会导致倒退。它会导致过于关注个人而忽略更大的共同体……我认为，愤世嫉俗正在腐蚀美国公民的交流话语，并对民主制度的根基造成威胁。”

伯达尔认为，新闻媒体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虽然它是独立的，但却不能超然世外。正像他所说的，新闻工作者不是“事不关己的看客”。他们是独立的，但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却与他们利益攸关。

以上看法绝不是认为主持公共论坛意味着不能参与讨论；它的意思只是在意见交换中应该考虑周全、集中于讨论本身并寻找解决方案。

“有些人认为新闻应该用智慧的方式大吵大闹，这种看法给我很大启发。”媒体批评家乔恩·卡茨(Jon Katz)对我们的研究合作者说。[14]“但是我的意思不是一边拿砖拍人脑袋，一边说‘哈哈，你是个混蛋’。你应该激发人们去做真正的思考——刺激他们证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并为之辩护，就像我必须证明和保卫自己的观点一样。”

概言之，公共辩论不应该成为吼叫比赛——像往人脸上扔馅饼一样进行政治攻击或把辩论当成娱乐。新闻媒体应该保证讨论兼容并蓄、阐明发微，准确反映某个讨论的社会意义，说明达成共识的社会意义。

到2006年，争论文化又演变成另一种更新的文化。这一变化在2004年10月15日得到了戏剧性的体现。这一天，喜剧明星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出现在了《交锋》节目之中。《交锋》作为争论文化的标志，已经播出了10多年。

斯图尔特是喜剧中心频道(Comedy Central)《每日秀》(*Daily Show*)的主持人，该节目非常流行，尤其受到青年观众的喜爱——这部分受众正是广告主渴望吸引的群体。斯图尔特之前曾批评了《交锋》节目和该节目攻击政治人物的方式，尤其是该节目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参议员的攻击让斯图尔特看不顺眼。因此，斯图尔特被《交锋》的两位主持人请到节目中。这两个主持人一个是保罗·贝加拉(Paul Begala)，代表政治左派；另一个是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代表右派。[15]

“好，我们请来了假新闻界(fake news)最受信任的人”，卡尔森带着灿烂的笑容说，这暗示着他十分盼望与斯图尔特对话，与斯图尔特的“美国新闻界中独特的政治立场”进行切磋。但是很显然(至少现场观众这么感觉)，从开始读准备好的开场白那一刹那开始，人们就发现斯图尔特此行不善，他不是来和主持人讲笑话的。①

---

① 这段节目的视频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题目是“jon stewart on crossfire”(http://www.youtube.com/watch?v=aFQFB5YpDZE)。

斯图尔特：为什么你们俩要争论？我讨厌看别人争论。

卡尔森：我们喜欢争论。

斯图尔特：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卡尔森：嗯，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吧。

斯图尔特：好吧。

卡尔森：约翰·克里——约翰·克里真的是最优秀的吗？我是说，约翰·克里是……

斯图尔特：他是最优秀的吗？我认为林肯不错。

卡尔森：他是民主党员中最好的吗？

斯图尔特：他是民主党员中最好的吗？什么意思？

卡尔森：对，就今年所有方面而言。

斯图尔特：我一直这么认为，民主制——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因为我只在这个国家生活过——是讲程序的。他们把这叫初选。

卡尔森：对。

斯图尔特：他们并不总是选最优秀的，但是谁赢了他们就选谁。因此，他是最优秀的吗？根据程序，是。

卡尔森：好。但是有9个人在角逐，你认为谁最优秀？你认为他是最好的吗，他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吗？

斯图尔特：给人印象最深？

卡尔森：是的。

斯图尔特：我认为阿尔·沙普顿(Al Sharpton)给人印象最深。我欣赏他说话的方式。我一般认为，那些意识到自己无法获胜的人说话才最自由。如果他们能获胜却大胆发言的话，会受到像《交锋》这类节目的……

贝加拉：《交锋》。

斯图尔特：或是《硬球》，或是"我想踹你屁股"节目，或是……都会拼命踩乎他。怎么看都很有意思。今天我勉为其难上这个节目，是因为私底下我对我的朋友(偶尔也在报纸和其他电视节目里)提到过，我认为这个节目实在太烂了。

贝加拉：我们注意到了。

斯图尔特：我想……我认为那对你们不公平，我应该来这儿告诉你们：我不喜欢你们的节目——节目烂还是其次的，重要的是它伤害了美国。但是今天我想上这里说……不要，不要，不要，不

要再伤害美国了。

到现在为止，主持人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了观众早就发现的事情——这个节目并不像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只是逗乐——卡尔森试图通过批评斯图尔特在自己的节目中采访约翰·克里的方式把矛头转向斯图尔特。

卡尔森：难道你不认为……你终于有机会采访这个人了吗。为什么不问真正的问题，而是拍他马屁？

斯图尔特：我问了。“你打算如何坚持下去？”确实是拍马屁的问题。事实上我在采访中问了他不少棘手的问题。

卡尔森：听上去还像那么回事。确实是这样。

斯图尔特：要知道，听你谈论我的责任问题是件很可笑的事。

卡尔森：我感觉你们之间有火花（默契）。

斯图尔特：我没有意识到这点……没准这能解释为什么你们要这么问。

卡尔森：你当然没有。你有机会……

斯图尔特：……难道新闻机构指望从喜剧中心频道寻找做人的准则吗……

斯图尔特：因此我想说的是，当你谈论自己如何在采访中为难政客时，我觉得这太虚伪了。我认为你们……

[插话干扰]

斯图尔特：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你们想要攻击我没有问出有力道的问题，哥们儿，别怪我翻脸了。

在七嘴八舌的混乱发言之后，斯图尔特回到了他在节目一开始提出的令卡尔森完全没料到的问题，卡尔森则拼命想让节目回到自己的控制之中。

斯图尔特：你知道，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们本应该对公共交流负责，但不幸的是你们没有做到。

卡尔森：我觉得你可以在新闻学院找个工作。

斯图尔特：你应该进新闻学院学习。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们只给采访对象像膝跳反射一样容易回答的问题……

卡尔森：且慢。我原以为你是在开玩笑。算了吧，放松些，说点好玩的。

斯图尔特：不，不，我不会扮猴子让你耍的。

贝加拉：继续。继续。

斯图尔特：我每天都看你们的节目。但是它要了我的命。

卡尔森：看得出来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斯图尔特：它太……噢，看这个节目让人太痛苦了。你知道，因为我们需要你们。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你们可以剥下政客们用营销和战略伪装起来的面具。

卡尔森：你真的是斯图尔特吗？怎么回事？

斯图尔特：是的，我是看你们节目但是却无法继续忍受的普通人。我真的忍无可忍了。

卡尔森：我实在想象不出和你一块吃饭会是什么样？你肯定一直在训人。你是不是喜欢这样对着别人演讲，还是你喜欢到别人家之后一坐下来就给人做报告，说他们做得不对、没有抓住机会、逃避责任？

斯图尔特：如果我觉得他们错了，当然会这么做。

卡尔森：老兄，我肯定不愿意和你一块吃饭。那太可怕了。

斯图尔特：我知道。你不愿意……为什么我们不能心平气和地交谈……拜托。

卡尔斯：我觉得你是看《交锋》看多了。接下来我们休息片刻。

斯图尔特：不，不，不。拜托。

卡尔森：不，不，请忍忍。我们要进广告了。

斯图尔特：求求你们，请别进广告。

在讲求速度的21世纪，斯图尔特在节目中的表现立刻成为媒体界的经典，被不断重播和讨论。在此后许多天里，CNN、《交锋》，尤其是卡尔森在博客、互联网聊天室里被骂得狗血淋头。2005年1月，CNN总裁乔纳森·克莱因(Jonathan Klein)宣布取消这个节目。在宣布该节目死亡的同时，他对媒体说："我猜自己会坚决站在约翰·斯图尔特一边。"

当时持这种看法的决不只有克莱因一人。争论文化并没有结束。但是，它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这些分散在各媒体的节目现在基本上不再是没有胜负之分的开放式辩论，而是变成了只有一方意见，并让观众觉得他

们已经找到最终答案——这种节目的典型代表是广播界的林博和有线电视的奥赖利(Bill O'Reilly)。

在奥赖利、林博、MSNBC左派分子基思·奥尔博曼(Keith Olbermann)、"空中美国"(Air America)广播节目中,以及和他们相关的博客里都不会出现争论。它们只提供答案。即使是那些表面上存在争论的节目,比如福克斯的《汉尼提和科尔姆斯》(*Hannity and Colmes*)也堕入这一新阵营中。科尔姆斯只是代表自由主义者的稻草人,几乎没有任何说服力。在信息供应貌似过盛的时代,新争论文化提供舒适轻松的答案,似乎兑现了曾经许下的帮助人们理解和梳理世界的诺言。到2006年,许多最受欢迎的博客也开始走这条路线。

除了认为观点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信息外,新版争论文化的另一个诉求是,在越来越多的人质疑独立报道观念的时代,带有立场的论据更真实、更诚实。在争论文化中,我至少清楚你的立场是什么。

对于更商业化的媒体而言,媒体公司把争论看成是恢复媒体与社群关系的途径,每当二者的关系变得疏远时会采取相应的手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一支向所有人开放的麦克风是不够的,这甚至会成为弄巧成拙的解决方案。

至于原因,论坛出版公司的总裁杰克·富勒讲得很清楚。虽然他讨论的是印刷媒体,但是同样的观念也适用于其他媒体。富勒在一次热心新闻工作者论坛上告诉我们:"这是一对矛盾。不能深入反映社群的报纸不会成功,但是不能挑战社群的价值观和既有观念的报纸也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因为它没有做到报纸应该承担的直言不讳和领导公众(honest and leadership)的责任。"[16]既要做社群的推动者又要做社群的牛虻,这是件具有极大挑战性的事情,但是这正是新闻工作者一直声称的目标。要成功应对该挑战,必须既要向社群成员提供所需的知识和见解,同时要为他们提供建立社群的论坛。

互联网使新闻对责任的追求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迫切,因为网络论坛、聊天室、博客和其他论坛使传统的私人交谈也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

2006年2月11日,博客Daily Kos blog上贴出了一篇标题为"《华盛顿邮报》的吉姆·布雷迪仍是个卑鄙的家伙"的文章。该文后面发表了200多条评论,都指向《华盛顿邮报》网站(WashintonPost. com)的执行主编杰姆·布雷迪(Jim Brady),数天以来他一直在躲避左翼博客的攻击。事件的

起因是几天前他认为读者的回复言论不雅，于是决定关闭邮报网站的博客评论功能。他所说的不雅言论，指的是2006年1月中旬在《邮报》博客上发表的一千多条指责《邮报》的内部检查员德博拉·豪厄尔(Deboral Howell)的评论。豪厄尔错误地暗示可耻的国会游说者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不仅曾向共和党员行贿，还直接给民主党员钱。[17]

Daily Kos和其他自由派博客一开始严厉批评豪厄尔，其后布雷迪写了一篇评论解释了他删除评论(后来有一些评论又被恢复)的原因，还说明了后来决定关闭所有评论功能(后来他们又重新开放评论功能，并制定了新的政策，规定了关闭评论的条件)的原因。布雷迪的专栏并未说服Daily Kos以及其他读者，他们于2月11日做出了反应。[18]

一个化名为塔米法(Tamifah)的评论者的反应如下：

> 我只想针对布雷迪文章中的一点进行评论，同时回答他提出的两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愤怒？布雷迪先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人们愤怒的理由很多。下面是其中的几个：
>
> - 和五年前相比，我们的安全感下降。
> - 因为谎言，我们卷入了战争。
> - 我们的工作得不到保证，其中一些人同时兼着二或三个低收入工作，原因是我们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下失去了工作。
> - 我们在两次联邦选举中被欺骗，天知道其他层次的选举中是否同样存在作弊。
> - 每次我们的意见有可能被接受时，总会有大量伪善的莫名其妙的仇恨逼着我们吞下苦果[对同性恋婚姻的仇恨，对良知权的仇恨①，对AFA的仇恨，对特里·夏沃(Terri Schiavo)按照自己的意愿体面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的仇恨②，对弱者、贫困者和老年人的仇恨]。

---

① 在美国，由于医疗工作者的信仰而与病人发生冲突屡见不鲜(如麻醉师不愿为堕胎者麻醉，生殖专家拒绝为女同性恋者做人工授精)，因此引来争论不断。病患拥护者认为医疗工作者应以患者为第一考虑，而反对者则倡议应该有"良知权"保护人们不必做违反其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事。这一争论还在继续。

② 针对是否应该切断患病7年的植物人特里·夏沃的进食管道进行安乐死的问题，特里的父母和丈夫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从1998年到2005年)的诉讼，该案件最后上升至由国会、总统和司法机关共同参与的立法事件，受到全美关注。

布雷迪先生，为什么我们会对你发火？因为每次像德博拉·豪厄尔这样的人代表控制国家的篡位者和窃国者们[1]故意说谎的时候，每次像你这样的人为他们撑腰的时候，你们把自己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和强权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像你和德博拉·豪厄尔一样为捍卫共和国的谎言而奋勇斗争。我们不会扣留信息不发表，就像《纽约时报》在选举前不发表《变态的政府正在监视美国人》这样的文章。我们也不会在知道美国政府关押并虐待人犯时隐瞒不报，天知道《华盛顿邮报》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会在我们和 Plame 案件的关系上说谎，并且像你们的鲍勃·伍德沃德那样企图操纵新闻。杰姆·布雷迪，我们正在承担已经被你们抛弃了的自由媒体的责任。

这篇评论的后面是另一篇自称叫侏罗纪猪肉(Jurassic Pork)的网友的评论，其中建议：

[布雷迪是]一个废话连篇的共和党走狗，它不过是《纽约时报》以仇视博客著称的比尔·凯勒(Bill Keller)的复制品而已……

废话连篇？走狗？说谎者？这些用词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的专业话语中。但是博客们经常发出这样的声明，其中充满对背叛者的愤怒，同时对政治和媒体权威部门的腐败与伪善表示极度怀疑。新闻工作者对这种用词和暗讽应该作何反应？在某种层面上这种表达过于个人化和恶毒。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它又反映了公众情绪中很可能普遍存在的真实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在主流的公共话语中却没有得到体现。

尖锐刻薄的批评并不是博客空间中新争论文化的唯一特征。同样，对主流媒体报道标准失误穷追猛打也只是博客的一个侧面。

在同一天的同一个博客里，就在同一个帖子下面，还有一些评论并没有攻击布雷迪，而是把矛头指向了阿布拉莫夫和游说丑闻本身。这种交流是另一种公共话语——对丑闻复杂的细节的不厌其烦的争论——这种讨论针对非常微小的细节，以至于许多公民很难跟得上。一个自称“总督”(Viceroy)的网友与一个名叫托马斯·威廉(Thomas William)的人在这里发生争论，他们争论的问题是阿布拉莫夫是否导演了印度部族向民主党人行贿。很难想象传统媒体会对用词做这么细致的语义学分析。

---

① 此处暗指乔治·布什的总统职位是通过在选举计票中作弊而得来的。

"总督"：你[威廉]针对使用"导演"(directed)这个词所提出的观点没有任何说服力。我们讨论"导演"这个词的时候，你指责[我]是在语义学上"咬文嚼字"。你混淆了委托人、客户、雇主或主人之间的区别。你同时忽略了一个事实：部落组织也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并未取得上风的争论中宣称自己取得胜利更是荒谬——你甚至还没真正讨论到实质问题呢。

托马斯·威廉的回应很友善，他讨论了**导演**和印度部族的自由意志的含义。

托马斯·威廉：如果你讨论的是"导演"的含义，我不得不承认，根据你对这个词的定义，可以说阿布拉莫夫没有"导演"任何事情，包括给两党的政治捐款。但是，如果想证明你要的结论，证明阿布拉莫夫没有导演任何向民主党提供政治捐款的结论，在文字上做文章这种方法实在相当蹩脚。因为如果想证明你的结论，还必须得承认他没有导演任何部族给共和党人提供政治捐款……如果我们必须表达立场的话，我会选择不同意。我认为你在目前语境下对"导演"的定义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因为它无视阿布拉莫夫和这些部族之间的所有联系，不论你把这种关系叫作什么，或者提出这种政治捐款形式完全出自他们的"自由意志"，这都是在为民主党护短。很抱歉，我不是民主党员，我是无党派人士，我对阿布拉莫夫也没有什么成见。

同一天，同一个博客，同一个主题，涉及内容之广让人惊叹。既有近似诽谤新闻工作者的赤裸裸的个人攻击，也有对主要新闻事实细节的公共辩论。这就是公共参与。更重要的是，这里面充满激情。

应该如何处理新闻与这种新型争论文化的关系？博客和互联网上的其他渠道会激起各种各样的感情。显然，它们会给公共对话注入传统媒体无法提供的内容。但是互联网讨论群体的特征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科技决定不了参与者的态度。机器改变不了人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他媒体如何应对。新的论坛也许丰富多彩，也许空洞无物，发帖和跟帖并不能取代传统新闻通过核实发现事实、提供背景的功能。如果那些搜集新闻、传递新闻的人不再花时间和金钱去报道、核实和综合——如果他们认为做判断只是精英才该干的事情，或者科技已把自己从古老的负担中解放出来的话——留给我们的就只剩下网络空间的闲聊了。

到那时候，谁来对聊天室中判断的真实性做出裁决？谁来调查不同集团的背景和动机？又是谁来给出即便是那些愤怒的争论者也想要知道的答案？

将来我们可能会让公民之间的相互监督发挥更大的作用。毫无疑问，这将扩大公共论坛的范围，让更多声音加入其中。但是该论坛必须建立在事实和大量背景信息的基础之上，否则，公民只能提出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这些争论不再具有教育作用；只是在强化先入为主的判断。公众将无法参与问题的解决过程。公共交流无法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它将最终消失在噪音之中，听不到大多数公众的声音。令人担忧的不是起辅助作用的公民媒体如何神奇，而是全职的、专业的权力监督工作正在消逝。

因此，新闻论坛首先应该遵守新闻的其他所有原则，其次，要注意麦迪逊提出的民主社会中妥协的重要作用与论坛的关系。但是要让论坛发挥启发而不是煽动的功能，新闻工作者应该如何吸引受众参与？这正是下面要谈的另一个新闻的基本原则。

## 注 释

[1] *Hardball with Chris Matthews*, CNBC News, transcript, May 11, 1999.

[2] Gene Lyons, "Long-Running Farce Plays On," *Arkansas Democrat-Gazette*, May 26, 1999, B9; available in LexisNexis.

[3] Cody Shearer, interview by Dante Chinni, June 2000.

[4] Robert D. Leigh, *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7), 23.

[5] 这一争论源于 Jim Giles 的一篇文章"Internet Encyclopedias Go Head to Head", *Nature*, December 22, 2005; 见 www.nature.com/news/2005/051212/full/438900a.html。2006 年 3 月，《大英百科全书》在其网站上以"Fatally Flawed"为题刊登了一篇很长的回复(http://corporate.britannica.com/britannica_nature_response.pdf)。几天后，《自然》也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回应文章。

[6] Warren G. Bovee, *Discovering Journalis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9), 154—55.

[7] Tom Leonard, *News for A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2.

[8] Tom Winship, "Obvious Lessons in Hindsight," *Media Studies Journal* (Sping/Summer 1998), 4.

[9] *Crossfire*, CNN, transcript, March 30,2000.

[10] 这些估计基于2000年7月10日华盛顿特区的电视节目。聊天节目所占比例的计算根据以下事实：在广播式电视节目中，有39.5%的新闻节目，27小时的谈话节目，3小时的伪新闻(*Access Hollywood*, *Inside Edition*)，此外还有108小时的有线电视新闻，其中既有新闻也有谈话节目。

[11] Paul Farhi, "The New Face of the Talking Head," *Washington Post*, May 25, 2000; available at www. washingtonpost. com.

[12] Michael Crichton, "Mediasaurus," speech delivered to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DC, April 7, 1993.

[13] Robert Berdahl, speech delivered to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iors Credibility Think Tank, San Francisco, CA, October 8, 1998.

[14] Jon Katz, interview by William Damon, Howard Gardn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1998.

[15] *Crossfire*, CNN, transcript, October 15, 2004.

[16] Jack Fuller, at CCJ Forum, Chicago, November 6, 1997.

[17] Jim Brady, "Blog Rag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1, 2006; available at www. washingtonpost. com.

[18] Daily Kos, "WaPo's Jim Brady Is Still a Wanker," February 11, 2006; available at www. dailykos. com/storyonly/2006/2/11/23938/9747.

# 第8章

# 引人入胜且息息相关

新闻工作者知道，身患绝症的儿童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治疗是个重要题材，但是大多数新闻工作者也知道，这个题材很难驾驭。如果只是老调重弹，表现家属如何悲痛欲绝，确实很难写好这个家庭拼命挽救垂危患儿生命的故事。如果在子女夭折的悲剧中再加上治疗过程中复杂的两难选择（是否应该以患者最后阶段的痛苦为代价，使用具有危害性的治疗手段延长患者的生命），那么对大多数记者而言，这个报道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黛安娜·萨格（Diana Sugg）是个例外。作为《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健康报道记者，获得普利策奖的萨格一直在等待这么一个故事，这是那种令她感到兴奋的故事："令人感动的、未经加工的、从未被讲述过的故事。"[1]她花了两年时间跟踪这个题材。她经常提醒自己，新闻工作者身上最普遍的缺点就是轻易放弃。她已经掌握了可靠的文件、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还对几个家庭进行了采访，但她感觉还有欠缺。

"我起初想报道的是，在美国，类似的儿童患者的死亡过程太受罪了，"萨格说，"吸引我注意的是这些儿童忍受着不必要的痛苦，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没有希望生存下去，可还是没人告诉他们真相。"[2]

痛苦是这类故事的核心：父母和医生们竭尽全力给孩子希望和关爱，但是讽刺的是，孩子却在受罪。虽然萨格收集了大量信息，但是她明白，来自专家和医护人员的证言并不能让读者看到事情的全部。因此，除了解释被医疗界称为"儿科保守治疗"（pediatric palliative care）的两难选择这一抽象概念外，她还想寻找能说明它的现象。她在12岁的R. J. 沃

伊特(R. J. Voigt)那里找到了,她对他生命最后的四个星期做了追踪报道。

沃伊特的故事说明了儿童个人经历的强大感染力,没有一个读者不为之动容。人们忘不了这一幕:眼睛浮肿的虚弱男孩挣扎着对母亲小声说:"天使。天使来了。"

"我知道这个故事能改变其他家庭的感情倾向,"萨格写道,"母亲或许会自问:'你害怕吗?'濒死的男孩或许会说:'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萨格花了三年时间才写出了理想的报道。在写作中,她使用了医疗记录、沃伊特的个人日记以及对几十个家庭成员、朋友、医生和其他人的采访。此外,萨格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摄影记者莫妮卡·洛波赛(Monica Lopossay)花了20多天的时间在沃伊特的病房拍摄,除了孩子去世的场面外,拍下了报道中描述的大部分事件。最后,所发表的由四个部分组成的系列报道在因类似情况失去孩子的家长们和医疗专业人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篇报道兼顾了沃伊特的个人故事和更大的社会问题,这两个方面都值得关注。萨格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之所以讲述某个人的个人经历,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很精彩。但是我们关心一个身患癌症的孩子,不仅是因为想知道他的命运,还因为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值得关注。它就存在于人们需要知道的新闻之中。"萨格在报道沃伊特之死的悲剧中所做的正好解释了我们要讨论的新闻的第七个基本原则:

**新闻工作者必须让重大事件变得有趣并且与受众息息相关。**

谈起如何才能使新闻既引人入胜又与受众密切相关时,讨论总会徒劳无益地将吸引受众和相关性对立起来。我们是应该强调新闻有趣、有吸引力、刺激人的感情,还是应该坚持只报道最重要的新闻?新闻工作者应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还是满足他们的本能欲求?

信息对故事,需要对欲求——这种引出吸引受众这一问题的方式完全歪曲了这个问题。新闻工作者告诉我们,现实中的新闻实践根本不是这样的。同样,我们也相信这不是人们接触新闻的方式。有证据证明,大多数人两样都要:既阅读体育版也看商业版,既看《纽约客》也看卡通漫画,既看书评也做填字游戏。《纽约时报》有25个海外分社,同时仅华盛顿分社就有80多个工作人员。该报既报道市议会的集会,也有桥牌专栏、饮食评论、家居和厨艺专版。《纽约每日新闻》以体育报道、娱乐图片

和花边专栏见长，但是它也和其他媒体竞争，毫不留情地向其读者报告正义得不到伸张或政府项目的失败。

讲故事和提供信息，这二者并不矛盾。最好把它们看成传播方式光谱上的两极。其中一极可能是你编出来讲给小孩听的睡前故事，它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为了增进感情，让彼此快乐。另一极是原始数据——体育比赛的统计数据、社区公告板或股票行情表——这里面没有任何故事。和多数传播的内容一样，新闻大多居于两极之间的某个点。写作教师罗伊·彼得·克拉克（Roy Peter Clark）和奇普·斯坎伦（Chip Scanlan）说，有效的新闻写作必须既做到清晰明了地提供公民必需的新闻，同时还要文字优美，这也是对记者叙事技巧的基本要求。

照此来看，最优秀的作品——那些超越具体报道对象的作品——以受众意想不到的方式，通过优秀的报道、思考、叙述等，把故事向传播光谱的中间地带推进。就像好莱坞的介绍会揭示潜藏在电影后面更深刻的意义一样，调查性新闻披露的内容也会揭示丰富的人性，对人口统计学数据的整理也能把某个社区生动地呈现在受众面前。因此，新闻工作者的任务是想方设法使每则新闻中的重要之处变得生动有趣，使严肃的成分与家长里短的轻松部分以适当的比例融合在当天的报道中。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新闻就是有目的地讲故事。这个目的就是向人们提供理解世界所需的信息。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寻找人们需要的信息。第二则是使这些信息具有意义、和人们息息相关并且引人入胜。

让新闻引人入胜也是新闻工作者对公民的义务之一。一位记者在接受我们学术研究合作者的采访时这样表述："当你发现了一些东西之后却不满足于此，还想找到最好的方式讲给别人听，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你就是新闻工作者。"[3]

换句话说，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不仅是提供信息，还要用人们愿意倾听的方式提供信息。"我们最重要的一些挑战都围绕着如何吸引读者产生——许多读者，许多不同类型的读者，"网络杂志《热线》（*HotWired*）的前执行总编霍华德·莱因戈德（Howard Rheingold）说，"在光谱的一端是最重要的事情——战争还是和平？税率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光谱的另一端是纯粹让人感兴趣的事情……许多新闻是这两者的混合体。"[4]

但是为什么吸引力的问题会被如此歪曲，好像没有通融的余地？既然新闻可以既具有重要性也吸引人观看，既然人们所需要的信息不是非

此即彼的两极，为什么新闻不能总是做到两者兼顾呢？

要让新闻具有吸引力，必须克服许多问题：仓促、无知、懒惰、公式化、偏见、文化盲点。要把新闻写好，超越印刷媒体的倒金字塔结构，以及电视新闻的“导语—同期采访—连接—同期采访—总结”公式，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总之，写作要讲究策略，仅仅把大量事实塞进简短的陈述句中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而言，时间太宝贵了，他们觉得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

不幸的是，这个时代的公众除了新闻以外，还拥有更多令人感兴趣和兴奋的自由选择，而且他们对新闻越来越不信任。此外，削减对传统新闻编辑部的投入导致员工人数减少，并且报道重点常常集中在新闻的数量而不是质量上。要了解所报道的话题也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好的新闻作品一定要经过扎实而深入的采访，用大量细节和背景把整篇文章整合成一体。不是每篇文章都要像萨格那样写上三年，但是好的作品绝不是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坐在键盘前或非线编辑机前就能完成的。

即使记者有时间进行采访和写作，还存在报纸版面和新闻节目播出时间有限的问题。因为新闻机构认为受众注意力的持续时间缩短，因此要求制作短小的新闻，记者很难有足够的版面和时间把故事讲好。

但是吸引受众注意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互联网已经让空间有限不再是问题。理论上讲，在互联网上，视频、文字叙述、背景资料、解释性链接和图表的数量都是无限的。因为空间的限制不再成为问题，受众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不断提高，要求他们在信息的供给（和舍弃）数量上做出最佳的选择。因此时间成为唯一的稀缺资源。

讽刺的是，有证据显示，某些关于注意力持续时间的传统看法具有误导性，不但对新闻无益，而且已经伤害到了新闻事业。例如，卓越新闻项目对地方电视新闻展开的一项长期研究发现，短新闻——长度少于 45 秒——比例越多的电视台，观众越容易流失。相反，长度超过 2 分钟的新闻较多的电视台反而吸引了更多观众。[5]

艾拉·格拉斯（Ira Glass）主持的广播节目《这种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专门播出“像电影大片一样的广播新闻”。他说，在 60 分钟的节目中，该节目的听众的平均收听时间是 48 分钟。每周共有 170 万听众收听《这种美国生活》，每次节目有 3 则新闻，体裁从深度报道、评论到寻找音频资料不等。[6]

能够证明传统看法存在问题的并非仅此一例。关于公民对新闻要求

的错误看法会把我们引向自我毁灭。

## ◉ 娱信(infotaiment)的诱惑

ABC新闻的个性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做出同情的表情,凝视着眼前这位女孩。

"他吻了你?"她问。

"是的。"莫妮卡·莱温斯基回答道。

"感觉如何?"沃尔特斯的表情好像是一位掩饰不住想要挑逗对方的知心阿姨。

"他很会接吻。"

"你是个喜欢感官之乐的女孩吗?"

"嗯——。"

"充满激情?"

"是的。"

"比尔·克林顿也是个充满激情的男人吗?"沃尔特斯身体微倾,靠近被采访对象。

莱温斯基的脸突然一红,沃尔特斯在挑逗她。接着莱温斯基回答道:"我觉得他是个追求感官享受的男人,很能体会声色之乐。但我想他同时受到强烈的宗教教育的影响。我觉得他挣扎在自己的情欲之中,因为我想他自己认为那不妥。同样,我觉得他也一直在试图控制自己,但是最后的防线崩溃了。"

"你们第一次亲密接触时,"这位有37年从业经验的电视网新闻报道主持人继续问道,"你们亲热的时候总统接了一个议员打来的电话。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这是个私人问题,"25岁的莱温斯基开始回忆,"那让人感觉到刺激。卷入到这种关系之中,令人兴奋,也许因为有点危险,如果假装不存在这种感觉是不真实的。"

ABC新闻就像这样公开而急切地继续对莱温斯基的采访。

"你或者总统是否担心有人闯进来发现你们?……这种想法是否会更令人兴奋?"沃尔特斯接着问。

……[7]

在ABC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一半时间都在仔细研究这类问题,

诸如总统是否擅长接吻、是否是一个情欲旺盛的人、害怕被发现的恐惧是否是他性行为的心理动机等。只有到第二部分，节目才开始探索事实性问题——和宪法有关的问题——例如莱温斯基是否在书面陈述中为了保护总统而撒谎，作为回报总统是否在实习结束后替她安排工作等。

简而言之，这个主要内容都在人们意料之中的独家新闻或采访就像"莫妮卡的故事"，巧合的是，这正是莱温斯基要借这个访谈推销的新书的题目。在这个事件中，新闻不仅强调性爱和激情，本身也成了双方商业促销的一种形式。ABC 利用莱温斯基提高收视率。莱温斯基利用 ABC 卖书。

《为名而狂》(*The Frenzy of Renown*)的作者和娱乐产业研究的权威、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英语教授利奥·布劳迪(Leo Braudy)说，娱信新闻的关键特征是"把新闻包装成秘密。你必须是了解隐情的报道者，然后引诱受众入彀。但是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发现，这个秘密多为丑闻或淫秽的内容"。反过来，这又使"受众认为自己也是知情者之一"——他们需要再来点淫秽的内容才能满足。[8]

这些只不过是小报的经典噱头而已：新闻把性和名人丑闻当作真相加以揭露。布劳迪所说的把新闻变成娱乐和把娱乐变成新闻的主要技巧在今天的媒体中俯拾皆是。其中最有趣的是，那些本该致力于报道严肃新闻的机构却在这个问题上展开相互竞争，就像我们在 ABC 以及它对莱温斯基的采访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再来看一下《新闻周刊》在新世纪头 6 个月的封面报道。一项研究发现，在所有 22 个封面里，有 17 个封面要么是娱乐明星(和性有关)，要么使用了揭露秘密的语言，比如"伊连：监护之战的幕后"①、"内幕故事"或"关于……的真相"。尽管当年是总统初选年，然而在 22 个封面中，只有两个与政治有关。剩下的，有两个涉及性，三个涉及健康，两个涉及科技，两个涉及商业，两个涉及古巴男孩伊连·冈萨雷斯(Elian Gonzalez)的案件。没有一个封面涉及全球事务。

---

① 1999 年 11 月，古巴男孩伊连·冈萨雷斯和他母亲在乘小船由古巴前往美国的途中翻船。伊连的母亲及其他 10 人遇难，伊连及另外两个人幸存。伊连获救后由他在美国迈阿密的亲属抚养。伊连的父亲起初并不知道伊连母子俩的去向，在得知消息后，向美国政府提出要让伊连回到古巴由他抚养，但伊连在美国的亲属并不同意。伊连的父亲及古巴的亲属和伊连在美国的亲属之间围绕着伊连的监护权问题，闹上法庭。此事把美国、古巴两国政府以及伊连父亲、伊连在美国的亲属、古巴裔美国人社群都牵涉进来，并成为当时美国大众媒体关注的焦点。地方法院判决伊连应该由其父亲带回古巴监护。虽然后来伊连的美国亲属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此案。最后伊连被强行带走，于 2000 年 6 月 28 日回到古巴。

不论对《新闻周刊》还是更大的文化环境而言，这都标志着某种巨变。根据卓越新闻项目的研究，1977 年《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中，有 31%涉及政治人物或国际人物，只有 15%涉及娱乐明星或名人，数量只有前者的一半。但是到 1997 年，这两者的比例完全颠倒。政治人物或国际人物的封面只占总量的十分之一，下降了 60%，相比之下，名人和娱乐明星的封面数量则增长了 40%（超过了十分之二）。[9]

还有一组数字更清晰地显示出这种变化：《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两本杂志，与《人物》杂志封面发生撞车的比例，1997 年是 1977 年的 7 倍。[10]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只关注重要事务的新闻和完全不关注重要事务的新闻一样，都不正常。反之亦然。

无论何时，我们都能找到煽情新闻畅销的例子。比如芭芭拉·沃尔特斯对莫妮卡·莱温斯基的采访就是当时 ABC 新闻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长期来看，倾向于信息一极的组织最终将超过倾向于娱乐一极的组织。随着像沃尔特斯—莱温斯基采访这样的名人加丑闻的新闻在电视网新闻中大行其道，转向娱信不仅没有遏制电视网新闻的观众流失，反而不断加剧其流失。[11]历史的发展一直就是如此。

20 世纪初，随着 19 世纪 80 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开始向中产阶级流动，黄色新闻的煽情主义让位于《纽约时报》严肃清醒的报道风格。举例来说，到 20 世纪 20 年代，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变成了一份相当文学化的报纸。随着“咆哮的 20 年代”被严峻的大萧条所取代，小报的名流新闻时代与以名人广播和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为代表的八卦新闻贩卖者让位给新的严肃新闻，后者一直延续到整个冷战时代。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报之战，导致大部分城市变成一城一报，这些幸存者不是以发行量取胜的小报，而是每个城市的严肃报纸——《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费城问讯者报》、《波士顿环球报》以及其他。电视也一样。电视网新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节目总是那些分社最多并专注于制作严肃新闻的节目，不论是 60 年代的《亨特利—布林克利报道》（*The Huntley-Brinkley Report*），70 年代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持的《CBS 晚间新闻》（*The CBS Evening News*），还是从 80 年代中期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由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主持的《晚间世界新闻》（*World News Tonight*），无一例外。

卓越新闻项目对 1998—2002 年间新闻的研究发现，甚至在地方台电视新闻中也存在类似的规律。那些 60 秒以上，在重要性、创造性、平衡

性、权威性方面水准很高，关心民生，不过分煽情的新闻不仅收视率高，保持新观众继续收看的能力也胜于质量较次的新闻节目。[12]

这些证据说明，从长远看，仅仅依靠娱乐并不能吸引受众，这是失败的新闻商业策略。其原因简单而且有说服力，一共有三条。

首先，如果仅仅提供琐事和娱乐，会败坏一些人对所有信息的胃口和期待。这对于那些由于政治倾向、时间和资料受限，不会寻找替代性信息的人来说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很多地方电视新闻来说，这是目前面对的两难选择。根据加利福尼亚一家居于领先地位的电视观众调查公司——英塞特调查(Insite Research)的数据："在被调查的收看地方新闻的人中，有一半不再在乎他们看的是什么频道。"[13]

娱信战略带来的第二个长期问题是，它损害了新闻机构传播严肃新闻的权威性，赶走了那些想看严肃新闻的观众。这种现象也可以在地方电视新闻中见到。例如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实验室的研究者在一项调查中发现，人们列举最多的 7 个不再观看地方台电视新闻的原因中，有 5 个都是它缺乏实质内容(另外两个原因是不在家或太忙)。[14]这项调查不仅引起了许多地方新闻工作者的共鸣，也得到了其他调查机构的证实。英塞特在另一项调查中表示，"回避地方新闻的现象在过去的 10 年间增长了一倍"。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大多数电视台花大量时间重复报道同一事件。"

最后，娱信战略作为一个商业计划存在缺陷，因为作为新闻媒体，当你将新闻变成娱乐之时，就是在以己之短攻其他媒体之长。新闻机构如何能够在娱乐上和娱乐机构相抗衡？为什么它要这么做？新闻的价值和魅力就在于其与众不同。新闻的基础是与公众密切相关。娱信战略虽然从短期来看可以吸引受众，并且制作成本低廉，但是因为它重形式而不重实质内容，同时也会让受众变得浅薄。这些受众只是为了追求刺激，他们的注意力很快会转到下一个"最刺激"的事情上。

这些挑战，就像注意力分散的公众，并没有使新闻做不下去，只是变得更困难而已。这些挑战也是分水岭，将成功的新闻和懒惰的新闻、好新闻和坏新闻、全面的新闻和过度煽情的新闻区别开来。

为什么新闻工作者会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缺乏交流。发展心理学家威廉·达蒙(William Damon)和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对新闻工作者进行研究后，认为令他们印象最深的一个结论是：和其他职业相比，不同年龄段的新闻工作者缺乏经验教训

的传递和沟通。此外，学徒制系统被打破后，没有新的系统取而代之。在一线的新闻工作者看来，新闻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至少存在一定争议。[15]美发师的继续教育时间都比新闻工作者的长。[16]

更重要的或许是，要通过讲更精彩的故事重新争取受众，不仅困难，而且费时费钱。因此，当新闻产业试图找回流失的受众时，经常强调的是那些易于管理的措施，比如增加市场营销预算、削减成本、更换主播或创办新的新闻栏目。举例来说，当 20 世纪 80 年代报纸产业发现阅读率下降时，它们强调版面、设计和颜色上的改革。80 年代的编辑开发出了针对非报纸读者的报纸版面模型，这个模型基本上按照一定模式，把新闻往里面填充，指挥说："这里填文字。这里填文字。这里填文字。这里填文字。"没有人重新思考新闻的叙事方式。

个别新闻工作者在使新闻具有吸引力和相关性方面获得了成功，他们使重要的问题变得有趣，使有趣的事件变得重要。但是正如威廉·达蒙发现的那样，他们一般通过摸索试错或借鉴同行经验自学成才。但是最优秀的观念和做法并没有得到推广。

在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介绍如何才能使叙述变得引人入胜——使重要的问题变得有趣。那要写本新书才能说得清楚。但是我们将讨论一些观念性的问题，帮助公民、公民新闻工作者和职业新闻工作者从新的角度思考如何讲故事。

首先，从讨论当前的不足入手会更有帮助。接受我们采访的新闻工作者认为，大多数传统的新闻叙事方法具有一些共同的弱点。它们包括：

缺少人物性格——信源变得千人一面，是模式化的人而不是真实的人。

时间停滞，每件事都发生在昨天或今晚。

信息只适合某类受众接受，没有针对不同受众。

新闻写得像内行人士在交谈。

没有说明新闻的重大意义。

没有把全球问题本土化或把本土问题全球化。

叙事方式千篇一律，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

用互联网新瓶装旧酒而不是把它作为独特的技术加以利用。

## ◉ 一些新方法

如果新闻行业竭尽所能，集思广益，搜索不同媒体中的独特观念的话，是可以发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点子的。

第一个观念，精彩的叙事并不是坐下来进行视频编辑、写脚本或在电脑屏幕上打开一个新页面之后才正式开始。它始于你还没出去采访之前。它包括如何与众不同地报道、寻找哪些不同的信源、提出哪些新颖的问题。

## ◉ 受众是谁以及他们需要知道什么？

记者在报道开始时，通常会“查找剪报”，搜索数据库，然后再驾车上路，报道最新进展。然而，这种做法会使报道具有局限。

现在有个别记者提倡一种完全不同的报道方法。拿到任何一个任务，记者首先应该问以下几个问题（读者也能发现这些问题）：

1. 这则新闻讲的究竟是什么？
2. 这则新闻的受众是谁？他们需要知道哪些信息才能对这个主题做出判断？
3. 谁掌握信息？
4. 叙述这则新闻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这些简单的问题会对报道产生巨大影响。它们引导报道贴近公民——受众第一，利益群体、知情人士和其他直接参与者其次。如果新闻机构目前依靠的信源不能回答公民想知道的问题，这些问题还会指引找到传统素材中不曾出现过的新信源。过去惯用的报道方式可能限制了受众的视野而不是扩大其视野，而这些问题将使新闻报道摆脱陈规。

## ◉ 对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为何、如何的新定义

新闻工作者应该重新思考新闻的基本要素——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为何及如何。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波因特学院（Poynter Institute）的

写作教授罗伊·彼得·克拉克(Roy Peter Clark)正是这么做的。多年以前,克拉克就非常欣赏西雅图的作家和编辑里克·扎尔勒(Rick Zahler)的观点:目前的新闻写作把充满活力的动态事件变得僵化无比。时间只有昨天。地点只是电头地点。扎尔勒想为新闻"解冻",让事件恢复活力。在扎尔勒的观点的基础上,克拉克现在经常谈及的是如何达到上述目标。

克拉克说道,"谁会成为主要角色。情节是什么。哪里是故事发生的场景或环境。动机或原因是什么",最后,"如何进行叙事",或者说是如何把所有元素组合在一起的。[17]克拉克经常指出,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十四行诗的前 8 行里就道出了包括结局在内的所有故事情节,还有什么可告诉观众的? 他解释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戏里要补充的只是缺失的细节。"我们通常已经告诉了你新闻是什么,但是你还是想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莫妮卡·莱温斯基开始是怎么进白宫的?叙事就是回答'那是怎么发生的?'"克拉克说。

如果我们把**何人**看成角色、**何事**看成情节、**何地**看成环境、**如何**看成叙事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信息和故事融为一体。新闻不再只是数据,还有了更多意义。要坚持这么做,就必须要进行更多的采访,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俄勒冈人》报的主编和写作指导杰克·哈特(Jack Hart)说,如果写叙事性报道,每天完成 15 到 30 英寸比较合理。主要思路就是追踪某个角色,看他遇到了什么困难并且如何解决。可以通过 5 段叙事方法来完成上述任务。首先是呈示(exposition),在这一部分介绍角色及其遇到的困难。接下来是行动(rising action),这一部分展示解决困难中所碰到的各种障碍。然后是领悟(insight),这时角色获得某种启示。第四部分是解决问题(resolution),困难得到解决。最后是结局(denouement),趁机让松散的结尾变得紧凑。[18]

## ◉ 尝试新的叙事技巧

新闻中最常见的叙事结构带有明显缺陷。随着新闻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复杂,题材越来越宽,许多一流的新闻工作者发现这种结构无法满足需要。"从 A 开始按部就班地到 Z,有时并不是最好的方式," CBS 新闻的威廉·惠特克(William Whitaker)对我们的研究合作者说,"有时可以把 L、M、N、O、P 从中间抽出来放在开头,这会使故事的意义更加突出,那

也是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同时人们能看得更清楚。”[19]

幽默周刊《洋葱新闻》(*Onion*)[①]的首席撰稿人托德·汉森(Todd Hanson)在接受《网络新闻评论》(*Online Journalism Review*)采访时说，《洋葱新闻》的幽默来自于模仿报纸陈旧过时的报道方式。该杂志经常制作“国会批准40亿预算购买面包”以及“女孩职业理想排行：医生律师行情看涨，马戏团明星和仙女看跌”之类的新闻。[20]

## ◉ 最吸引受众的方法

普利策奖得主雅基·巴纳辛斯基(Jacqui Banaszynski)说，想要就同一题材写出不同的报道，可以尝试从七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向以及第八种(非写作的)途径加以思考。[21]这些方向不一定对任何一个题目都同时适用，但是在报道特定题材时，这种快速头脑风暴练习会产生大量丰富多彩的想法：

1. 人物特写(A profile)。找出故事背后的人物，推动事件发展的角色。不仅可以写人物特写，还可以写出地点、事件，甚至建筑的特写。
2. 分析解释(Explanatory piece)。告诉读者为什么会发生某事或为什么会如此进行。
3. 问题或趋势报道(Issues and trend stories)。问问自己是否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有待探索。趋势并不一定总是与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关；不妨想想犯罪或经济。
4. 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关注不义之举，“追踪资金链”，分析权力斗争，利用能够获得的文件。
5. 叙事(Narrative)。一个有人物、场景和冲突的故事。
6. 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天(Descriptive day in the life)。另一种叙事方法，关注某个特定时刻，比如和警察一起驾车执勤或参观新开张的博物馆。
7. 采访实录或观点报道(Voices or perspective story)。通过独特的

① 《洋葱新闻》是美国著名的“假新闻”媒体，以刊登模仿新闻的幽默讽刺文章著称，内容虽然荒诞恶搞，但不乏睿智的评论。

方式让受访者讲故事：问答体、圆桌讨论、引语或叙事片段构成的新闻。

8. 视觉新闻(Visual story)。照片、图表或图解可能是讲述某些故事的最佳方法。

## ◉ 沙漏体

20世纪90年代初，克拉克注意到了一种他称之为“沙漏”(hour glass)的新闻结构。“它既不是纯粹的叙事结构，也不仅是倒金字塔结构。……这种形式以新闻体开头，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接下来金字塔中断，另起一行开始叙述，通常按时间顺序展开，例如‘此事发生时，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报道摆脱倒金字塔结构，以更具戏剧性并且通常更真实的语言进行叙述。

## ◉ 问答体的前景

在一个探讨如何拓展联系公民的新方法的会议上，纽约大学的新闻学教授、以敏锐见长的媒体文化批评家杰伊·罗森(Jay Rosen)说，他认为问答形式是一种有力的但是未被充分利用的体裁。这种形式迫使新闻工作者以公民可能提出的问题为中心组织架构材料。它也使受众能迅速通览新闻，取其所需，不必从头到尾阅读全文。有趣的是，这种体裁在互联网上很常见，并以“常见问题”(FAQs)的形式出现。

## ◉ 体验式新闻

迈克尔·赫尔(Michael Herr)的《战报》(*Dispatches*)一书被认为是关于越战的最佳作品，他给战争报道增加了全新的维度，把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所说的“墙上的苍蝇”[①]的技巧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赫尔不仅收集了一般战地报道所需的大量细节，还让战士自己发言，他挑选的材

① 指不引起被报道者注意、不干扰被报道者正常活动的采访。

料不仅诉说战士们的故事，而且捕捉到了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状态。正如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在《绅士》（*Esquire*）上发表的书评中所写的那样："赫尔比其他人更准确地捕捉到了战士们身上绝望的信号，他们过得不错但同时毫无希望。"[22]

## ◉ 显而易见

道格·马利特（Doug Marlette）曾经获得社论漫画奖，他同时也写过话剧、电影脚本和小说，他说新闻的最大问题是多数内容过于"乏味"。

"当感觉乏味时，你会停止学习，导致无效传播。"[23]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不再感到新奇"。在戏剧里，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乏味，叫作"显而易见"（being on the nose），意思是"你在说别人已经知道的东西"。

马利特说，在新闻里，它表现为"述说而不是呈现；做报告似的说教，好为人师。在电视新闻里，表现为记者告诉观众他们已经看到的东西"。在报纸新闻里则表现为针对某一点作冗长的分析而不是向前推进。

我们应该如何防止新闻"显而易见"？

## ◉ 心理图像

防止"显而易见"的一个方法是帮助人们在心中构建自己的图画，而不是替他们绘制画面。安妮·兰（Annie Lang）在印第安纳大学讲授电信传播并且主持传播研究所，她提出，学术研究已经明确地承认了包括隐喻在内的心理图像的力量。"什么也比不上对某人说'你身后有条蛇'更令人恐惧。那甚至比看到真蛇还让他们害怕。"[24]

## ◉ 揭示：将故事与深层主题相连

NBC新闻的记者约翰·拉尔森（John Larson）提出，讲故事的关键在于出人意料。但是他又补充说："但是出人意料要有意义，而不局限于使人惊愕或震惊。"[25]在拉尔森工作的《日线》节目里，他们把这称为"揭示"。在拉尔森的心目中，最好的揭示是新闻触及某些预料不到的深层的主题。那是新闻"在某些最基本的层面打动我们的东西。它们可能是母亲对子女的爱、丈夫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也可能是野心、贪欲、私心。在

优秀的新闻中，总有一些以简单的方式呈现但却十分重要的东西”。

这些主题不是由新闻工作者说出，而是被表现出来或揭示出来，这取决于记者如何使用新闻素材——恰到好处的引语、电视的关键镜头，或者两个人默默地四目以对时的眼神。拉尔森说：“优秀的故事引导你发现真相；但不会直接说出真相。”

把新闻素材和更大的主题联系起来的正是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在《权力掮客》（*The Power Broker*）、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在《那样的权力》（*The Powers That Be*）、H. G. 比辛格（H. G. Bissinger）在《星期五夜晚的灯光》（*Friday Night Lights*）或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太空英雄》（*The Right Stuff*）中所做的。卡罗为林登·约翰逊总统和纽约权力掮客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写过传记；他说，以小见大的思想指导着他一生的工作。当他为摩西这位改变了纽约市但却不为人知的官僚作传时，卡罗不愿只是单纯揭露。“我想做的是解释政治权力如何运作，因为我曾是名记者并且一直在报道政治，在为报纸工作时也试图解释政治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但我总感觉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原来有许多事情要追溯到罗伯特·摩西这个人身上，许多事情是我以前并不理解的。现在，这个人就在我面前，他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但是我逐渐意识到，他的权力比任何州长或市长的还大。”[26]

## ◉ 新闻中的角色和细节

另一些新闻工作者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角色是故事吸引受众的关键。常见的手法是通过细节使角色更加人性化、更加真实。古巴男孩伊连·冈萨雷斯遭遇海难。2000 年，他的父亲从古巴来到美国想把儿子接回家。在对移民局工作人员的整个采访中，最让 KARE 电视台的记者博亚德·赫珀特（Boyad Huppert）感动的是一个细节，“这位父亲知道［儿子］所穿鞋子的尺码”。对于赫珀特而言，这个细节“点亮了这个男人的全新形象”，揭示出父子之间的关系、他的感情投入和他的性格。[27]

但是许多新闻工作者却疏于塑造角色。他们笔下的人物不过是道具；是被套进记者模板的姓名和面孔——调查警官、反堕胎抗议者、愤怒的少数派发言人、悲痛的母亲。造成该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让这些被报道者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说话。新闻中的引语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报道对象和受众进行深入交谈的途径。电视中拍摄被采访对象的方式是

造成此现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通常，被拍摄者坐在人工制作的背景前面，身上打着完美的灯光，或者站在某建筑物前，前面是一圈话筒，他们看上去一点不像真实的人。他们只存在于虚假世界——新闻所营造的世界——之中，像夸张的漫画而不是真正的角色。

把某人称为“调查警官”是在描述信源。但是，“刘易斯警探，重案组警察世家，他父亲20年前曾经办过类似的案子”才是角色。第一种描述方式把重案调查员刘易斯放在固定模板里，虽然方便了记者，但是缺乏深度，把他变成了和其他调查警官没有任何区别的稻草人。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次级共和党成员”就是模式化的写法。“有30年从军经历的众议员，他反对所有减税方案，在成为残障儿童的祖父后，唯独不反对与心理健康有关的方案”，这种描述就有趣得多。但是要达到第二个层次，将信源变成真实的人，必须提前围绕人物进行思考。包括要向警官提出更多问题，寻找更多的细节，把他当成潜在的角色而不是信源，好奇地探索。这或许要花更多时间，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也不必问太多问题。只需问：“你是否听说过类似的案子？你的调查风格或方法有哪些地方与众不同？”最重要的是，把这个警官当成真实的人进行交往，而不是为了获得引语或事实而与其接触。

对电视新闻来说，这种思维方式还意味着重新思考新闻摄像。同时担任自己作品摄像、记者、撰稿人和编辑的ABC《夜线》制作人戴维·图雷卡摩（David Turecamo）总是尽量把采访对象拍得像在真实生活中一样——站在柜台后面的店主、开着车的销售员、走向会议室的商务人士，一般都使用长镜头。他的作品都是研究小角色。观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突然看到了真实的人、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而不是“倡导者”或“游说者”。

## ◉ 寻找故事中的隐喻或隐性结构

在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中，或许没有人能像ABC新闻的记者罗伯特·克鲁维奇（Robert Krulwich）那样富有创造性地把重大题材变得生动有趣。克鲁维奇说，他的方法就是寻找每个故事后面能使它变得难忘和真实的隐性素材。这意味着避免公式化，把每个故事看成独一无二的，让素材来决定结构。“我做了许多抽象问题的报道，你必须找到人们容易记住的隐喻。这些隐喻就像挂大衣的钩子把人们钩住。如果你找到了这个钩子，

那么，‘嗯，这个故事讲的是会打鸣的小鸡仔的故事，是这样吗？这是什么意思？哦，原来是货币贬值啊。’”

克鲁维奇的隐喻常常让人觉得意外。为了强调日本经济增长变缓的概念，他把视频变慢。为了强调人们不会拼读**千禧年**（millennium）这个词，他加入了一个严肃的小学老师缓慢拼读这个词的片段。

## ◉ 发挥互联网的威力

许多新闻编辑部开始使用网络来扩大报道的影响，让新闻变得更个人化和具有互动性。这也提高了透明度，让读者能了解记者的报道产生的过程。下面是一些报道网络版中流行的让报道增值的内容。

- 该报道的视频或与该报道有关的视频
- 采访录音、配上幻灯照片的角色自述或记者本人的评论
- 读者通过与记者聊天或其他方式参与该新闻的讨论
- 由相关照片制作成的幻灯片
- 用户可以操作的互动图片
- 报道中引用的文件以及新闻中提到的资源的链接

我们列举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些做法。目的是说明新闻工作者可以进行更多实验，把每则新闻看成独一无二的，拒绝公式化。关键在于意识到“把重要的问题变得有趣”是一个基本原则，并且需要不断反思才能做得更好。

## ◉ 为真实服务的叙事

最后是一个提醒。最近几年，叙事性新闻写作被一些编辑视为“带着态度写作”。使用这种写作方式的新闻工作者像舞台上对观众说旁白的演员一样把自己的感想和观点插进新闻之中，在自我指涉的段落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当候选人开始讲话时，记者堆里发出了明显的抱怨声……”

在一些情况下，某种态度会扩散，并在不同的新闻里反复出现，甚至出现在不同的出版物上——成为新闻工作者共享的元叙事（meta-

narrative)。在这种元叙事里，政客只会追逐权力，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稍显疯狂，比尔·克林顿从来不会遵守诺言，乔治·W. 布什是个冒牌货。元叙事的力量能变得非常强大，以至于强大到掩盖真相。

在讨论技巧的同时，要记住重要的一点：形式永远不能决定内容——技巧绝对不能改变事实。新闻工作者对叙事模式的使用必须服从前面提到的准确、真实的原则。不论表现形式如何，必须牢记，最具吸引力的是真实的故事。

我们在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对公共事务的报道，引人入胜和息息相关的原则对其他题材也同样适用。在许多方面，帮助受众理解比尔·盖茨的营销战略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和讨论总统候选人的互联网政策同样重要。一篇说明好莱坞为什么会把影片拍成那样的人物专访也可以成为揭示美国文化的大作——当然，它也可能成为公关人员的促销活动。这完全取决于记者如何处理，而不是报道题材。因此，公民可以使用引人入胜和息息相关的原则来判断自己接触到的任何一则报道是否有价值。

接下来的一个原则将把这个问题放到更广阔的背景加以讨论：如何判断应该优先报道什么新闻？

## 注 释

[1] Diana Sugg, "Angels and Ghosts: Anatomy of a Story," *Poynter*, July 14, 2005; available at www. poynter. org.

[2] Diana Sugg, interview by Cristian Lupsa, January 19, 2006.

[3] Ray Suarez, interview by William Damon, Howard Gard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unpublished interviews conducted for the book *Good Work: When Excellence and Ethics Mee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4] Howard Rheingold, interview by William Dammon, Howard Gard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ibid.

[5]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Local TV Project,"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Local TV News: What Works, What Flops, and Why," January 1999; "Quality Brings Higher Ratings, But Enterprise Is Disappearing," November 1999; "Time of Peril For TV News," November 2000; available at www. journalism. org.

[6] Andy Smith, "A Touch of Glass," *Providence Journal*, April 14, 2005.

7] "Excerpts of Lewinsky Interviews," cnn. com, March 4,1999.

[8] Leo Braudy, at CCJ Forum, Los Angeles, March 4, 1998.

[9]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Changing Definitions of News," March 6, 1998,4; available at www. journalsim. org .

[10] Ibid. , 5.

[11]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Internet Sapping Broadcast News Audience, Investors Now Go Online for Quotes, Advice," June 11, 2000; available at http: //people-press. org. 根据该报告,从 1987 年到 2000 年,美国电视网晚间新闻固定观众的比例从 71%降到 50%。其中,从 1990 年到 2000 年,电视网新闻杂志节目的固定观众比例从 43%降到 31%。

[12] Tom Rosenstiel, Walter Dean, Marion Just, Dante Chinni, and Todd Belt, *We Interrupt This Newsc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13] Insite Research, Television Audience Survey, October 1999; available from Insite Research, 2156 Rambla Vista, Malibu, CA 90265.

[14] News Lab Survey, "Bring Viewers Back to Local TV News: What Could Reverse Ratings Slide?" September 14,2000; available at www. newslab. org. 参加这个调查的人专门提到,他们"从其他渠道获取本地新闻",本地新闻中"犯罪事件过多","本地新闻总是相同的内容","有太多花哨的故事而不是真正的新闻","电视新闻很少表现周围社区里发生的正面消息"。

[15] Everette E. Dennis, "Whatever Happened to Marse Robert's Dream?: The Dilemma of American Journalism Education," Gannett Center Journal (Spring 1988),3.

[16] Betty Medsger, "Winds of Change: Whither Journalism Education," a Freedom Forum study, July 1996.

[17] Roy Peter Clark,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June 2000.

[18] 杰克·哈特在2004 年 10 月的 *Above the Fold* 中详细解释了这种叙事的环节,*Above the Fold* 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Minneapolis Star Tribune)给内部员工阅读的有关写作与编辑的简报。

[19] William Whitaker, interview by William Damon, Howard Gardn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20] Jim Benning, "Why Journalists Eat Up the Onion: World Media Shedding Tears of Joy Over the Onion," Online Jouralism Review, May 2, 2000; available at www. ojr. org/workplace/1017964709. php.

[21] 雅基·巴纳辛斯基是在全美写作工作坊中提出七种(以及第八种)叙事方向的。

[22] Alfred Kazin, "Vietnam: It Was Us vs. Us: Michael Herr's Dispatches: More Than Just the Best Vietnam Book," *Esquire*, March 1, 1978, 120.

[23] Doug Marlette, News Lab retreat on storytelling, Washington, DC, April 12 and 14,2000.
[24] Annie Lang, News Lab retreat, Washington, DC, April 12 and 14,2000.
[25] John Larson, News Lab retreat, Washington, DC, April 12 and 14,2000.
[26] Booknotes, C-Span, April 29,1990.
[27] Boyd Huppert, News Lab retreat, Washington, DC, April 12 and 14,2000.

# 第9章

# 全面均衡

佛罗里达州调查传播公司的负责人瓦莱丽·克兰(Valerie Crane)很喜欢讲一个错误的受众研究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家大型有线电视网的市场调查负责人,公司要求他在以青年观众为对象的焦点小组的一轮访谈中加入一个问题:"你认为年轻人中的下一个流行趋势是什么?"

研究人员认为,可以使用抽样调查、消费心态学和焦点小组等工具观察人们如何对事物做出反应。你还可以用它们了解受众如何生活以及如何使用媒介。但是它们不能(或者至少不应该)代替专业判断。

可是老板想问这个问题,于是研究者郁闷地从圆桌对面的单向玻璃后看着这群围坐在圆桌四周的年轻人。讨论组织者提出这个问题:"你们认为下一个潮流将会是什么?"令组织者高兴的是,他们立刻做出反应:"这是什么意思,下个潮流是什么?我们还指望你们告诉我们下个潮流是什么呢。"[1]

如果说引人入胜和息息相关原则有助于解释新闻工作者如何有效地完成新闻的话,下面这个原则涉及的则是应该报道什么新闻。

什么是新闻?由于时间、空间和资源有限,必须判断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留下什么抛弃什么。在无限的互联网时代,谁来做这个决定?这些问题引出了公众对新闻媒体提出的第八个原则:

**新闻工作者应该使新闻全面均衡。**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在人类探索世界的时代,绘制地图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坐在羊皮纸前的画家绘制着不断扩大的已知世

界，在绘制欧洲甚至邻近海洋的时候，他们的工作还算准确。但是当转向西边绘制新世界时，对这片令人浮想联翩的地区，他们主要靠猜想。那里有什么？金子？不老泉？地球的尽头？鬼怪？根据他们对顾客喜好的判断，那片遥远大陆的面积时大时小。在绘制遥远的太平洋时，他们在未知区域绘上海怪、恶龙或巨鲸。图上的怪兽越怪异越吓人，金矿和印第安人越具有异国情调，地图卖得就越好，绘图家的名气就越大。流行的地图总是十分煽情，但是它们对探险或认识世界却没有多大用处。

新闻工作就是当代的地图绘制工作。它为公民画出探索社会的地图。那也正是它的功能和存在的经济理由。绘制地图的观念有助于说明什么才是新闻应该负责报道的问题。就像地图那样，新闻工作的价值取决于是否全面和均衡。那些投入过多时间和空间报道一场轰动的审判或名人丑闻的新闻工作者——尽管知道这些内容不应该给予如此关注，但还是这么做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新闻更畅销——和那些为了迎合市场喜好而把英格兰或西班牙画得和格陵兰岛一样大的地图绘制者没什么两样。这么做或许会带来短期的经济效益，但是它误导了旅行者，最终毁掉了地图制作者的名声。那些没有事先进行核实就写下“自以为真实”的内容的新闻工作者，和在遥远的新世界角落画上海怪的艺术家没什么不同。而漏报太多其他题材的新闻工作者，则像那些没有告诉旅行者前方还有其他道路的地图绘制者。

把新闻工作者看成地图绘制者，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均衡和全面是做到准确的关键要素。这超越了孤立地评判某一篇报道。那些好笑、有趣但是却缺乏重要性的头版报道、网页和节目也是一种歪曲。与此同时，对某一天的报道如果都是严肃认真的重大事件，没有任何轻松或人性化的内容，同样也有失衡之虞。

显然，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意味着新闻工作者无法报道每件事。但是作为公民，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下列问题：我们从报道中能否看到整个社区？我能否看到自己？大多数人认为有趣或重要的事情在报道中是否以恰当的比例混合在一起？

## ◉ 目标群体谬误

地图绘制者的概念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闻多样性的概念。如果把新闻看成社会地图，这张地图应该包括所有社群，而不仅限于具有吸

引力的或对广告主具有吸引力的群体。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绘制出的地图就会有大块区域缺失。

不幸的是，实践证明这个原则很难坚持下去。我们在第 3 章忠于公民部分提到，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新闻机构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富裕读者。在讨论比例均衡的语境中，还需要对这个问题再作一些分析。新闻机构实行这个策略，有以下几个原因。25 年以来，报纸的受众和广告主不断流失到电视和其他媒体，因此报纸行业认为，在电视时代要对报纸发行做一些结构性限制。于是他们决定，报纸应该成为服务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小众媒体。第二个原因与成本有关。报纸每卖出一份，就会亏损一份的钱。25 美分甚至 1 美元的报费只能抵消平摊到每份报纸上的报道、印刷和运输费用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要靠广告收入来补偿。所以，如果卖给读者的报纸不能吸引广告商，每卖出一份报纸就会倒贴一份的钱。广告行业也认为报纸是到达上层人士的主要媒介。他们会使用其他媒介，尤其是广播和电视，到达蓝领受众。报纸产业的策划人员理性而及时地意识到，把目标受众定位在富裕阶层不仅有必要，而且还有好处。在经济效益的名义下，对每份报纸的成本和每个订户收入的核算，使放弃整个社区的行为具有了合理性。把某些群体从读者中排除出去也就意味着没必要投入大量资源对他们进行报道。

要挑战经济学的结论，或者在报纸的媒体领导地位被电视所取代的环境下证明流失的读者会重新回到报纸，几乎都不可能。要改变这一趋势则意味着要相信长期战略能够奏效，虽然华尔街和许多传统观念并不认同长期战略。

电视也经历了同样的轨迹，尤其当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开始报道新闻之后，每个台的份额都在缩小。由于电视台和华尔街已经习惯了之前新闻节目的高利润率（通常超过 40%），电视新闻的压力增大。为了保持利润，电视台把记者数量削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要求大多数人每天必须完成一则报道。[2]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对整个社区进行报道。于是，新闻把目标瞄准了最令人满意的群体——年轻女性。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用人口统计学特征来定义目标受众的经济逻辑存在的严重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忽视了从 70 年代末开始不断增加的移民社群，这些群体不断改变着美国的城市构成。而移民正是一百多年前美国新闻业获得成功所依赖的主要人口。普利策、斯克列普斯以及其他便士报巨头都把移民作为核心受众。他们报纸的用

词都比较简单，以便移民能看懂。他们在社论版上教移民们如何做合格的公民。这些新来的美国人傍晚下了班，聚在一起，聊聊报纸上的内容，或读报给别人听，然后讨论当天的重大事件。

随着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进入美国的这批移民逐渐美国化，报纸也随着他们改变，更加贴近中产阶级、更有文化。1910年的《纽约世界报》比20年前的《世界报》严肃清醒得多。80年后，执着于经济效益的新闻业却没有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进行同样的投入，与新加入美国的公民建立亲密的关系。

新闻把目标受众定位在最具赢利性的群体的同时，也没有在最年轻的美国人身上投入太多精力。新闻写得冗长高深，多数时候只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才能看得懂。布鲁金斯学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斯蒂芬·赫斯(Stephen Hess)这样的批评家提出，记者是在为信源写作。[3]由于强调犯罪和刺激，电视新闻已经从家庭成员愿意聚在一起观看的节目，变为家长为保护孩子而禁止其观看的节目。[4]在效益和边际利润的名义下，我们没有为培养新一代对新闻的兴趣做任何事情。今天，来自互联网的受众数据显示，年轻人对新闻感兴趣，但是这里所说的新闻不是任何传统技术形态下呈现的新闻。[5]虽然不能把所有过错推给新闻的商业化，但是它们的商业战略实际上帮助缔造了一代不消费新闻的人。

和19世纪9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媒体无疑更难到达所有社群。各种活动对时间的争夺更加激烈，而且相比一百年前的移民基本都是欧洲人，文化也比一个世纪前更加多元。但是现在可供他们选择的信息渠道也多了很多，而新闻机构还是错误地认为，既然他们已经“美国化”了，也自然会被吸引到美国报纸上来。迈阿密的《先驱报》后来意识到，受众不会自己来《先驱报》，《先驱报》应该主动走近他们。直到该报改变目标受众并且制定应对方案之后，发行量才停止大幅下跌。1984年，该报的发行量超过43.5万份，到1999年惨跌到35.7万份。该报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使报纸多样化，创办了《新驱报》(*El Nuevo Herald*)①、《犹太人先驱报》和《iYo!》(一份针对年轻人的周刊)。有意思的是，到20世纪末，《先驱报》和《新驱报》的发行量加起来达到了437 809份，比旧《先驱报》巅峰时的发行量还大。根据《编辑与出版人》年鉴的报告，到2005年，迈阿密先驱报系列报纸的发行量达到405 618份。

① 一份西班牙文报纸。

这一现象能在其他地方重现吗？新闻是否能够避免脱离更广大的受众，成功地发行到更多样和更年轻的人群中去？对于这个问题，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回答。但是因为新闻公司只盯着精英群体和成本效率，从总体上看，整个产业并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尝试。或者，等到他们开始尝试时，产业已经是病入膏肓，就像迈阿密先驱报的案例那样。如果使用地图绘制者的概念来看这个问题，那些观念的错误就会更加明显。我们只把一部分地区画进了地图，其他地区则付之阙如。那些不能够找到自己社区的人就会放弃这张地图。

新闻节目和报纸忽略整个社群的行为也会给它们所服务的那部分群体带来问题。首先，因为大量信息被遗漏，这部分受众得不到完整的信息，会导致他们无法对当前的趋势和自己的需求做出正确判断。最终，这种市场战略还会威胁到新闻机构自身的生存，因为新闻机构是最需要被全部公民所关注的。用华尔街分析家约翰·莫顿(John Morton)的一句名言来说，我们这是“杀鸡取卵”(eaten our seed corn)。[6]

反过来，把某些社群整体排除在外还会造成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为之服务的那部分群体报道得过细。虽然新闻报道的对象范围变得越来越狭窄，但是新闻却变得更长更丰富。有时候报纸有上百页，要花上一整天才能读完。电视节目的目标群体策略也带来了同样的效果。例如现在地方电视台每天播出的健康节目几乎对每一项新的医疗研究进行报道，不论它们多么不成熟也照报不误，公民不但没有得到清晰的信息，反而更加困惑。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新闻行业必须迅速行动，想方设法为各种不同的社群服务——但是首先要把它们当成整个社群的有机组成部分。有证据表明公民们也赞成这种做法。从 1998 年开始，卓越新闻项目花了数年时间，想发现哪种地方电视新闻能提高收视率。一组由地方电视新闻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的调查设计小组认为，报道整个社群是电视新闻台最重要的义务。有数据显示，观众也同意这种看法。和报道面狭窄的电视台相比，报道范围更大的电视台更容易吸引或保持观众。[7]

## ◉ 隐喻的局限

就像所有隐喻一样，绘制地图的类比也有局限。绘制地图是一门科学，但新闻工作不是。你可以标出一条路在地图上的精确位置，测量一个

国家甚至一片海洋的面积。但是新闻的比例则是另一码事。一些人认为重要的新闻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有可能无足轻重。

新闻的均衡和全面是主观的。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和地图上更客观的道路和河流的特征相比，新闻的均衡和全面就没有什么意义。相反，力求全面均衡是确保新闻受欢迎（和财务健康）的关键。虽然全面均衡具有主观性，但是它们在实际中是可以实现的，绝不是抽象的理论。对事情重要性的判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如果公民们相信新闻工作者做新闻判断是为了服务于读者需求的话，他们会接受这些差异。关键在于公民相信新闻工作者的选择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是只提供那些能卖钱的新闻——以及不是在迎合受众。人们也不会太在意新闻工作者是否犯错误，是否很好地做更正确或永远选择正确的新闻。信任的关键是受众对新闻工作者动机的感知。人们不会求全责备，但是正如我们在对公民忠诚那一章中讨论过的，他们要求意图善良。关注报道的均衡是为公众利益着想的最佳表现。

正直的人们对新闻重要性的判断可能不同，但是他们和新闻工作者一样，能看出什么新闻是被夸大了。他们对一则新闻的哪处细节已经越线的判断可能有分歧，但是当新闻到达某一点，他们能看出它已经越过了底线。在最近一段时间，越过这条底线的新闻越来越多。

## ◉ 被迫夸大

当新媒体经历巨变、找不到明确方向时，它们似乎被逼上夸张和煽情的路线。你可以把这个规律称为“裸体和吉他”原理。

如果你想吸引受众，可以到街角表演脱衣舞，脱到一丝不挂。在短时间内或许你会吸引一群看客。但问题是如何才能让他们持续观看？如何避免观众转移注意力？还有另一种方法。假设你回到同一个街角表演吉他。第一天听的人很少。但是第二天可能会多些。这取决于你的吉他弹奏水平，如果曲目丰富多样、引人入胜，观众很可能会与日俱增。如果你弹得好，就用不着去费劲地保持观众量，总能不断吸引新观众进来，替代那些听厌了的老观众。

实际上，当新技术增加了信息渠道数量，致使每个新闻机构眼睁睁地看着受众减少时，新闻媒体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当未来无法预测，除了短平快地获得新受众之外，你甚至不清楚这个行业会存在多长时间。这

时你会选择哪种招徕受众的方式？既然过去的经验未必适用于未来，新闻机构至少应该按照某种信仰或哲学采取行动。

某些新闻机构，甚至是那些拥有严肃历史的机构，却求助于裸体这条路。部分原因是它们受到了“新闻已经成为供过于求的商品”这一观念的影响。华尔街的分析师、培基证券（Prudential Securities）的小詹姆斯·M. 马什（James M. Marsh Jr.）告诉热心新闻工作者委员会：“目前的新闻节目过多，供远大于求。”[8]另一个事实也部分影响了这一选择，那就是生产大量独家报道十分昂贵，需要记者网络、摄影师和遍布全世界的分社。

求助于“裸体”的结果是各电视网明显减少了对硬新闻的报道。卓越新闻项目的研究不断发现，作为电视网经济引擎的早间新闻节目把大量注意力转向了名人、娱乐、日常生活甚至产品的关联促销（cross-promotion）。黄金时间的新闻杂志也有同样的现象，经常忽视新闻。[9]

甚至晚间新闻节目在20世纪90年代也减少了对公共机构的报道，转向娱乐和名人等具有吸引力的内容，直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这一现象才有了明显的改观。[10]

一些在电视网工作的人发现，就在新闻部门减少报道专题和全世界突发新闻的同时，娱乐部门却在向“以真实为基础的”节目转移。诸如《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犯罪现场》（*CSI*）和《寻人秘探组》（*Without a Trace*）之类的剧集拼命“从新闻头条中扒取”微妙而复杂的故事。“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娱乐部门做新闻、新闻部门做娱乐的地步。”2000年春天，ABC新闻的记者罗伯特·克鲁尔威奇（Robert Krulwich）若有所思地说。[11]

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电视网开始播出“以真实为基础”的娱乐节目，比如2000年夏季开播后造成万人空巷的热门节目《幸存者》（*Survivor*）。紧接着，明星们作为“嘉宾”走入新闻节目，既提高了娱乐节目的收视率，同时也提高了新闻节目的收视率。举例来说，CBS新闻部制作的早间节目把大量时间用来宣传《幸存者》，包括采访前一天晚上被淘汰的参与者。这就等于是公司的娱乐部门策划了新闻，再让新闻部门来报道。随着真人秀节目日益壮大，尤其是伴随《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学徒》（*The Apprentice*，又译“飞黄腾达”）等品牌节目的发展，这一幕持续不断甚至愈演愈烈。

显然，不到6年时间，克鲁尔威奇所说的一一应验。2006年，广电新

闻节目中的煽情主义达到了新的顶峰。越来越多的电视新闻主持人尝试通过表达自己对新闻的感受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比如，2005 年卓越新闻项目的研究发现，电视网的早间新闻节目为了做到这一点，在解说中加入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比如像“极好的……可怕的……恐怖的……”，以及像“每个家长都应该收听的严肃警告”之类的短语。例如就在 2005 年 5 月 11 日，三大电视网节目在介绍前 5 条新闻时就使用了 30 次类似词语，有时是主播在导语或结语时使用，有时是同期声里被采访对象使用。[12]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这种趋势变本加厉，报道重大事件的记者不仅表达感情，有时还表现出愤怒。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在新奥尔良州报道卡特里娜飓风的破坏时正是这么做的，这之后他被提拔为 CNN 黄金时间的主播，在库珀的宣传片中表现的正是他带着个人感情播报新闻的情景。

一些评论家对第四等级身上新出现的激情赞誉有加，甚至一些人猜测这有可能标志着新的攻击精神。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赞扬他的行为，许多人提出质疑，100 年来新闻报道所坚持的冷静报道事实的原则是否正面临威胁。

这个问题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成为新闻工作者意味着什么？在一个承诺放弃个人喜好来换取公信力的职业里，煽情主义和愤怒是否恰当？如果是，究竟何时能这么做？当然，在目击人类痛苦的时候，并不是说新闻工作者的任何感情都不合适。因此，如果说有时掺入个人感情是恰当的而另一些时候则不恰当，那么二者的分界线在哪儿？

根据经验可以得出以下两条原则。第一条是当其他反应都违反人性——感情是唯一自然的反应时，可以表达个人感情。1963 年肯尼迪遇刺后，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拭去眼中泪水，还有几年后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之后他表现出的震惊，不仅打动了美国人，也是恰当的。

第二个规则是当探索问题以及研究信息的意义是为了在更大的语境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时，不宜加入感情。新闻工作者对见到的事件做出了本能反应之后，他们应该使自己冷静下来并努力寻找答案，这要求具有怀疑精神、认真敬业和思想独立。人的情感是决定一件事是否能成为新闻的核心要素，但是一旦你企图制造出一些情感或者利用它引起世人对你的关注，就已经越过底线，把新闻变成了已经泛滥成灾的东西——真人秀娱乐节目。

## ◉ 市场挑战市场

如何才能抵制煽情主义，保持新闻的均衡？正如前面所说，我们认为，用高墙把新闻工作者和现实市场隔绝开不是最佳解决方案。进一步理解社群不断变化的趣味、需求和潮流，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但是目前对市场的判断大多建立在流行的市场调查方法之上，其实这些方法未必真的奏效。传统的市场调查让消费者在规定的选项中做出选择。你喜欢橙色的球鞋还是蓝色的？你喜欢用塑料挤瓶装的牙膏还是管装牙膏？你觉得牙膏是胶状好还是啫喱状好？“[消费者]只能从有限的选项中进行选择。你已经规定好了他们可以选择的范围。”当时在普林斯顿调查研究协会(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任职的李·安·布雷迪(Lee Ann Brady)向我们解释说：“因此他们不是在表达喜欢什么。他们只是对你规定的选择做出反应，然后给你一个排序。”[13]

我们不妨设想一个典型的抽样调查，长度约 20 分钟，大概有 15—18 个问题。通常只有两个问题允许受访者用自己的话自由填答。其余的问题不是多项选择就是问被访者是否赞成调查中提到的某个观点。

传统的市场调查只调查静态的选择，对新闻并不适用，因为新闻每天都在变化。焦点小组访谈是市场调查中最便宜和最普通的形式之一，它可以提开放式问题。这种方法在新闻的市场调查中也很流行，因为新闻工作者可以一边听受众谈对产品的看法，一边观察他们。但是该方法也有很大缺陷。布雷迪说：“偶尔，你能从焦点组里得到某个你从未想到过的意见或想法。因此如果你是白板一块的话，焦点小组会对你很有帮助。”[14]

观察过焦点小组讨论的人都会发现，在研究与新闻有关的问题时，该方法存在局限。首先，焦点小组不太科学，很难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或者说很难让两个焦点小组的答案互相复证——这是客观性的基本含义。一两个人就可以改变讨论的结果，讨论的主持人无意中也会引导焦点小组得出事先确定好的答案。

也许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研究者并不使用焦点小组探索开放性的问题。相反，该方法经常被用来检验新闻机构已经考虑好的假设或选择。“焦点小组刚出现时，是用来了解思想的。进行完焦点小组访谈后，调查者再把获得的想法精心设计成开放式调查，并在更大的人群中进行检

验。”已故媒体调查人员利奥·博加特(Leo Bogart)说:“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从一群人说的话中得出结论或预测,我们也不要求做到这一点。”但是今天,“这种方法被严重误用了”[15]。

传统的市场调查除了这些结构上的缺陷外,研究者还提出,受众恐怕也无法准确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某新闻甚于另一个。NBC 新闻受众调查的前任经理拉里·麦吉尔(Larry McGill)说:“如果让人们比较啫喱状牙膏和胶状牙膏,你会得到比较明确的答案。而说出汤姆·布罗考和彼得·詹宁斯之间的基本差异则困难得多。”麦吉尔说,在 NBC 的时候,他和手下的研究人员学会了对这种表面工作表示怀疑。“我们通常会在得出的数字的基础上适当地打个折扣。”[16]

市场调查可以有效地发现黄金时段新闻杂志的节目如何编排能让效果达到最佳。NBC 发现,要把观众吸引到旗下附属台晚上 11 点的新闻,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在节目的最后播出本日最佳照片或本周最佳照片。《日线》发现,播出节目的最佳时机是在其他电视网播广告的时候。“一般会提高 2 个百分点的收视率,这等于 180 万户的收视。在大部分时候我们可以获得 12% 的收视率,给附属台带来 14% 的收视率。”麦吉尔解释道。

但是说到新闻内容,对于还未策划好的或进入测试的节目,如何测量受众的反应?这才是电视新闻面对的问题。电视媒介在了解受众收视情况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因为它有按分钟计算的晚间节目收视率调查。它甚至可以说出在哪条新闻的哪个地方,受众开始转台。因此该媒介开始对节目做出调整,保证每条新闻的收视率达到最高。

但是这个策略在防止观众流失上收效甚微。观看电视网晚间新闻的家庭已经从 1980 年的 75% 下降到了 2005 年的 37%。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官方数据,地方新闻的收视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也开始下降。[17]对于迎合受众需求的新闻战略来说,这个结果或许可谓事与愿违。

“新闻机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曾为 NBC 和其他媒体客户做过市场调查的约翰·凯瑞(John Carey)解释说。[18]“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紧跟收视率的指挥棒,增加可以获得更高收视率的新闻,他们陷在这些数字里不能自拔……结果,新闻杂志的受众越来越局限于老龄观众、比较感情用事的观众和猎奇的观众。”但是大部分观众离去了。“在某种意义上,电视网的人清楚问题出在哪儿,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摆脱。”[19]

为什么我们不重新回到“连锁公众”的理念,回到 A. M. 罗森塔尔

(A. M. Rosenthal)在当《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时所说的"新闻和信息的自助美食集锦(smorgasbord)"的新闻报道理念？或者如报纸编辑戴夫·伯金(Dave Burgin)在谈起应该如何编辑报纸版面时常说的一句话：如果没有一条新闻能够吸引15%的读者，那么一定要保证版面上的新闻丰富到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条想读的新闻。如果这样选择内容，新闻机构就可以保证新闻的代表性和均衡性。

或者我们还可以回到地图绘制者的比喻。如果新闻只提供人们事先表示过想知道的信息，那么我们只是在谈论社区中他们已经了解的部分。

## ◉ 新闻工作者的新型市场调查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市场调查才有价值？新闻工作者、公民和调查人员一起提供了如下答案：是帮助新闻工作者做判断的调查，而不是代替他们做判断的调查。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使用那些把受众看成顾客、询问他们喜欢什么产品的市场调查。我们需要创造新闻的市场调查，把人民看成公民，告诉我们更多有关他们生活的事。你如何分配时间？带我们进入你每天的生活。你花多长时间上班或上学？你担心些什么？你对小孩的期望和担忧是什么？这些都是调查宽泛的偏好趋势的开放性问题——它们可以让编辑知道如何才能设计出全面、均衡地代表社群及其需要的新闻组合。

《费城问讯者报》的前主编伯奇·沃德(Butch Ward)现在任教于波因特学院，他认为，询问人们需要什么是问错了问题。"这是一个市场营销的问题。想想看：星期一，一个开始节食的男子希望获得更多有关营养的信息。但是到了星期四，同一个人也许一边吃薯片，一边想看精彩的新闻报道。"

沃德认为，新闻机构应该问一个记者式的问题——一个他们在新闻报道中经常提到的问题：人们在做什么？"发现社区成员正在做的事情，"沃德说，"他们在餐桌前和朋友谈些什么？为什么要打两份工？他们吃些什么？他们在医疗健康、休假和儿童教育问题上的选择是什么？"[20]一旦知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可以策划报道，针对你想到达的受众直接做出回应。

这正是佛罗里达调查传播公司的瓦莱丽·克兰所从事的调查。克兰的调查使用两种基本方法，它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方法。第一种方

法首先通过对受众的深度访谈，接下来通过更大的随机样本，弄清楚人们接触的新闻究竟满足了哪些基本生活需求——通过量化的方法重新研究新闻的功能。克兰说："对某些人来说，新闻的功能是和社群建立联系。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更健康、更安全、更舒适]。还有一些人使用新闻帮助自己做决策。另一些人则是为了赢得社会的接受。"她找出了一系列基本需求，这些需求会随媒体的类型、媒体对新闻的分类方式和所研究的受众有所变化。[21]克莱恩的发现向媒体公司证明，关注人们为什么使用新闻——而不是对什么话题感兴趣——才是抓住问题症结的关键。她谈起自己的客户时说："新闻公司很少有人关心公民的需求是什么。"

克兰使用的第二种方法是使用被一些人称为生活方式和趋势研究的方法，研究某个社群的成员如何生活。这种调查方法希望根据态度和行为把人口分成不同群体，而不仅仅是依据人口统计学数据。她研究了15个不同的领域，包括健康、宗教、工作、消费、家庭关系、教育等，找出每个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和趋势。综合在一起，她有关人们为什么使用新闻的研究，和有关人们生活中的深层关注和趋势的调查，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洞察力，有助于他们做出自己的职业判断。但是，她认为，这项研究应该帮助评判记者的判断而不是代替其判断。

曾担任新闻总监的阿尔·汤普金斯(Al Tompkins)目前在波因特学院教授广播电视，他认为克兰的调查让新闻工作者了解了"不同的社群如何生活，他们的效忠对象在哪里，受众为什么在看而不是他们在看什么"[22]。汤普金斯说，克兰的工作"为新闻报道提供了方向，但是却没有替你决定应该报道什么"。汤普金斯举例说，虽然大量研究认为人们不喜欢警察，但是"克兰的研究告诉我们，人们关心自己的社区，但是却不信任政治机构……他们厌恶的不是这个题材，而是这个题材的报道方式"。

在高级而复杂的市场调查造成的混乱中，叙事方式比题材更重要的观念几乎被抛在脑后。但是对于地方电视台而言，至少到现在为止，这仍是保持收视率的关键因素。

卓越新闻项目用了五年时间从150个电视台的2419个新闻节目中抽取了33000条新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新闻的采集和报道方式——信源的数量、均衡度和专业性，是否公认与受众相关，并且对社区很重要，报道是否更加全面——对于收视率的影响是题材的两倍。[23]如果真像预期的那样，新闻本身(而不是新闻报道)才是消费者在新媒体市场中寻找的

核心内容的话，那么这个发现的意义尤其重要。

皮尤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有力地支持了上述结论，该调查的内容包括一系列有关政治的标准化选择题。只有29%的人说他们对政治报道感兴趣。但是当被问起是否对“政府如何才能改善本地学校的表现的新闻”感兴趣时，“非常感兴趣”的百分比跃升至59%。与此类似，当问到是否对“政府如何才能保证公共场所免遭恐怖袭击的新闻”感兴趣时，“非常感兴趣”的百分比上升到67%。[24]人们对于降低医疗成本的新闻的兴趣也相当高。所有这些题材，从学校、医疗到公共安全，都与政治和政府息息相关。

新闻工作者需要关注人民及其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政客及其面临的问题。要为难以预测的未来找到前进方向，关键在于丢掉陈旧而可疑的咨询式调查方法。加利福尼亚英斯特调查公司的斯科特·托尔罗尔(Scott Tallal)改进了电话调查技术，使用开放式问题和数字录音，而不是让采访者逐字逐句写下受访者的反应。

格雷斯通传播(Greystone Communication)的约翰·卡里采用了民族志市场调查。民族志来自于人类学研究，通过直接的现场观察完成工作。卡里坐在人们家里，观察他们如何与媒体和技术打交道。在进餐时间他一直坐在人们家里，从早饭到晚饭，从清晨一直到深夜。

卡里的发现扭转了许多关于电视的传统观念。例如，虽然大量社会科学研究认为电视画面比声音更重要，一些学术界人士将这称为“视觉至上”，但是卡里的研究发现，“人们经常不是看电视新闻而是听电视新闻。事实上许多人一边看报纸一边放着电视新闻节目。当他们认为听到的新闻可能会有重要画面时，会转而看电视”。只求视觉信息传达而缺乏文字强化的做法是个极大的错误。

卡里的研究同时暗示，节目预告广告的概念完全是一个误导。所谓预告广告是一种为了使人们保持收看一个频道接下来要播出的重要新闻而播出的广告。“认为人们会一直看下去直到重要报道出现的想法大错而特错。预告广告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人们不会等待。”一些广告会说：“明天是否下雨？嗯，今晚会比较冷，7分钟后吉姆会回来带给您完整的天气预报”——这些信息只会把人们赶走。事实上，卡里的观察显示，只要播出广告，大部分观众会立即换台。[25]卡里认为，另一种更好的做法是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像天气这样的重要信息，把这些信息与你所有的新闻节目打包在一起，甚至在播广告时也继续在屏幕上滚动播出。“你能通过

持续不断的信息抓住观众。”

已故的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新闻总监卡萝尔·尼兰(Carole Kneeland)以挑战传统智慧著称,她就采取了上述方法。她在整个新闻播出过程中不断重复天气预报,这样做是基于如下前提假设:人们不会在同一个节目上停留半个小时,但是如果能迅速地把信息传递给更多人,日积月累,你就会拥有最高的忠诚度和最多的观众。“我认为将来我们一定会摆脱30分钟和60分钟这样的长度束缚。”卡里建议说。“你可以把节目长度缩短到5分钟,然后在播出较长的节目时通过定时插播的方式循环播放。”就像广播节目中每隔8分钟或12分钟就重复播出新闻和天气预报一样,也可以像全国公共广播(NPR)那样在播出更长的新闻节目过程中(整点)不断重复新闻摘要。

这些概念目前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市场调查领域,甚至超越了传统的收视率和发行量数据,它们将重新定义调查方式和新闻包装的方式。

许多新闻工作者抵制市场调查。克兰说:“这就是我所说的聪明人做傻事。”具有讽刺性的是,新闻工作者更适合从事这类观察性调查,他们的技能用在研究人们生活方式上或许比用在新闻报道上更合适。然而新闻工作者却没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传统,甚至几乎没尝试过。

如果说新闻迷失了方向,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对人们的生活失去了意义,不但对传统受众如此,对下一代也是如此。我们希望已经说明了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新闻工作者失去了努力使新闻做到全面均衡的信心。就像古代的地图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留下虚假的信息一样,当代的受众看到的新闻也在非目标群体和很难报道的地方留下了类似的空白。

如果新闻工作者足够机灵和有创新精神,网络的互动性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去克服由市场调查和人口统计数据造成的短视以及带来的问题。他们可以使用开放的聊天室和学生交流,报道课程改革,也可以给公认的专家发电子邮件,请教不明白的问题,记者们可以和公众建立起更紧密的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样可以建立起人们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相互理解,让公众自己不断补充媒体对他们报道的不足,让他们提供基于个人的特殊经历而产生的知识以及独特的视角。

我们的解决方案不是回到新闻工作者纯粹依靠直觉工作的时代。我们希望人们能看到还有这么一群新一代的地图绘制者,他们发明新的工具描绘今天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他们为新闻组织提供了

最重要的工具，让后者生产出更全面和更具有代表性的新闻，吸引而不是赶走受众。现在就等新闻工作者一试身手了。

除了这个原则以外，还有最后一个原则，是把之前提到的原则融会贯通。它与新闻编辑部的内部事务有关。

## 注 释

[1] Valerie Crane,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June 2000.

[2]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Local TV Project, "Quality Brings Higher Ratings, But Enterprise Is Disappearing,"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November 1999; available at www.journalism.org.

[3] 一些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赫斯是较早的一个。见《华盛顿记者》(*Washington Reporter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1)。

[4] 本书作者、地方广电新闻工作者、参加焦点小组讨论以及会议的观众都表达过这个观点。

[5]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Use of Source for News," May 1, 2005. A slideshow of the report is available online on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website, www.carnegie.org/pdf/AbandoningTheNews.ppt.

[6] John Morton, "When Newspapers Eat Their Seed Corn,"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November 1995), 52; available at www.ajr.org.

[7]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Local TV Project, "Quality Brings Higher Ratings."

[8] "Transformaiton of Network News," *Nieman Reports*, special issue (Summer 1999).

[9]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Changing Definitions of News: A Look at the Mainstream Press over 20 Years," March 6, 1998, 5; available at www.journalism.org.

[10] 从卓越新闻项目2004年起每年出版的《新闻媒体现状》报告中所收集的数据里也能看出该趋势。Available at www.journalism.org.

[11] 克鲁尔威奇是在新闻实验室(一个关于新闻的智库)于2000年4月14日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一个关于叙事的会议上发表该评论的。

[12]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06," March 2006; available at www.journalsim.org.

[13] Lee Ann Brady,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June 2000.

[14] Ibid.

[15] Leo Bogart,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June 2000.
[16] Larry McGill,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June 2000.
[17] 尼尔森媒体研究授权使用，并刊登于卓越新闻项目发布的《新闻媒体现状 2006》中。引用数据为 11 月份的共享数据。详见：www. journalism. org。
[18] John Carey,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June 2000.
[19] Ibid.
[20] Butch Ward, interview with Cristian Lupsa, December 1, 2005.
[21] Crane,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June 2000.
[22] Al Tompkins,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June 2000.
[23] Tom Rosenstiel, Walter Dean, Marion Just, Dante Chinni, and Todd Belt, *We Interrupt This Newsc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4] Tom Rosenstiel and Dave Iverson, "Politics and TV Can Mix,"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5, 2002; available at www. latimes. com.
[25] Carey, interview by author Rosenstiel, June 2000.

# 第10章

# 对良心负责

2002年10月，连续三周以来，华盛顿特区一直被恐惧的阴云所笼罩。有人在华盛顿特区城里以及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郊区神不知鬼不觉地跟踪过13个人，此人狡诈凶狠，手法娴熟，用枪击毙9人，重伤4人，无一失手。受害者有男有女，其中还有一名12岁的男孩，他在上学的路上遇害。

一场全国范围的搜捕行动展开了，犯罪分子在谋杀现场留下字条，嘲笑各级地方和联邦执法人员，其中一张字条警告说："你们的孩子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安全。"在乔治·W.布什所谓"反恐战争"的阴影下，这些可怕的谋杀案就像拉开了新一轮恐怖游击战的序幕。目标并不明确的"反恐战争"是布什13个月前宣布的，起因是被劫持的飞机成为自杀性炸弹，撞毁纽约世贸大厦导致数千人死亡，并破坏了华盛顿五角大楼的一部分。媒体对这一系列谋杀案的报道把其他新闻挤出头版，其中也包括美军在阿富汗作战的新闻，就好像全世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美国首都地区笼罩的无形的死亡恐惧一样。

对执行总编豪厄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而言，这则发生在华盛顿的新闻给了他一个向下属和竞争对手传递讯息的机会，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执掌着一个全新的、充满斗志的《纽约时报》，它将最全面地报道重大事件，打败其他竞争者。雷恩斯是在2001年"9·11"袭击事件发生前几周才被提拔到这个显要位置的，他动员下属对这一历史性事件进行了出色报道，为该报一次性赢得了创纪录的5项普利策奖。在华盛顿发生的这则新闻是在《华盛顿邮报》的家门口打败宿敌的绝佳机会。30年前在报道水门事件丑闻时《邮报》盖过《时报》，这件事一直让很多《时报》

员工耿耿于怀，此次正好可以一雪前耻。

虽然《时报》的华盛顿分社是该报分社中最大的一个，拥有半打该报最优秀的调查记者，雷恩斯还是一直坐镇纽约进行遥控指挥。在他派往华盛顿的人员中有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一位 27 岁的前实习生，21 个月前已经转正。不到几天，人们就发现，把布莱尔调入华盛顿确实是一步好棋。这个新人写的头版报道充满了让同行艳羡的细节，令其他在华盛顿报道的记者自叹弗如。

但是同样没过多久，华盛顿一些有经验的记者开始对“这个叫布莱尔的家伙”提出质疑，因为此人的名字虽然出现在报纸上，但是没有人在分社或采访现场见过他。《时报》跑司法部的记者埃里克·利希特布劳(Eric Lichtblau)开始对布莱尔有所怀疑，因为布莱尔写的报道受到了他较为信任的司法部官员的质疑。其他记者也提出了疑问，一个恼怒的信源告诉利希特布劳，他“虽然不知道这个叫布莱尔的家伙的匿名信源是谁，但是他写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属实”。听到这个意见后，利希特布劳向分社新闻编辑里克·伯克(Rick Berke)做了汇报。伯克将他的意见报告给纽约，但是得到的回答是自己“多虑了”，这些投诉是出于妒忌。结果伯克被告知，雷恩斯“已经断定布莱尔是个腿勤的好记者”[1]。

华盛顿分社的工作人员不知道的是，就在布莱尔被派往华盛顿之前，纽约总社内部对布莱尔工作的投诉就像持续高烧一样在编辑部里传染。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当布莱尔从一个指导编辑手下转到另一个指导编辑时，第二个编辑对他的报道质量的问题居然一无所知，就好像编辑之间的距离不是同处一室的几码或几里，而是远隔重洋。

就在华盛顿的记者考虑要向纽约进行集体上诉时，警方抓住了两个嫌疑犯，并指控他们与狙击案有关。关于此事的报道开始减少，随着布莱尔被派遣报道其他事件，由他引起的紧张和怀疑也有所缓和。新闻电头显示，他的报道范围不再限于华盛顿，他开始从马里兰、西弗吉尼亚、俄亥俄甚至得克萨斯发回报道。得克萨斯《圣安东尼奥快讯》(*San Antonio Express-News*)的编辑罗伯特·里瓦德(Robert Rivard)在布莱尔的新闻中看出了蹊跷之处。他觉得事关重大，于是给雷恩斯和《时报》主编杰拉尔德·博伊德(Gerald Boyd)发了封电子邮件，说他发现布莱尔的文章与自己报纸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有“令人不安的相似”。

来自另一家报纸的外部投诉不容忽视，于是雷恩斯和博伊德找来布莱尔对质。很快，这位年轻记者报道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不断地暴露出来。

两天之后，事情真相大白：他根本没有采访过他写到的得克萨斯家庭，“亲眼所见”的细节仅仅来自《时报》图片库的图片；其余的信息来自其他记者的报道。2003 年 5 月 1 日，布莱尔辞职。这一消息打破了《时报》同仁内部的隔绝状态。一个接一个地，员工们纷纷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对布莱尔的行为和报道表示过不满的人。

对布莱尔报道的全面调查发现了许多员工一直在怀疑的事情：他不是进取、投入、深入挖掘新闻的记者，而是靠欺骗、抄袭、虚构和牺牲周围人换取前程的制造麻烦的年轻人。报社的工作人员在长期受到压抑后，公开表达自己的怨恨，甚至认为自己遭到了背叛，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只有自己的意见才没有得到重视。接下来的几周，雷恩斯和博伊德接待了编辑部的个人和群体，并试图安抚他们。在这些场合，他们听到记者和基层编辑发泄理想幻灭的失望之情。令员工愤怒的是，这种对标准和价值的最根本的亵渎，影响了他们自己和报纸的信誉。

结果报社人员不仅没有恢复信心，他们的不满反而变得更加强烈，要求有进一步行动。社长阿瑟·小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 Jr.）宣布，他和雷恩斯、博伊德将和编辑部的员工一起召开一个“镇民会议”，专门讨论各种问题和大家的担忧。该会议在报社附近的一个剧院召开，不对其他新闻工作者开放。在会上，对报社高层管理人员强烈的不信任和愤怒后来被形容为“少见的、毫不掩饰的、情绪激动的、率真的”。一些与会者不仅向其他新闻机构的记者描述了会上的冲突，而且向 Romenesko 等监督新闻的网站发送电子邮件，邮件被贴出后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些讯息让公众逐渐了解到反对雷恩斯和博伊德的细节。

这些讯息给人的印象是新闻编辑部内部的信息沟通几乎瘫痪，以至于 5 年以来对布莱尔报道的质量和可信性的警告一直被置若罔闻，而布莱尔反倒被派去报道越来越重大的新闻，他的名字不仅出现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新闻下面，甚至还出现在牵涉国际利益的新闻下。在布莱尔事件结束之前，雷恩斯和博伊德被迫辞职[2]，新闻编辑部超过 24 名员工参与了一项重整新闻编辑部标准、结构和运作方式的长期项目。

至 6 月，对布莱尔的内部调查形成文字，指出他“经常进行新闻欺诈……大量造假和抄袭，既是对信任的严重被叛，同时也成为本报 152 年历史中最耻辱的事件”。随着更多信息浮出水面，员工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只有通过外部的声音才能打碎由内部沟通障碍造成的壁垒。

新闻编辑部高层倒台的主要动力来自互联网，因为《时报》员工将之

前一直被忽视的投诉贴到了网上。《时报》员工利用新媒体的开放结构，使之成为检查内部行为的“外部声音”。和其他人一样，他们意识到互联网在开放新的信息传递渠道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新的渠道，对新闻伦理寄予厚望的共同体可以对新闻中的价值和标准进行质疑和审判。结果，新闻工作只是其中的一分子。

因为美国没有新闻法、新闻管制条例、新闻从业执照和规范化的自我管理措施，因为新闻从本质上容易被其他力量利用，重担就落在了新闻工作者个人及其工作于其中的单个组织的道德和判断上。对任何职业而言，这都是个充满困难的挑战。然而对于新闻来说，还存在着另一对矛盾，那就是新闻工作者为公共服务的角色（这是新闻工作能够侵入其他领域的主要理由）和为这一工作提供经济支持的商业功能之间的矛盾。更为复杂的是，即使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因为建立新闻机构的成本令人望而却步，大部分新闻工作者仍然必须依附于实行寡头管理的机构。

寡头管理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通常使个人很难听到对抽象问题的讨论，例如伦理问题或良知问题——至少在自己的新闻编辑部里很难听到。近些年来，博客的兴起和内容生产的民主化让公民可以发出监督政策、社会和媒体的声音，造就了一个由媒体权威和媒体批评家组成的新阶层。他们中一些人完全保持独立，另一些则在以监督媒体为目标的组织中工作，但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承担起一项前所未有的责任——监督主流媒体（MSM，mainstream media）。今天，如果新闻编辑部内部出现了麻烦，总会被泄露出来。如果某些组织逃避责任，就会有人指出来。因为害怕组织内部事务被外人议论，一些编辑已经不再发送备忘录或把决策诉诸文字。

这些新的监督力量不仅提高了对新闻编辑部透明度的要求，其中有些还协助揭露了《纽约时报》权力等级结构造成的伦理缺陷和过失，就像杰森·布莱尔事件那样。虽然网上大部分讨论局限在对媒体意识形态的指责上，不是批评它们过于保守，就是批评它们过于自由，但是一旦他们这么做，一旦这些批评确实严肃地发现新闻编辑部存在的问题，新闻产品的可信性将受到严重影响。

把这一后果铭记在心非常重要，因为不论我们是否能意识到其重要程度，归根结底，当我们选择杂志、电视节目、网站或报纸时，选择的是生产这些内容的新闻工作者的权威性、诚实与判断能力。此外，促进透明和开放的文化，使批评家没有机会对报道的可信性提出质疑，这也是新闻工

作者责任的一部分。

因此，新闻工作者应该了解的最后一个工作原则，也是我们公民在选择媒体时凭直觉意识到的原则。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则，但是该原则把其他九个原则联系在一起：

**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按良心行事。**

每个新闻工作者，不论是从事业务工作还是从事管理工作，都应该有道德感和责任感，即道德罗盘。此外，他们还有责任大声说出自己的良心话，并且让周围其他人也这么做。

为了让新闻工作者能够按良心行事，管理者和所有者必须创造一个开放的新闻编辑部，这种环境对于实现本书提到的原则至关重要。数不清的障碍让新闻工作者很难制作出准确、公平、均衡、关注公众、具有独立思想和无畏精神的新闻报道。如果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氛围允许人们可以对彼此的前提假设、感知和偏见提出意见，这种努力就会被扼杀在襁褓之中。要让新闻工作者感到可以自由地（甚至受到鼓励）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我觉得这则新闻带有严重的种族歧视”，或者“头儿，你的决定是错误的”。只有能让人畅所欲言提出不同看法的新闻编辑部，才有机会准确地预测和反映美国文化中越来越多元的观点和需求。

简而言之，新闻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意识到，为了做到公平和准确，他们有义务向编辑、老板、广告主甚至公民和权威表达不同看法，乃至质疑这些人的看法。

反过来，那些拥有和管理新闻机构的人也要鼓励和允许员工履行个人义务。在媒体的未来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那种认为只要保持个人忠诚就万事大吉的看法显然过于天真。许多新闻工作者十分担心自己会被下一波裁员潮扫地出门，以至于连想都不敢想去挑战权威以及有缺陷的组织文化。因此新闻机构（更重要的是联合大企业）及其母公司要建立培养个人责任的文化。此外，管理者必须愿意倾听，而不是仅仅把问题和担心当作麻烦来解决。

本书没有专辟一章讨论伦理问题。那是因为这一道德维度，以及判断、风格、品味和人格的优劣正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某本杂志、某个电视节目或某个网站而不是其竞争对手的原因。伦理问题贯穿在新闻工作的每个原则之中，作为公民，我们对伦理问题比新闻工作者更敏感，他们有时

会把伦理与其他问题割裂开来。

芝加哥的新闻播报员卡萝尔·马林(Carol Marin)在热心新闻工作者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说："我认为新闻工作者就是坚持那些本可放弃的信仰的人。"[3]

1993 年,NBC 的《日线》正在策划制作一则名为《等待爆炸?》("Waiting to Enplode?")的报道,宣称通用汽车某型号卡车的油箱在撞车时容易破裂并起火,该报道的记者对此表示担忧。虽然记者米歇尔·吉伦(Michele Gillen)收集到了真实事故的录像,在那次事故中司机因被困在车中而受伤,但是她心里清楚,NBC 做的撞车实验并没有得到同样的结果,虽然出现了小火灾,但是火焰只持续了 15 秒钟就自己熄灭了。因此当得知电视网为了让效果更明显,安装了引爆装置又进行了新实验,吉伦做了一件自从加入该节目 7 个月以来从没做过的事。她从家里给上司杰夫·戴蒙德(Jeff Diamond)打了一个电话表示担心,希望停止新实验。

戴蒙德告诉她,自己认为这段视频会引人注目,要加到节目中去。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来来回回争论了几天,但是当制片人保证在节目最后会就她所关心的问题加上说明时,戴蒙德最终说服了吉伦给新的撞车实验配音。这个实验画面会标上"非科学实验"的字样,并把结论留给专家。

然而这则新闻并没有明确说明吉伦提到的所有问题。它没有提到火势会持续多久,何时会自行熄灭。不论如何,最终吉伦违背自己的本意,同意给节目配音,原因正如她后来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信任执行制片人,如果他说一切没问题,就意味着他能最大限度地对我以及节目的利益负责,所以我必须相信他"[4]。但是吉伦错了,这宗令人尴尬的人为引爆事件成为 NBC 新闻历史上最大的丑闻。

这一事件说明道德罗盘的问题是多么复杂。良知问题不能打折,就像《日线》事件里发生的那样。良知必须得到尊崇。保护良知的重担不应全部落在个人身上,否则会把人压死,就像吉伦起先的反抗。如果吉伦的反对意见被采纳,NBC 新闻就能避免这起最终导致新闻部主任迈克尔·加特纳(Michael Gartner)辞职的尴尬丑闻。

如果吉伦事件发生在今天,最大的不同可能是新闻编辑部外的交流会更加活跃。互联网上的新型媒体批评和评论会支持吉伦,并更加迅速有力地攻击 NBC。

再看一个例子,可能不如汽车爆炸事件那么重大。2005 年 8 月 19 日清晨,MediaBistro. com 网站一个提供新闻界消息和资源的博客

TVNewser爆出了一则新闻——鲍勃·科斯塔斯(Bob Costas)拒绝主持前一天晚上CNN的《拉里·金访谈》,因为那个话题让他不舒服。[5]科斯塔斯偶尔会代替金主持这个节目。这一期节目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纳塔利·霍洛韦(Natalee Holloway),一个来自阿拉巴马的十几岁女孩,在2005年5月去阿鲁巴岛(Aruba)的毕业旅行中失踪。到8月时,关于霍洛韦的报道已经成为一个媒体现象,一些有线电视频道连续进行长达数小时的现场报道。

Mediabistro网站的博客TVNewser说,此信息来自"匿名的信息提供者,该人对科斯塔斯'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原则不报道这种垃圾新闻'表示欢迎…… TVNewser采访了科斯塔斯,但是后者没有对此做出回应"。这则新闻被证实,到下午时,美联社的通稿已经发到了各个地方。科斯塔斯后来在声明中说:"我认为周四节目的主题不是我应该做的那种。我建议换个题目,但是制片人更倾向于他们选定的这个。我对这个决定没有什么意见,于是有礼貌地拒绝了参与这期节目的制作。"[6]

美联社的新闻里说,科斯塔斯和CNN对最终做出的决定都没有什么不满,但是这并未阻止博客们和批评家们在接下来的数周里对此事进行评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赞扬了记者的决定,写下了题目诸如"终究有一个负责的新闻工作者!"、"谢谢你,鲍勃·科斯塔斯"或"鲍勃·科斯塔斯的诚实"等的博客日志。

## ◉ 凭良心办事之不易

在新闻工作中引入良知的要求会产生另一个矛盾。作为必要措施,新闻编辑部是不讲民主的。这里一般实行的是蛮横的独裁制。在权力链条顶端的人必须做出最终决策——跟踪这条新闻还是不理会它,保留这段该死的引语还是将其删除。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大多数报纸、网站或电视台这样的大型组织便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新闻发布。不仅如此,现代新闻编辑部为了在商业经营和新闻风格上创造统一的公司文化,不断地要求团队合作。虽然这种做法便于管理,但是新闻编辑部的单一文化与遵从个人良心的原则会产生冲突,因为后者会引入诸如准确、对公民负责等其他价值观以及报道社群所必需的多样的知识。虽然管理者仍然拥有最终决定权,但是他们要明白,在他们决策的过程中,必须向所有人敞开大门。正如鲍勃·伍德沃德所说的,他的工作让他明白一件事情:"最

好的新闻经常是在和管理者的对抗中完成的。"[7]

在某种意义上，管理者要看到更大的整体利益和眼前的蝇头小利是不同的。虽然安静而同质的新闻编辑部更容易管理，但是要实现新闻公司的整体更大的和更抽象的利益，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文化。允许编辑部的每个人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良心话可能会使报纸更难管理，但是它会使新闻变得更准确。

我们所遇到的许多记者（如果不是大多数记者的话）都对这一道德良心的观念深信不疑。比尔·柯蒂斯（Bill Kurtis）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合作者说："每个记者都必须建立自己的规则和标准，规划和规范自己的事业。"[8]

刚开始写媒介批评时，乔恩·卡茨（Jon Katz）就意识到做新闻工作需要道德良知，而做新闻批评工作则对道德良知的要求更高。他觉得有义务坐下来写下自己的伦理准则。他对我们的研究合作者说："我认为如果你想要自己的工作有意义的话，必须把它放在道德语境之中。不论做什么，做事的方式都应在道德上使你得到满足。"[9]

大多数新闻工作者不会像卡茨这么正式。他们只是感觉到新闻工作和道德密切相关，而且知道自己的背景和价值观会指导自己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汤姆·布罗考对我们的研究合作者说："我的直觉和成长环境……我的感情经历和教育经历让我多年来相当坚决地坚持某种信念，我时时注意到它们对我的影响。"[10]

很多新闻工作者都有强烈的伦理意识，这也正是他们被这个行业吸引并投身其中的原因。他们开始对新闻感兴趣通常是在二十几岁或十几岁时，许多人被这个行业最根本的特征所吸引——呼吁人们注意社会系统中的不公平，把人民联系在一起，创造共同体。在我们和皮尤人民与新闻调查中心一起进行的新闻工作者调查中，上述几个选项以超过其他选项一倍的票数成为新闻最突出的特征。[11]简言之，对于该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个职业具有道德的特征。

这些新闻工作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职业的道德维度，因为如果缺乏了道德，他们将在伦理决策的灰色地带孤立无助。正如卡萝尔·马林告诉我们的，因为"新闻无定则……所以你做什么不做什么，最终决定于你自己的道德罗盘"[12]。

作为受众，我们受到新闻工作者决定的引导，他们决定报道什么、如何报道，同时，我们也受自己选择的引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哪些媒

体组合是由一系列微妙的理由决定的，但是这种道德判断是这些理由的其中之一。我们在寻找需要的信息的同时，还在寻找正确性、权威性、诚实，以及寻找一种新闻工作者把我们的利益放在心上的感觉。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马林(Marin)自己在芝加哥的经历。1997 年初的时候，她是芝加哥 WMAQ 的主播，NBC 拥有并运营该地方电视台。管理该台新闻部门的乔尔·奇特伍德(Joel Cheatwood)为了提高面临激烈竞争的晚间 6 点档新闻节目的收视率，想出了一个点子。奇特伍德的所谓名声来自于他在迈阿密的业绩，当时他使用“所有时间所有内容都与犯罪有关”的策略，把福克斯的一个附属台改造成了当地收视率第一的电视台，这次在芝加哥他打算使用不同的手段。他想邀请吉瑞·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在新闻后面做点评，斯普林格曾是一位不受欢迎的市长，后来转行做了谈话节目主持人。斯普林格就是芝加哥人。他一直用 WMAQ 的演播室为辛迪加节目公司录制谈话节目，内容都是些怪异的三角恋和演播现场的暴力冲突。

当奇特伍德宣布了他的计划时，WMAQ 的员工顿时觉得非常郁闷。难道他们也加入猎奇节目(shock-show)的经营了吗？他们本以为自己是在做重要的事情，与公共服务相关的事情。最终，马林决定不能再忍下去。她认为 WMAQ 已经把自己降格为不讲道德的小人。她其实早就被管理层列为暂时留用以观后效的人员，因为她曾经拒绝为一则健康报道配音，理由是电视台与当地一家医院合作，用广告换新闻。现在又遇上了斯普林格。马林不再抱任何幻想。虽然她不是圣人，但是就像做人要讲伦常一样，新闻工作者要讲道德，名誉就是生命。名誉是新闻工作者所拥有的一切。她决定辞职。

当马林在镜头前宣布自己的决定时，同事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观众可以在直播中看到他们。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个公众人物在工作中采取这样的伦理立场意味深长。马林跳槽到另一家电视台，随着她的离开，WMAQ 的收视率也开始下滑。

后来，马林对人们的反应肃然起敬，尤其是“信件和电子邮件的数量和质量……人们的信很长，在许多信里会提到三点。他们会说明自己与新闻的关系……介绍自己的背景……说明自己曾经遇到的道德两难……重要的是，我认识的一位芝加哥律师在信中说，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类似斯普林格这种选择。我和一些不愿缺斤短两的小贩交谈过，其中的一位还因此丢了工作。一位房地产银行家因为不愿意在湖畔森林项目的

评估上弄虚作假而丢掉了芝加哥银行的两个重要客户”[13]。

新闻工作者所遇到的角色问题，我们消费者并不陌生，我们也在判断我们认为可靠而可信的人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角色。

## ◉ 诚实的文化

“新闻工作者能否凭良心做事远比他们相信什么或把什么信仰带进了工作中重要得多。”报纸同业协会(Newspaper Guild)主席琳达·福利(Linda Foley)在热心新闻工作者委员会的论坛上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可信性比客观性更重要……新闻编辑部应该形成一种允许新闻工作者自由开放地进行讨论的文化。”[14]

纽约联合神学院的荣誉退休教授唐纳德·施赖弗(Donald Shriver)不久以前刚为四本有关新闻伦理的书写了书评，他在为佛罗里达州波因特学院准备的新闻伦理手册中这样写道：“波因特新闻伦理学大纲最大的用处在于，它说明了应该如何从‘本能反应’的伦理走向成熟的反思和推理，在此基础上对伦理规则做出自己的评价。在这些规则中，居于首位的就是‘合作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允许同事检查你的新闻。考虑到大部分新闻编辑部都存在着截稿日期紧和记者互相竞争的现实，这一建议基本上形同虚设。但是，如果承认新闻是公民相互对话的中介的话，从新闻编辑部就开始对话似乎也合情合理。”[15]

有趣的是，新闻史上一些最正确的和最难做出的决策正是通过施赖弗所说的这种合作完成的。凯瑟琳·格拉汉姆在 1971 年决定出版五角大楼文件，这个决策过程异乎寻常地公开。当司法部决定起诉《纽约时报》并阻止该报向公众发布秘密的五角大楼文件时，格拉汉姆必须做出决定，《华盛顿邮报》是否要冒着被起诉的风险发布这些文件。她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这个决定的：

> 本[布莱德利(Bradlee)]发现自己两头受压，编辑和记者坚决主张出版刊登，在出版自由问题上支持《时报》，律师则建议妥协，并建议《邮报》不要在星期五刊登这些文件，但是可以通知司法部长本报将在星期日刊登这些文件。霍华德·西蒙斯(Howard Simons)百分之百支持刊登这些文件，他召集记者们和律师直接对话。
>
> [唐·]奥伯多弗(Oberdorfer)说这个妥协方案是“我听到的最馊

的主意”。[查默斯·]罗伯茨(Roberts)说《邮报》对司法部长简直“卑躬屈膝到极点”;如果《邮报》不刊登这些文件,他将提前两周退休,改为主动辞职,并且公开谴责《邮报》胆小怕事。默里·马德(Murrey Marder)回忆说,“如果《邮报》不刊登这些文件,对整个机构形象的破坏将比刊登严重得多,”因为报纸的“可信度将因为缺乏报道新闻的勇气而毁于一旦”。[本·]巴格迪基安(Bagdikian)提醒律师注意,邮报如果要信守对[丹尼尔·]埃尔斯伯格(Ellsberg)的承诺①,就应该刊登这些文件,并且宣称“维护出版权的唯一方式就是大胆出版”…… 吉恩·帕特森(Gene Patterson)……第一次就此事的后果向我发出警告,他说他相信不论是否刊登文件,最后的决定都将由我做出,他“知道我已经完全意识到这张报纸的精神正受到威胁”。

“天啊,你真的认为会严重到这个程度吗?”我问道。是的,吉恩说,他确实这么认为……

尽管充满恐惧和紧张,我还是鼓起勇气说:“去吧,去吧,去吧。一起干吧。让我们登吧。”[16]

《纽约时报》当时的社论专栏作者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在17年后写道:

后来在研究这个事件时,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哈罗德·埃德加(Harold Edgar)和贝诺·小施密特(Benno Schmidt Jr.)在一篇法律评论中说,该事件标志着美国新闻界“一个时代的结束”。过去的时代“政客与新闻界之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但是现在,通过力排众议,刊登有关越南战争的秘史,新闻大报“显示新闻界的大多数人不再愿意只扮演小骂大帮忙的角色,而想成为政府的对立者”[17]。

就在五角大楼文件案后一年,《华盛顿邮报》开始了对水门事件的调查。

## ◉ 思维的多样性是真正目标

在思考新闻的人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闻编辑部内部的公开对话

①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1931— )是美国兰德公司的前美国军事分析员,他于1971年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泄露了五角大楼文件。这份高度机密文件披露了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是如何决策的。

是实现多样性和代表性的最核心的基本因素。

“新闻编辑部是否形成了某种文化?”ABC的查尔斯·吉布森(Charles Gibson)在一次热心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论坛上问道。“你们会彼此质疑吗?你们会交谈吗?你们会相互激励吗?”[18]

“让我来说说我所在的新闻编辑部的基督徒文化”,普利策奖得主、《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戴维·阿申费尔德(David Ashenfelder)回答说。他是基督徒,而且是底特律郊区的一个大型每周圣经研究小组的成员。“他们从不谈及此事。他们害怕被人们嘲笑。他们就在我周围。我知道周围谁是基督徒。我们似乎有点偷偷摸摸的,我们会彼此交流,会在我们自己人之间交流。我们最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只能在自己人之间进行交流?”[19]

按传统的看法,新闻编辑部的多样性概念主要用民族、种族和性别数量来定义。新闻行业很晚才意识到,新闻编辑部应该与整体文化保持一致。例如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在1978年才正式确定了目标,要求在美国报纸工作的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应该反映总人口中该族裔的比例——但是这一目标至今仍未实现。这些目标,及其他未得到实现的事实,都非常重要。数量上的配额措施牵涉到公正性,同时也是使新闻成为所有人的新闻的重要一步,这样,公民权和民主才是每个人都能企及的。[20]

但是把问题放到个人良知这个更大的语境下观察,就会发现,对多样性的这一传统定义固然重要,但是仍然过于狭隘。它有把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的风险。让更多的少数族裔进入新闻编辑部确实是多样性的目标之一,但却不是多样性的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建设准确而具有代表性的新闻机构。民族、性别和种族的配额是实现该目标的手段之一。但是如果新闻编辑部的文化要求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只用一种思维方式思考,那么即使是实现了某种比例也等于零。地方报纸或电视台可能会像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口头禅——“看上去很美国”,但是却和社群想不到一处,无法理解社群或没有能力报道它。

多样性的目标不仅是建设一个在人口比例上与社群相似的新闻编辑部,而且还是开放和诚实的,这样的多样性才能发挥其功能。这不仅限于种族或性别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社会阶层或经济的多样性。它也不仅是统计数字上的多样性。它是我们所说的思维的多样性(intellectual diversity),它涵盖其他所有的多样性并使它们更具有意义。

为多样性而奋斗的人们逐渐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一直以来我

们在定义多样性时，过于注重性别和遗传因素，其实人们表面上看来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实大同小异。”在得克萨斯教新闻的梅塞德丝·德尤里安缇(Mercedes de Uriarte)在另一次委员会的论坛上说。“我们过于频繁地把这种所谓多样性推广到信源身上，他们只是在重复那些让我们觉得舒服的话，其实正反双方只代表极少数人。但是，在我们的新闻中，仍然很难看到思维方式的多样性。根据美国文化学者的定义，思维多样性是美国人最难接受的事物之一。”[21]

不幸的是，思维多样性的观念也很难被管理者所接受。在种种原因的作用下，目前的趋势是建立和上司思维方式完全一致的新闻编辑部。

## ◉ 使人违背良心的压力

导致新闻编辑部走向同质化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人性。“编辑倾向于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他人。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不讨编辑的喜欢，就得不到提拔。因此在这个行业内存在着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纽约每日新闻》的专栏作家胡安·冈萨雷斯在委员会的一次论坛上说。[22]

当时，《底特律新闻》的保守专栏作家汤姆·布雷(Tom Bray)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雇佣体系很难让人敢冒着风险不拘一格用人。当人们被排除在我们所定义的主流之外……就很难获得发展机会。”[23]

另一个问题是任何组织都存在官僚主义惰性。官僚主义导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按照正常情况行事。惯例成为安全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新闻机构及相关的商业、社群、生产和其他利益群体错综复杂，等级森严。个人很容易落入到所谓的多重合理化过程之中，受到掣肘或打击，无法按良心的要求行事。即使事情还没完全核实，但报道“必须”现在就发出，因为截稿时间不等人。在辩论的敏感时期，也许不要碰那个话题为妙。我们的实力不容许这期发这么长的报道。类似的理由不一而足。

某些新闻工作者一直在组织外工作。他们只听从个人责任感的指挥，这些个人可以为着某个单纯的目标(有时这个目标十分独特)报道新闻，通常他们发现的是被别人忽略、回避或看不到的真相——这些人中包括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乔治·塞尔迪斯(George Seldes)、I. F. 斯通(I. F. Stone)以及更近一些的如戴维·伯纳姆(David Burnham)和查尔

斯·刘易斯(Charles Lewis)。

正如前面所说的,管理行动、思想完全一致的新闻编辑部更容易。因为最终新闻编辑部要服从生产效率。他们要填满播出时间、网页或版面。在这种气氛之下,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能完成的新闻就是好新闻。因为每日出版或播出节目的工作越来越像生产线,所以必须尽量让生产过程顺利、高效。

## ◉ 建设能够使良心和多样性茁壮成长的新闻编辑部

对于新闻生产者来说,或许最难的是认识到自己的长期健康依赖于新闻编辑部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其效率。为了长期利益,新闻编辑部的文化应该向更复杂和更挑剔的方向发展。所有者、编辑或管理者素质的主要表现,就是看他们能否长期不懈地坚持向这个方向努力。

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困难重重,但是新闻史上类似的事例还是层出不穷,有的表现为合作,有的甚至表现为对抗,有的说明它是如何出现的。有一些新闻机构似乎自然地会崇尚自由并鼓励凭良心做事的文化。

其中一个模式就是通过公开、明确的示范,制造一种氛围,使这种文化至上而下得到推行。或许最好的例子就是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讲述的第一次见到奥威尔·德赖富斯(Orville Dryfoos)的故事,德赖富斯当时刚刚成为《纽约时报》的社长:

> 那是1962年初,好像是2月。自从1961年7月以来,我一直被派驻在刚果,刚刚被召回纽约领奖。一个人走到我的办公桌前,自我介绍说他叫奥威尔·德赖富斯。"我听说你回来了,"他说,"我想对你说,我十分钦佩你的所作所为,我们都知道你为此冒了多大的危险。正是这种努力使这张报纸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正是这种态度,以及社长和记者之间可以如此轻松地进行交谈,让这张报纸的新闻编辑部与众不同。[24]

最后,大多数新闻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都认为,与所服务的公民进行交流是比新闻工作更重要的使命。这是天职,在新闻编辑部工作的每个人都要为该使命服务。对管理者而言,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助新闻工作者尽最大可能完成该使命。《萨克拉门托蜜蜂报》(*Sacramento Bee*)前总编、麦克拉奇报团的副总裁格雷戈里·法夫里(Gregory Favre)后来到波因特

学院任教，他经常向新闻工作者谈起这个更强的使命感。

> 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危急时刻，你都在帮助人们。你帮助他们彼此交流，让人们听见许多不同的声音，为他们成为合格公民提供所需的信息。你帮助他们建立跨越差异的桥梁。你也有义务质疑自己，就像质疑别人一样。你有义务按照在报道中要求别人的那样生活和工作。你有义务帮助改变我们的文化，使它更具有关怀性、多样性，更具有人文色彩（不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以道德为外壳，即使在危急时刻也不会分崩离析。[25]

事实上，法夫里是在告诉新闻编辑部的人员，这一使命至关重要，新闻工作者有义务保护和强化该使命，这既是为了先辈，也为了子孙。

## ◉ 公民的角色

等式的最后一部分，是作为社群成员的公民如何参与这个过程。他们具有什么责任？新闻工作者通常的反应是，如果新闻界失职——过于煽情或偏袒而成为娱信——最终会导致公民的失败。他们说，如果人们想要更好的新闻，市场可以满足他们。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逻辑的最大问题是，目前的新闻并不是由完美的市场制造出来的。以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地方新闻为例，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华尔街要求的收益率的影响。我们从新闻管理人员那里了解到，一张报纸的特征主要受到所有者的价值观的影响。新闻工作者日常决策的质量受到编辑和新闻编辑部文化的极大影响。此外，新闻的运营方式也起着重要作用。报纸总体而言是垄断产业。电视台必须持有公共频段执照才能运营，所以它们基本上也是寡头垄断经营。目前，互联网的历史还不长，很难预测它的市场状况如何。

市场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提供公民想看的新闻。它还按照华尔街、媒体所有者、新闻培训机构和新闻传统的要求，向公民提供新闻。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如果要落实新闻工作者首先忠于公民的原则，新闻工作者和公民之间必须建立起新型关系。这是最新的新闻工作的原则，这个原则一直存在，但是进入新世纪后变得更加明显、更加重要——那就是公民的角色。

## 注 释

[1] 这一描述源自 2006 年 3 月本书作者科瓦奇对利希特布劳和伯克的采访。

[2] CNN. com, "Top New York Times Editors Quit," March 1, 2004; available at www. cnn. com/2003/US/Northeast/06/05/NYTimes/resigns/.

[3] Carol Marin, at CCJ Forum, Chicago, November 6, 1997.

[4] Benjamin Weiser, "Does TV News Go Too Far? A Look Behind the Scenes at NBC's Truck Crash Test,"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8, 1993; available at www. washingtonpost. com.

[5] "Did Bob Costas Refuse to Fill in for Larry King on Thursday?" *TVNewser*, August 19, 2005.

[6] Bill Carter, "Bob Costas Says No to Hour on Amba,"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2005, E1.

[7] Bob Woodward, Nieman Fellows seminar, Harvard University, Fall 1998.

[8] Bill Kurtis, interview by William Damon, Howard Gardn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unpublished interviews for the book *Good Work: When Excellence and Ethics Mee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9] Jon Katz, interview by William Damon, Howard Gardn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ibid.

[10] Tom Brokaw, interview by William Damon, Howard Gardner,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ibid.

[11] CCJ and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Striking the Balance: Audience Interests, Business Pressures and Journalists' Values," March 1999,6; available at www. journalism. org.

[12] Marin, at CCJ Forum, Chicago, November 6, 1997.

[13] Ibid.

[14] Linda Foley, at CCJ Forum, Ann Arbor, MI, February 2, 1998.

[15] Donald W. Shriver Jr., "Meaning from the Muddle," *Media Studies Journal* (Spring/Summer 1998),138.

[16] Katharine Graham, *Personal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97),449.

[17] Anthony Lewis, Eleventh Annual Frank E. Gannett Lecture, Capitol Hilton Hotel,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8,1988.

[18] Charles Gibson, at CCJ Forum, Ann Arbor, MI, February 2, 1998.

[19] David Ashenfelder, at CCJ Forum, Ann Arbor, MI, February 2, 1998.

[20]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1999 Newsroom Census: Minority Employment Inches Up at Daily Newspapers"; available at www. asne. org.
[21] Mercedes de Uriartre, at CCJ Forum, St. Petersburg, FL, February 26, 1998.
[22] Juan Gonzalez, at CCJ Forum, New York City, December 4, 1997.
[23] Tom Bray, at CCJ Forum, Ann Arbor, MI, February 2, 1998.
[24] David Halberstam, interview by author Kovach, June 10, 2000.
[25] Favre delivered a version of this speech at the Portland *Oregonian's* annual Fred Stickel Award ceremony in April 2006.

# 第11章

#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2005年7月7日上午，三枚炸弹在伦敦地铁爆炸，紧接着另一枚炸弹在一辆双层公共汽车上爆炸。这一系列与2004年马德里火车爆炸事件类似的自杀性爆炸袭击导致52人死亡。

英国广播公司(BBC)深知这条新闻的重要，派出了大量记者，力争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同时，如新闻部主任理查德·萨姆布鲁克(Richard Sambrook)所写，也要“获得真实的信息”[1]。事发当天，BBC得到了伦敦市民前所未有的帮助。袭击发生6小时后，BBC收到了1 000多张照片，20多段视频，4 000多条文字信息，2万多封电子邮件——它们全都来自市民。

BBC一直以来鼓励公民参与新闻报道，但是遇到像这样的参与情况还是第一次。“公众来稿的数量和质量之高，使这种参与不再停留在追求时髦、做样子和偶尔为之的层面，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的工作。”萨姆布鲁克回忆道。

除了对这些反应感到惊讶外，BBC将这些材料善加利用，甚至开了一档新闻节目，专门播放市民提供的视频素材。萨姆布鲁克把关于伦敦事件的报道称为合作伙伴关系(partnership)，并提到他的组织明白了“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公众可以给我们提供大量可供播出的新鲜信息”。

科技使公民有能力参与新闻报道，并在危急时刻成为传统媒介的合作伙伴。BBC与公民的互动模式还证明，突发重大事件并不是公民新闻可以或应该产生作用的唯一机会。

BBC促进公民参与的措施还包括：

- 数字讲述项目(Digital Storytelling Project),开始于2001年,在各地建立工作室,以10人为一期,由BBC的专业人员传授撰稿、录音、图片编辑和视频编辑的技术。到目前为止,超过500人参加了培训,他们制作的不少新闻都播出了。
- 在BBC苏格兰台的协助之下,苏格兰沿岸一些岛屿的政府实施了一个被称为岛屿博客(Island Blogging)的媒体参与项目。这些岛屿博客每人得到了一台可以窄带上网的个人电脑,可以用它发布照片和故事,还可以就许多社区问题发起讨论。他们甚至还发布突发新闻,比如鲸鱼搁浅事件,这些新闻后来被苏格兰的主流媒体采用。
- BBC行动电视网(The BBC Action Network)向公民提供一个讨论与自身相关话题的论坛,让公民重新参与政治过程。

BBC还有一些其他想法正在酝酿中,包括全球对话(Global Conversation)。萨姆布鲁克把它看做"全球公共空间",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民可以相互交流。这些措施之所以有可能实现,原因是科技的发展赋予了公民前所未有的权力。新闻事业刚刚才开始探索公众如何更好地参与日常事件。要实现目标,需要长期努力,而且很可能不会一帆风顺,公民和新闻工作者还需要协商和妥协。

"作为这一新方向的支持者,我建议BBC的员工不要放弃准确、公平和客观的义务,"萨姆布鲁克写道,"在对公众稿件开放的同时,必须要求这些稿件与我们的编辑方针和价值观相一致。当然,我相信,通过向更多观点和视角开放,通过吸纳观众的知识和理解,真实、准确、公正和观点的多样性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从发明机械印刷技术开始,历时200多年的知识扩散,导致了西方社会的结构转型。通过印刷文字带来的知识扩散,人民变成了由知识武装起来的公众,形成公众意见,参与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中。这些扩散到广大人民中的信息大多是通过我们后来所说的新闻活动来完成的。正是这些信息,帮助人民成为知情的公民,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才能形成公众意见。反过来,公众意见使自治成为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与民主是同时诞生的。在最初阶段,新闻只是向人民提供那些控制他们生活的权力机关的活动和制度运行的信息。今

天，当世界淹没在信息海洋之中时，新闻界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当信息极大丰富到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时，新闻与需要信息的公众之间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正如新闻价值观在新的竞争条件下没有改变一样，新闻的角色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过去新闻的角色只是提供信息，充当自治的工具，但是现在它的角色是向公民提供需要的工具，帮助他们从当前传播系统生产的谣言、宣传、流言、事实、判断和指责的大杂烩中，提炼出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因此，新闻工作者不仅要使人理解世界，而且要帮助公民理解收到的信息的意义。

为了做到这一点，新闻工作者首先要邀请受众参与新闻生产过程。正如我们在第 4 章关于核实原则中详细讨论过的那样，在要求被报道的人民和权力机构公开透明的同时，新闻工作者也必须尽力让自己及自己的工作公开透明。

这种努力是新闻工作者有效地与公民建立新型关系的起点。它让受众有机会对新闻工作者的原则做出裁判。他们拥有的信息让他们有能力比较这些原则与其他可能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它给了公众一个平台，可用于裁决是否愿意支持这些新闻。

在这个意义上，公民也承担着义务。我们不妨把它作为新闻工作的第十个原则，这个原则随着赋权的新媒体的到来而日益重要。

在新闻的问题上，公民享有权利，同时也要承担义务。

他们必须摒弃偏见，在判断新闻工作时，要以它是否有助于增强公民改变社会的能力为基础。当然，新闻工作者吸引公众参与的方式，不仅应该包括提供公众需要的内容，还应包括向公众解释新闻工作的原则。通过这种方法，新闻工作者就能发现公众是否能够成为优质新闻的促进力量。

显然，市场的需求是影响今天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因此，为了自己的利益，新闻工作者也应尽其所能创造一个能让本书所描述的新闻得以生存的市场，报道可信、及时、有代表性、全面的新闻，帮助受众理解我们的世界和生活的空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想办法让构成市场的消费者了解新闻的生产过程——我们如何工作、如何决策。

这对公民意味着什么？更准确地说，我们公民应该对新闻机构提出什么要求？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十分重要。新闻工作的原则不仅属于新闻工作者，也属于公民，原因很简单，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头提到的，这些原则的来源不是某种职业精神，而

是新闻在人民生活中的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工作的原则既是新闻工作者的义务法案，也是公民的权利法案。伴随着权利而来的自然是公民的义务——随着21世纪公民参与新闻能力的提高，该义务不断增加。那么，怎样才能判断我们接触的新闻是否符合新闻的基本原则？有必要列出公民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法案

### 1. 关于真实性

我们有权要求报道中包含证明自己诚实可信的证据。这意味着核实的过程，即新闻工作者如何及为何做出此决定，必须透明。应该有明确的信息表明这是经过了无偏见的检验过程的。我们要能够判断信息中隐藏的价值观和偏见。

为了履行这个义务，我们应该要求报道遵守哪些原则？一则新闻应该清楚地说明信息来源和知识根据。应该清楚地说明这则报道的重要性和相关性。要明说报道中未得到解答的重要问题。如果报道中涉及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应该要求对此做进一步报道。其他新闻应该继续这场公共讨论，这样才能做到去伪存真。换句话说，新闻不应该只顾吸引我们的注意，还应当反驳我们，促使我们思考。

反过来，这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公民同样有义务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新闻，不要只希望新闻与既有的观点保持一致。

### 2. 关于忠于公民

我们希望在新闻中看到证据，证明提供这些资料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给我们使用。这意味着新闻应该满足我们作为公民的需求，而不只是为被报道者和政治或经济体系服务。这同样也意味着应该表明新闻工作者是在努力理解整个社区。

或许最好的判断方法，是观察一直以来新闻是否做到了尽量避免刻板印象。在新闻里，刻板印象通常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真实，但是在被报道的那则新闻中并不适用的抽象概括。如果一则本地的犯罪新闻只关注社区的一部分，而忽视了犯罪实际上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社区，这其中就存

在刻板印象。一般来说，操作失误会导致刻板印象。这类刻板印象一般可以通过增加采访和进行多点报道加以避免，我们可以在许多认真的报道中看到使用这两种方法。

我们还应该希望明确看到：新闻公司有些时候为了在新闻、艺术和商业评论、消费和零售业报道中向我们提供重要信息，会把公司自己的利益置之度外。凯瑟琳·格拉汉姆在决定刊登五角大楼文件时，正是这么做的，还有无数其他人每天也都在这么做，他们有的在餐厅评论中批评报纸的广告主，有的毫不留情地报道当地的重要产业。

对公民忠诚，同时意味着当某个新闻涉及同一集团下的兄弟公司、合作伙伴或利益相关群体时，新闻工作者敢于大胆揭露。这也包括对本企业的游说进行报道——有时组织为了让政府制订对本企业有利的措施，会对政府施加压力。我们也有充分理由要求新闻提供者透明运作，就像我们期待他们这么要求其他权力体制一样。

### 3. 关于独立

我们有权要求评论员、专栏作家和报道观点的新闻工作者进行的辩论是在为公民的利益服务，而不是只为一小撮人的利益服务，或为某个预定的结论服务。

在那些跟在某个小集团或相关利益群体后面亦步亦趋的评论中，不存在独立精神。举例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保守的评论员有时批评共和党人，自由派评论员有时批评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忠诚于公民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虽然不必完全中立，但应该要求他们不能一仆二主。我们有权要求他们：不要为被报道或被评论的人写演说词，或秘密地为他们提供意见。因为我们依赖言论作者帮助公民们从冲突和错综复杂的问题中理出头绪，我们有权期望在他们的文章或报道中看到确凿的证据，期待他们仔细考察他人的看法。

### 4. 关于权力监督

我们有权要求有人监督最重要的权力中心和最难监督的权力中心。监督的对象除了政府以外，还包括其他拥有经济权力、强制权力、社会权力、道德权力和说服权力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权力与政府相当，甚至超过政府。

由于调查的角色授予新闻媒体相当大的权力，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权

力被小心谨慎地加以使用。这意味着新闻机构要承担引导的责任——发现最新的、重要的、能改变社区已有规则的事物。我们有权期待从监督者的身上看到新闻机构对公共利益认真负责。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期待这种权力不要浪费在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虚假的丑闻上，比如凝固型酸奶的细菌安全标准或宾馆床上无害的灰尘数量。相反，新闻机构应该把时间和资源集中到重大问题、意想不到的大奸大恶之人、新的威胁之上，就像《纽约时报》在 2000 年总统竞选结束几个月后，重新回头调查共和党如何在佛罗里达州大规模地操纵计票工作，把缺席票也计算在内。

**5. 公共论坛**

我们应该要求新闻提供者创造一些我们能够相互交流的渠道。这些渠道应该包括信件、电子邮件、电话、聊天室讨论、给嘉宾言论留出的栏目(专栏)空间、提供新闻线索和内部调查员。这些渠道还应包括媒体工作人员定期出现在公共集会上，比如论坛、市民俱乐部、家长—教师协会的会议、小组讨论和互动的广播、电视节目。

新技术和互联网赋予公民更多权力，削弱了版面空间给传统媒体造成的限制，我们有理由期待自己能制作内容，或为新闻报道增加内容(就像 BBC 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

通过这些接触方式，我们希望长此以往，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能够反映在新闻报道之中，而不是以重大事件中的极端看法的方式出现。如果要实现民主制度的妥协的理想，我们应该希望媒体的公共论坛的建设向着促进社群理解的方向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妥协。

权利也意味着义务。作为公民，我们有义务以开放的心态接触新闻，当新事物出现时，愿意接受新的事实，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作为公民，我们也有义务出现在公共论坛上，或者向编辑发送电子邮件或信件。简言之，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不仅对新闻从业人员适用，也适用于公民，公民们必须在维系此关系中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6. 关于代表性和吸引力**

我们有权希望新闻工作者了解我们作为公民的最基本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我们有及时深入地了解社群重大问题和趋势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又没有时间和途径去接触大部分关键信息。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权希望新闻工作者利用特有的接触事件和信息

的机会，把收集到的材料放到能够吸引我们关注的语境中，长此以往，让我们看到这些趋势和事件对于我们的真正意义。我们不希望看到那些短期热点被过分炒作或者为了商业目的被歪曲。1997 年，全国和地方媒体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对篮球讲解员马弗·艾伯特(Marv Albert)的案件进行了集中报道，报道的焦点又集中在他的性习性和难看的假发上，与国家公共事务没有任何关系。像这样只是为了追求收视率而进行报道不是在为受众服务，而是在剥削受众，长此以往不免会疏远受众。

所以，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对大量生活中的问题发出声音，并在广听博闻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我们有权要求新闻报道反映那些威胁社区的危险(比如犯罪)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反映社区生活正常良好的一面。我们的成功应该和失败一样得到表现。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讨论过的两个新闻的基本原则——核实和良心——没有在公民权利里出现。这是因为一些原则可以从公民应该如何认知这些权利的角度进行重申，而有一些原则应该从另一些角度进行理解。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核实作为新闻真实的必然特征，被包括在真实性的题目之下。同样，良心原则作为公共论坛功能中新闻提供者与公民互动的一部分，列在公共论坛的标题之下。

如果这些权利未得到实现，我们公民应该怎么办？例如，要是报纸在报道商业或政治欺诈时没有进一步深入报道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首先，效果最好的是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和信息强过谴责咒骂。其次，如果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就再提一次，或者通过多种途径提出。例如，要是电子邮件没有得到回复，就再发送一次，然后拿起电话或写信，同时抄送给总编。如果想让其他公民也了解你的申诉，把你与该组织的接触过程和他们的反应通过博客公之于众。

如果我们公民向新闻组织做出了这些反馈，但是我们的文稿、想法或批评被忽视，又应该怎么办？只有把权力当成权利，它们才会成为真正的权利。在这个时候，拒绝与该媒体进行经济往来。不再订阅，停止收看。最重要的是，清楚地说明你这么做的原因，并把它寄给总编或媒体批评家，或者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如果我们公民过于消极，甘愿忍受质量不断下滑的产品，市场机制就会失效。过去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但是今天的传统新闻组织已经不能垄断某些内容。如果我们有理有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很可能会倾听并与我们对话。

最后，可能正如卡罗尔·马林所说的那样："新闻无定则。"但是我们的研究和与新闻工作者、公民的对话告诉我们，确实存在一些永恒的关于新闻传播和新闻工作者角色的观念值得被定义。这些观念经过了潮起潮落，有时被误解和滥用——通常是被那些打着它们旗号的行为所误解和滥用。但是它们并不是虚构出来的。新闻的基本原则是在三百多年信息市场竞争的经验和考验中熔炼和锻造而成的。它们缘起于新闻在人民生活中的功能。新闻的生产者必须使用这些原则在工作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道德之路。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冒险偏离这些原则。

我们在这里列出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即我们的新闻理论遗产，构成了新世纪新闻工作的基础，新世纪的新闻工作是建立在综合、核实和绝对独立基础上的解惑工作。这些原则也是用来抵抗那些威胁要摧毁新闻事业进而削弱民主社会的唯一保护伞。这些威胁包括把新闻界纳入商业话语的世界，或不加区分地把新闻当成一般性传播活动。要避免这些威胁，唯一的方法是新闻工作者进一步清楚准确地理解这些使新闻工作更有价值的基本原则。一个透明的企业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市场需求，它通过邀请公民参与信息生产过程，用对话而不是单向演讲将新闻与公民重新联结在一起。这个转变不是公民和新闻工作者某一方能够控制的；为此，双方都必须承担一些责任。

历史通过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社会的公民只能获得为某个利益服务的信息，他们只能按这些信息行动，那将会发生什么。无论这些信息是独裁国家的宣传，还是骄奢淫逸的有闲阶级用面包和马戏团来统治国家的命令，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公众始终感到苦恼。他们越来越担心新闻存在偏见，不确定新闻媒体是否真的会为民主提供保护。但是如果就此说国家正面临新的危机，甚至说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已经持续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又有点夸大其词了。虽然从某些指标（其中包括新闻是否足够职业化并且具有道德）上看，公众对新闻媒体的态度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了整体恶化，但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后，或者比尔·克林顿遭弹劾事件后，美国人比以前更相信媒体。

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人中对媒体持"喜爱"态度的人在增加。[2]接近四分之三的美国人继续认为新闻媒体应该是独立的和超然于党派的。这些数字中没有什么奇妙的公式。公众欣赏矢志追求为公众利益服务、力求做好做对并勇往直前的媒体，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并且越

来越明显。人们表示严肃质疑的，是新闻工作者是否能做到这些，以及那些拥有新闻机构的公司是否仍然支持他们这么做。

人类文明创造了一个最强大的理念——人民可以自治。这一理念衍生出大量未曾被清晰表达过的信息理论来支持自己，这些理论被称为新闻学(journalism)。自治的理念和新闻理论这两者密切相连、荣辱与共。这本书正是想清晰地表达该理论的一次尝试。我们最盼望实现的未来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它其实远没有回忆中那么美好。当然，在数字化的新世纪，在对技术和法团复兴的信仰重新复苏的时代，只有不忘过去、不忘传统的新闻理论，我们才能获得自由。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为了对抗这种技术乌托邦，我们经历了两次传统的世界大战和一场秘密的冷战。我们未必能在下一次战争中幸存下来。

## 注　释

[1] Richard Sambrook, "Citizen Journalism and the BBC," *Nieman Reports* (Winter 2005), 13—16; available at www. nieman. harvard. edu/reports/05-4NRwinter/Sambrook. pdf.

[2] 对媒体持"喜爱"态度的美国人的比例由 2004 年 12 月的 43%增加到 2006 年 2 月的 53%。这些数字来自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Bush a Drag on Republican Midterm Prospects," February 9, 2006。

# 致　谢

本书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作品。它是多年来热心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和 1 200 名新闻工作者的集体成果，他们不仅贡献了自己的看法和时间，还对这部作品表示了关心。许多人给本书提供了宝贵的信息，300 多人来到了我们的论坛，提供了真知灼见，好几百人回答了我们的问卷调查，接近 100 人坐下来接受了我们的研究合作者长达数小时的采访。我们写作此书的目的不是提出新闻应该成为什么样，而是勾勒出新闻工作者已有的共同看法。因为新闻工作者十分独立，以至于一直拒绝把这些思想集中在一起，甚至拒绝有意识地让它们指导自己的工作。但是当新闻工作与其他信息传播方式的区别变得混淆不清、疑惑难解的时候，我们相信，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更有必要把这些目标和职业理论清晰地表达出来。对于那些怀疑自身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这十分重要。对于刚进入新闻编辑部的新一代来说，这也十分重要。对于那些迫切希望看到可信新闻的公众来说，这同样十分重要。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如果我们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那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帮助。如果失败了，那是因为我们辜负了大家的信任。

我们还要专门感谢一些人。这个名单由 Dante Chinni 开始，他是我们的合作伙伴、研究人员以及第一版的顾问。对于第二个平装版，我们要感谢 Cristian Lupsa，他参与了我们的研究，同时担任顾问和评论家。这个协会刚建立时，Amy Mitchell 是协会早期运作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论坛、监督调查研究以及负责协会的其他工作。这本书里留有她的职业精神、组织协调能力和幽默的印记。Tom Avila 接过了 Amy 的工作，在协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负责管理工作，他把协会看成是自己的作品，呵护有加。Carrie Brown，Wally Dean，Brett Mueller 和一大群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组成了协会流动课程的新闻培训教员；他们的工作为新版提供了许多新的观点。此外，我们还想感谢 Howard Gardner，Mihaly Csikszentmihalyi

和 William Damon 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Damon 还成为我们培训新闻工作者的伙伴。还有几位重要的朋友的鼓励、意见、编辑和指导对本书写作起到关键作用，他们中包括 James Carey，他始终深化着我们的想法，刺激着我们的想象力，还有 Roy Peter Clark，Tom Goldstein，David Halberstam，Richard Harwood，John Kovach，Jim Naughton，Geneva Overholser，Sandra Rowe，Matthew Storin 和 Mark Trahant。

卓越新闻项目的工作人员也非常关键：这一名单包括 Nancy Anderson，Jennifer Fimbres，Stacy Forster，Chris Galdieri，Carl Gottlieb 和 John Mashek。哈佛大学尼曼奖金项目的 Julie Dempster 也给了我们重要帮助。我们的策划委员会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还要大力感谢那些和我们一起合办、合作组织论坛的大学、报纸和个人，有几次他们还为论坛提供了资金，其中包括帕克基金会（Park Foundation）。与全国各地新闻工作者的交谈为本书的新版提供了很多信息，John S. 和 James L. Knight 基金会（致力于改善全球新闻工作的委员会）慷慨的资助使这些交谈得以实现。我们还要感谢经纪人 David Black 的信心和热情。还要感谢皇冠出版社的编辑们，首先是 Bob Mecoy，然后是 Annik Lafarge 以及现在的 Lindsey Moore，感谢他们对这个项目的信任。

如果没有皮尤慈善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的 Rebecca Rimel 和 Don Kimelman 的资金和个人支持，这个项目也不可能完成，他们始终对我们充满信心。他们非常值得信赖。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参与创造《第一修正案》然后再赋予它意义的新闻先驱们。正是他们的遗产让我们有责任确保新闻界的自由和独立，并最终实现它给人民带来自由的承诺。

# 译后记

这本书的翻译要追溯到2003年，一位正在美国学传播的朋友送了我这本书的第一版。我翻看后非常喜欢，遂萌生了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这本书的念头，便把它推荐给了一家在新闻传播类图书出版方面颇具权威性的出版社，但对方说考虑一下，就没有了下文。中间我讲过两年硕士学位班的专业外语课，把这本书作为教材，做了一些准备工作。2008年，北大出版社将此书纳入出版计划，购买了版权。

2008年我申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青年骨干教师的海外访学的项目。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堡传播学院研修之余，我和妻子晓东合作完成了本书的翻译。一般是我先译出初稿，由她对照原文校读和做文字编辑，然后再由我统稿。这本小书的译稿也纪念了我们在费城43街Osage一间三层顶楼studio里度过的从圣诞到晚春的快乐时光。

首先要感谢高钢教授，他屡次提到对此书的喜爱，没有他的鼓励和敦促，这本书的翻译可能还停留在计划中。杨保军教授同样也是此书的“粉丝”，他也关心此书的出版并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建议。还要感谢陈力丹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此书写了非常中肯的推荐语。

同时要感谢宾大安纳堡传播学院全球传播研究中心（CGCS）的Monroe Price教授，他不仅安排了我的访学，还帮助我联系到本书的作者之一科瓦齐教授。该院的Barbie Zelizer教授不仅肯定了我的翻译计划，还分享了她对本书的看法，让我颇受启发。

本书的两位作者也对中文翻译工作十分关心。科瓦齐教授不仅解答了我信中提出的问题，还和罗森斯蒂尔一起为中文版写了序言。他们的指点为翻译工作清除了不少障碍。

北大出版社的周丽锦和张盈盈两位编辑专业、严谨的工作态度令人钦佩，她们对译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避免了不少错误的发生。

当然，译文中肯定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这都是我的责任，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我的电子邮箱是 liuhailong@ruc.edu.cn。

刘海龙

2010 年 12 月 12 日于中国人民大学